嚈噠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嚈哒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 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嚈噠史研究／余太山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ISBN 978－7－100－08491－8

Ⅰ.①嚈… Ⅱ.①余… Ⅲ.①古代民族—民族歷史—研究—亞洲 Ⅳ.①K30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45824號

嚈噠史研究

余太山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491－8

2012年1月第1版　　開本 880×1230　1/32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10　1/8

定價：29.00 圓

目錄

附卷

緒說

嚈噠起源於塞北，大約在四世紀七十年代初，越過金山即阿爾泰山西徙索格底亞那（Sogdiana），控制了柴拉夫善河（Zarafshān R.）流域；直至五世紀初，力量還很弱小，一度役屬於新興的柔然。

五世紀二十年代中，嚈噠人渡過阿姆河，進犯薩珊波斯，被巴赫蘭五世（Bahrām V，420—438 年）擊退。

三十年代末，嚈噠人又南下吐火羅斯坦（Ṭuhārestān），戰勝盤踞該處的寄多羅貴霜人（Kidāra Kushāns），逐走其王寄多羅。

緊接著，嚈噠人自吐火羅斯坦西侵薩珊波斯，其時正值伊嗣俟二世（Yazdgird II，438—457 年）即位之初。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嚈噠、波斯戰爭的序幕從此揭開。最初十餘年內，波斯軍成功地阻止了嚈噠的入侵，且在伊嗣俟二世即位第十二年（449 年），一度轉守爲攻；然而四年之後，嚈噠人大敗伊嗣俟二世，不僅鞏固了在吐火羅斯坦的統治，還奪取了薩珊波斯東部的一些領土。

在戰勝伊嗣俟二世的同時，嚈噠人越過興都庫什山，山南乾陀

羅諸國皆役屬之。嚈噠人隨即發動了對笈多（Gupta）印度的戰爭，但被剛即位的塞建陀笈多（Skandgupta，約 455—470 年）擊退。

伊嗣俟二世身後，二子爭位，次子嗢沒斯（Hurmazd III，457—459 年）獲勝；長子卑路斯（Pērōz，459—484 年）倉皇外逃，求庇於嚈噠，並假嚈噠兵威奪取了帝位。

卑路斯即位後，波斯和嚈噠仍不斷以兵戎相見。最初，雙方各有勝負；但在一次戰役中，卑路斯中伏被困，不得已同嚈噠人訂立了屈辱的和約。484 年，卑路斯欲雪前恥，撕毀和約，戰端重開，這一次以卑路斯的陣亡和嚈噠人的全勝告終。

卑路斯的繼位者巴拉士（Balāsh，484—488 年）被迫連年向嚈噠納貢稱臣。

巴拉士遭廢黜後，登基的是曾爲質嚈噠的卑路斯之子居和多（Kavād I，488—496，498—531 年）。496 年，居和多一世因支援馬資達克教徒，亦遭波斯貴族廢黜。他越獄投奔嚈噠，嚈噠人與之聯姻，終使率軍復辟。

503 年，居和多一世在西線同拜占庭作戰，嚈噠人乘機又犯波斯。居和多一世急忙回軍應戰，並與拜占庭議和。此後一段時間內，嚈噠和波斯的戰爭時斷時續，處於相持狀態。

五世紀七十年代末，嚈噠人最終滅亡了偈趣於乾陀羅等地的寄多羅貴霜殘餘勢力，立特勤爲王，統治興都庫什山以南地區。

六世紀初，大約在佛陀笈多（Budhagupta，約 477—500 年）去世後不久，嚈噠人在頭羅曼（Toramāṇa）率領下，從乾陀羅入侵印度；約在 510 年或稍前推進至埃蘭（Eran）附近。此後，頭羅

曼繼續東進，直抵華氏城（Pāṭaliputra），可能是由於後方乾陀羅與罽賓發生糾紛，頭羅曼在佔領華氏城後，便引兵西歸，在抵達迦尸（Kāśī）時患病去世，傳位其子摩醯邏矩羅（Mihirakula）。

約517年以降，摩醯邏矩羅在乾陀羅與罽賓爭境。以後再次引兵東向，於531年前後佔領瓜廖爾（Gwālior），但旋被馬爾瓦（Malwa）的耶輸陀曼（Yaśodharmān）擊敗，撤至印度河以西。雖然此後嚈噠人仍不斷侵擾印度，但規模和影響遠非昔比了。

可能在殺死卑路斯以後不久，嚈噠人就積極向塔里木盆地發展，沿西域南北道自西向東推進。在北道，嚈噠的勢力到達焉耆以東；在南道則到達于闐；疏勒、姑墨、龜茲、鉢和、渴槃陀等國均役屬之；時在五世紀末、六世紀初。

在向塔里木盆地發展的同時，嚈噠又北上同高車爭奪準噶爾盆地及其以西。可能在六世紀初，嚈噠殺死副伏羅部所建高車國之儲主窮奇，擄其子彌俄突。嗣後，高車國主阿伏至羅殘暴失衆；部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爲主。嚈噠聞訊，再伐高車，納彌俄突爲高車主。516年左右，彌俄突爲柔然所殺，餘衆悉入嚈噠；嚈噠又納彌俄突弟伊匐爲高車主，有效地控制了高車國。

至此，嚈噠勢力臻於極盛，領土超過了昔日貴霜帝國的最大版圖。

六世紀中，突厥在北亞興起。546年前，其首領土門爲柔然擊敗鐵勒，居功求婚，遭柔然可汗阿那瓌訾辱，土門怒，斬使與絕，並於552年擊破之，阿那瓌自殺。在突厥的連續打擊下，柔然汗國終於全面崩潰。突厥盡有其地，西境遂同嚈噠鄰接。

在西方，庫薩和一世（Khusrau I，531—579 年）即位後，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薩珊波斯國勢於是轉盛。庫薩和一世一面繼續同拜占庭爭奪地中海等地霸權，一面同突厥聯姻結盟，共謀嚈噠。

六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突厥、波斯聯軍夾擊嚈噠，嚈噠國破。突厥、波斯以阿姆河爲界中分嚈噠領土。不久，突厥勢力繼續南下，佔有全部嚈噠舊壤。嚈噠餘衆則散處北亞、中亞和次大陸各地，漸與當地諸族融合。

嚈噠人自塞北遷至阿姆河流域後迅速强大起來，其原因在於當時貴霜帝國已經瓦解，西面的薩珊波斯和南面的笈多印度雖然力量不弱，但不足以深入內陸，而中亞的許多小國，人口稀少，無法抵禦嚈噠騎兵的長驅直入。

另外，嚈噠人一進入中亞，便控制和佔領了索格底亞那和吐火羅斯坦，兩地是當時東西陸上交通的樞紐。撒馬爾罕、布哈拉和巴爾赫等城市都是重要的手工業、商業中心，興旺的東西貿易增强了嚈噠的經濟實力，對於嚈噠的勃興無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嚈噠在中亞興起，有力地阻遏了柔然勢力的西進。蓋柔然自五世紀初葉起，就不斷向西方擴張，西域南北道許多城郭國家均曾役屬之。準噶爾盆地以西的遊牧部族如烏孫、悅般等也經常受到它的攻擊，它的騎兵還越過葱嶺進入索格底亞那，進而抄略阿姆河以南地區。顯然，它的勢力是隨著嚈噠日益强盛，並向東方發展，纔逐步退出中亞的。

嚈噠和薩珊波斯的對抗，持續了一百多年。長期戰爭的開支、

失地和賠款，大大削弱了薩珊波斯的國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馬資達克起義的爆發和此後庫薩和一世的改革。

嚈噠和薩珊波斯的對抗，還給予亞美尼亞和拜占庭局勢以重大影響。如所週知，薩珊波斯立國之初便同羅馬爭奪亞美尼亞，主要因爲該處是裏海和黑海之間的交通要衝。兩國勢力時盛時衰，對亞美尼亞的控制權也幾次易手。基督教成爲羅馬國教以後，因爲亞美尼亞人主要信仰基督教，故每逢波斯同羅馬交惡，亞美尼亞總是站到羅馬一邊。亞美尼亞這種對波斯的離心傾向，一直是薩珊王朝的心腹之患。自從巴赫蘭五世把亞美尼亞的波斯部份改爲行省後，歷代波斯皇帝爲鞏固在那裏的統治，多殘酷迫害佔亞美尼亞人口絕大部份的基督徒，鎮壓因此引起的反抗。但是，由於嚈噠在東方崛起，使薩珊波斯面臨東西兩線作戰的局面，它對亞美尼亞的政策，也就不能不受到嚈噠的制約。舉例來說，伊嗣俟二世從即位起，和嚈噠進行了長達九年多的戰爭，直到他認爲可以告一段落之後，纔把注意力轉向亞美尼亞，儘管他對亞美尼亞問題早已耿耿於懷。他對亞美尼亞用盡了威脅利誘的手段，力圖改變其宗教信仰，但不僅沒有奏效，反而激起了大規模的反抗。伊嗣俟無情地進行鎮壓，下令整個亞美尼亞的波斯部份都改信祆教。然而他對亞美尼亞的干涉和戰爭尚未結束，嚈噠人又在東部入侵，使他不得不再掉過頭來對付嚈噠人。由於伊嗣俟二世在453年戰敗且不久去世，亞美尼亞問題祇能擱置起來。又如：卑路斯陣亡前亞美尼亞的基督徒乘薩珊波斯全力對付嚈噠之機，武裝暴動，波斯接連派遣大軍鎮壓，均未能獲勝。亞美尼亞人逐走波斯

總督，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由於此後不久卑路斯戰死，嚈噠勢力囂張，繼位的巴拉士纔不得不向亞美尼亞建議談判，最後承認亞美尼亞人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那裏的拜火祭臺被拆除，基督教堂則得到修繕和擴建。

正因爲如此，拜占庭人絕不願意看見波斯與嚈噠之間出現睦鄰關係。而當居和多一世復辟後，爲維持同嚈噠的和平，不斷償付嚈噠所勒索的款項，而不得不向拜占庭借款時，拜占庭人斷然加以拒絕。他們認爲，用金錢去鞏固自己的敵人同嚈噠人的友誼是不明智的，上策應該是儘可能擾亂他們之間的關係。

顯而易見，祇要嚈噠的力量繼續存在於東方，並保持强大，薩珊波斯便不可能成功地向西方發展。而同拜占庭爭奪亞美尼亞和通商口岸，又是薩珊波斯的重大利益所在，這就是從巴赫蘭五世起，薩珊列帝都積極從事對嚈噠戰爭的根本原因。

嚈噠的入侵無疑也給笈多帝國帶來了災難。例如：塞建陀笈多雖然成功地擊退了嚈噠人，但也付出了不少代價，這明顯反映在錢幣的鑄造上。和早期笈多王朝的錢幣摹仿羅馬的款式、力求輝煌華麗不同，塞建陀笈多後期鑄造的金幣都按照古印度的 Suvarna 標準，含金量降低，設計、造型也比較粗糙，這是塞建陀笈多統治期間財政困難的表現。

嚈噠人的入侵還加速了笈多帝國從佛陀笈多以來開始的分裂。一般認爲，從佛陀笈多卽位起，雖然笈多帝國的版圖表面上並未縮小，但是它的權力和聲望已經大不如從前了。佛陀笈多可以說就是帝國名義上能行使最高權力的最後一位皇帝。佛陀笈多

以後，帝國的統一不復存在。先後出現的割據勢力有索拉什特立（Saurāshṭra）的梅特臘卡族（Maitrakas）、馬爾瓦的耶輸陀曼王、恒河上游的穆克里族（Maukharis），孟加拉的鴦伽國（Vaṅga），摩揭陀的後期笈多諸王，以及薩他泥濕伐羅（Sthānīśvara）建立的普士帕布蒂（Pushpabhūti）王朝等。他們都乘嚈噠人入侵引起的擾亂，或在抗擊嚈噠的過程中擴展了自己的實力和地盤，並相互展開了激烈的鬬爭。

笈多帝國終於崩潰了。一些學者完全歸因於嚈噠人的入侵。其實不然。像笈多帝國這樣一個大國，如果穩定、統一，外敵縱然强大，也不會滅亡。嚈噠首次入侵笈多印度，正值它的勢力上昇之際，但還是被塞建陀笈多擊退，而且有將近半個世紀不敢窺視笈多帝國。佛陀笈多之後，帝國陷於內亂，國力迅速衰退，嚈噠人這纔獲得了遠比以前成功的入侵。這種入侵不用說給了岌岌可危的帝國沉重的打擊，加快了局勢分崩離析的過程，但不能把這說成是笈多王朝滅亡的主要因素，因爲我們看到耶輸陀曼畢竟打敗了摩醯邏矩羅。因此，根據現有的資料，似乎衹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笈多帝國是從內部瓦解的，嚈噠人的入侵則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同它的興起一樣，嚈噠的滅亡也是十分迅速的。其原因主要在於征服者本身是一個由不同部落或部族組成的不牢固的集合體，這類集合體衹有處在不斷的遷徙或軍事行動中纔能維持，一旦行動停頓，便趨於渙散。嚈噠人一度控制了大部份中亞地區，但這種控制是單純依靠軍事力量建立起來的。嚈噠人沒有、也許根本

就不可能採取有效的行政措施，把這樣一片遼闊土地上語言、宗教、習俗千差萬別的各族真正統一起來。因此，在新興的突厥和中興的波斯聯合打擊之下，嚈噠國很快就破滅了。

嚈噠是一個遊牧部族，長期逐水草遷徙。進入中亞後，纔逐步向定居生活過渡。由於控制著當時歐亞陸上交通樞紐，嚈噠人也積極從事貿易活動。在嚈噠統治中亞期間，東西交通是暢通無阻的。嚈噠治下各小國，大多依舊有自己的國君和領土，有宗教信仰和遣使"朝貢"的自由。中亞各地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似乎並沒有因嚈噠人的佔領而受到影響。

嚈噠很可能是乙弗鮮卑的一支，後者似可溯源於高句驪。因其部落聯合體形成於塞北，受當地諸族的影響十分明顯。嚈噠有可汗、可敦、葉護、特勤等稱號，有殉死、剺面、截耳等習俗。嚈噠西遷後，以吐火羅斯坦爲統治中心，並一度南下北次大陸，因而在制度和習俗方面又受到治下和周鄰伊朗和印度諸族的影響。嚈噠人最初的宗教信仰不得而知；在進入中亞後，接受了祆教；後來隨著景教勢力的東漸，也有部份嚈噠人成了景教徒，進入次大陸的嚈噠人則在不同程度上改宗婆羅門諸教派。嚈噠人並不信佛，但一般說來不打擊佛教，歷來認爲嚈噠興起乃中亞佛教一劫之說並不可信。

我並不奢望通過本書揭示嚈噠史的本來面目，而祇是想說明它有可能是怎樣的。這主要是嚈噠史料的特點決定的。

嚈噠人沒有自己的文字，遺存的實物爲數寥寥，其周鄰中國、

波斯、印度、亞美尼亞、拜占庭乃至阿拉伯史家留下的記錄也極端貧乏，其中有許多隨著歲月流逝更成了斷簡殘篇，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之處比比皆是，以致嚈噠史研究迄今沒有跨出假說的階段。因此，我在研究的過程中，勢必對若干舊說下一番驗證的功夫，以期剝取諸說的合理內核，經過修正和補充，組成一種可靠程度較高的新說，至於“責備賢者”，雖係古訓，實非初衷。

一　族名、族源和族屬

嚈噠的族名，在中西史籍中有許多異稱和異譯。

在中國，《魏書》作“嚈噠”；《梁書》作“滑”；《周書》作“嚈噠”；《隋書》、《新唐書》作“挹怛”；《洛陽伽藍記》作“嚈噠”；《西蕃記》等作“挹闐”；《酉陽雜俎》作“厭達”；《册府元龜》作“悒怛”或“挹達”；《續高僧傳》作“厭怛”。

拜占庭史家如普洛科庇烏斯（Procopius, I, iii-viii）等寫作 Ephthalitai（Hephthalitai），阿伽提阿斯（Agathias, 338-340 = IV, 27-28）寫作 Nephthalitai，忒俄費拉克圖斯·西摩卡塔斯（Theophylactus Simocattas, VII, 7-8）寫作 Abdelai；如普洛科庇烏斯等又稱之爲 Huns（匈人）；普洛科庇烏斯、科斯馬斯（Kosmas, XI）又稱之爲“白匈人”；普里斯庫斯（Priskus, 33，41，47，51）還稱之爲 Kidāra Huns（寄多羅匈人）。

在亞美尼亞史籍中寫作 Hep't'al。史家如埃里塞（Elišē）還稱之爲 Kušan Huns（貴霜匈人）。

印度古文獻如《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 I, III, VI）、《毗濕

奴往世書》(Vishṇu Purāṇa, 177)，迦梨陀娑（Kālidāsa）的《羅怙世系》（Raghuvaṃsa, IV, 67-68)，以及笈多時期碑銘均稱之爲 Hūṇa（匈奴）；六世紀的天文學家彘日（Vārāhamīhira) 在所著《廣集》（Brihatsaṁhita, XI, 61）一書中稱之爲 Śveta Hūṇa（白匈奴）。

在敍利亞史籍中寫作 Abdel；507 年用敍利亞語寫的《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The 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 IX-XI, XIX, XXIII-XXIV）還稱之爲 Hunnāye（匈奴）或 Kūnānāye (Kūšānāye) d-hinnōn Hunnāyē（匈奴貴霜）。

在波斯史籍中，寫作 Heftal（中古波斯語）和 Hētal（新波斯語）。

在阿拉伯史籍中，寫作 Haiṭal（複數爲 Hayāṭila）。

此外，在粟特語文書中作 Heβtalit；在古藏語文書中作 Hebdel；等等。

其中嚈噠、囐噠、𠷿噠、厭達、厭怛、悒怛、挹怛、挹達、挹闐，Ephthalitai (Hephthalitai)、Nephthalitai、Hep'ṭ'al、Heftal (Hētal)、Haiṭal (Hayāṭila)、Heβtalit、Hebdel、Abdelai、Abdel 等，顯然是同名異譯。據拜占庭的忒俄法涅斯（Theophanes Byzantios）記載：戰勝薩珊皇帝卑路斯的嚈噠王名 Ephthalanus；並說："該族實得名於此王。"[1]《通典·邊防九·西戎五》"挹怛條"引劉璠《梁典》也說：

滑國姓嚈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

由此可見，此名得自王姓。一般認爲，在文獻中，此名最早

見諸《魏書》；[2] 據載：太安二年（456 年）嚈噠首次遣使朝魏。

其餘諸稱，似乎除了《梁書》的“滑”之外，均與匈奴或匈人有關。普洛科庇烏斯 [3] 說：

> 嚈噠人是匈人中唯一膚色較白，面目亦不甚醜陋的一支。他們生活方式確實並不野蠻，與其血親殊異。（I, iii）

因此，他在稱嚈噠爲“匈人”的同時，亦稱之爲“白匈人”。同時代的印度人稱嚈噠爲“白匈奴”，恐怕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蓋嚈噠有兩個族名，一個得自王姓，另一個便是“匈奴”或“匈人”。必須指出的是，這並不能說明他們和中國史上的匈奴乃至歐洲史上的匈人同出一源。四至八世紀活躍於歐亞草原上的遊牧部族多以“匈奴”或“匈人”爲號，舉其大者如 Chionitai、Khazār、Sabir、Onogur、Utigur、Kutrigur、Avar 等；[4] 又如《魏書·高車傳》稱高車爲“匈奴之甥”；《宋書·芮芮傳》稱柔然爲“匈奴別種”；《南齊書·魏虜傳》稱拓跋鮮卑“匈奴種也”。這些部族風俗大致與匈奴或匈人相同，故往往自稱、亦被稱爲“匈奴”或“匈人”；嚈噠亦其中之一例。然而，當時史家未必均有見於此。如普洛科庇烏斯雖將嚈噠與匈人加以區別，稱之爲“白匈人”或“嚈噠匈人”（Hephthalitai Huns），但仍認爲嚈噠是匈人之一支。當時的印度人似乎並不知道有“嚈噠”這一稱號，始終稱嚈噠人爲“匈奴”或“白匈奴”；在他們心目中，嚈噠和匈奴的關係如何，就不得而知了。至於拜占庭、亞美尼亞、敍利亞史家將嚈噠稱爲

“寄多羅匈人”、“貴霜匈人”或“匈奴貴霜”等顯然是由於嚈噠人進入中亞後，以原屬貴霜或寄多羅貴霜的吐火羅斯坦爲其统治中心的緣故。[5]

最後，我認爲：“滑”，《廣韻·入聲》（卷五）“户骨切”，發音猶如“胡”。“滑”實卽“胡”也。關於“胡”的意義，衆說紛紜；但陳寅恪指出：“胡本匈奴（Huna）專名，去 Na 著 Hu，故音譯曰胡。”[6] 其說明白可信。客觀上“滑”正是“匈奴”的異譯。[7]

對此，史學界歷來有不同看法，歸納起來，有以下三種：

1. 以“滑”爲王名，卽六世紀下半葉爲突厥 Singibū 可汗所殺之嚈噠王 Warz 一名之音譯，[8]

今案：此說未安。因爲嚈噠人於天監十五年（516 年）初次朝梁，其時梁人已稱之爲“滑”，《梁書·西北諸戎傳》且明載其王名“厭帶夷栗陁”。

2. 以“滑”爲都城名，卽今昆都斯附近的 Warwālīz 一名之缩譯。[9]

今案：此說欠妥。因爲嚈噠人的都城並非 Warwālīz，且首次朝梁時尚未定都。

3. 以“滑”爲地名，卽 Hari 河上游 Ghōr 一名之音譯。“滑”卽 Ghōr 原是受嚈噠控制下一小國，《梁書·西北諸戎傳》“其王厭帶夷栗陁”云云，不過表明該國其時處在嚈噠王厭帶夷栗陁治下而已。該國後爲嚈噠所滅，“滑”卽 Ghōr 就成了嚈噠的代名詞。[10]

今案：此說亦欠妥。《梁書·西北諸戎傳》明載：“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論者所謂 Ghōr 國爲嚈噠所滅云云，皆係想當然。嚈噠征服中亞，一般說來並不消滅原有的

土著政權。《梁書·西北諸戎傳》於嚈噠控制下的諸小國如胡蜜丹、呵跋檀、周古柯等都分别加以記載。遊牧部族以所征服地區的某一小地名爲族名或國號，似無先例；且不説 Ghōr 這一地名在六世紀初已經出現，還有待證明。

“滑”卽“匈奴”之異譯尚有一證。《通典·邊防九·西戎五》“滑國條”載：

滑國，車師之别種也。……至後魏時，謂之滑瓲。

可知“滑”乃“滑瓲”之省稱。“瓲”卽“囤”字，古音 duən；而 d 與 n 通，故可讀若 nuən，而“滑瓲”不妨讀爲 Hunuən，與“匈奴”發音相似。[11]

蓋梁人認爲“嚈噠”是王姓，全譯爲“厭帶夷栗陁”，並非真正的族名，乃按其另一族名稱之爲“滑”或“滑瓲”。之所以不譯爲“胡”或“匈奴”，則可能是梁人爲了把嚈噠和真正的匈奴區分開來，然而更可能是但聞其音，不知其實，猶如北魏人把嚈噠佔領下的粟特稱爲“温那沙”一樣。[12]

有關嚈噠族名的問題旣已澄清，便可以進一步探討嚈噠的族源和族屬。

嚈噠的族源，歷來衆説紛紜。中國古史就有高車説、車師説、大月氏説和康居説；西史則有匈人説。自十八世紀中葉起，東西學者對此作了大量研究，或附和、推衍康居説以外諸舊説，或另創新説。新説中較有影響的有柔然説、蒙古説、突厥説、伊朗説、

悅般說等。近代學者且大多力圖在查明族源的基礎上判定其族屬。

茲先略陳諸說之得失，再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1. 高車說：此說始見於《魏書·西域傳》：

> 嚈噠國，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至高宗時已八九十年矣。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13]

案：《魏書》修成於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至五年（551—554年）。其時，嚈噠國尚未破滅，且據《魏書》"本紀"，嚈噠遣使北魏至少有十三次，北魏使臣抵嚈噠也有二次，往來不可謂不頻繁，故所述必有依據，最應受到重視，試詮釋如下：

(1)"原出於塞北"：嚈噠來自塞北，故深受阿爾泰系諸族之影響，既有可汗、可敦、葉護、特勤等阿爾泰系諸族習見的稱號，又有殉死、剺面、截耳等阿爾泰系諸族習見的風俗。[14]

(2)"高車之別種"：既然所謂"別種"往往與"別部"同義，便不能逕視兩者同種；嚈噠語與高車語不同，正可佐證。

(3)"自金山而南，至高宗時已八九十年矣"：嚈噠首次朝魏在高宗太安二年（456年），故其人自塞北度金山即阿爾泰山南遷的時間當自456年上溯80—90年，約爲366—376年。又，嚈噠首次朝魏時已控制吐火羅斯坦，其人果遷自金山，勢必首先佔領索格底亞那，《魏書·西域傳》的記載證實了這一點。[15]

(4)"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剪髮"：纓絡、剪髮皆當時

伊朗族之風尚，故“類胡”之“胡”乃指當時所知伊朗系諸族。嚈噠人自金山南遷後，先佔領索格底亞那，後又立國於吐火羅斯坦，服飾遂有伊朗之風。《梁書·西北諸戎傳》載滑傍伊朗系諸國衣服“皆與滑同”，可以參證。

(5)“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一般認爲高車屬突厥語族，柔然屬蒙古語族，然而不能據此認爲嚈噠語既非突厥語族，又非蒙古語族，更不能據此認爲嚈噠語不屬阿爾泰語系。因爲阿爾泰語系並不祇有突厥、蒙古兩個語族，每個語族也不是祇有一種語言，古人不知今日的科學分類法，所言不免籠統。同理，傳文又稱其語與“諸胡”即當時所知諸伊朗語族不同，也不能因此完全排除嚈噠語屬伊朗語族或印歐語系的可能性。

要之，《魏書·西域傳》上引記載的價值在於指出了嚈噠起源於塞北，在四世紀六七十年代度阿爾泰山南遷。但是，尚不能據以判斷嚈噠的族屬和語言。

或以爲嚈噠應即高車（敕勒）。其說略云：匈奴被逐出塞北後，大部遷往歐洲，餘衆移至阿克蘇和喀什噶爾，復西徙抵裏海及波斯東境，後者即鐵勒或敕勒，因居於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地多水澤，被稱爲 Ab-te-le，意爲“水鐵勒”(Telites d'eaus)；Abtelites、Ephthalites 或 Nephthalites 蓋源於此。[16]

今案：此說似難成立。如前所述，《魏書·西域傳》其實並沒有視高車、嚈噠爲同族。不僅如此，《魏書·西域傳》還明載兩者之差異；除言語外，載嚈噠“無車，有輿，多駝馬”與《魏書·高車傳》所載高車“車輪高大，輻數至多”，顯然不能混爲一談。

2. 車師說：此說始見於《梁書·西北諸戎傳》：

>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

案："八滑"事見《後漢書·西域傳》：

> 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

"後部"卽車師後部。準此，"滑"是東漢時後部親漢侯八滑這個特定人物的後裔，滑卽嚈噠人也就成了車師人了。

近人主車師說者的主要依據便是上引《梁書·西北諸戎傳》的記載。[17] 此外，還有若干體貌、語言方面的證據。如說者以爲嚈噠人膚色較白，素有"白匈奴"之稱，故應爲白種。又以爲其語旣與柔然、高車及諸伊朗族不同，故有可能是吐火羅語，蓋一般認爲車師人正是操"所謂吐火羅語"的印歐人。質言之，《魏書·西域傳》關於滑卽嚈噠族源的記載是可信的。

今案：此說雖不乏有利的立足點，但不妥之處亦頗多。因爲《梁書·西北諸戎傳》有關記載並非來源於滑國使臣，也別無其他依據，可以說完全出於裴子野的武斷。《梁書·裴子野傳》載：

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乃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由此可見，梁人對滑的真正起源一無所知，即所謂“莫知所出”。裴子野斷定“滑”即“八滑”之後的根據，僅僅是漢字的偶然相同而已。

又，《梁書·西北諸戎傳》載：“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不用說也採取了裴子野說。“白題”似即《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行記”所載“跋提”國，從其王“姓支”這一點來看，有可能是一個月氏人的政權，亦與《漢書·灌嬰傳》的“白題將”無涉，致誤原因與指“滑”爲“八滑”之後同。

這種錯誤的比附，在《梁書·西北諸戎傳》中還可以找到，例如：以“末國”（Merv）比漢且末國。

既然滑即嚈噠人與車師人無關，在此對車師人的族屬、語言也就沒有深究之必要。《魏書·西域傳》有關嚈噠語的記載，既不足以說明嚈噠語不屬於阿爾泰語系，亦不足以說明嚈噠語不屬於印歐語系；同樣，似乎也不能僅僅根據拜占庭人關於嚈噠人膚色較白的記載斷定他們是白種，因爲膚色並不是判別人種的唯一標

誌，甚至不是重要的標誌。

總之，上述車師說是難以成立的。

3. 大月氏說：此說始見於《周書·異域傳下》：

>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畧同。

和《隋書·西域傳》：

>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

今案：《周書》、《隋書》晚出，故有關嚈噠族源記載的可靠性應低於《魏書》。蓋周、隋時人對於嚈噠的起源已茫然不知，而嚈噠人自塞北西遷中亞後不久，統治中心一直在吐火羅斯坦，該處自東漢以來先後曾在貴霜和寄多羅貴霜的統治之下，而中國對貴霜和寄多羅貴霜是一直如《後漢書·西域傳》所言“本其故號”，稱之爲“大月氏”的，故誤以爲嚈噠亦“大月氏之種類”。《周書·異域傳》、《隋書·西域傳》所述皆爲嚈噠定都阿姆河以南之後的情況，很可能時人以爲嚈噠人從來就居於該處。

近人持大月氏說者，除援引《周書》、《隋書》外，主要證據無非是指“月氏”與“嚈噠”得視爲同名異譯。[18] 如：一說“嚈噠”[I-ta, Y-tien, Yeta] 與“月氏”[Yé-tha, Yue-tchi] 讀音相同，兩

者又均居阿姆河畔，中國史籍先稱爲“月氏”，後稱爲“嚈噠”，實則同爲一族。[19] 一說“月氏（月氏）”原音或爲 Ghuthal，訛爲 Yuttal、Yettal，轉爲 Haythal、Ephthal，又轉爲 Khuttal、Khotthal、Khottalan 等；𠾨噠、嗽噠等乃譯自 Ghuthal (Khuttal)，嚈噠、挹怛等乃譯自 Yuttal（Yet-tal）。[20] 諸如此類。

今案：《周書·異域傳》、《隋書·西域傳》關於嚈噠族源的記載出諸誤解，已如前述。《魏書·西域傳》又有寄多羅月氏被嚈噠逐出吐火羅斯坦的記載，顯然不能僅憑名稱讀音之偶似，遽斷兩者同源或同族。[21]

此外，有人還在其大月氏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斷嚈噠爲藏族。[22] 其說頗多舛誤，可以勉强算作證據的僅僅是：《周書·異域傳》、《隋書·西域傳》均載嚈噠人一妻多夫，而藏族亦有此風。

今案：多夫制乃家庭在特定發展階段上出現的一種例外形式，與族屬無涉。事實上，此風並非嚈噠所固有，亦非藏族所獨有，不能據以斷嚈噠爲藏族。[23]

4. 康居說：《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

今案：此說連說者本人亦不敢深信，其誤自不待言。陳湯征郅支事見《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挹闐”今本作“抱闐”。

5. 匈奴說：西史多稱嚈噠爲“匈人”或“匈奴”，近人乃敷衍成說。[24] 除援引拜占庭史籍及印度碑銘外，有人還列舉以下理由

以證成其說：

（1）侵入歐洲的匈人係突厥韃靼人（Türk-Tartars）。

（2）入侵印度的匈奴王頭羅曼的稱號 Jauvla 係突厥語。

（3）比魯尼《印度考》（Táríkhu-l Hind of Bírúní）記載，664 年以降，伊斯蘭勢力入侵期間，喀布爾（Kābul）受突厥人統治；悟空亦載 753 年乾陀羅與喀布爾在突厥人治下。[25]

今案：此說未安。僅憑名稱不足以斷兩者爲同族，故無須在此深論匈奴或匈人的族屬。嚈噠起源於塞北，受包括突厥語族在內的阿爾泰語系諸族的影響，是勢在必然，一二語彙相同亦不足以證實嚈噠爲突厥語族。至於比魯尼和悟空所載，是西突厥的情況，與嚈噠無關。

6. 柔然說：據稱，社崙於 402 年創白匈人第一王朝，自號丘豆伐可汗。經數代，傳位至敕連可汗吳提。巴赫蘭五世在位時，吳提曾入侵薩珊波斯。吳提死，處可汗立。處可汗死，受羅部真可汗予成立。此可汗卽波斯史家所載助卑路斯登基的 Khūshnāwaz。470 年魏顯祖擊破予成，殺白匈人兵五萬餘。予成死於 485 年，子豆崙繼立，號伏古敦可汗。494 年其將軍阿伏至羅叛變，白匈人第一王朝遂告滅亡。阿伏至羅卽拜占庭的忒俄法涅斯所載戰勝卑路斯的 Ephthalanus；嚈噠一名乃得自此人。[26] 如此等等。其誤一望而知，誌之以見嚈噠史研究遞進之蹟。

7. 蒙古說：說者認爲，在印度記錄中，除了稱嚈噠爲 Sveta Hūṇa 外，還稱之爲 Hāra Hūṇa。Hāra 應卽突厥語或蒙古語的 qara（黑色的）；Hāra Hūṇa 應卽 Qara Qūn。由此可見，Sveta Hūṇa 的原

詞應爲 Čaγan Qūn；Čaγan 在蒙古語意爲“白色的”。吐火羅斯坦的城市 Čaγāniyān（石汗那）也因嚈噠佔領而得名。因此，嚈噠人應爲蒙古語族。[27]

今案：Hāra Hūṇa 一名究竟如何詮釋，衆說紛紜，迄無定論。說者所言也未必可信，很難想像印度人在稱嚈噠爲“白匈奴”的同時又稱之爲“黑匈奴”。[28] 何況，上說即使正確，也不足以成爲判斷嚈噠人語言繫屬或族屬的根據。

8. 突厥說：說者[29] 提出以下證據：

（1）泰伯里（al-Ṭabarī）稱巴赫蘭五世時入侵薩珊波斯的嚈噠人爲突厥人。

（2）乾陀羅的嚈噠統治者有“特勤”這一突厥族常見的官號。

（3）據太羅那特（Tāranātha）《印度佛教史》（Geschichte des Buddhism in India）載，在無著和世親時代，迦濕彌羅的統治者是突厥王大三摩吒（Mahāsammata，大敬愛王）。該王信仰佛教，并有吐火羅、鶻悉那等地，在各處多建伽藍，世親弟子衆畝（Saṁghadāsa）等頗受崇敬。然此王之父君臨迦濕彌羅時，曾迫害佛徒，毀壞堂塔精舍。世親約爲笈多時代人，故上述突厥王應即嚈噠王。

（4）中國史籍稱嚈噠人風俗與突厥同。

此外，還有人認爲嚈噠人起源於阿爾泰山這一點已足以證明嚈噠人屬突厥語族。因爲該處是突厥語族的發祥地。[30] 至於嚈噠人中有若干習俗類似伊朗族，乃是西遷後受影響所致。

今案：以上論據不足以證實嚈噠屬突厥語族。

(1) 泰伯里所載巴赫蘭五世時入侵薩珊波斯的“突厥人”確係嚈噠人，但這並不能成爲嚈噠與突厥同族的根據。泰伯里所謂“突厥”乃是突厥興起以後伊朗人對伊朗以外遊牧部族的泛稱。

(2) 風俗或稱號等相同有可能是影響使然，不能據以判斷族屬。嚈噠人的風俗既有類似伊朗族者，稱號亦有同於伊朗族者，論者並未逕指嚈噠爲伊朗族。

(3) 太羅那特已是十八世紀人，所載未可全信。何況嚈噠人既不滅佛，也不信佛。衹此一端，已可見所謂大敬愛王父子與嚈噠無關。

(4) 突厥語族的發祥地究竟是不是阿爾泰山，尚未有確證。何況《魏書》僅籠統記載嚈噠起源於塞北，南遷時取道阿爾泰山，如此而已。

另外，有人認爲 haftal 或 haptal（卽 Ephthalitae）詞尾的 l，乃是阿爾泰語集合名詞的詞尾。[31] 今案：嚈噠人本身並無文獻遺留至今，故無從確指其人對自己的稱呼，即使能證明西史所見其族名是 hafta (hapta) 與 -l 或 Eftal 與 -itae 的組合，也不能因此認爲嚈噠屬阿爾泰語系或突厥語族。[32]

9. 伊朗說：這在學界影響頗大，以下就其代表性說法 [33] 略陳己見。

說者最重要的論據是：嚈噠的發祥地在吐火羅斯坦東部。其立足點則在否定《魏書·西域傳》關於嚈噠起源於塞北、自阿爾泰山南遷的記載。

基於對原本《魏書·西域傳》構成所作的考證，說者指出董

琬、高明西使報告中對嚈噠隻字未提，可見遲至437年嚈噠人尚未在索格底亞那和吐火羅斯坦出現（其實並非如此）[34]。因此，《魏書·西域傳》“自金山而南”云云便無法落實。而直至五世紀末、六世紀初，嚈噠纔同準噶爾盆地的高車發生衝突並并吞西域南北道諸國，也說明嚈噠乃起源於吐火羅斯坦，然後自西向東發展的。

今案：此說的根本弱點在於忘記了嚈噠是一個遊牧民族。誠如說者所言，嚈噠人確是在控制吐火羅斯坦之後，亦卽五世紀末、六世紀初，纔將勢力伸向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但是，這一事實同《魏書·西域傳》的記載並無矛盾可言，因爲嚈噠人完全可以自阿爾泰山南遷吐火羅斯坦，並在該處站穩腳跟後，再向東方發展。

爲了加强自己的推論，說者旁徵博引，爲嚈噠在吐火羅斯坦找到四個活動中心：Ghōr、巴爾赫、活卽阿援城（Warwālīz）和呬摩呾羅。並指呬摩呾羅爲唯一可能的嚈噠人的發祥地。然而正如《魏書·西域傳》所言，嚈噠人“夏還涼土，冬逐暖處”，凡水草豐美之處便是其人駐牧、並逐步定居之處。因此，卽使確如所言，在吐火羅斯坦存在上述嚈噠人的活動中心，也無助於其吐火羅斯坦起源說成立。

至於說者指呬摩呾羅爲嚈噠人的發祥地，主要的依據是《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的一段文字：

呬摩呾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邐迤，

> 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菓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歧，表夫父母。上歧表父，下歧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歧。舅姑俱沒，角冠全棄。其先强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鄰突厥，遂染其俗，又爲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

說者詮釋如下：

（1）"葱嶺之西，多見臣伏"，乃指嚈噠征服中亞的歷史。

案：其實不然。《大唐西域記》卷三對呬摩呾羅王的歷史有詳細的描述。據稱，該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乃往討滅之；"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可惜嚈噠人並不信佛，不可能扮演護法的角色。

（2）呬摩呾羅婦人的角帽，必定是嚈噠婦人的角帽，可知直到玄奘時代，該地仍然是嚈噠人最大的聚居地。

案：此說未安。因爲角帽並非嚈噠人所獨有。且《周書·異域傳》所載嚈噠婦人角帽之形制與此完全不同：一爲兩歧，表夫父母；一爲多歧，表丈夫多少之數。更何況嚈噠人在吐火羅斯坦經營多年，即或遺民於該處，亦不足爲奇。

（3）宋雲見嚈噠王當在呬摩呾羅附近，知該處乃嚈噠王冬令居地。

案：此推測即使成立，也與嚈噠人的起源毫不相干。

(4) 寄多羅被逐西遷，可見嚈噠人來自巴爾赫以東，上述四地中衹有呬摩呾羅符合條件。

今案：如此理解未免過於機械，嚈噠人來自阿姆河以北，寄多羅又何嘗不可能西遷？

(5) 嚈噠人的多夫制，說明它應起源於呬摩呾羅以南、興都庫什山中某一孤立的地區。

案：此說亦未安，詳見下文。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與此有關。《唐會要·安北都護府條》（卷七三）載：

> [貞觀] 二十三年（649 年）十月三日，諸突厥歸化，以舍利吐利部置舍利州，阿史那部置阿史那州，綽部置綽州，賀魯部置賀魯州，葛邏祿、悒怛二部置葛邏州，並隸雲中都督府。

又，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古藏文文書（No. 1283）“北方若干國君之王統敍記”載：

> 往昔，回鶻王頒詔：北方究竟有多少國君？命五名回鶻人前往偵察，此即其回報文書，係取自玉府也。
>
> 某地，漢語稱爲室韋（Ji-vur），突厥語稱之爲莫賀婆力（Ba-ker-pa-lig）。以此爲主體，在其上，有突厥默啜（Vbug-

chor）十二部落：

王者阿史那部（Rgyal-po-zha-ma-mo-ngan），頡利部（賀魯，Ha-li），阿史德部（A-sha-sde），舍利突利部（Shar-du-livi），奴剌部（駮馬,Lo-lad），卑失部（Par-sil），移吉部（Rngi-kevi），蘇農部（So-ni），足羅多部（Jol-to），阿跌部（Yan-ti），悒怛部（嚈噠，頡跌，He-bdel），葛羅歌布邏部（Gar-rga-pur）。

諸小部落中無國君，勝兵六千人。

據考證，該文書寫成於八至九世紀回鶻取代突厥稱霸漠北之後。[35]或以爲這則記載可視作嚈噠起源於北方之佐證。[36]而主伊朗說者則以爲文書提到的殘部是嚈噠人自西向東擴張進入準噶爾時留下的。質言之，不能用來證明嚈噠起源於北方。

其實，嚈噠的起源，《魏書·西域傳》自有明確記載，固毋須藉殘部以證明。這些殘部的由來，既可能是嚈噠人西遷時留下的，也可能是嚈噠人東進後留下的，甚或兩種情況都有，在此大可不必深究。問題在於主伊朗說者既知金山等地殘部之存在不足以證明嚈噠起源於北方，卻又用呬摩呾羅等地可能殘留的嚈噠人來證明嚈噠起源於吐火羅斯坦，何其矛盾乃爾。

要之，《魏書·西域傳》有關嚈噠起源和遷徙的記載最爲可靠，不容輕易否定。

主伊朗說者提出的另一重要依據是在嚈噠人的體貌和文化方面可以看到若干伊朗因素。今案：這是忽略了不同種族之間相互影響乃至融合的可能性。以下就說者提出的具體問題作一些剖析。

（1）體貌特徵

說者主要列舉了兩條。其一是拜占庭史家普洛科庇烏斯關於“嚈噠人膚色較白，面貌亦不甚醜陋”的記述。可是，膚色較白未必就是伊朗種。《太平御覽》卷三五九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秦［人］呼鮮卑爲白虜。”可見阿爾泰系的鮮卑人中也有膚色較白者。[37]

其二是前引《大唐西域記》玄奘關於呬摩呾羅王爲“釋種”即塞種（Śakas）的記述。說者認爲這說明玄奘看到了人種的差異。其實，論者承認普洛科庇烏斯的記載，亦即承認嚈噠人的面貌並不醜陋，何故又忽略玄奘關於呬摩呾羅人“形貌陋鄙”的記載。何況“塞種”這一概念，在當時也是比較模糊的。彌南（Menander）曾載波斯人稱突厥爲 Sacae（Fragment 10.2: Exc. de Leg. Rom. 7）。[38] 故不能因玄奘稱呬摩呾羅人爲塞種，遂斷其人爲伊朗族。換言之，即使能證實呬摩呾羅人是嚈噠人，亦何助於伊朗說之成立？

至於《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謂“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衣服相同，影響使然；容貌類似，因嚈噠人膚色較白，故云。

目前，唯一可據以瞭解嚈噠人體貌的資料，便是所謂《梁職貢圖》描繪的滑國使臣圖像。其像蓬頭、剪髮、無髭鬚，鼻亦不甚高大。按此體貌，連說者本人也不得不承認：與其說是伊朗系，不如說更接近於蒙古系。然而，他接著又表示懷疑來使是真正的嚈噠人。[39] 殊不知嚈噠當時遣使於索格底亞那或吐火羅斯坦，周

圖多爲伊朗族，何來阿爾泰人充任使者？更何況嚈噠多次遣使朝梁，梁人所圖畫使者形容，無疑爲其中之典型者。

（2）語言

《魏書·西域傳》載嚈噠人的語言與柔然、高車不同。說者因柔然說蒙古語，高車說突厥語，排除了嚈噠語屬阿爾泰語系的可能性；如前所述，這是不能成立的。何況，《魏書·西域傳》同時還說嚈噠語與“諸胡不同”，聯繫上文，“胡”應指伊朗族，依照說者的邏輯，當時所知伊朗各族，豈不也應在排除之列。

由於僅存的可以確定爲伊朗語的單詞或其殘骸寥寥無幾，完全不足以用來鑒定嚈噠人原始語言的繫屬，故說者不得不間接藉助近人發現的用希臘字母的半草體書寫的所謂“嚈噠文”。[40] 據云：以嚈噠草書書寫的文獻和銘文的語言與伊朗語頗爲類似，而其中卻找不出一個阿爾泰語單詞，這一事實就表明了嚈噠也屬於伊朗語族。今案：這也是有欠考慮的。

據《梁書·西北諸戎傳》，滑國即嚈噠人“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宋雲也說，嚈噠人“不識文字，禮教俱闕”（《洛陽伽藍記》卷五）。可知至少到六世紀初，嚈噠人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再者，誠如說者所言，上述半草體的出現，遠遠早於嚈噠人在吐火羅斯坦的出現，可見這並不是嚈噠人創造的。因此，這些所謂嚈噠文書即使果真是嚈噠人留下的，從中不能發現嚈噠人的原始語言又何足爲怪？實難設想，“旁國胡”會用自己的文字寫下嚈噠人原來的語言。更何況，嚈噠這樣的一個文化十分落後的遊牧部族進入吐火羅斯坦後，也完全

有藉用當地語言的可能。說者認爲，從語言學的角度上，不會發現對伊朗說的確切反證，我們不是也可以說，對於阿爾泰說，同樣的反證迄今也沒有找到麽？[41]

（3）宗教和習俗

說者認爲，《洛陽伽藍記》所引宋雲等關於嚈噠人宗教信仰，以及《梁書·西北諸戎傳》關於嚈噠人“事火神、天神”的記載，乃是嚈噠人爲伊朗族的根據之一，因爲拜火係波斯及其他伊朗族的一大特徵。

今案：其實不然，因爲宗教信仰是可以傳播的，與族屬沒有必然聯繫。嚈噠人最早的信仰雖已無蹟可尋，但嚈噠人的喪葬習俗與正統的拜火教徒截然不同，後者務將屍體剖陳山頭，以委鷹鷲，而前者卻是土葬的。這不正說明他們原來不是拜火教徒麽？

此外，《梁書·西北諸戎傳》載嚈噠人“氊屋爲居，東向開戶”，說者亦指爲伊朗族風習。

今案：北方草原民族多有此俗，如《北史·后妃傳》載“蠕蠕俗以東爲貴……營幕戶席，一皆東向”。又烏桓等亦同。既非伊朗族特有，也就不能用來判斷族屬。

如果談到習俗，應該指出的是，普洛科庇烏斯載嚈噠人有殉死之風；[42]《梁書·西北諸戎傳》載嚈噠人有“截耳”之俗；迦梨陀娑《羅怙世系》在頌揚羅怙的武功時，有以下詩句：

> 匈奴王后臉頰上的紅色證明了羅怙的成就，他向她們的丈夫顯示了他的英勇。（IV, 68）[43]

描寫的顯然是“匈奴”卽嚈噠人的剺面風俗。殉死、截耳、剺面三者均爲北方遊牧部族特有的習俗。[44]

至於嚈噠人“頭皆剪髮”，固可指爲伊朗之風，卻未嘗不可能是進入中亞後所沾染，也就是所謂“類胡”。這種風尚，北方遊牧部族時或有之，如《魏書·西域傳》載悅般“俗剪髮齊眉”，可以爲證。

最後，談談嚈噠人的一妻多夫問題。

通過說者的徵引，我們知道這種風俗並非嚈噠人所獨有，它在中亞各地、不同民族之間流行得如此廣泛，以致如說者所言，幾乎無法據以追溯一個部族之起源。但是，說者仍認爲探索這種風俗流行的客觀環境將大大有助於推斷一個部族的成長情況，而由於多夫制風俗乃是地區性村社的殘留現象，在文化上與其他地區是隔絕的，所以嚈噠原來是一個處於相當孤立環境中的民族；並指出，這個地區便是興都庫什山的某個山區。

案：此說未安。一則，嚈噠多夫制的成因，《梁書·西北諸戎傳》曾指出是“少女子”，這恐怕不過是相當然罷了。其成因主要是經濟的，地理環境卽使起作用，也衹是第二位的。卽便從地理角度來看，此風流行旣如此之廣，也可知足以形成此風的環境隨處皆有，何以獨指興都庫什山某地爲嚈噠人的發祥地？二則，說者在進行上述論述時，似乎始終忘記了嚈噠是一個遊牧部族，而且是一個騎馬遊牧部族，它怎麼可能長期處在一個孤立的環境中呢？

問題還不止乎此。有關嚈噠人一妻多夫的記載不見於《魏

書·西域傳》，因而不無理由懷疑這並不是嚈噠人的習俗，至少不是他們固有的習俗。[45]

10. 悅般說：此說可概括如下：[46]

（1）匈奴崩潰以後，原來隸屬匈奴的若干部族度阿爾泰山沿天山北側西向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遷徙。《魏書·西域傳》所載“自金山而南”的嚈噠，和“其先”爲“匈奴北單于之部落”的悅般，雖然各有其起源傳說，其實是同一個遊牧部族，不過中國史籍的表述有所不同而已。

（2）嚈噠首次在中國史籍中出現是北魏高宗太安二年（456年）；而悅般最後一次在中國史籍中出現是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以後就下落不明。因此，可以假定嚈噠的出現是悅般於上述八年內西向移動的結果。宋雲西使時報告嚈噠北境與敕勒即高車相接，暗示當時嚈噠已佔有天山北側。如此大規模的開疆拓土，也衹有認爲嚈噠即悅般纔能理解。

（3）嚈噠在中國史籍中也寫作囐噠、嗽噠、挹怛、揖怛等，可見“厭”既可讀作“嗽”、“囐”，也可讀作“挹”、“揖”；“達”可讀作“旦”。“悅般”之原音應爲yet-pat，[47]即使“般”不讀pat，而如現存日本音，讀作pan，也可與“嚈噠”的異譯“挹怛”相對。因此，把“悅般”看作“嚈噠”、“挹怛”的異譯乃至訛音，不致大錯。

（4）《舊唐書·地理志三》列舉了西域十六個都督府，其中之一爲悅般都督府，“於石汗那國所治豔城置”，《新唐書·地理志七下》所載略同。石汗那即Čaγāniyān曾是嚈噠領土的主要部份。唐

人將該地與“悅般”這一名稱聯繫起來，當有原因，很可能在唐人看來，悅般即嚈噠，至少説明這兩個名稱的發音十分相似。

（5）《魏書·高湖傳》載，延昌年間，高徽使嚈噠，得破洛那、烏孫名馬。事在宋雲西行前數年，正是嚈噠開疆拓土接近完成之際。因此，烏孫、破洛那這兩個名稱不過是作爲古代名馬産地而提出來的，未必意味著兩國繼續維持著獨立。另一方面，太延年間，董琬西使抵悅般後，很可能是經悅般介紹去烏孫、破洛那的。同一産馬地（烏孫和悅般），在太延年間是通過悅般和北魏聯繫的，在延昌年間是通過嚈噠出現在北魏記錄中的，這豈不表明悅般和嚈噠之間並非完全沒有關係，儘管在它們爲北魏瞭解時所佔有地域並不相同。

今案：上説未安。

第一，《魏書·西域傳》載：悅般，“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故悅般有可能如説者所説，原來曾隸屬於匈奴，但很難斷定嚈噠原來也是匈奴的部落。嚈噠人雖曾自號匈奴，但當時自號匈奴的部落很多，未必均與匈奴有政治或血緣的關係。[48]即使嚈噠和悅般一樣，亦曾隸屬於匈奴，也不能因此認爲兩者是同一部落或部族。因爲匈奴强盛時，隸屬於匈奴的部落或部族很多；匈奴崩潰後，西徙的部落和部族也不止一個。

第二，《魏書·西域傳》明載，“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兹北”，是爲悅般。可見悅般人的原居地在龜兹以北。後來由於烏孫西遷，悅般人纔北上佔領了納倫河流域和伊犁河流域，其東境則在裕勒都斯河流

域，與柔然西界鄰接。[49]而《魏書·西域傳》明載嚈噠起源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兩者的區別十分明顯。

第三，嚈噠人在四世紀六七十年代已西遷索格底亞那，五世紀二十年中南渡阿姆河入侵薩珊波斯；三十年代末領有吐火羅斯坦；五十年代中擊敗伊嗣俟二世並乘勝越過興都庫什山，入侵笈多印度。而《魏書·西域傳》載太平真君九年（448年），悅般還遣使朝魏，“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可見至少到五世紀四十年代末，悅般尚在納倫河、伊犁河流域直至裕勒都斯河流域活動。因此，如果要證明悅般卽嚈噠，唯一的途徑就是證明悅般事實上並沒有西遷，而是在保有準噶爾盆地以西地區的同時，向西方發展，僅僅是在448年以後將活動中心移到吐火羅斯坦而已。事實上，悅般說的支持者正是這樣敍述嚈噠的發展史的。[50]然而這並不成功。

一則，上引《魏書·西域傳》所載北單于度金微山一事見於《後漢書·竇憲傳》，時在公元91年。可知早在一世紀末，悅般已在龜兹以北活動，並不是直到四世紀六七十年代纔自阿爾泰山南遷的。“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云云，說者曾表示懷疑。[51]此事前史不載，固屬可疑，“度金微山”卻是見諸《後漢書·竇憲傳》的事實。不能因懷疑北單于曾“西走康居”，也否定北單于“度金微山”。“度金微山”旣是事實，在此之前或同時北單于把“羸弱”留在龜兹以北也應該是可信的。卽使把悅般和北單于聯繫起來純係傳說，也完全有理由認爲這一傳說是基於悅般人早已在龜兹以北出現，其時間和北單于“度金微山”約略相當。何況如

果完全懷疑這一記載，又從何證明悅般是曾經隸屬匈奴的部落？因此，即使如悅般說的支持者所言，嚈噠自阿爾泰山南遷第一步到達的是天山地區，而不是索格底亞那，也不能在嚈噠和悅般之間劃上等號。

二則，正如下一篇所考證，嚈噠自阿爾泰山南遷的年代，和它在索格底亞那出現的年代正相符合。這説明嚈噠自阿爾泰山南遷第一步就到達索格底亞那，並沒有在中途長期停留。

三則，四世紀六七十年代，天山以北，納倫河、伊犁河流域有烏孫活動（即使不把悅般考慮在內），因而嚈噠自阿爾泰山南下，在天山北側停留的可能性很小，多半會沿著巴爾喀什湖，西去索格底亞那。

四則，龜兹以北的悅般佔領納倫河、伊犁河流域應在烏孫被柔然所逐西遷之後，而柔然勢力伸展到準噶爾盆地以西，得以接觸烏孫，最早也要到社崙可汗時代即五世紀初。顯然，在此之前，悅般是既不可能西遷，也不可能向西方發展的。説者雖企圖否定《魏書·西域傳》關於烏孫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這一記載的正確性，把烏孫西遷的時間提前到鮮卑繼匈奴在漠北興起之際，[52] 但這也是有欠考慮的。[53]

五則，悅般自龜兹以北北上納倫河、伊犁河流域，以及粟特爲匈奴征服的消息，都是太延年間董琬西使所得。董琬雖未親至粟特，但到達悅般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説悅般便是征服“粟特國”的“匈奴”，則董琬不可能毫無所知；而如果並不是征服“粟特國”的“匈奴”，則五世紀二十年代中，嚈噠（即悅般）入侵薩珊

波斯一事（這恰恰是悅般說的支持者作爲嚈噠發展史上一個環節敍述的）就無從解釋，因爲當時“粟特國”正在“匈奴”治下。

至於宋雲報告中說嚈噠北境和高車相接，是六世紀初的情形，和悅般完全無關。說者提到這一點，不過是爲了暗示悅般並沒有西遷，而是在保有天山以北、同柔然對抗的同時，向西方發展的。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第四，北魏對悅般十分熟悉，嚈噠更非罕通之國。僅隔八年，就把同一個部族誤以爲兩個不同的部族，已屬難以想像，何況按照悅般說的必然邏輯，悅般即嚈噠並沒有放棄天山以北地區，北魏人何致疏忽如此。

第五，《魏書·西域傳》載嚈噠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同傳又載悅般之“風俗、言語與高車同”。兩者並非同一部族本來十分清楚。然而，悅般說的支持者以爲，這是由於悅般即嚈噠向索格底亞那和吐火羅斯坦發展後語言逐步伊朗化的結果。這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從悅般在中國史籍上消失，到嚈噠在中國史籍上出現，相隔僅八年時間。即使悅般完全放棄天山以北地區，舉族西遷索格底亞那和吐火羅斯坦，也很難想像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一個部族的語言會發生如此顯著的變化，何況按照悅般說的邏輯，悅般應始終保有天山以北地區。

第六，《魏書·高湖傳》載：

> [高] 徽，字榮顯……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嚈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並因之以獻名馬。

又，《魏書·西域傳》載：

> 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朝廷所賜，拜受甚悅。謂琬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

兩段文字明白易懂，卻實在從中看不出悅般和嚈噠的關係來。即使如說者所言，董琬赴烏孫、破洛那實際上是由悅般介紹的，也至多説明太延年間悅般的鄰國烏孫、破洛那，到延昌年間成了嚈噠的屬國而已。其實，說者之所以將上述事件進行對照，也無非是爲了暗示悅般並沒有西遷，而是向西方發展，到延昌年間領有了舊爲烏孫、破洛那所佔有的名馬産地。前面說過，這同已知的有關史實相牴牾，是不可取的。

第七，就漢譯名而言，“嚈噠”和“悅般”對音並不吻合。具體而言，以“悅”對“嚈”、“囐”、“噘”、“挹”雖然可通，以“般”對“噠”、“怛”則是不行的，無論“般”字讀若 pat 還是 pan。當然，如果就對音而言，將“悅般 [jiuat-peən]”看作 Ephthal、Abdel、Hebdel 的對譯也未嘗不可。衹是不能僅憑對音，斷“悅般”和“嚈噠”爲同一名稱的不同漢譯。更何況，名稱相同並不等於實質相同。

第八，唐高宗龍朔元年（661 年）所置西域都督府的名稱，多有自南北朝以前的地名、族名中信手拈來者，並不完全以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爲依據。明顯的例子如：《新唐書·地理志七下》所載於怛沒國置“姑墨州都督府”。由此可見，唐人在昔日嚈噠領土上置“悦般都督府”並不能説明任何問題。

要之，現有史料表明，悦般和嚈噠並不能作同一認定。悦般在 448 年以後消息中斷，確實是西遷了，西遷的悦般便是西史的阿瓦爾；對此，我已有文專論，這裏就從略了。[54]

如上所述，迄今有關嚈噠族源、族屬諸説均不能成立。究其原因，主要在於説者對於下述因素完全忽略或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每個遊牧部族固然有原始的血緣部落爲其核心，然在它興起時，往往合并或役使周鄰許多部落，形成一個政治、軍事的聯合體。而當這個部族走上遷徙、擴張和征服的道路時，這種情況尤其突出。因此，當我們今天探討歷史上某一遊牧部族的族源和族屬時，除必須對該部族的名稱、語言、習俗、制度、宗教等進行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考察之外，還必須認真考慮該部族的形成和遷徙過程，特别注意它和其他各族之間相互存在的影響，以及在血緣和文化上融合或同化的可能性。否則往往結論越精確，離開事實真相越遠。

我認爲：嚈噠可能與乙弗鮮卑同源，而乙弗鮮卑可溯源於高句驪。茲先考乙弗，後證兩者同源。

1. 乙弗係鮮卑之一部

《魏書·官氏志》載：“乙弗氏後改爲乙氏。”乙氏爲拓跋魏

“內入諸姓”之一。可知乙弗是拓跋鮮卑之一部。

《魏書·太祖紀》載：登國元年（386年）“五月，護佛侯部帥侯辰、乙弗部帥代題叛走”。可知乙弗部附拓跋氏當在登國以前。

《北史·乙弗朗傳》載：“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可知該部出自遼東，後遷入塞北。

2. 乙弗與乙弗敵同出一部

《晉書·禿髮烏孤載記》云：“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資治通鑒·晉紀三〇》繫此事於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年）七月。胡注：“乙弗、折掘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廉川在湟中。”又，《晉書·禿髮傉檀載記》云：“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可知南涼之西亦有乙弗部。

《魏書·吐谷渾傳》載：“吐谷渾北有乙弗（勿）[55]敵國，俗風與吐谷渾同，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又，《通典·邊防六·西戎二》：“乙弗敵，後魏聞焉，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其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蘇子。”案：屈海即青海，吐谷渾之北正當南涼之西。可知此乙弗敵國即禿髮氏所討之乙弗部。“乙弗”乃“乙弗敵”之省稱。

《北史·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傳》載：“其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案：《太平御覽》卷一〇四引《後魏書》及《北史·西魏文帝紀》皆稱乙弗后爲乙氏。可知上引塞北之乙弗與青海之乙弗敵同出一部。

3. 乙弗與乞伏爲同部別出

《晉書·乞伏國仁載記》云：“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

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伏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爲乞伏可汗託鐸莫何。……其後有祐鄰者，卽國仁五世祖也。”又，《元和姓纂·七之》（卷二）引《西秦錄》云：“乞伏氏與期引氏自漠北出陰山。”《古今姓氏書辯證·五支》（卷三）所引《西秦錄》略同；唯“期引”作“斯引”。而《通志·氏族五》引《西秦錄》文字作：“乞伏國仁之先如弗與出連、斯引、叱靈三部自漠北出陰山。”知《晉書·乞伏國仁載記》“斯”下奪一“引”字。唯各書所引《西秦録》一作“斯”，一作“期”，未知孰是。今案：《魏書·官氏志》等不見“期引”或“斯引”氏，故很可能諸書皆誤。“斯引”或“期引”疑當作“胡引”。《魏書，官氏志》有“胡古口引氏”，一說“當爲胡引氏”；[56]甚是。蓋“胡”字先訛爲“期”，又訛爲“斯”也。故《西秦録》原文似應作：

> 乞伏國仁之先如弗與出連、胡引、叱靈三部自漠北出陰山。

而《晉書·乞伏國仁載記》原文似應作：

> 在昔有如弗［與］胡引、出连、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

由此可見，乞伏乃合如弗、胡引、出連、叱盧（即叱靈）四部而成。

上引《西秦録》稱乞伏國仁之先爲如弗；《魏書·乞伏國仁傳》亦載："鮮卑乞伏國仁出於隴西，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可知乞伏本出自如弗。《晉書》所謂"又有乞伏部"，蓋追言之。又據同傳，其後乞伏部任顯職者有叱盧那胡、出連高胡、斯（當作胡）引烏埿，獨不見如弗氏，亦見乞伏與如弗其實一而二,二而一。乞伏，一作乞佛，與如弗很可能是同名異譯。然而，"乞伏"實際上已成爲如弗等四部组成的部落聯盟的名稱，又不同於"如弗"。

今案：乙弗應即乞伏。《魏書·官氏志》分列乞伏與乙弗，乃同部别出之故。

(1) 據《晉書·乞伏國仁載記》，乞伏部首領祐鄰於"泰始初(265年左右）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无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乃詣統降于堅"。由此可見，乞伏這一部落聯盟在逐步遷徙的過程中，征服了許多别的部落，其勢漸盛，而其種愈雜。這樣一個龐雜的部落集團本來就極不穩固，一旦大敵當前，不戰而潰，也就勢在必然了。正如司繁所謂"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故降於

苻堅者衹可能是其中一小部份，其餘各部或投鮮卑，或附高車，必定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司繁降秦，《資治通鑑·晉紀二五》繫於晉簡文帝咸安元年（前秦苻堅建元七年，371年）；乙弗從乞伏中分出，很可能就在這個時候。此後，乙弗始見諸史籍。

（2）上引《魏書·太祖紀》載乙弗與護伏侯部帥侯辰同叛。“侯辰”乃“胡引”之異譯，“胡引氏”乃以部酋名爲氏。[57]從乙弗與胡引等部的關係，亦可證乙弗出自乞伏。

（3）乙弗與乞伏（乞佛）同音，乃同名異譯。《魏書·乞伏保傳》：“乞伏保，高車部人也。”又，《魏書·高車傳》：“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泣伏利”應卽“乞伏”的異譯。[58]案：“乙弗”卽“乙弗敵”之省譯；“乙弗敵”與“泣伏利”音同。亦可證“乙弗”卽“乞伏”之異譯。

4. 乙弗係雜胡

如前所述，乞伏由如弗、胡引、出連、叱盧四部組成。其中，如弗或是鮮卑種，故史稱其後裔乞伏爲鮮卑。胡引，一說“乃羯族也”；[59]羯多爲西域胡。出連，一說“本居各族”；則原來可能是匈奴種。[60]叱盧，一說應爲高車種。[61]由此可見，乞伏部中包含了鮮卑、羯胡、匈奴和高車，是一個十足的雜胡；其組成各部雖一直保持原來的部名，種類糅雜，自不待言。乙弗旣出自乞伏，亦不可能例外。

5. 乙弗之遷徙過程

從乞伏部分出的乙弗部，有一部份留在塞北，依附拓跋，大部份則西遷，有一支到達青海湖畔，卽乙弗敵國。

應該指出，乙弗氏爲拓跋魏“内入諸姓”之一；而據《魏書·官氏志》，所謂“内入諸姓”，乃指“神元皇帝（力微，220—277年）時，餘部諸姓内入者”。但所列諸姓未必皆於此時内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屈突氏：魏有屈突氏始於登國十三年（395年）。[62] 根據以上所考，我認爲乙弗附拓跋當在371—386年之間。

乙弗的源流、族屬和遷徙情況果如上述，則不難發現它與嚈噠同出一源。我認爲兩者同源的主要理由如下：

1. 族名

嚈噠，西史作 Ephthal、Abdel；一望而知，也可譯作“乙弗敵”，或省作“乞伏”、“乞佛”和“乙弗”。饒有趣味的是，中史還有“如弗”這一異譯，“如”，讀音爲 njia；無獨有偶，西史亦曾將 Ephthal 譯作 Nephthal。

“嚈噠”得自王姓（一説王名），“乙弗”乃部名，然遊牧部族的部族名往往得自其酋長之姓名。西遷中亞的乙弗即嚈噠最初很可能自號“匈奴”，周鄰各族亦目之爲匈奴；佔領吐火羅斯坦後，其勢日盛，原名始顯，拜占庭人遂誤以爲此名得自五世紀下半葉戰勝卑路斯之嚈噠王。乙弗自塞北遷至中亞其間何止九難八阻，然始終保持同一名稱，真可謂雖亂不失種姓了。

2. 故地

《魏書·西域傳》載嚈噠起源於塞北，這是現存有關嚈噠故地的唯一可靠的記載。乙弗，史稱乙弗鮮卑，雖可溯源於遼東，但衹有當它遷至塞北，成爲雜胡之後，纔成爲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乙弗，因而事實上它也是起源於塞北。

3. 遷徙

如前所考，嚈噠度阿爾泰山西遷索格底亞那應在366—376年之間，這同以上推測的乙弗可能自乞伏分出，走上西遷道路的時間（371年）基本一致。當時，這些西遷的乙弗人大概分爲兩支，一支（或其羸弱）到達青海湖畔，是爲乙弗敵，一支度阿爾泰山奔赴嬀水北岸，是爲嚈噠。

4. 族源和族屬

西史稱嚈噠爲“匈奴”（或“匈人”），《魏書·西域傳》則稱之爲“高車之别種”，乍看似難统一。但如果從嚈噠與乙弗同源這一角度來看，問題就很清楚了。乙弗之前身乞伏，不僅可能混有匈奴之血統，而且可能一度役屬於匈奴，故西遷時假匈奴之名，並被周鄰稱爲匈奴。然而它同高車之間亦存在某種聯繫，故在北魏人看來，儘管其語與高車不同，還應該稱之爲高車别種。

至於嚈噠被稱爲“白匈奴”，則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乙弗人膚色本來就比較白；其人雖係雜胡，但核心如弗爲鮮卑種；一些鮮卑人本來就有“白虜”之稱。另一種是如弗與羯胡混血的结果。應該指出，無論乙弗卽嚈噠因混血而膚色白到何種程度，其體貌仍未脱出蒙古利亞種的窠臼，《職貢圖》所寫滑國使臣圖肖像便是明證。

5. 語言

《魏書·西域傳》載嚈噠人的語言不同於高車、柔然和諸胡，如前所述，無法據以判斷嚈噠語的繫屬。但由此可見嚈噠人説的是一種很特殊的語言，極可能是長期以來種類揉雜的結果。然

《梁書·西北諸戎傳》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河南卽吐谷渾，其人之所以能譯嚈噠語，未必嚈噠語與吐谷渾語同，顯然是因爲吐谷渾人和其北鄰乙弗敵人經常接觸的缘故。我認爲，這已從語言的角度增强了嚈噠與乙弗同源的可能性。

6. 制度、習俗和宗教

如前所述，嚈噠有可汗、可敦、葉護、特勤等稱號，有剺面、截耳、殉死等習俗，皆係阿爾泰系諸族所固有，可以作爲嚈噠與乙弗同源的佐證，因爲乙弗起源於塞北，主要是由鮮卑、匈奴和高車等阿爾泰系諸族融合而成。甚至嚈噠所事天神，也可索解於乙弗。乙弗前身乞伏的組份之一羯胡亦有此俗；[63] 很可能乙弗人在塞北時已受其影響。至於嚈噠人在習俗等方面表現的若干伊朗之風，則應是遷入中亞後，沾染自伊朗系諸族，不能視作嚈噠與乙弗同源説的反證。

合上六證，嚈噠與乙弗鮮卑同源，或可成立。本篇所考乙弗部的形成及遷徙過程，不妨作嚈噠前史讀。

■ 注释

[1] C. Müller,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æcorum (IV), Disposuit, Notis et Prolegomenis Illustravit*. Paris, 1851, p. 270. 英譯文見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I, London, 1942, pp. 204-205。

[2] 亞美尼亞史家 Elišē 記載，薩珊波斯皇帝伊嗣俟二世在其卽位第十二年，

曾進軍抵達 Idaghagan。或以爲此詞意指“嚈噠國土”。果然，則爲“嚈噠”一名最早見諸西史者。説見 V. Langlois, *Collection des historiens ancients et modernes de l'Armenie*, vol. 2. Paris, 1869, p. 188。

[3] H. B. Dewing, tr.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New York, 1914.

[4] G. Moravcsik, *Byzantinoturcica, die Byzantinischen Quellen der Geschichte der Türkvölker*, II. Berlin, 1958, pp. 199-204.

[5] 見本書第五篇。

[6] 陳寅恪《五胡問題及其他》，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编年事輯》附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pp. 194-195。

[7] Ed. Specht, "Études sur l'Asie central d'après les historiens chinois." *Journal Asiatiqua* 8~2 (1883): pp. 317-350.

[8] 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III. Berlin-Leipzig, 1937, p. 312.

[9] J. Markwart,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p. 45.

[10] K. Enoki,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Ephthalit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18 (1959): pp. 1-58.

[11] 榎一雄氏始指“滑�”之“匝”係伊朗語後綴，意爲“場所”；復因“滑匝”一名不見於《魏書》，頗疑《通典》原文應作“至後魏時謂之嚈噠”。今案：前説非是。又，《魏書·西域傳》既失原貌，後説亦屬無據。此外，《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嚈噠”之後，有“挹怛同”一條。榎氏將此“同”字比定爲意指“場所”的 Ormuri、Parachi、Yagnobi、Šughni 語後綴 -tūn 和 Osset 語後缀 -don 等，以證嚈噠爲伊朗語族。今案：其説亦誤。“同”乃“國”字毁壞而成。“至隋時”云云乃承上“嚈噠條”而言，末尾所引《梁

典》可證。换言之，是條魏的嚈噠國，而不是什麽“挹怛同”至隋時被稱爲挹怛國。故《通典》此條應讀作：“挹怛國（同）：[嚈噠國] 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滑國王姓嚈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榎氏説見“エフタル民族に於けるイラン的要素”，《史學雜誌》，61 ~ 1（1952 年），pp. 1-26；以及注 10 所引文。

[12] 見本書第二篇。

[13] 此處所引與今本不同，説詳本書第一一篇。

[14] 嚈噠的制度、習俗等詳見本書第七篇。

[15] 説見本書第二篇。

[16] J. Deguignes,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etc*, II. Paris, 1756, pp. 325-326.

[17] 例如：W. M.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 the Huns and thr Part they placed in World History. With Special Refrence to the Chinese Sourd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9, pp. 404-406.

[18] 近人主大月氏説者，最早爲 V. de St. Martin, *Les Huns Blancs ou Ephthalites des Historiens Byzantins*. Paris, 1849, p. 64; *Mémoire analytique sur la carte de l'Asie centrale et de l'Inde, Mémoire sur les contrees occidentales*, II. Paris, 1858, pp. 285-286。此後有 F. F.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 1. Berlin, 1877, pp. 439-441; Thos. W. Kingsmill, “Migr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White Hu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8, pp. 285-304; E. H. Parker, “The Ephthaltes Turks.” *Asiatic Quaterly Review* (1902): pp. 131-159; 在中國則有徐中舒、鄭

德坤、馮家昇“月氏爲虞後及氐和氐的問題”,《燕京學報》第 13 期（1933 年），pp. 209-238，esp. 233-238，等等。

[19] V. de St. Martin 說，出處見注 18。

[20]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釋》,北京,1910 年,pp. 36-38；“大宛の貴山城と月氏の王庭”,《東西交渉史の研究·西域篇》，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 年，pp. 1-43, esp. 38-39；“月氏の故地とその西移の年代”，上引書，pp. 45-96, esp. 94-96。

[21] 詳見本書第三篇。

[22] V. de St. Martin 說,出處見注 18。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pp. 876-879，亦有類似說法

[23] 參看本書第一一篇。

[24] E.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s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London, 1912, pp. 87-92.

[25] A. Stein, “White Huns and Kindred Trib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 Northwest Frontier.” *India Antiquary* 34 (1905): pp. 73-87.

[26] A. Cunningham, “The Ephthalite or White Huns.”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2 (1871): pp. 75-82.

[27] J. Marquart. *Über das Völkstum der Komanen*. Berlin, 1914, esp. 70-71. R. Grousset,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Jerssy, 1970, p. 67.

[28] U. Thakur, *The Hūṇas in India*. Varanasi, 1967, pp. 52-54.

[29] 最早提出突厥說的似乎是 J. Klaproth, *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Paris, 1824, p. 258。而此說系統的論述者首推重松俊章“嚈噠種族考”,《史學雜誌》28~1,2（1917 年）,pp. 20-50, 114-154,以下介紹卽以重松氏說爲主。

[30] 宮崎五十騎《嚈噠種族の發展》,《青丘學叢》4, 6, 21（1931—1935 年），pp. 69-92, 73-91, 163-184。此文對匈奴説、高車説、柔然説、大月氏説均有批判，可參看。

[31] H. W. Haussig, "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Byzantion* 23 (1953), pp. 275-462, esp. 320-327.

[32] 注 10 所引 K. Enoki 文認爲沒有理由把 haftal (haptal) 看作 Hafta (hapta) 和 -l 的組合，蓋迄今尚未發現稱嚈噠爲 hafta (hapta) 的例子，Ephthalitae 應是詞幹 Eftal 和伊朗語的複數詞尾 -itae 的組合，並進而認爲這是嚈噠屬伊朗語族的證據。今案："嚈噠"很可能正是 hafta（hapta）之異譯；榎氏説未必然，參看下文。

[33] 見注 10 所引 K. Enoki 文。此文是榎氏關於嚈噠史最重要的論文，對於諸舊説均有概括和批判，不少處爲本篇採用。又，本篇以下凡引伊朗説不另注者皆出此文。

[34] 詳見本書第二篇和第三篇。

[35] 王堯、陳踐譯注《敦煌吐蕃文獻選》，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年，pp. 159-172；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4（1977 年），pp. 1-48。

[36] 松田壽男《アルタイ山とエフタル族》,《史觀》57·58（1960 年），pp. 8-21。

[37] 内田吟風《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75 年，p. 161。

[38] 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 p. 117.

[39] 榎一雄《エフタル民族の人種論について》,《東方學》29（1965 年）, pp. 1-29。

[40] 所謂嚈噠文見 O. Hansen, “Ein Neues Hephthaliten-Fragment.” *La parela del passato* 20, Napoli, 1951, pp. 361-366; “Die Berliner Hephthaliten Fragment.” *La Nouvello Clio* 1951, pp. 41-69。

[41] 在榎氏之前，持伊朗說者，還有 S. Konow, “The White Huns and Tokharian.” *Festskrift til Professor Olaf Broch*. Oslo, 1947, pp. 77-82; R. Ghirshman, *Les Chionites-Hephthalites*. Le Caire, 1948, pp. 116-130，等，他們也根據對所謂嚈噠文書及嚈噠錢幣銘文的研究，分別得出了嚈噠爲伊朗語族的結論。這些研究本身都是很有意義的，但既然嚈噠人沒有自己的文字，原始語言不得而知，因而似乎不可能通過上述文書或錢銘正確判斷其語言乃至人種歸屬。

[42] 詳見本書第七篇。

[43] D. H. Velankar, ed. *Raghuvaṃśa of Kālidās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Mallināthа*. Bombay, 1948.

[44] 參見江上波夫“ユーラシア北方民族の葬禮における剺面，截耳、剪髮について”,《ユーラシア北方文化の研究》，東京: 山川出版社，1951 年，pp. 9-15。

[45] 同注 23。

[46] 此說由松田壽男在《漢魏六朝の西域》(《世界文化史大系》6，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36 年，p. 320）一書中首次提出，1951 年榎一雄著文（“エフタル民族の起源”,《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講談社，1951 年，pp. 133-150）批判，翌年，松田氏重申這一論點，並作了重要

補正（見《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52年，pp. 213-219。其結論也見於平凡社1959年版的《アジア歷史事典》第1卷，pp. 391-392）該氏所撰“悅般條”釋文中。在196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見注36）中，松田氏又將此說作爲其嚈噠阿爾泰山起源說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再次强調，1965年榎一雄再次著文（見注39）反駁。此後則有內藤みどり“エフタル民族とその發展”，《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年，pp. 134-147，具體運用松田氏此說闡述嚈噠的發展史。內藤氏對松田說有所發揮，但沒有正面觸及榎氏的駁論。仔細拜讀諸氏的論文後，我認爲榎氏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即嚈噠決非悅般。但由於榎氏是站在嚈噠吐火羅斯坦起源說這一錯誤立場上對松田說進行批判的，許多地方難免隔靴搔癢，因此有必要在此對松田說重新檢討。

[47] 說本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第6卷），東京：岩波，1970年，pp. 1-55。

[48] G. Moravcsik, *Byzantinoturcica, die Byzantinischen Quellen der Geschichte der Türkvölker*, II. Berlin: 1958, pp. 231-237.

[49] 參見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 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年，pp. 187-204；以及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193-216。

[50] 見注46所引內藤みどり文。今案：內藤氏的論述過於簡單，沒有按照嚈噠即悅般說的必然邏輯展開。

[51] 同注49所引松田氏書（出處同）。

[52] 同注49。

[53] 余太山“柔然－阿瓦爾同族論質疑——兼說阿瓦爾即悅般”，注49所引書，

pp. 163-192。

[54] 同注 53。

[55] 傳文衍“勿”字。

[56]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學出版社，1958 年，pp. 160-165。

[57] 注 56 所引姚薇元書，p. 82。

[58]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78 年，pp. 382-450。今案：唐氏疑乞伏源出高車，毋寧說高車泣伏利氏來自乞伏。

[59] 注 56 所引姚薇元書，pp. 84-85。

[60] 注 56 所引姚薇元書，p. 114。

[61] 注 58 所引唐長孺文。

[62] 注 56 所引姚薇元書，pp. 137-139。

[63]《晉書·石季龍載記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太平御覽》卷一二〇引《後趙錄》同。

二　西徙索格底亞那

嚈噠西徙索格底亞那（Sogdiana），一般認爲並無直接的史料，祇能從彌南（Menander）和迪奈韋里（Abū Ḥanīfa Dīnawarī）等人的記錄中間接得知。彌南稱已歸屬突厥的索格底亞那人“原爲嚈噠臣屬”（10, 1），[1] 迪奈韋里則載突厥與波斯結盟夾擊嚈噠時，可汗首先攻佔了包括索格底亞那在内的阿姆河以北地區。[2] 顯然，僅僅根據這些材料無從確知嚈噠西徙索格底亞那一事發生於何時，而查明這一點，對於探索嚈噠的起源，乃至闡明整個嚈噠人的發展史至關重要。

今案：嚈噠自塞北度阿爾泰山西徙，第一步就到達索格底亞那，而《魏書·西域傳》所載“匈奴”對“粟特國”的征服正是指嚈噠對索格底亞那的入侵。據載：

>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

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矣。自後每使朝獻。

長期以來，這則不過寥寥九十字的記載，由於被認爲和匈奴、匈人是否同族，以及四至五世紀中亞、北亞許多重大歷史問題有關，一直受到史學界的重視，學者們進行了翻覆的討論，論著不下幾十萬言，祇是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見。在此，我打算從研究嚈噠史的角度，談談自己的看法。爲了便於討論，先介紹有代表性的幾家意見如下：

第一種意見[3]：

1. “粟特”即“古之奄蔡”。據《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奄蔡又名“阿蘭”，其國所臨“大澤”，應即黑海；再按之去代距離、與康居的相對位置等，可知粟特人無疑即西史所載Alans。

2. “粟特”一地即約耳達涅斯（Jordanes）所載Alans之一支Sadages（亦作Satagari）所領有的克里米亞半島之Sughdag。

3. 匈奴的“粟特”國王遣使北魏在高宗初（據李光庭《漢西域圖考》，爲太安初即455—457年），由此上溯“三世”即一百年左右，可知匈奴滅“粟特（奄蔡）”在355年前後，這和西史所傳匈人征服Alans的年代完全符合。

4. 匈奴的“粟特”王名“忽倪”，漢字古音爲hut-ngiek（或hut-nik）。既然古代中國人常以t譯外國音r，“忽倪”不妨視作匈王阿提拉（Attila）幼子Hernac（亦作Irnach、Ernak、Irnas、

Hirnas）。當然，也可能是 Hernac 之兄卽阿提拉嫡子 Ellac。據約耳達涅斯，Ellac 戰死後，其兄弟（其中包括 Hernac）退至黑海一帶，佔有了克里米亞半島的 Sughdag。

第二種意見[4]：

1.《後漢書·西域傳》的“粟弋”、《魏略·西戎傳》的“屬繇”、《晉書·西戎傳》的“粟弋”，古音讀如 suk-dok、suk-do，應爲 Soghd（或 Sughda）之音譯。從地理位置和物産等方面的情況來看，祇能是中亞的 Sogdiana。因此，在年代上和上述諸史書相銜接的《魏書·西域傳》的“粟特”（古音 suk-dok）也應該是中亞的索格底亞那。

2. 據《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奄蔡一名“阿蘭”，相當於西史的 Alans，是居住在鹹海、裏海以北曠野上的遊牧部族，決非索格底亞那土著。因此，《後漢書·西域傳》爲“粟弋”和“奄蔡”分別立傳，《魏略·西戎傳》也對“屬繇”和“奄蔡”加以區別。《魏書·西域傳》將“粟特”和“奄蔡”看作一國，想必是由於“粟特”的另一名稱“溫那沙”和“奄蔡”的讀音十分近似的緣故。作爲結果，在《魏書·西域傳》“粟特條”中插入了《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關於奄蔡的記事。

3. 其實，“溫那沙”的“溫”，據《隋書·西域傳》，是九姓昭武國之一康國（Samarkand，撒馬爾罕）國王之姓。“那”是粟特語“九”（nao, nava）之訛，“沙”是伊朗語 šah 的音譯。“溫那沙”意爲“溫姓的九王”。這是伊朗語對“九姓昭武王”的稱呼。另一方面，“昭武”相當於突厥碑文中的 čub。在伊朗語爲“溫”，在

突厥語則爲“昭武”。《通典·邊防九·西戎五》載粟特“一名特拘夢”，即突厥語 toquz manab，意指“九王”。君臨索格底亞那的王統既有伊朗語的、又有突厥語的稱呼，乍看似乎不可思議，但衹要瞭解當時中亞的社會狀況就不難理解。南北朝時，索格底亞那的君主和上層社會是突厥種的嚈噠人，其臣民則是土著伊朗人；換言之，“粟特”是由人種和語言不同的兩個民族組成的國家。“粟特”一名“溫那沙”是土著伊朗人的稱呼，一名“特拘夢”是統治階層突厥人的稱呼。

4. 入侵“粟特”即索格底亞那的“匈奴”不是純粹的匈奴，而是嚈噠。“忽倪”也許就是嚈噠王 Khūshnāwaz。[5]

5.《魏書》“本紀”始載嚈噠入貢，後又載“悉萬斤”即撒馬爾罕入貢；“悉萬斤”取代“粟特”是因爲索格底亞那的中心從貴霜匿即“粟特”轉移到了撒馬爾罕的緣故。這一轉移的時期也許在“粟特國”最後一次朝魏的太和三年（479 年）之後。

第三種意見[6]是第一種意見的補充：

《後漢書·西域傳》的“粟弋”、《魏略·西戎傳》的“屬繇”和《晉書·西戎傳》的“粟弋”固然可以看作中亞的索格底亞那，但《魏書·西域傳》的“粟特”卻是指克里米亞半島的 Sughdak。理由如下：

1. 古之奄蔡。

2. 居於大澤（即黑海）。

3. 在康居西北。

4. 去代一萬六千里。而《魏書·西域傳》載位於索格底亞那地

區的“悉萬斤”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儘管這些里數是杜撰的，但大體遠近可知。

5. 匈奴奪其國。

6. “忽倪”卽阿提拉之子 Hernac，其名也見於保加爾人王侯世系表所載其遠祖之列。他曾統治克里米亞半島是無庸置疑的，但並有發現他統治索格底亞那的證據。

7. 據《通志·四夷三·西戎下》，奄蔡“去代一萬六千里，北距安息五千里”，顯然不在中亞的索格底亞那，而應在克里米亞半島的 Sughdak，也就是阿提拉的子孫一度佔領過的 Sughdak。

8. 克里米亞半島的 Sughdag（Sudak, Σουγδαία）可以和西史所載與匈人同時活躍的、被認爲是 Alans 或匈人的 Sadagarier（Sadages, Sadagarii）聯繫起來考察。其實早在漢代，Sadagarier 已爲漢人所知，被看作匈奴單于支配下的部族之一。後漢杜篤在《論都賦》中這樣歌頌漢武帝對匈奴的征服：“燔康居……獲昆彌，虜儌侲”。李注：“諸家並音‘儌侲’爲‘粟犢’，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西漢討滅郅支單于之際，曾俘獲單于支配下的“闔蘇”卽“奄蔡”，亦卽“肅特”或《魏書·西域傳》的“粟特”，杜篤的頌詞蓋本乎此。至於李注中的“肅特”，應卽《資治通鑒·漢紀一二》注引杜佑曰“奄蔡，後爲肅特國”的“肅特”。漢武帝並沒有征服過索格底亞那，因此這個“儌侲”（卽“粟犢”）無疑是指“肅特”卽奄蔡，也就是和《魏書》所載克里米亞半島的“粟特”（卽 Sughdak）有關的 Sadagarii。

《魏書·西域傳》的“粟特”之所以不可能是中亞的索格底亞

那，理由如下：

1.《魏書·西域傳》大體上保留了魏收原著的面貌，因此有關記載是可靠的。

2.查《魏書》、《宋書》及《周書》等，“粟特”前後朝魏達九次，其使者直至北周時尚未絕蹟於中國；尤其是該國曾有爲數衆多的商人（Alans是作爲貿易商人活躍的民族，他們大批赴中國經商不是不可思議的）被北魏俘獲，並留居中國，可知當時中國人有關“粟特”的知識不可能有太大的錯誤。

3.《魏書·西域傳》另爲代表索格底亞那的“悉萬斤”立傳，可見“粟特”並不是索格底亞那。“悉萬斤”於延興、太和、正始、景明、永平、皇興年間頻頻朝魏，北魏人對悉萬斤一定具有高度正確的認識。

4.《魏書·高祖紀》載太和三年（479年）入貢的西域諸國有云：“粟特……州逸……悉萬斤諸國各遣使朝貢。”對“粟特”和“悉萬斤”是分別加以記錄的。

5.如果《魏書·西域傳》的“粟特”是悉萬斤所在的索格底亞那，則太和三年以後，索格底亞那地區其餘諸國繼續朝魏，唯獨“粟特”斷絕朝貢的原因何在？假定太和三年以後，索格底亞那的中心自它處遷至悉萬斤，那末消失的應該是小名稱“悉萬斤”，而不應該是大名稱“粟特”。再說，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重新出現“粟特”之名，足見其地極遠，故長期斷絕朝貢。

6.如果《魏書·西域傳》的“粟特”是索格底亞那的話，那末應該有被嚈噠人襲奪的記載，而不應該記載被匈奴襲奪。當時的

中國人與嚈噠交往頻繁，對嚈噠有相當豐富的知識，必然能把嚈噠和匈奴區別開來。特別對於“粟特”，連王名都知道，且曾接受它引渡商人的請求，不可能出現如此錯誤的記載。

7.《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西戎七》所引《十三州志》“奄蔡、粟特各有君長”一句，並不表示“粟特”位於索格底亞那，反而說明“粟特”與“奄蔡”卽頓河地區的 Alans 鄰接，位於克里米亞半島。《十三州志》的記載不過表示當時 Alans 和 Sughdak 各有君長而已。

第四種意見[7]可以說是上述兩種觀點的折衷：

1. 在《魏書·西域傳》中，“粟特”列於迷密（Māymurgh）、悉萬斤、忸密（Bokhāra）、破洛那（Ferghāna, 費爾幹納）之後，而在波斯之前，可知傳文編者認爲“粟特”是中亞的索格底亞那。

2.《魏書·西域傳》所載“粟特”商人事，也是“粟特”應爲索格底亞那的有力證據。因爲索格底亞那人自古以擅長經商聞名，而奄蔡卽 Alans 是遊牧民族，東西文獻中沒有他們作爲商業民族活躍的明證，而且當時就從南俄羅斯遠赴中國甘肅從事貿易，斷難令人相信。

3.《魏書·西域傳》自“古之奄蔡”至“已三世矣”一段，全部是關於克里米亞 Sughdak 的記載。“溫那沙”應是 Hūna-stān 或 Hūna-shāh 的對音。[8]

4.《魏書·西域傳》“一名溫那沙”句夾在“古之奄蔡”和“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亦卽與奄蔡有關的兩句之間，並不和“粟特國”直接相連，因此無法斷定“溫那沙”究竟是“粟特”還是

“奄蔡”的異稱。或指爲“粟特”之一名是頗可懷疑的。

5.《魏書·西域傳》“去代一萬六千里”，應看作代和奄蔡的距離。《魏書·西域傳》載“悉萬斤”去代 12720 里，“迷密”去代 12600 里，因此不能認爲 16000 是索格底亞那去代距離。

第五種意見[9]是在綜合批判上述諸家意見的基礎上提出的，論證更爲周密。

首先，說者指出《魏書·西域傳》的“粟特”應是中亞的索格底亞那，而不是克里米亞半島的 Sughdak：

1.《魏書·西域傳》的主要依據是董琬、高明 437 年西使歸來的報告。該傳所載西域諸國的次序也基本上是按照董、高所說“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爲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來排列的。“粟特國”列爲“葱嶺以西”第一國，其位置顯然在中亞的索格底亞那。[10]

2. 索格底亞那在中國的史籍中，不僅見諸《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晉書·西戎傳》等，還見於《宋書·文帝紀》（作“肅特”）和《宋書·粟特傳》（作“粟特”）。後者載大明中（457—464 年）粟特國“遣使獻師子”，師子（卽獅子）正是索格底亞那的特產。足見中國古代一貫用“粟特”或其他發音類似的名稱來稱呼中亞的索格底亞那。

3.“粟特”和“奄蔡”是兩個不同的國家。《魏書·西域傳》稱“粟特”爲“古之奄蔡”，是因爲“奄蔡”和“粟特”的異稱“溫那沙”發音相似而產生的誤解。所謂“去代一萬六千里”，是

據《漢書·西域傳》所載康居去長安的距離，加上康居去奄蔡的距離推算出來的。[11] 闞駰《十三州志》“各有君長”云云，未必說明五世紀前半葉奄蔡國依舊存在，很可能衹是闞氏有機會讀到董、高的報告，不以爲然，有所指而發。

4. 索格底亞那自古以來就是商業活動的中心。五胡十六國時代更有許多索格底亞那人來河西居住，斯坦因從敦煌搜集到的許多粟特文書簡能充分證明這一點。這同《魏書·西域傳》關於粟特的記載是符合的。而克里米亞半島成爲以熱那亞人爲中心的國際貿易區遠在十一至十二世紀以後，此前尚未見記載。

5. 匈王阿提拉死於 453 年，其子 Ellac、Hernac 分領遺衆當在此年之後，而“忽倪”的消息於 437 年已由董、高獲悉。因此，“忽倪”不可能是 Ellac 或 Hernac。

6. 匈人征服 Alans 在 370 年以前，這和《魏書·西域傳》關於“匈奴”征服“粟特”“已三世矣”的記載似乎並不矛盾。但是按之匈人的歷史，在 5 世紀以前，各部並不統一，王位繼承也沒有制度化；第一個留下姓名的匈王是 402—408 年入侵羅馬的 Uldis，有關他的消息 408 年以後便斷絕了；412 年 Olympiodorus 訪問匈人時，獲悉匈王 Donates 死，由 Charato 續位。嗣後，415—420 年左右有匈王 Basich 與 Cursich 出，率匈人入侵波斯。20 年代後半，則有匈王名 Rua 者出，於 432 年統一匈人諸部，但 Rua 與前述諸王關係均不清楚。Rua 死於 434 年，由其兩姪長 Bleda、次阿提拉繼位。阿提拉殺死 Bleda，於 445 年掌握了匈人的最高權力；阿提拉死於 453 年，遺衆由其子 Ellac 等分領。因此，如果認爲“忽

倪”卽 Ellac 或 Hernac，則無論從他上溯三代或四代，都和匈人戰勝 Alans 的時間（370 年）不符。可見《魏書·西域傳》“粟特條”所載“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云云，不可能是指匈人對 Alans 的征服，而衹能是說的索格底亞那的情況。

7.“粟特”的異稱“溫那沙”，當爲 Hūnashāh 的對音，意爲“匈奴王”。[12]“粟特”卽索格底亞那“一名溫那沙”是被匈奴征服的結果。“溫那沙”的“溫”正是《隋書·西域傳》所載康國王之姓“溫”。但說者有關“溫”與“昭武”兩姓同時並存，實質相同之說並不可取。《隋書·西域傳》是說康國王家“本姓溫”，這表明索格底亞那地區出現過“溫”姓與“昭武”姓的交替，反映了征服“粟特”的“匈奴”又被嚈噠征服的事實。“昭武”應爲嚈噠王家之姓，或卽入侵笈多印度的嚈噠王頭羅曼的稱號 Jobula。

接著，說者試圖論證滅亡“粟特”的“匈奴”應爲阿彌阿努斯·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所載、於 356—359 年和薩珊波斯人作戰的 Chionitae（匈尼特）人。其說如下：

1. 年代上接近。“匈奴”征服“粟特”的年代應爲 337 或 367 年。假如以 367 年爲準，則在匈尼特人活躍的 19—22 年之後；假如以 337 年爲準，則在 11—13 年之前。不管怎樣，“匈奴”征服“粟特”和匈尼特出現的時間是相銜接的。

2. 地理上接近。匈尼特的原居地雖不清楚，但無論如何是在巴克特里亞（Bactria）和木鹿（Merv）一帶，而索格底亞那正和這兩個地區的西北和北部鄰接。

3. 名稱上類似。Chionitae 一名中的 (i)tae 在北部伊朗語中，是

接在族名後面的複數詞尾，詞根是 Chion- 或 Chioni-。另一方面，“溫那” = Ūnna-、Ūna- < Hūnna-、Hūna-。由此可知兩者同出一源。356 年以後，437 年以前，在巴克特里亞和木鹿一帶，除 Chionitae 外，沒有其他名稱相類者。

4. “溫那沙”應視作伊朗語 Hūn-śāh、Hūna-śāh 之轉訛。阿彌阿努斯·馬塞利努斯所載匈尼特王名 Grumbates，應是 Grum- 和 -bates 的合成詞。-bates 即 MP. NP. pād- (<OP. pāta-)、NP. pādišāh (OP. patiχšaya-, Pahl. pātaχśā, pātaχšāh)。可見 Grumbates 也是可以用伊朗語詮釋的“溫那沙”的王。

綜上所述，對《魏書·西域傳》“粟特條”的意見可大別爲三類：

1. “粟特”一名是克里米亞半島 Sughdak 的音譯。《魏書·西域傳》“粟特國條”全部是關於 Sughdak 的記載。所傳“匈奴”事是指匈人對 Alans 的征服。

2. “粟特”一名是中亞的索格底亞那的音譯。但《魏書·西域傳》“粟特國條”中有關“匈奴”事是指匈人對 Alans 的征服，其餘部份纔是關於索格底亞那的記載。

3. “粟特”一名是中亞的索格底亞那的音譯。《魏書·西域傳》“粟特國條”基本上是關於索格底亞那的記載，僅僅是在名稱上和地理位置上和“奄蔡”有所混淆而已。所傳“匈奴”事是指嚈噠（第二說）或匈尼特（第五說）對索格底亞那的征服。

我的看法按以下三個問題來敍述：

第一個問題：《魏書·西域傳》的“粟特”究竟是中亞的索格底亞那，還是克里米亞半島的 Sughdak 的音譯；《魏書·西域傳》

“粟特條”是關於索格底亞那，還是關於 Sughdak 的記載？

對此，我大致贊成第一說和第五說的主張，也認爲《魏書·西域傳》的“粟特”是索格底亞那，而不是 Sughdak 的音譯；《魏書·西域傳》“粟特條”是關於索格底亞那，而不是關於 Sughdak 的記載，其說如下：

1. 正如說者所指，《魏書·西域傳》的“粟特”和《宋書》的“肅特”或“粟特”一樣，都是《後漢書·西域傳》的“粟弋”、《魏略·西戎傳》的“屬繇”的承續。既然無論從地理位置和物産等情況來看，《後漢書》、《魏略》、《宋書》的有關記載都是指的中亞的索格底亞那，《魏書》也就不應該例外。

2. 正如說者所指，按之匈人的歷史，《魏書·西域傳》中關於“匈奴”王“忽倪”的記載，不可能是指匈王阿提拉之子 Ellac 或 Hernac 對克里米亞半島的征服。

3. 從《魏書·西域傳》本身的結構，以及“粟特國條”在傳文中的位置來看，“粟特”祇能是指中亞的索格底亞那。[13]

4. 據斯特拉波（Strabo），奄蔡（Aorsi）因佔有大部份裏海沿岸，遂假手亞美尼亞人和米底人，輸入印度、巴比侖貨物，故極富裕。（XI, 5-8）[14] 可見奄蔡和大多數遊牧部族一樣，主要通過中繼貿易獲利，本身並不是商人，不能稱之爲商業民族。另一方面，索格底亞那人自古以來就擅長經商，他們纔是名副其實的商業民族。因此，《魏書·西域傳》“粟特條”關於“粟特”商人的記述，也應該是指中亞索格底亞那的情況。

5. 中國史籍中從未出現過有關克里米亞半島的 Sadagarier 或

Sughdak 的記載。說者所舉杜篤《論都賦》不足爲憑。該賦載於《後漢書·文苑傳》，有關字句可摘錄如下：

>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票騎，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罽帳，繫閼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馳阬岸，獲昆彌，虜㥘侲，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拓地萬里，威震八荒。

這分明是在歌頌漢武帝的武功，與《漢書·陳湯傳》所載陳湯滅郅支單于事牽扯不到於一處。而且《漢書·陳湯傳》也衹是說郅支"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並沒有提到陳湯有虜闔蘇之舉。將這裏的"㥘侲"和"奄蔡"劃起等號來是沒有任何依據的。賦中的"㥘侲"，果如李注，讀如"粟犢"的話，那末有可能是來自中亞的索格底亞那人。其人由於經商，進入天山東部地區活動的時間應該非常之早。漢武帝固然沒有征服索格底亞那，但在征匈奴時，俘虜到索格底亞那人的可能性卻是存在的。後漢的杜篤用"㥘侲"，而不用《後漢書·西域傳》的"粟弋"來稱呼索格底亞那，也許他別有所本，很可能確是武帝時代流傳下來的資料；[15] 不能因此認爲"㥘侲"另有所指，甚至認爲卽五世紀中葉在克里米亞半島上出現的 Sadagarier。至於杜佑所言，根據正是《魏書·西域傳》的錯誤記載，完全不足爲證。再說，《後漢書》李注所謂"肅特"，

也未必就是《資治通鑒·漢紀》注引杜佑所指的“肅特”。（杜佑《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奄蔡，“後魏時曰粟特國”。）

6. 查《魏書》“本紀”，“粟特”朝魏共九次，“悉萬斤”朝魏共十次。“悉萬斤”第一次朝魏在延興三年（473 年）；“粟特”最後一次朝魏在太和三年（479 年），同年“悉萬斤”第三次朝魏。如果“粟特”是中亞的索格底亞那的話，這種現象如何解釋呢？我認爲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北魏政府最初把凡是來自中亞 Soghd 的使者一律記在“粟特”名下。所載皇興元年以前“粟特”的七次朝貢中，自然也包括了“悉萬斤”和其他索格底亞那國家。後來，由於逐漸能分辨清楚這些使者是來自索格底亞那地區的不同國家，纔一一另行記錄。其中，“悉萬斤”顯然是最突出的一個，它位於索格底亞那的交通要衝，商業發達，使者來往也最頻繁，北魏政府自然最早注意到它，並把它和來自索格底亞那即“粟特”地區其餘國家的使者區別開來。要之，“悉萬斤”於 473 年首次在北魏的朝貢記錄上出現，決不意味著“悉萬斤”人直到 473 年纔第一次來中國朝貢或經商。而延興四年（474 年）和太和三年（479 年），“粟特”最後兩次在朝貢記錄上出現，則是北魏政府按照慣例，仍把來自索格底亞那的使者，記錄到“粟特”名下，但其中顯然已不包括“悉萬斤”人了。太和三年，“粟特”和“悉萬斤”同時出現在朝貢記錄上，正是這個緣故。而當北魏政府對索格底亞那地區具體的國家逐個瞭解，能分別加以記錄（例如後來朝貢記錄中又出現了“忸密”和“迷密”等索格底亞那國家的名稱）時，“粟

特”這個泛稱，便自然而然地從朝貢記錄中消失了。

這種可能性存在的主要依據是，北魏對中亞包括索格底亞那地區的瞭解是逐步加深的。董琬、高明西使歸來時，雖然知道其間“諸小渠長蓋以百數”，但是能確指其名的衹有十六國。[16] 這十六國中可能包括“粟特”在內。正如說者所指，《魏書·西域傳》中有關“悉萬斤”等索格底亞那地區諸國的記載，所依據的都不是董、高的報告，而是此後獲得的資料，[17] 而如果“粟特”是指克里米亞半島的 Sughdak，那末就難以解釋爲何董、高對中亞的索格底亞那反倒一無所知。

至於北周保定四年（564 年），朝貢記錄中重新出現“粟特”這一名稱，則是北周政府籠統地把來自索格底亞那地區的使者歸屬於“粟特”名義之下了。須知“粟特”朝北周見於記載的衹有保定四年這唯一的一次，亦無須細分。試看《周書·異域傳下》“粟特國條”衹是疏略地抄襲《魏書·西域傳》，毫無新的內容增加。《周書·異域傳下》對於“悉萬斤”、“忸密”和“迷密”這些索格底亞那的具體國家一概沒有提及，也就無怪乎朝貢記錄不確切了。如果說《周書·異域傳下》的“粟特”是指克里米亞半島的 Sughdak 的話，那末代表索格底亞那的“悉萬斤”等又爲何不見記載，難道都已消亡。事實恰恰相反，隋唐以降，昭武之姓大盛，“颯秣建”即“悉萬斤”幾乎成了索格底亞那的代名詞。

另一種可能性則如說者所言，索格底亞那的中心發生了轉移。按照這一解釋，473 年以前，“粟特”（當時中心或在貴霜匿）的歷次朝魏，以“善商賈”著稱的“悉萬斤”人自然一貫參與其事。

473年起，由於“悉萬斤”在東西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舉足輕重，“悉萬斤”人便開始單獨遣使；而由於“悉萬斤”人分離出去，原來的“粟特”使團便名存實亡了，終於不得不完全讓位於“悉萬斤”。至於北周保定四年又出現“粟特”朝貢的記錄，則可能是某些索格底亞那商人偶然以舊日名義進行貿易活動的緣故。

以上兩說，目前我比較傾向於前一種。不管怎樣，我認爲肯定《魏書·西域傳》的“粟特”是中亞的索格底亞那的主要障礙已經排除。

第二個問題：既然《魏書·西域傳》的“粟特”是指中亞的索格底亞那，有關記載也是指的索格底亞那的情況，那末爲什麼又出現有關奄蔡的記事呢？如果說《魏書·西域傳》混淆了“粟特”和“奄蔡”，原因又何在呢？

今案：《魏書·西域傳》確實混淆了“粟特”和“奄蔡”；有關奄蔡的記事是抄襲以前的史書，但混淆的原因不在於“奄蔡”和“溫那沙”發音的相似。其說如下：

1.“奄蔡”，最早見於《史記·大宛列傳》：

>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又見於《漢書·西域傳上》：

> 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

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又見於《後漢書·西域傳》：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又見於《魏略·西戎傳》：

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

"粟特"，又作"粟弋"，最早見於《後漢書·西域傳》：

粟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陶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又見於《魏略·西戎傳》：

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

這是位於不同地區的兩個不同國家，上引諸家考之已詳，毋庸贅言。

2.《魏書·西域傳》關於“奄蔡”的記事全本《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不僅“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句，文字相類，而且“去代一萬六千里”，也如說者所言，乃據《漢書·西域傳》所載康居去長安1230里，加上奄蔡去康居約2000里，再加上長安去代1900里推算出來的。[18]然而，何以見得《魏書》衹是抄襲《史記》、《漢書》，而不是當時實際情況恰與《史記》、《漢書》所載相符合呢？

首先，北魏時康居國已亡。一則，《魏書·西域傳》不見“康居國條”，二則此傳在談到“者舌”時說：“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既稱爲“故”，可知已不復存在。指者舌爲“故康居國”，不過是說者舌國位於原康居國的領土上。如果《魏書·西域傳》的“粟特”即“奄蔡”確指克里米亞半島的Sughdak，則在記述其地理位置時不應該用已經消亡的“康居”爲基準。

其次，《魏書·西域傳》抄襲《史記》、《漢書》的現象決不止“粟特國條”這一處。“小月氏國條”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

3. 但是，隨之出現了一個十分明顯的矛盾：既然《魏書·西域傳》編者熟知《史記》、《漢書》，且隨意抄襲，不加選擇地把漢代的事情搬到魏代來，又何至於將前史中明確加以區分的“奄蔡”和“粟特”混爲一談。質言之，很難設想這位盲從《史記》、《漢書》的《魏書·西域傳》編者，會僅僅由於“奄蔡”和“溫那沙”發音相似，而作出如此重大的修改。也就是說，《魏書·西域傳》作出“粟特國”乃“古之奄蔡”這一錯誤判斷，一定另有原因在。

今案：這原因主要是董琬等西使中亞，在傳聞“粟特”被“匈奴”所滅的同時，又聽說“奄蔡”即 Alans 爲 Huns 所滅；由於 Huns 和“匈奴”名稱相同，Huns 滅 Alans 在 370 年左右，和“匈奴”滅“粟特”的時間也相去不遠，於是錯誤地推斷“奄蔡”就是“粟特”。《魏書·西域傳》編者既根據董琬等的報告，認定“粟特”即“奄蔡”，《後漢書·西域傳》等又不載“粟特”去“奄蔡”的距離，且如前所述，“粟特”本一泛稱，該處使臣或商賈雖不斷來朝，但所述里距不一，當要記述“粟特”的地理位置時，便祇能根據《史記》、《漢書》等有關“奄蔡”的資料了。

第三個問題：既然《魏書·西域傳》有關“匈奴”的記事是敍述中亞索格底亞那的情況，那末這“匈奴”究竟指的是什麼？

今案：《魏書·西域傳》所載征服“粟特”的“匈奴”應即嚈噠。其說如下：

1. 董、高西使時，傳聞“匈奴”统治“粟特”“已三世矣”。一世若以三十年計，由 437 年上溯“三世”（約 80—90 年）、可得“匈奴”滅“粟特”約在 347—357 年。而如前節所考，嚈噠度阿爾泰山南遷約在 366—376 年。兩者大體相符。

說者以爲“忽倪”既可能是第三代王，也可能是第四代王。[20] 今案：此說未安。“至王忽倪已三世矣”一句，衹能理解爲“到忽倪已經是第三代王了”。

2. 如第一篇所考，嚈噠另一個族名是“匈奴”，而《魏書·西域傳》“粟特條”的“匈奴”乃指嚈噠，在《魏書·西域傳》中也可以找到佐證。同傳載大月氏王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遷，或

考此“匈奴”爲嚈噠，[21] 甚是。

顯然，嚈噠人於四世紀六七十年代自塞北度阿爾泰山，西遷中亞後，一直自號“匈奴”或被稱爲“匈奴”，在一段時間內，嚈噠之名不著。所以包括董琬、高明在內的中國人祇知中亞有“匈奴”，不知有嚈噠，猶如僞阿瓦爾人西徙時自稱“匈奴”，本名反而不爲世人所知一樣。這就回答了以下疑問：如果《魏書·西域傳》的“粟特”是指中亞的索格底亞那，爲何不見被嚈噠襲奪的記載？答案是：《魏書·西域傳》所傳“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云云，正是嚈噠襲奪索格底亞那的記載。

至於《魏書·西域傳》所傳“匈奴”之王名“忽倪”，也許根本不是王名，祇是“匈奴”之音訛。[22] 董、高傳聞失實，遂誤以爲王名，如此而已。

3.“溫那沙”爲 Hūnashāh（匈奴王）之音譯，而嚈噠首領頭羅曼的 Kura 石刻銘文中有 Rājādhirāja Mahārājā Toramāṇa Shahi Jobula 的字樣，[23] Shahi 即“溫那沙”之“沙”，知嚈噠確曾以此爲號。

《魏書·西域傳》粟特國“一名溫那沙”句，雖如說者所言，夾在與奄蔡有關的兩句之間，但顯然不是說奄蔡一名“溫那沙”，因爲主語是粟特而不是奄蔡。

合上三證，指征服索格底亞那的“匈奴”爲嚈噠，或可成立。

說者指《魏書·西域傳》“粟特國條”的“匈奴”爲匈尼特，從名稱、年代、地望三方面加以論證，固不失爲一說，但根據似不如嚈噠說充分。而且，包括阿彌阿努斯·馬塞利努斯（XVI, 9;

XVII, 5; XVIII, 6; XIX, 1）在內的任何記載都沒有提到匈尼特人曾征服過索格底亞那。[24] 與此相對，嚈噠曾佔領過索格底亞那是無庸置疑的，彌南和迪奈韋里的記載均可爲證。

此外，匈尼特說還有一處難以逾越的障礙。《隋書·西域傳》載：

> 康國者……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

誠如說者所言，康國王之姓"溫"卽"溫那沙"之"溫"；但細讀原文，衹能認爲是同一王家兩姓之交替，卻不能認爲是不同王家兩姓之交替。傳文反映的史實應該是作爲索格底亞那土著的昭武王家，因被"匈奴"卽嚈噠所征服，曾不得不改姓"溫"，後來嚈噠破滅纔又恢復了原來的姓"昭武"，這就是所謂"不忘本也"。無論如何看不出先被匈尼特征服，後來又被嚈噠征服的蹟像，更不能認爲"昭武"是嚈噠王家的姓或稱號，不僅傳文明載其王"月氏人也"，而且昭武姓最活躍的時期，也在嚈噠滅亡之後。說者舉頭羅曼碑銘中的 Jobula 以證實嚈噠確有"昭武"一號。但是，此號不管是嚈噠人原有，還是進入中亞後取自土著，均不影響以上我對《隋書·西域傳》"康國條"所作的分析，因爲康國王畢竟不是嚈噠人的後裔。

再者，據《新唐書·西域傳下》，貞觀年間入貢的安國王訶陵迦，曾炫耀其王統之悠久，"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同年入貢

的東安國也有“子孫相承十世”之說。此兩國均姓“昭武”，足見此姓起源甚古，並不是嚈噠人侵索格底亞那以後纔有的。說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因而補充說：如果“昭武”姓早已存在於索格底亞那，則有可能是因匈尼特的征服而一度失去了全土支配權的昭武王家在嚈噠征服匈尼特之後，又恢復了地方性的支配權；或者嚈噠人和作爲土著的昭武王家結合，並最終取“昭武”爲姓。

今案：這些解釋也都有欠妥貼。因爲《隋書·西域傳》“康國條”和上引《新唐書·西域傳》的記載合起來仍然衹能說明同一王家曾一度姓“溫”，後來又恢復了原來的姓“昭武”，怎麼也看不出另有一個姓“溫”的王家被“昭武”姓的王家（不管是嚈噠，還是索格底亞那的土著，甚或是兩者的結合）所取代。

《魏書·西域傳》關於粟特國的記載，我的看法歸納起來是：“粟特”一名是中亞的索格底亞那的音譯，“粟特條”也是有關索格底亞那的記載；其中“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是指嚈噠對索格底亞那的征服；之所以混入有關奄蔡的記事，主要是由於魏使在傳聞“匈奴”即嚈噠征服索格底亞那的同時，又傳聞Huns對Alans的征服，兩者在時間上接近，“匈奴”與Huns在名稱上又相同的緣故。

最後，說一說與嚈噠西徙索格底亞那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即所謂滑國“屬芮芮”問題。

《梁書·西北諸戎傳》載：“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這是現存有關早期嚈噠和柔然關係的唯一史料。

有人對這則記載的可靠性表示懷疑，指出梁人誤以爲嚈噠起

源於車師後部，而車師後部卽濟木薩一帶曾受柔然支配，因而得出了嚈噠曾“屬芮芮”的結論。[25] 換言之，這是梁人從滑卽“車師別種”這一錯誤前提出發得到的結論，因而也是錯誤的。

今案：此說未安。因爲滑卽“車師別種”和滑“屬芮芮”之間，未必存在前提和結論的關係，說者也沒有試圖證明這一點。因此，今天我們判斷滑卽嚈噠“屬芮芮”這則記載是否可靠最好求諸嚈噠和柔然本身的歷史。

如前所述，嚈噠自阿爾泰山南遷、並征服索格底亞那的年代約在 366—376 年之間，而柔然興起於五世紀初，故嚈噠度阿爾泰山、遷往索格底亞那之前不可能役屬柔然。又，437 年左右，嚈噠人自索格底亞那入侵吐火羅斯坦，逐走寄多羅貴霜人，此後逐漸强大，當然也不可能再役屬柔然。因此，從嚈噠和柔然的發展史來看，如果嚈噠受柔然役使的話，衹可能在嚈噠西遷索格底亞那之後，入侵吐火羅斯坦之前。

所謂“元魏之居桑乾”，應卽拓跋氏都平城之時（398—494 年），這同上述柔然、嚈噠的情況結合起來，嚈噠役屬柔然的時間似可定在 402—437 年之間。這一段時間，正是柔然積極向西方發展的時期，嚈噠役屬柔然是完全可能的。

柔然勢力越過葱嶺，侵掠位於吐火羅斯坦的寄多羅貴霜，有《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的記載爲證。旣然吐火羅斯坦尚且受柔然侵掠，位於索格底亞那的嚈噠受柔然支配也就不難想見了。“大月氏國條”稱大月氏國“北與蠕蠕接”，正說明柔然勢力一度伸向阿姆河北岸。[26]

有學者曾根據《魏書·西域傳》關於嚈噠係“高車之別種”的記載，論證嚈噠受柔然役使的可能性，指出柔然原在鄂爾渾河流域，其北方色愣格河流域附近有以高車爲中心的突厥系部族。後來高車南下。與柔然對抗，並受柔然支配，直至五世紀後半葉纔擺脫柔然的控制，度阿爾泰山進入準噶爾盆地，並伸張其勢力於東部天山地區。嚈噠作爲高車卽突厥系部族之一，曾與高車一起活動於色愣格河流域，後來又與高車一起南下役屬柔然，但比高車先一步到達阿爾泰山，復南下準噶爾盆地進入天山地區。當柔然勢力從蒙古高原向準噶爾盆地發展，進而在五世紀初到達東部天山、支配西域諸國之際，嚈噠一面和柔然保持關係或受其支配，一面向西發展。結論是嚈噠役屬柔然當在四世紀末。[27]

今案：此說未安，因爲缺乏起碼的資料依據。所謂嚈噠最初與高車同在色愣格爾河流域，後與高車一起南下受柔然役使等等，全出諸說者想像。如前所述，嚈噠在四世紀六七十年代已西徙索格底亞那，不可能在準噶爾停留到五世紀初，也完全沒有史料可以證明。它的勢力在準噶爾出現，是後來從索格底亞那和吐火羅斯坦向東方發展的結果。

■ 注释

[1] 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 1985, p. 111.

[2] 見本書第六篇。

[3] F. Hirth, "Ü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M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899, II, pp. 245-278.

[4] 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第7卷)，東京：岩波，1971年，pp. 43-123。

[5] 白鳥庫吉氏對嚈噠說未有充分論證，後又放棄此說，認爲入侵索格底亞那的"匈奴"應是悅般，見"蒙古及び突厥の起源",《白鳥庫吉全集·塞外民族史研究（上)》(第4卷),東京:岩波,1970年,pp. 541-547。關於悅般，參看余太山"柔然阿瓦爾同族論質疑——兼說阿瓦爾卽悅般",《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163-192。

[6] 內田吟風"匈奴西移考",《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pp. 115-141。

[7] 江上波夫"匈奴·フン同族論",《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1954年，pp. 319-402。

[8] 說本 J. Marquart, "Die Nichtslavischen (altbulgarischen) Ausdrücke in der Bulgarischen Fhrstenliste." *T'oung Pao* 11 (1910): pp. 649-680, esp. 660-661。

[9] 榎一雄"魏書粟特國傳と匈奴·フン同族問題",《東洋學報》37～4（1955年），pp. 1-48；ソグディアナと匈奴 1-3",《史學雜誌》64～6（1955年），pp. 1-28；64～7（1955年），pp. 31-49；64～8（1955年），pp. 31-54。

[10] 榎氏有關《魏書·西域傳》結構之研究並未中的，參看余太山"董琬、高

明西使考”一文，載注 5 所引書，pp. 217-244。

[11] 見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 年，pp. 178-186。

[12] 見注 8 所引 J. Marquart 文。

[13] 參看注 10 所引余太山文。

[14] H. L. Jones,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8 vols. London, 1916-1936.

[15] 杜篤所賦“僋侲”有可能便是《漢書·衛青霍去病傳》所載武帝詔：“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塗王……”一段中的“鱳得”。果然，則杜篤不過說漢軍於該處虜獲特多而已。

[16] 同注 13。

[17] 榎氏說，見注 9 所引文。

[18] 見注 11 所引松田壽男書，pp. 178-204。

[19] 見本書第三篇。

[20] 同注 17。

[21] 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0 ~ 3（1958 年），pp. 1-52。

[22]《史記·夏本紀》：“來始滑”，集解：“《尚書》‘滑’字作‘曶’，音‘忽’”。“忽”、“滑”客觀上都是“胡”的異譯，參見前篇。

[23] G. Bühler, “The New Inscription of Toramana Shaha.” *Epigraphia India* I (1892): pp. 238-241.

[24] 關於匈尼特，見 J. C. Rolfe, tr. *Ammianus Marcellin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39.

[25] 榎一雄“滑國に關する梁職貢圖の記事について”,《東方學》27 (1964 年), pp. 12-32。

[26] 参看本書第三篇。

[27] 内藤みどり “エフタル民族とその發展”,《東西文化交流史》, 東京: 雄山閣, 1975 年, pp. 134-147。

三　佔領吐火羅斯坦

有關嚈噠佔領吐火羅斯坦的直接記錄，是《魏書·西域傳》“小月氏國條”。因此，要搞清楚這段歷史，就必須從研究這則記載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入手。《魏書·西域傳》的這兩則記載，由於涉及貴霜帝國衰落以後中亞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歷來受到學界的重視。

如所週知，魏收原著《魏書·西域傳》已於唐宋間亡失。今天看到的《魏書·西域傳》是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劉恕等人在整理殘缺的《魏書》時，取《北史·西域傳》補入的。而由於《北史·西域傳》除主要依據《魏書》外，還摻雜了《周書·異域傳》和《隋書·西域傳》的內容。近人對考訂《魏書·西域傳》原文下了不少工夫。對於其中“大月氏國條”和“小月氏國條”，一致認爲均係《魏書·西域傳》原文；前者主要依據太延年間董琬、高明的報告，後者所依據資料的年代則要稍晚一些。但是，關於《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和小月氏國記載所傳史實的理解則並不一致。這正是本章辨析、考證的重點。玆介紹其中最典型的兩說，

並從研究嚈噠史的角度談談自己的看法。

《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全文如下：

>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第一說[1]認爲：傳文雖然主要是董琬、高明的報告，但亦含有《魏書·西域傳》編者杜撰的內容。所謂“盧監氏”應爲《漢書·西域傳》所傳大月氏國都城“監氏”之誤，而“監氏”實爲“膜市”、“莫市”之訛，乃譯自 Bāχdi（Bāχdiyā），應即《梁書·裴子野傳》等所見“白題”、《新唐書·地理志》等所見“縛叱”、《新唐書·西域傳》所見“縛底野”、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所見“縛底耶”。“薄羅”譯自 Bāhūlaka，應即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的“婆佉羅”、《續高僧傳》的“薄佉羅”、《求法高僧傳》的“縛渴羅”、《大唐西域記》所見“縛喝”。Bāχdi（Bāχdiyā）與 Bāhūlaka 分屬兩個系列，[2]均指當時吐火羅斯坦首府，即今阿富汗的 Balkh（巴爾赫）。《魏書·西域傳》編者不明此理，既從《漢書·西域傳》中獲悉大月氏國的都

城是“監氏”，又從董琬、高明的報告中得知大月氏國的都城是“薄羅”，於是推出大月氏國已經遷都的結論，並把遷都的原因歸諸柔然的侵犯。其實柔然的勢力別說吐火羅斯坦，就連索格底亞那都未曾達到。質言之，柔然侵犯大月氏國以及大月氏國遷都均非事實，而是《魏書·西域傳》編者爲了解決他想像中的矛盾而編造出來的。該傳“大月氏國條”所提供的史實僅僅是：

1. 437年左右大月氏國都於“監氏”即“薄羅”，亦即今巴爾赫。

2. 大月氏國在其王寄多羅在位時，興兵越過興都庫什山，南向擴張領土。437年左右，其領土包括了吐火羅斯坦和乾陀羅以北地區。[3]

第二說[4]認爲：傳文稱大月氏國受柔然侵犯應是事實。歷來認爲柔然西境不越過焉耆，而這僅僅是社崙可汗時代（402—410年）的情況。社崙以後，柔然勢力繼續西進，阿姆河流域的嚈噠曾一度役屬之。柔然既能控制嚈噠，侵犯吐火羅斯坦是勢在必然。其時間應在吳提可汗時（429—444年），更確切地說在434年左右。董、高西使時，發現烏孫已被迫西徙葱嶺，可見在此之前，柔然勢力已經向西方發展。《魏書·西域傳》載，太延五年（439年）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强，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亦可見柔然在西域的影響。此外，普里斯庫斯（Priscus）有載，卑路斯即位之初，貴霜王死，其子Κούγχαν幼年即位，波斯人爲曠日持久的戰爭所苦，便建議同新王聯姻。這位去世的貴霜王應即寄多羅。Κούγχαν實非人名，應係Qun-Xan之訛。[5]Qun之意不明；Xan應即“可汗”，爲柔然皇帝之稱號。

貴霜本無“可汗”號，顯然是由於高車、嚈噠相繼興起，柔然西進吐火羅斯坦的部隊退路隔絕，其中有許多人反而投降了寄多羅貴霜，使貴霜王也有了“可汗”這一尊號。

至於“盧監氏”，說者以爲應係“監氏”之誤，卽今巴爾赫。“薄羅”則應爲Balaam之音譯。其地在今裏海東南克拉斯諾沃德斯克（Krasnovodsk）附近。[6]據普里斯庫斯，467年，卑路斯戰勝寄多羅族，佔領其城Balaam，可以爲證。《魏書·西域傳》既載“盧監氏”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弗敵沙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可知盧監氏去弗敵沙840里，儘管里程計算不很精確，畢竟不能完全無視這些有關地理位置的記載，而指“監氏”與“薄羅”爲一地。

《魏書·西域傳》“小月氏國條”全文如下：

>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第一說認爲：傳文中有部份是《魏書·西域傳》編者根據過去的知識加進去的，並非當時乾陀羅地區“小月氏”的實際情況。例如：“先居西平、張掖之間”一句，根據是闞駰《十三州志》；“被服頗

與羌同”一句，採自《後漢書·西域傳》；“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一句，是按照《漢書·西域傳》寫的。因此，該傳“小月氏條”所提供的史實如下：

1. 其都城爲富樓沙。

2. 其王爲大月氏王寄多羅之子。寄多羅被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富樓沙，號小月氏。

3. 其國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

4. 使用金銀錢。

在此基礎上，說者進一步論述了“小月氏國傳”所謂“匈奴”就是嚈噠。五世紀三十年代末，亦即伊嗣俟二世即位之初，嚈噠勢力在吐火羅斯坦擡頭，自東向西壓迫寄多羅月氏，寄多羅被迫逐步放棄吐火羅斯坦遷徙，並同薩珊波斯發生衝突，這種衝突一直持續至六十年代末。

第二說認爲：傳文所見“匈奴”，應按《通典·邊防八·西戎四》改爲“蠕蠕”。質言之，“大月氏國傳”所傳大月氏西徙和“小月氏國傳”所傳寄多羅西徙，實爲同一事件。也就是說，《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和“小月氏國條”所提供的主要史實是：434 年左右，大月氏王寄多羅由於遭受柔然侵犯逃離監氏城，而於 435 年或此後數年內都於薄羅（Balaam），積蓄力量，然後南侵北天竺，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在此同時，寄多羅令其子守富樓沙，史稱“小月氏”。

以下是我的看法：

關於《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薄羅”應是 Bāhūlaka

的音譯，與“盧監氏”或“監氏”同指一地。[7] 大月氏國實際上並沒有遷都。說者指“薄羅”爲 Balaam，未安。

一則，普里斯庫斯（51.1, Exc. de Leg. Gent. 22）[8] 所載 467 年卑路斯奪取 Balaam 時戰勝的 Κιδαρίτας Οὔννους，可直譯爲“寄多羅匈人”。寄多羅既爲“匈奴”所逐西徙，斷無以“匈人”爲族號之理，[9] 可見這 Κιδαρίτας Οὔννους 應讀作“來自寄多羅統治地區的匈人”。由此可見，卑路斯所奪取的 Balaam 並不在寄多羅人控制之下。換言之，普里斯庫斯這則記載不足以證明寄多羅曾佔領過 Balaam，當然更不能用來證明寄多羅曾以該處爲都城。

二則，傳文所載“盧監氏”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是由《漢書·西域傳上》所載“監氏”去長安“一萬二千六百里”，加上長安去代一千九百里推算出來的，[10] 而“薄羅”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則是以當時的報告爲依據的。蓋《魏書·西域傳》編者既不知“監氏”、“薄羅”爲同一地點，又按弗敵沙去代“一萬三千六百里”，算出“薄羅”去代 15760 里，乃認爲其位置應在“監氏”之西，於是得出了“大月氏西徙都薄羅城”的結論。由此可見，根據里程計算否定“監氏”與“薄羅”爲一地是缺乏說服力的，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要求西漢和北魏對萬里之外地點的測算不產生誤差。

三則，傳文在敍述大月氏遷都“薄羅”之後，又稱其王寄多羅興師越“大山”（興都庫什山），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似乎也能說明事實上大月氏並未徙都，更不可能徙至遠在裹海東南的 Balaam。[11]

也許是由於《魏書·西域傳》把事實上未曾發生的“徙都”和柔然的侵犯聯繫在一起的緣故，第一說在否定“徙都”的同時，也簡單否定了柔然侵犯大月氏的記載，這是有欠考慮的，因爲大月氏未曾徙都並不排斥大月氏受柔然侵犯的可能性。

一則，柔然勢力崛起之際，貴霜帝國早已衰落，中亞地區沒有出現强大的統一的力量。薩珊波斯雖也經略東方，但其主力一直在西方同羅馬爭奪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嚈噠雖自四世紀六七十年代已遷至索格底亞那。但還處於很弱小的階段。另一方面，中亞地處東西交通要衝，居民擅長經商，許多城市積聚了大量財富，這些財富正是遊牧部族所垂涎的。因此，柔然在不斷南侵的同時，西進役使索格底亞那的嚈噠，侵掠吐火羅斯坦的大月氏是完全可能的。

二則，《魏書·蠕蠕傳》在談到社崙可汗時代柔然的疆域時雖然說：“其西則焉耆之北”，[12]乃指其實際控制地區，並不是指其寇掠範圍，不能援引以證明柔然勢力未曾越過葱嶺。

三則，柔然寇掠的方式，有《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條”的一則記載爲例：

> 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延望救援。顯祖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惟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所拒，當已旋矣。雖欲遣使，勢無所

及。顯祖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

“示其使者，亦以爲然”，說明“惟習野掠”云云，並不是這些公卿的想當然。既然“蠕蠕軍馬到城下”時，位於西域南道的于闐尚能“聚兵自固”，遠在吐火羅斯坦的大月氏當然也能守住都城。由此可見，大月氏苦於柔然的侵掠，卻未必遷都。

四則，《魏書·西域傳》“烏孫國條”載，“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這主要是因爲烏孫是個遊牧部族，且駐地與柔然十分接近的緣故。[13] 換言之，不能以此例于闐和大月氏。

正因爲柔然侵犯吐火羅斯坦的方式僅僅是所謂“野掠”，所以不可能對寄多羅貴霜人產生什麼深遠的影響。事實上，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大量柔然人留居在吐火羅斯坦，以致貴霜人接受了“可汗”這一稱號。普里斯庫斯所載“貴霜人”或 Κιδαρίτας Οὔννους 實際上都是嚈噠人，使用“可汗”稱號的也是嚈噠人。[14] Qun-Xan 應即 Hun-Xan，可譯爲“匈可汗”。而如前述，“匈奴”正是嚈噠的另一個稱呼。

至於柔然侵犯大月氏的時間，其上限可溯至於五世紀初，也就是說未必在 434 年左右。因爲柔然役使嚈噠、數侵大月氏，應該在逐走烏孫之後，而烏孫西徙葱嶺的年代最早可能在社崙立國之時。論者之所以把柔然侵犯大月氏的時間定在吳提可汗時，很可能還是拘泥於上引《魏書·蠕蠕傳》“焉耆之地”一句，以爲社崙時代柔然勢力未能逾此而西；否則便是誤以爲柔然的寇掠發生

在寄多羅王在位時。其實，柔然在社崙可汗時代已有向西方發展的可能，而月氏受侵之際，未必寄多羅王已經登位。[15]

關於《魏書·西域傳》"小月氏國條"：說者指傳文"匈奴"爲"蠕蠕"之誤似不可取，此條內容與"大月氏國條"其實並不重複。[16]

一則，《魏書·西域傳》作者不可能不知道"匈奴"和"蠕蠕"的區別，也從未將兩者混爲一談，持《通典》否定《魏書》似乎也缺乏充分的理由。

二則，《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所說大月氏西徙，在編者心目中，是大月氏因苦於柔然屢次侵擾，主動遷都以避其鋒，國力既未受損，亦未因此放棄興都庫什山以北地區，故在"西徙都"句後，接以"興師越大山"等等。同傳"小月氏國條"所說寄多羅西徙，在編者心目中，是被"匈奴"驅逐出吐火羅斯坦的，因此纔有下文"令其子守富樓沙"云云。後一種情形在編者看來頗類似於《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爲匈奴所逐遠去，"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這也許正是編者襲用《漢書·西域傳》等有關漢代小月氏資料的原因。傳文一作"所侵"，一作"所逐"，雖僅一字之差，意義迥異。

要之，大月氏雖苦於屢受柔然侵犯，卻並無遷都之必要，寄多羅王在位時，不僅仍領有吐火羅斯坦，且擁有南征北天竺的實力。衹是在征服乾陀羅以北五國之後，纔出現了一股足以把勇武的寄多羅王逐出吐火羅斯坦的、號稱"匈奴"的勢力。這便是來自阿姆河北岸的嚈噠人。

據亞美尼亞史家埃里塞記載，薩珊波斯伊嗣俟二世即位伊始，

便投入了同“貴霜人”和“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的戰爭。[17]這些入侵者顯然是嚈噠人，因爲他們自號“匈奴”、又來自貴霜舊土，所以亞美尼亞人纔這麼稱呼他們。這就是“小月氏國傳”中“匈奴”一詞的真正含義。至於寄多羅何故西徙，則既可能是迫於形勢，欲以換取小月氏國的苟延，也可能是寄多羅已被“匈奴”征服，成爲其西向進攻薩珊波斯的前驅。主第一說者認爲上述“貴霜人”和“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都是真正的貴霜人，貴霜人這次西徙持續了將近三十年。[18]今案：此說未安。伊嗣俟二世最初遭遇的卽使是寄多羅率領的貴霜人，他也必定隨卽面臨接踵而至的嚈噠人的入侵。

伊嗣俟二世卽位於董琬、高明歸國後不久，因此，寄多羅被“匈奴”所逐西徙不見諸“大月氏國傳”，而見載於“小月氏國傳”。兩傳內容不僅不重複而且正相銜接。

綜合上面的考察，可知《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和同傳“小月氏國條”是保存至今有關寄多羅貴霜唯一系統的文獻資料，彌足珍貴。兩傳內容不重複、不矛盾，在時間上是銜接的，按之當時中亞內外的形勢，絕大部份是可靠的。所傳史實要點可列述如下：

1. 五世紀以降，位於吐火羅斯坦的大月氏國屢遭柔然侵擾。

2. 大月氏國在其王寄多羅在位時，興師越過興都庫什山，征服了乾陀羅以北五國。

3. 437 年左右，大月氏國佔有興都庫什山南北地區，都城爲監氏城（卽薄羅城）。

4. 五世紀三十年代末，卽薩珊波斯伊嗣俟二世卽位後不久，寄多羅被“匈奴”卽嚈噠人逐出吐火羅斯坦而西徙。

5. 寄多羅西徙後，其子守富樓沙，史稱“小月氏”。

■ 注释

[1] 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0 ~ 3（1958 年），pp. 1-52。

[2] 詳見本書第八篇。

[3] 注 1 所引榎氏文甚至極疑傳文“乾陀羅以北五國”也是《魏書·西域傳》編者根據《後漢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有五翖侯設想出來的。

[4] 內田風“蠕蠕の寄多羅月氏領バルク地方侵入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8 ~ 2（1959 年），pp. 23-34。

[5] 說本 H. W. Haussig, “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Byzantion* 23 (1953): pp. 275-462, esp. 353。

[6] 說本 J. Marquart,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1901, p. 55。

[7] 注 1 所引榎氏文還引樂史《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三·西戎五》爲證：“大月氏國，漢時通焉，理藍氏城，一名薄羅城。”案:《太平寰宇記》爲宋人著作，大半承襲前史，間或亦有有價值之史料，但此處不足爲據。

[8] R. C. Blockley,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ARCA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exts, Papers and Monographs 10. Francis Cairns, 1981-1983.

[9] 內田氏曾力辨貴霜王家係大月氏出身。論據之一爲貴霜王波調若出身於大夏，決不可能接受曹魏“親魏大月氏王”之稱號，蓋大月氏與大夏爲世仇。說見“吐火羅（Tukhāra）國史考”，《東方學會創立25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72年，pp. 91-110。今案：根據同樣的邏輯，出身大月氏的貴霜豈非也不可能以其世仇匈奴的族名爲族名。

[10] 說見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年，pp. 178-204。又監氏去長安《漢書·西域傳》原作“一萬一千六百里”，亦據松田氏說改。

[11]《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載“薄羅”去弗敵沙（Badakshan）二千一百里，如果“薄羅”即Balaam，這一距離未免太短。

[12]《魏書·西域傳》原文作“其西則焉耆之地”，此據《通典·邊防一二·北狄三》改。說見內田吟風“柔然族史序說”，羽田博士還曆記念會編《羽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0年，pp. 131-171。

[13] 參看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193-216。

[14] 參看本書第四篇。

[15] 同注14。

[16] 榎一雄氏認爲，《通典》作“蠕蠕”，是編者爲了和“大月氏國傳”取得一致而妄加改動的。今案：其說甚是。又，中華書局標點本《魏書·西域傳》於“寄多羅爲匈奴所逐”句下出校記曰：按大月氏爲匈奴所逐，遠在西漢初，見《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這裏所說據上“大月氏傳”，乃是被“蠕蠕”所侵，纔“西徙都薄羅城”。“匈奴”應作“蠕蠕”。又，《北史·西

域傳》於此所出校記同，更引《通典》、《通志》爲證。今案：兩校記均未安。

[17] V. Langlois. *Collection des historiens ancients et modernes de l'Armenie*, vol. 2. Paris, 1869. p. 186.

[18] 榎一雄“初期アルメニア史書に見えるエフタルとクジャン”,《東洋學報》47 ~ 4（1965 年），pp. 1-56。

四　進犯薩珊波斯

在嚈噠同薩珊波斯的關係史上，意見分歧最大的有三個問題：一、迪奈韋里、泰伯里（Tabarī）、費爾道西（Firdausī）等所載五世紀二十年代入侵波斯，被巴赫蘭五世（Bahrām V）擊退的是不是嚈噠人。二、亞美尼亞史家埃里塞（Ełišē）等所載與伊嗣俟二世（Yazdgird II）翻覆交戰的是不是嚈噠人。三、普里斯庫斯（Priscus）等所載與卑路斯（Pērōz）作戰的是不是嚈噠人。這三個問題歸結起來其實衹有一個，即嚈噠人是從何時開始進犯薩珊波斯的。

第一，據泰伯里，巴赫蘭五世在位時，有突厥可汗率軍二十五萬入侵波斯，但被巴赫蘭擊退。[1] 因爲從年代來看，此時不可能有突厥人入侵波斯，所以此事成了中亞史上一個謎，歷來衆說紛紜，迄未取得一致意見。

今案：要搞清楚這時入侵波斯的是什麼人，先要弄明白他們究竟來自何方。泰伯里告訴我們，巴赫蘭五世在擊退上述入侵者後，曾遣將一名，渡過阿姆河，鎮壓那裏的居民。[2] 比泰伯里年

代稍前的迪奈韋里也說，巴赫蘭五世乘勝追擊，“直到阿姆河，並在巴爾赫附近渡過了河”。[3] 從這些記錄來看，入侵者顯然是來自阿姆河以北，卽索格底亞那地區。而如前所述，嚈噠早在四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遷至索格底亞那，故入侵者很可能是嚈噠人。[4]

說者懷疑《魏書·西域傳》關於嚈噠起源於塞北記載，以爲：嚈噠人果自金山南下，遷至索格底亞那，則早就該同薩珊波斯發生接觸了，何故不見記載？[5] 今案：泰伯里等所載“突厥”入侵波斯事件便是嚈噠同波斯的首次接觸。

費爾道西《列王詠》有以下詩章：

卻說英勇的巴赫蘭（Bahrám）曾經勘邊巡土，
他在平原上竪起一根圓柱，
上面鐫刻著這位王中之王的銘文：
“突厥人（Turkman）和伊朗人（Íránian），
誰也別用任何方法越過這道疆界，
或者渡過這道河。”
當卑路斯（Píruz），這位殺獅英雄來到此地，
看見伊朗（Írán）先君樹立的界標，
他對將領們說道：
“我也將同樣用財富和彎刀，
修築起當年抗禦突厥人的高塔，
以免遭受嚈噠人（Haitálians）的侵擾。
當這高塔在塔里堪（Tarak）建起之時，

如果嚈噠的首領將舊約重提，

我就好說，巴赫蘭（Bahrám Gúr）這樣做，

是出於慷慨、智慧、無畏和仁慈。

但我決不讓庫希那瓦（Khúshnawáz）以及任何一個

突厥人或是嚈噠人在此留下足蹟。”

庫希那瓦，汗（Khán）的兒子，

聽說國王（Sháh）公然不顧巴赫蘭（Bahrám Gúr）親自簽署的條約，

率領他的全部軍隊渡過了紀渾河（Jíhún），

他傳令詔書起草官火速來謁。[6]

接著，費爾道西進一步描述庫希那瓦即那位嚈噠可汗如何責備卑路斯違反巴赫蘭對他先王的承諾，以及卑路斯如何在這場背信棄義的戰爭中一敗塗地。十分清楚，在費爾道西筆下，巴赫蘭五世時代的“突厥”和卑路斯時代的嚈噠是一脈相承的，否則，也就談不上“舊約重提”了。

也許有人會說，費爾道西既然並提突厥和嚈噠，可見在他心目中，兩者還是有區別的。其實不然，因爲在費爾道西時代已經把“突厥”作爲非伊朗系遊牧部族的泛稱，故“嚈噠”與“突厥”並不排斥。之所以兩者並提，是因爲巴赫蘭五世時代入侵波斯的嚈噠人也自稱或被稱爲“匈奴”，而那時的“匈奴”和費爾道西時代的“突厥”這兩個概念衹是名稱不同，內涵是相同的。

或因上述關於“突厥”可汗入侵波斯一事，年代在後的費爾

道西（934—1020年）所載反而比年代在前的泰伯里（838—923年）等詳細而懷疑其可靠性。[7] 今案：此說未安。泰伯里、費爾道西的作品可能有共同的依據，詳略不同不過反映了取材多少而已。

或以爲巴赫蘭五世時代入侵波斯的“突厥”人是匈尼特人。[8] 今案：此說亦未安。蓋五世紀二十年代匈尼特人下落不明，而當時嚈噠人領有索格底亞那則是比較可信的。

第二，巴赫蘭五世死，其子伊嗣俟二世即位伊始，便對拜占庭宣戰，但戰事尚無明顯進展，雙方就突然媾和了，這很可能是波斯東部邊境出現了麻煩。

埃里塞記錄了當時祆教祭師對伊嗣俟二世的一番話：

> 動員軍隊，召集士兵，去進攻貴霜人的國家，帶領全體人民居住到諸門那邊去吧！當他們完全屈服，遠方不友好的國家也被封鎖住的時候，您的計劃和期望就能實現了。您要統治貴霜人的帝國，正如我們要讓他們瞭解我們的宗教一樣，希臘人也不敢反抗您的力量。[9]

伊嗣俟二世接收了祭師們的建議，對他的軍隊和盟國發出了動員令：

> 我們決定遠征東方，再次平定貴霜人的國家，願神保佑我們！［你們］接到命令，就立即徵集騎兵，隨我來阿巴爾（Apar）州！[10]

於是，“他突然侵入了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的國家。戰鬭持續了二年，卻未能征服他們”。[11] 上述事件發生在伊嗣俟二世即位第一至四年（438—441 年）之間。[12]

此後，伊嗣俟二世在尼沙普爾（Nishapur）建造了一座城，從即位第四至第十一年（441—448 年）一直駐守在那裏，他蹂躪了許多匈人的領地，逼得匈王走投無路。[13] 第十二年（449/450 年）初，他又出動一支大軍，進擊至 T‘etals。貴霜王不敢攖其鋒，率部遁入荒漠。伊嗣俟四出攻擊，佔領要塞和城市，并將俘虜、戰利品和劫掠所得帶回國內。[14] 第十六年（453/454 年），上述匈人又犯呼羅珊，伊嗣俟急忙從亞美尼亞回軍應戰，但由於供職於軍中的 Xailandurk 族王子貝爾（Bēl）叛變而失敗。[15] 此後，直至 456 年，這位薩珊皇帝還在同貴霜匈人作戰。[16]

說者認爲以上亞美尼亞史料中提到的“貴霜人”和“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都是真正的貴霜人即寄多羅貴霜人。[17] 有的學者還結合下文將列述的普里斯庫斯的記錄，進一步指出，這些貴霜人因受嚈噠壓迫，向西遷徙，遂同薩珊波斯發生衝突。這種衝突自五世紀三十年代末一直延續到六十年代中。[18]

今案：伊嗣俟二世最初遭遇的纔有可能是真正的貴霜人，他們由於受到嚈噠人的壓迫，西向衝擊薩珊波斯的東部領土，或在嚈噠人的脅迫下，充當進攻波斯的前鋒。這或許就是亞美尼亞史料將貴霜和嚈噠混爲一談的原因。但是，嚈噠人必然接踵而至，故伊嗣俟二世隨即面對嚈噠人的大舉進犯。蓋寄多羅貴霜早已成爲强弩之末，不可能一面承受來自嚈噠的巨大壓力，一面同薩珊

波斯進行如此曠日持久的戰爭，並在最後戰勝伊嗣俟二世。再者，公元四、五世紀，中亞雖有許多部族號稱“匈奴”，但如果因此認爲貴霜或寄多羅貴霜人也可能自號“匈奴”就難以令人接受了。因爲自號“匈奴”者均爲遊牧部族，風俗大致與匈奴相倣，爲假匈奴之威，纔自號匈奴。而貴霜或寄多羅貴霜人早已農耕、定居，與匈奴毫無共同之處。又，亞美尼亞史家對貴霜並不陌生，他們在別處從未稱貴霜爲匈人或把兩者聯稱。因此，埃里塞的“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和下引普里斯庫斯的“寄多羅匈人”都應該是嚈噠人。

第三，普里斯庫斯的有關記録[19]如下：

> 戰爭隨之爆發，戰爭的原因是匈人收不到波斯人和帕提亞統治者此前一直繳納的貢金。……卑路斯（Perozes）派人去見匈人的首領 Kunchas，表示樂意言和，並希望締結盟約，將其姊妹許配給他。……可是，可汗接受了這些建議，卻沒有娶到卑路斯的姊妹，娶到的是波斯國王派去的一個僞裝成公主的女人。卑路斯對她說：祇要她不揭穿這一詭計，就能享有王室的身份和優裕的生活，如果說出這一欺詐行爲，就會被處死，因爲寄多羅人的統治者不會容忍娶一個婢女而不是一位貴族婦女爲妻。……於是兩國間戰火重燃，戰況激烈。於是，卑路斯在 Gorga 亦即波斯人駐軍的地點接見了（羅馬使者）Constantinus，慷慨地款待了他好幾天，沒有給他一個滿意的答覆，就打發他回去了。(41, 3: Exc. de Leg. Rom. 12)

> [468 年] 一位波斯使者来到拜占庭，以野蠻人的方式炫耀：卑路斯戰勝了寄多羅匈人（Kidarite Huns），佔領了他們的城市 Balaam。(51, 1: Exc. de Leg. Gent. 22)

據泰伯里[20]、費爾道西[21]等記載，伊嗣俟二世身後，二子爭位。次子嗢沒斯獲勝，長子卑路斯避難於嚈噠。並借嚈噠兵威奪取了王位。足見在五世記五十年代末，嚈噠已是波斯的緊鄰，且強大到足以操縱波斯帝位之廢立，而其時寄多羅貴霜人西遷之一支當早已撲滅，故在 Gorga 與波斯接壤的是嚈噠，而絶非寄多羅貴霜；普洛科庇烏斯[22]的一則記載可爲佐證：

> 在波斯國界的對面，座落着一座嚈噠人的城市 Gorgo，於是该城便成爲這兩個民族頻繁的邊境衝突的中心。(I, iv)

Gorgo 卽 Gorga，在今裏海東南古爾甘河流域。或以爲卑路斯與之交戰的是西徙至裏海沿岸的寄多羅人；[23]並無充足的依據。

至於匈人的可汗 Kunchas（Κούγχς），又作 Κουνχαν；數行之後出現的 Κουνχας，是由於 Κούνχαν 的詞尾 ν 變成了第四格。因此，用作主格時應爲 Κουνχαν，Κουνχας 是筆誤。[24]

案：Κούγχς 或 Κουνχαν 應卽 Qun-Xan（匈可汗）。因貴霜無可汗號，或曲爲之解，以爲受西侵柔然之影響；[25]其説不可從。採用可汗號者應爲嚈噠。蓋嚈噠起源於北方，北方遊牧部族如鮮卑等均有此號。前引迪奈韋里、泰伯里所載“突厥”可汗入侵波斯

事，可證嚈噠確有可汗號。

迪奈韋里還説，巴赫蘭五世一戰而勝，“抓住了可汗之妻Chātun”。[26] 此 Chātun 當即可汗配偶之稱號“可賀敦”或“可敦”。據《北史·后妃傳》，北齊文宣帝重視鮮卑固有習俗、語言，尊皇后李氏爲“可賀敦”，可知原爲鮮卑語。又《舊唐書·蕭瑀傳》：“北蠻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嚈噠的 Chātun 亦知兵馬事，故隨軍出征而遭擒；名實俱符，可知嚈噠亦有可敦號。

根據以上理由，不妨認爲普里斯庫斯的“寄多羅匈人”可以讀作“來自寄多羅地區的匈人”或“征服了寄多羅的匈人”，也就是嚈噠人。

此外，似乎還有必要提一下：有學者甚至認爲泰伯里、菲爾道西等有關卑路斯藉嚈噠兵力登基的記載也是極成問題的，不過是在模倣 498 年居和多一世賴嚈噠之助復辟一事，因爲其時嚈噠尚未自金山南下。[27] 我認爲其説也不可從。説者致誤原因是没有正確理解中國史籍關於嚈噠南遷的記載，錯誤地認爲嚈噠自金山南下應在北魏文成帝時（452—465 年），並進而斷定此前嚈噠不可能同薩珊波斯接觸。

最後，《梁職貢圖》滑國使臣圖題記有載其人“齊時始走莫獻而居”。説者認爲“莫獻”發音同颯秣建、悉萬斤的“秣建”、“萬斤”，故有可能是 Samarkand 的縮譯；但按之《梁職貢圖》文章旨趣，似乎滑人一旦從原居地遷往“莫獻”後，沒有再遷往別處，因而“莫獻”不可能指爲 Samarkand，而應求諸吐火羅斯坦。由於在吐火羅斯坦找不到對應的地名，説者極疑“莫獻”乃中古波斯

語 Baghgân 即神的居住地或王都的對音。[28]

今案："莫獻"有可能是 Margiana 的對譯，或即《後漢書·西域傳》的"蒙奇"。蓋嚈噠人滅亡寄多羅貴霜後，便西向進犯薩珊波斯，至五世紀六十年代末已推進至裏海東南，與薩珊波斯對峙。但直至 484 年卑路斯戰死，嚈噠人纔最後鞏固了它在吐火羅斯坦和呼羅珊的統治。所謂"齊時（479—502 年）始走莫獻而居"，正是指嚈噠對呼羅珊地區的佔領。而嚈噠對上述地區的佔領，乃是該族强大的開始，故《梁職貢圖》滑國使臣圖題記在"莫獻"句後接著說："後强大，征其旁國，破波斯、[渴] 槃（槃）[陁]、罽（罽）賓、烏（纆）[纏]、龜茲、疎勒、于闐、勾𣪠（般）等國，開地千餘里"。

嚈噠人自吐火羅斯坦進犯薩珊波斯，侵入 Margiana 亦即呼羅珊地區是勢在必然。如果我以上推測不錯的話，所謂《梁職貢圖》上引題記便是有關這一事件最原始的史料。

■ 注释

[1] T. Nöldecke, *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zur Zeit der Sasaniden, aus arabischen Chronik des Tabari*. Leyden, 1879, p. 98.

[2] 同注 1。

[3] F. Altheim, *Geschchte der Hunnen* II. Berlin, 1969, p. 49.

[4] E. Drouin, "Mémoire sur les Huns Ephthalites." *Le Muséon* 14 (1895): pp.

232-247, 277-288.

[5] 榎一雄“ソグディアナと匈奴 1-3”,《史學雜誌》64 ~ 6（1955 年）,pp. 1-28; 64 ~ 7（1955 年），pp. 31-49；64 ~ 8（1955 年），pp. 31-54。

[6] A. G. and E. Warner, tr. *Firdausī, Sháhnama*, vol. 7. London, 1915, pp. 164-165. 今案：Jíhún（紀渾河）應卽阿姆河（Amu Daria）；K. Enoki.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Ephthalit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18 (1959): pp. 1-58, 以爲錫爾河（Sir Daria）；似誤。錫爾河應爲 Sihun（細渾河）。

[7] 榎氏說，見注 5 所引文。

[8] J. Marquart,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1901, p. 52; 注 5 所引榎一雄文。

[9] R. W. Thomson, tr. *Eḷishē. History of Vardan and the Armenian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63.

[10] 注 9 所引 R. W. Thomson 書，p. 64。

[11] 注 9 所引 R. W. Thomson 書，p. 66。

[12] 榎一雄“初期アルメニア史書に見えるエフタルとクジャン”,《東洋學報》47 ~ 4（1965 年），pp. 1-56。

[13] 同注 11。

[14] 注 9 所引 R. W. Thomson 書，p. 72。

[15] 注 9 所引 R. W. Thomson 書，pp. 192-193。

[16] 參看注 8 所引 J. Marquart 書，pp. 55-56。

[17] 見注 8 所引 J. Marquart 書，p. 55，以及注 12 所引榎一雄文。

[18] 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0 ~ 3（1958 年），

pp. 1-52。

[19] R. C. Blockley,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ARCA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exts, Papers and Monographs 10. Francis Cairns, 1981-1983.

[20] 注 1 所引 T. Nöldecke 書，p. 115。

[21] 注 6 所引 Firdausī 書，pp. 157-158。

[22] H. B. Dewing, tr.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New York, 1914.

[23] 注 18 所引榎一雄文。

[24] H. W. Haussig, 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Byzantion*, 23 (1953), pp. 275-462, esp. 353.

[25] 内田吟風 "吐火羅（Tukhāra）國史考",《東方學會創立 25 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72 年，pp. 91-110。

[26] 注 3 所引 F. Altheim 書，p. 48。

[27] 注 8 所引 J. Marquart 書，p. 59。

[28] 榎一雄 "エフタル民族の人種論について",《東方學》29（1965 年），pp. 1-29。

五　入侵笈多印度

在嚈噠同笈多印度關係史上，也存在著這兩者何時開始接觸的問題。質言之，塞建陀笈多時期入侵笈多帝國的是不是嚈噠人？

一般認爲，直到鳩摩羅笈多一世（Kumāragupta I，約 415—455 年）時代，笈多帝國還保持著繁榮，領土也是完整的。在鳩摩羅笈多一世統治的晚期，帝國的平靜纔被外敵的入侵打破。鳩摩羅笈多一世之子塞建陀笈多的比太里（Bhitari）石柱銘文[1]有如下描述：

> 爲了重振業已衰落的家業，他黑夜以大地爲床榻。在戰場上擊敗了强大富有的敵人之後，他將左腳踏到王座的足凳上。（L. 10）

“將左腳踏到王座的足凳上”云云，似乎表明他是在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鬬爭、擊退入侵者以後登基的。這個“强大富有”的來犯者很可能便是銘文隨後提到的“匈奴”：

> [塞建陀笈多]投身於對匈奴的激戰時，雙臂使大地顫抖，敵人中產生了恐懼的旋渦。……（L. 15）

不難看出，這是一場頗爲劇烈的戰爭。

關於塞建陀笈多擊退上述匈奴人入侵的年代，直接記載此事的比太里石柱銘文沒有標明，但同屬於塞建陀笈多的朱納伽德（Junāgarh）石刻銘文[2]可資參證。後者稱頌塞建陀笈多說：

> 他單槍匹馬征戰，被他驅逐回 Mlēchchha 的敵人也宣揚他的聲名，他們的傲慢蕩然無存。（L. 3-4）

Mlēchchha 卽《續高僧傳·玄奘傳》（卷四）所見“蜜利車”[3]，常用來泛指外族或外族居地，再加上兩篇銘文措辭頗有相似之處，不妨認爲所指正是匈奴人；[4]朱納伽德銘文的年代旣爲笈多紀元 136/137/138 年（公元 455/456/457 年），塞建陀笈多戰勝匈奴人應在他卽位（454 年）前後。

多數學者認爲這時入侵笈多印度的“匈奴人”便是來自中亞的嚈噠人。今案：這種看法是比較合理的，蓋如前述，嚈噠人早在五世紀三十年代末就逐走了寄多羅，並在同薩珊波斯的翻覆鬬爭中逐步鞏固了它在吐火羅斯坦的統治。他們在 453 年大敗伊嗣俟二世之後，完全有可能越過興都庫什山，南侵次大陸。也許畢竟因爲主力用於西線，偏師南下，纔被塞建陀笈多擊退的。由於嚈噠人一貫自號“匈奴”，印度碑銘便稱之爲 Hūṇas。

對此，最强有力的反證是《洛陽伽藍記》卷五所引宋雲“行紀”的一段話：

> 正光元年（520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塲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嚈噠所滅，遂立勑懃爲王，治國以来，已經二世。

以及《魏書》“本紀”如下記載：

> 太安五年（459年）五月，“居常國遣使朝獻”。（高宗紀）
> 和平元年（460年）十月，“居常王獻馴象三”。（高宗紀）
> 太和元年（477年）九月，“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各遣使朝貢”。（高祖紀上）

說者認爲上引材料表明，至少到477年，興都庫什山以南地區尚屬寄多羅王朝，亦即“居常”（Kušan）或“車多羅”（Kidāra），由寄多羅的子孫統治著。乾陀羅地區則直至五世紀末或六世紀初纔落入嚈噠人之手。換言之，嚈噠人决不可能在此之前越過乾陀羅等地入侵印度，並因而斷定被塞建陀笈多戰敗的不是嚈噠人，而是盤踞乾陀羅等地的寄多羅貴霜人，至於印度碑銘稱之爲 Hūṇa，是因爲寄多羅貴霜本來也被稱爲“貴霜匈人”或“寄多羅匈人”的緣故。[5]

今案：嚈噠完全有可能在塞建陀笈多即位之初便入侵笈多印

度。這同上引《魏書》"本紀"等記載並不矛盾。因爲乾陀羅等地完全被嚈噠控制，並不妨礙它們以原來的名義繼續朝魏。這種現象在嚈噠治下的中亞十分普遍。很可能直到太和元年以後，嚈噠人纔如宋雲等人所載，在該處立勑懃（卽特勤）爲王，直接進行統治，並開始以乾陀羅名義朝魏。

再者，如前篇所述，寄多羅貴霜人不可能自號"匈奴"，而埃里塞的"貴霜匈人"和普里斯庫斯的"寄多羅匈人"實際上都是嚈噠人。更何況比太里石柱銘文並沒有在 Hūṇa 上冠以"貴霜"或"寄多羅"字樣。特別是印度人，對貴霜應該比較瞭解，何至於與匈奴混爲一談。

一般認爲，傳世的笈多時期碑銘和錢幣等還證實，六世紀初，由於笈多帝國日益衰落，上述"匈奴"卽嚈噠人曾再次入侵，給帝國以沈重打擊。這時入侵的"匈奴人"是由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父子率領的。前者應卽嚈噠封王乾陀羅之特勤（或該特勤之子），後者應卽見諸《大唐西域記》卷四的"大族王"。[6]

但是，一些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爲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表明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是"匈奴人"。爭論由來以久，迄未取得統一。以下擬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說法[7]作一剖析。

說者認爲"匈奴人"在佔領乾陀羅以後確曾企圖入侵印度斯坦，但在被塞建陀笈多擊退以後，沒有再次侵犯笈多帝國。確切些說，嚈噠勢力從未越過印度河以東。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的活動與"匈奴"無關，文獻、碑銘、錢幣的證據完全不足以表明他們是"匈奴人"。

1. 頭羅曼的庫臘（Kura）銘文和埃蘭（Ēraṇ）銘文都沒有提到他是一個“匈奴人”。銘文稱頭羅曼爲 Rājādhirāja Mahārājā Toramāṇa Shahi Jovula，說明他可能是一個波斯出身的印度王。

2. 頭羅曼的庫臘銘文表明他並不是一個佛教徒的迫害者，而“匈奴”即嚈噠是以滅佛著稱的。

3. 頭羅曼的埃蘭銘文標明的年代是他即位第一年。埃蘭遠離乾陀羅，位於笈多帝國的心臟地區，頭羅曼即位第一年已是一位埃蘭王這一事實，說明他並非來自印度以外。在埃蘭發現的年代分別爲笈多紀元一六五年（484 年）和一九一年（510 年）的佛陀笈多（Budhagupta）和跋奴笈多（Bhānugupta）的銘文說明，頭羅曼在埃蘭即位不可能早於 484 年，他和佛陀笈多相去不會超過一代人的時間。

4. 有一枚頭羅曼的錢幣，標明的年份是 52 年，這表明他有一個很長而且很太平的統治期，而正如摩醯邏矩羅的瓜廖爾銘文所表明，他傳位其子摩醯邏矩羅，後者至少又統治了十五年。因此他們都不可能是“匈奴”部落首領。

5. 耆那犀那在所著《訶里世系》（783 年）中，稱笈多王朝一共統治了 221 年，此後由伽勒佉羅闍（Kalkīrāja）統治了 42 年，並傳位其子阿耆咀尼耶（Ajitanjaya）。伽勒佉羅闍既爲笈多王朝的直接後繼者，有理由認爲他便是頭羅曼。笈那跋陀羅在所著《嗢咀羅往世書》（898 年）中，記載伽勒佉羅闍的年代在毗羅涅槃（Vīra-nirvāṇa，前 528 年）之後一千年，即公元 473 年。他是尸稺波羅（Śiśupāla）之子，共活了 70 年，在位 40 年。尸稺波羅可能

是笈多王朝末期的一位帕提亞或印度出身的將軍。這也說明頭羅曼不是一個“匈奴人”。

6. 摩醯邏矩羅即位第十五年的瓜廖爾銘文也沒有提到他是“匈奴人”。

7. 耶輸陀曼的未標明年代的曼達索爾（Mandasor）銘文雖然既提到了“匈奴”，又提到了摩醯邏矩羅，但兩者被大段有關耶輸陀曼勢力範圍的記述隔開，看不出彼此有什麽聯繫。

8. 年代爲摩臘婆紀元五九八年（532/533 年）的耶輸陀曼的曼達索爾銘文也完全沒有提到摩醯邏矩羅和“匈奴”，也沒有蹟像表明“匈奴”曾經征服印度東部。

9. 提到“匈奴”的另一篇銘文是後期笈多王阿迭多犀那（Ādityasena，約 650 年）的銘文。銘文記載一位穆克里族之王對“匈奴”的一次勝仗。這可以理解爲該王曾協助耶輸陀曼遠征乾陀羅的“匈奴人”，同樣不能證明“匈奴”曾侵入印度河以東。

10. 科斯馬斯所著《基督教世界地理志》一書則明確記載白匈奴的勢力範圍限於印度河以西。他提到的白匈奴王 Gollas 與摩醯邏矩羅非一人。

今案：其說未安。

1. 頭羅曼、摩醯邏矩羅本人或其臣屬所樹之碑沒有提到他們的“匈奴”血統，不能用來證明他們不是“匈奴人”，很可能是當時沒有這種習慣。何況目前發現的屬於他們的碑銘非常有限，不足以得出一般性結論。

2. 頭羅曼庫臘銘文[8]等所見諸如 Rājādhirāja、Mahārājā 等印

度人，或 Shahi 等波斯、貴霜人習用的稱號，也不能用來證明他們是印度、波斯或貴霜人，完全可能是嚈噠人進入中亞和北次大陸後受土著影響使然。至於 Jovula 則可能是嚈噠人固有的稱號，或可譯爲“葉護”。此號多見於北方遊牧部族。[9] 嚈噠既有“特勤”，復以“葉護”爲號，本不足爲奇。

3. 耶輪陀曼的未標明年代的曼達索爾銘文 [10] 以詩的語言記載：耶輪陀曼的統治區“連佔領過整個大地的、光輝的笈多君主們都未能控制，連踐踏着諸王王冠稱雄的匈奴首領都未能攻佔。從勞希提亞（Lauhitya）河（布拉馬普特拉河）到山腳下長滿茂密棕櫚的馬亨德拉山（Mahēndra，可能指東高止山或西高止山的北部），從恒河一帶和山頭積雪的山峰（指喜馬拉雅山）到西海。王公們的傲氣被他的有力的臂膀打消，他們拜倒在他的腳下，他們頭髻上閃動的珠寶的光輝把大地的各個角落點綴得光怪陸離。除了對濕婆大神外，他不向任何人卑躬屈膝，連喜馬拉雅山也因被他用雙臂擁抱而失去不可逾越的驕傲名聲。他的雙足受到頂禮膜拜，他的頭頂上裝飾着奉獻的鮮花，連摩醯邏矩羅大王也不得不在他雙臂的壓迫下低頭”（L. 4-6）。不難看出，前面提到的“匈奴首領”，就是後面出現的摩醯邏矩羅，所述爲同一事實：耶輪陀曼戰勝匈奴，懾服其王摩醯邏矩羅。顯然不能因爲中間有幾句關於耶輪陀曼勢力範圍的敍述，便否定前後文的內在聯繫。

4. 在憍賞彌出土的兩方頭羅曼的印章，一方刻 To Ra Ma Na，另一方刻 Hūṇa-rāja（匈奴羅闍）。[11] 充分證實了頭羅曼是“匈奴人”。而摩醯邏矩羅的瓜廖爾銘文 [12] 既明載他是頭羅曼之子（L. 2-4），

可見他也應該是“匈奴人”。[13]

至於說者對上述文獻、碑銘、錢幣所作的詮釋，由於其前提即否定頭羅曼、摩醯邏矩羅父子是“匈奴人”是錯誤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而目前所掌握的這類材料儘管爲數寥寥，似乎已經可以勾勒出六世紀初“匈奴”即嚈噠人入侵笈多印度的大致過程。

據前引宋雲等“行紀”，正光元年（520年）宋雲一行經過乾陀羅時，該國爲嚈噠所滅，立勅懃（案即特勤）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一世一般以三十年計，則嚈噠特勤爲王當在460—470年間。又據《魏書》“本紀”可知直至太和元年（477年）尚有以“車多羅”（Kidāra）即寄多羅貴霜名義朝魏者，這“車多羅”當即盤踞乾陀羅等地的寄多羅貴霜人，故嚈噠滅乾陀羅似乎可以定在475—480年間。而此前乾陀羅等已可能役屬嚈噠，嚈噠遂得以在塞建陀笈多即位之初入侵笈多印度。這次入侵雖被塞建陀笈多擊退，但由於佛陀笈多以後，笈多帝國陷於分裂，其時已經鞏固了在乾陀羅等處基地的嚈噠人便捲土重來。

在埃蘭發現了年代爲公元484年佛陀笈多的銘文[14]銘文記載當地一位摩訶羅闍摩帝利毗濕奴（Mātṛviṣṇu）曾以某種方式向毗濕奴表示敬意。（L. 4-9）這表明遲至484年佛陀笈多還控制着東馬爾瓦。可是頭羅曼即位第一年的埃蘭銘文，[15]却記載摩帝利毗濕奴之弟曇尼耶毗濕奴（Dhaṇyaviṣṇu）已轉而效忠頭羅曼，稱頭羅曼爲“王中之王”，頌揚他“堅實的嘴巴吹口氣，就能使羣山顫慄”。（L. 4-6）這表明頭羅曼確曾佔領過埃蘭，年代在484年之後。

同在埃蘭發現的年代爲公元510年的跋奴笈多的銘文[16]則記

載一位酋長瞿波羅闍（Gopāraja），如何追隨“偉大的君王、天下最勇敢的人、顯赫的跋奴笈多”，在埃蘭進行了一場戰爭。瞿波於是役陣亡，其妻殉節等等。（L. 3-7）有理由認爲，跋奴笈多進行的這場戰爭，對手正是頭羅曼，目的是抵禦他的入侵。銘文對戰爭的结局諱莫如深，很難認爲跋奴笈多是勝利者。無論如何，遲至510年，頭羅曼已吞并了大片笈多帝國的領土，前鋒直抵埃蘭。他在埃蘭的即位元年當在510年或稍後。[17]

可能在佔領埃蘭後，據《文殊師利根本儀軌》（Mañjuśrīmūlakalpa，八世紀）記載，“這位西來的、稱呼的首字母爲H的（Hakārākhyaḥ）大王直達東方恒河岸邊。這位偉大的君王屬於首陀羅（Śūdra）種姓，他孔武有力，擁有强大的軍隊，他佔領了該處，控制了這個國家。這位孔武有力的君王圍攻了高達國（Gauḍa）的城市胝利陀（Tīrtha）”。[18] 這說明頭羅曼在佔領馬爾瓦之後，曾繼續東進，直抵印度最東部。頭羅曼兩方印章的出土證明了“匈奴人”曾佔領過憍賞彌，從而爲上引記述提供了證據。所謂“首字母爲H的”稱呼，應即Hūṇa-rāja。

《文殊師利根本儀軌》還載，“在憑藉鉢羅伽帝阿迭多（Prakatāditya）的正統性鞏固了（在華氏城的）政權後，頭羅曼便西歸處理國務。但他在迦尸耽擱之際突然患病，旋即去世。臨終召其子摩醯邏矩羅至牀畔，指定他繼位”。[19] 據考證，鉢羅伽帝阿迭多係笈多皇族。[20] 準此，則頭羅曼在佔領摩揭陀後，在該處扶立傀儡，自己西歸乾陀羅，但中途病逝於迦尸。

《文殊師利根本儀軌》沒有明載頭羅曼去世的年代，但似可從

宋雲等"行紀"推知。520年宋雲一行在乾陀羅謁見了一位嚈噠王。他記述此王"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楂，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今案：宋雲所見嚈噠王已是二世，故不妨認爲卽摩醯邏矩羅，其父頭羅曼應卽嚈噠最初封王乾陀羅之特勤。[21] 如果上引《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的記載可信，則可進而推測，摩醯邏矩羅在迦尸卽位後，便匆匆西歸，處理頭羅曼未了的國務，這很可能便是宋雲所載"與罽賓爭境"事，因而宋雲一行得以見彼於乾陀羅。而從這場邊境衝突已歷時三年來看，517年是摩醯邏矩羅繼承頭羅曼年代之下限。[22]

摩醯邏矩羅與罽賓爭境的結果，史佚記載。瓜寥爾發現的摩醯邏矩羅卽位第十五年的銘文似乎可以表明他在解決罽賓問題之後，曾再次引兵東向，佔領了瓜廖爾。如果上述關於摩醯邏矩羅卽位年代的推測不錯，則該銘文年代的下限應爲531年左右。

既然年代爲公元532/533年的耶輸陀曼的曼達索爾銘文[23] 表明，當時馬爾瓦和西印度在耶輸陀曼的大臣達磨陀娑（Dharmodoṣa）治下，則可見摩醯邏矩羅在瓜廖爾樹碑後不久，便被耶輸陀曼打敗。說者以爲上述曼達索爾銘文並未提及耶輸陀曼對摩醯邏矩羅的勝利，足見後者敗於532年以後；[24] 未安。

參照科斯馬斯的《基督教世界地理志》，似可進一步推斷摩醯邏矩羅最後失敗的年代。據載："白匈人居於印度北方邊陲高地，其王名Gollas，傳說他在一次戰爭中出動了不下二千頭戰象和一支强大的騎兵。他君臨印度，壓迫百姓，强使納貢。"又載："Phison

河把白匈人的國家和印度所有其他國家隔開。”關於 Phison 河，作者在另一節中說：“印度河卽 Phison 河，注入波斯灣，成爲波斯和印度的邊界。”[25] 今案：這位白匈人王顯然就宋雲所謁嚈噠王。Gollas 卽 Mihirakula 之略譯。科斯馬斯所載白匈人情況，年代可大致定在 525—535 年之間，[26] 因此，有關記載可以這樣解釋：最晚到 535 年，曾君臨印度卽印度河以東地區的白匈人已撤退至河西。說者舉上述科斯馬斯的記載來說明“匈奴人”從未越過印度和東進；未安。

又，說者據《訶里世系》(ch. 60, st. 491-492, 551)[27] 和《嗢呾羅往世書》(ch. 76, st. 397-401, 428)[28] 斷迦勒佉羅闍（Kalkīrāja）爲頭羅曼證據顯然不足。[29] 已知佛陀笈多執政的最後年份是495年，但他可能去世於 500 年或稍後[30]，而所謂笈多王朝的直接繼承者迦勒佉羅闍卻卽位於 473 年。兩書晚出，多採自傳聞，固不可視作信史。

至於在頭羅曼的半德克拉馬扇尾孔雀型銀幣上發現的 52 這一紀年數字，[31] 曾引起很多爭論，然諸說皆無確據。[32] 對此，我也祇能作如下猜測：這一紀年當始於五世紀五十年代末，其元年或卽頭羅曼始爲特勤之年。嚈噠人很可能就在這一年或稍前越過興都庫什山，發動了對笈多帝國的首次入侵。這一紀年頭羅曼大概使用了很久（至少 52 年），他在滅寄多羅貴霜時也未更始，直至佔領埃蘭後纔改元。如前所述，頭羅曼領有埃蘭不可能遲於 510 年。

如果按照說者的意見，那末這 52 年應自 510 年算起，也就是

説頭羅曼去世和摩醯邏矩羅敗於耶輸陀曼的年代之上限將分別是562年和577年。這同已知有關笈多時期的其它史實是無法調和的。

此外，摩醯邏矩羅雖爲耶輸陀曼所敗，但嚈噠人的勢力並沒有完全退出西北次大陸。從上引科斯馬斯的記載可以看出，他們在印度河以西仍保持著强大的實力。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匈奴人”在摩醯邏矩羅以後繼續入侵或擾亂印度河以東的可能性。阿迭多犀那的阿夫薩德（Aphsad）銘文[33]所載一位穆克里王的象隊對“匈奴人”的戰爭可以認爲是由於這種入侵或擾亂引起的。

以上是我對頭羅曼父子非“匈奴”説的批判。但必須指出，此説並非一無是處，其功績在於把迦羅那（Kalhaṇa）記載的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特别是玄奘記載的摩醯邏矩羅，同笈多時期的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區分開來，雖然説者是站在否定後者是“匈奴人”這一錯誤立場上指出這一點的。我們看到，一些正確主張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是“匈奴人”的學者卻在這一點上陷入了困境。[34]

迦羅那在《諸王流派》（1148年）[35]一書中記載，頭羅曼是室羅什咀犀那（Śreshṭhasena）之子，迦濕彌羅王醯羅尼（Hiraṇya）之弟。他僅是一個優婆羅闍（Yuvarāja），地位低於其兄。他因頒發以自己名義鑄造的錢幣，被其兄監禁至死。醯羅尼死後，鄔闍衍那的皇帝室利·曷利沙·毗訖羅摩阿迭多（Śrī Harsha Vikramādtya）命摩帝利笈多（Mātrigupta）往治迦濕彌羅。後者於五年後讓位於頭羅曼之子，即鉢羅婆羅犀那二世（Pravarasena II）。由此可見，這個頭羅曼本人從未當過國王，更未統治過中印度，其子亦非摩醯邏矩

羅，很難把他和“匈奴”王頭羅曼看成同一個人。[36]

迦羅那在同書中也記載了一個摩醯邏矩羅，這個摩醯邏矩羅的年代爲公元前 705—前 635 年，係婆蘇矩羅（Vasukula）之子，醯羅尼矩羅（Hiranyakula）之孫。他曾統治全印度，南至僧訶羅（Simhaḷa），西至羅呾（Lāṭa）。他在室利那迦利（Śrīnagar，幸福城）建造了一座城堡：摩醯邏堡（Mihirapura）。他贈給乾陀羅的婆羅門 agrahāra（國王封贈婆羅門的土地）。他殘忍之極，曾殺死三千萬男人、婦女和兒童。死前他感到後悔，在一個被蜜利車人蹂躪的地方復立聖法（āryadharma），並自焚而死。十分清楚，同樣不能把這個摩醯邏矩羅和被耶輸陀曼擊敗的摩醯邏矩羅看成同一個人。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四）中記載：“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矩羅，都治此城（Śāgala，奢羯羅），王諸印度。”此王曾“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逐，無復孑遺”。時有摩揭陁國婆羅阿迭多王（Bārāditya，即幼日王）“崇敬佛法，愛育黎元”，因摩醯邏矩羅“淫刑虐政”，遂“自守疆埸，不恭職貢”。摩醯邏矩羅“治兵將討”，幼日王自知不敵，率其民衆“棲竄海島”。摩醯邏矩羅“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誘戰”，生擒摩醯邏矩羅。卻“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縱其還國。摩醯邏矩羅雖得生返，卻因其弟自立爲王，祇能“藏竄山野，北投迦溼彌羅國”。迦濕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可是摩醯邏矩羅不久就“率其邑人，矯殺迦溼彌羅王而自尊立”，並“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羅國，潛兵伏

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殄滅。毀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噍類”。輔佐進諫，拒而不納；“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中族，下沈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士兵”。然“曾未改歲，尋卽殂落”，因身前“枉殺無辜，毀滅佛法”，終於“墮無間獄，流傳未已”。今案：這個摩醯邏矩羅的時代在玄奘之前“數百年”，建都於奢羯羅（今錫爾科特），曾自迦濕彌羅西討乾陀羅，殺其王而毀其國。顯然他不是宋雲所謁、以乾陀羅立國、東向與罽賓爭境的摩醯邏矩羅，也不是六世紀三十年代初被耶輸陀曼擊敗的摩醯邏矩羅。

一些學者堅持認爲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均衹有一個。理由之一是迦羅那和玄奘有關兩者年代的記載，皆係傳聞，不足爲憑；因而煞費苦心地把迦羅那、特別是玄奘描述的事件搬到笈多時代來，目前看來這是難以成立的。

在玄奘之前，同一個摩醯邏矩羅已見於574年漢譯的《蓮華面經》（卷下）[37]：

……復有金毘羅等五諸天子生罽賓國，廣令我法，流布於世。……彼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蘭那外道弟子，名蓮華面，聰明智慧，善解天文二十八宿、五星諸度，身如金色。此大癡人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破壞佛法。以其供養阿羅漢故，世世受於端正之身。於最後身生國王家，身爲國王，名寐吱曷羅俱邏，而滅我法。

此大癡人，破碎我鉢，既破鉢已，生於阿鼻大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子次第捨身生罽賓國，復更建立如來正法，大設供養。……[38]

又見於 472 年漢譯的《付法藏因緣經》（卷六）[39]：

……復有比丘名曰師子，於罽賓國大作佛事。時彼國王名彌羅掘，邪見熾盛，心無敬信，於罽賓國毀壞塔寺、殺害衆僧。卽以利劍，用斬師子，頂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是便絕。……[40]

取捨、詳略知雖不盡同，然於滅佛則一。可見這個摩醯邏矩羅一直受到佛教徒詛咒，到玄奘時代確實已有數百年了。

理由之二是玄奘所載幼日王便是那羅僧訶笈多（Narasiṁhagupta）；因而連篇累牘地去考證，究竟是那羅僧訶笈多還是耶輸陀曼，抑是兩者聯盟或先後分別打敗了摩醯邏矩羅。現在看來這些討論意義不是很大。[41]

和耶輸陀曼同時代的那羅僧訶笈多雖然也有"幼日王"這一稱號，但不能僅憑這一點就指玄奘所載"幼日王"爲那羅僧訶笈多。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九列舉建造那爛陀伽藍的諸王時，曾再一次提到婆羅阿迭多卽"幼日王"。這些依次傳位的國王是：鑠迦羅阿迭多（Śakrāditya）、佛陀毱多（Buddhagupta）、呾他揭多毱多（Tathagagupta）、婆羅阿迭多、伐闍羅（Vajra）和中印

度王。既然這個次序無法同依據碑銘和錢幣研究得出的笈多王朝的世系相符，也就很難把玄奘所載"幼日王"和那羅僧訶笈多視作同一個人。有關笈多王朝世系的討論極爲複雜，見仁見智，衆說紛紜，目前還難定論，也不可能在此一一剖析、辨證。但就本文所討論的問題而言，似乎衹要指出下面這一點就足夠了：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明載，那爛陀僧伽藍之建始於鑠迦羅阿迭多，"建立以來七百餘歲"。可知該王的年代當爲公元前一世紀。"幼日王"既爲鑠迦羅阿迭多之曾孫，其在位年代無疑遠在笈多王朝建立之前。他應爲一個前笈多王，和玄奘所載摩醯邏矩羅爲同時代人。

有人認爲，可能是玄奘混淆了兩個不同時代的摩醯邏矩羅的事。[42] 今案：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爲兩者畢竟完全同名。但必須指出，迄今還沒有發現足以證實這種可能性的依據。

玄奘所記摩醯邏矩羅的事蹟，舉其大者，不外兩端，一爲敗於"幼日王"，二爲滅佛。如前所述，玄奘所載"幼日王"，不可能是那羅僧訶笈多；又別無其他資料表明那羅僧訶笈多曾有擊敗"匈奴人"之舉；故在這一點上混淆似乎無從談起。再者，嚈噠人雖不信佛，但並不滅佛，在嚈噠控制下的中亞小國均有信仰宗教（包括佛教）的自由。歷來認爲嚈噠興起乃中亞佛教之一劫，唯一依據其實正是玄奘關於摩醯邏矩羅的記載。既然玄奘所載摩醯邏矩羅與嚈噠王摩醯邏矩羅並非一人，則嚈噠滅佛說完全不能成立。[43] 質言之，既不能因爲庫臘銘文表明頭羅曼並不滅佛，而否定他是嚈噠人；也不能以嚈噠滅佛爲理由，指玄奘所載摩醯

邏矩羅爲嚈噠王，或認爲玄奘因此混淆了兩個不同時代的摩醯邏矩羅。

至於笈多時期碑銘、錢幣所見“匈奴”王父子，和玄奘、迦羅那所載頭羅曼、摩醯邏矩羅同名，則可以認爲是嚈噠人進入興都庫什山以南地區後，和土著同化的表現，正如中國北方遊牧部族進入中原後姓名逐漸漢化一樣。

以上討論可小結如下：

1. 塞建陀笈多時期入侵印度的“匈奴人”很可能便是嚈噠人。嚈噠人乃假道乾陀羅等國進入北次大陸的。

2. 笈多時期碑銘、錢幣所見頭羅曼、摩醯邏矩羅父子係“匈奴”即嚈噠人。

3. 頭羅曼即宋雲等“行紀”所載嚈噠封王乾陀羅之特勤。他在六世紀初率領嚈噠人再次入侵笈多印度，於510年以前佔領埃蘭。此後繼續東進，佔領憍賞彌、迦尸和華氏城。最遲在517年死於西歸途中，傳位於摩醯邏矩羅。

4. 摩醯邏矩羅即宋雲一行於520年往謁之嚈噠王，應即科斯馬斯所載白匈人王矩羅斯。他在頭羅曼去世後西歸乾陀羅，與罽賓爭境。此後再犯笈多印度，遲至531年左右佔領瓜廖爾，但在532/533年左右被耶輪陀曼擊敗，約在535年以前撤退印度河以西。

5. 玄奘所載摩醯邏矩羅和迦羅那所載頭羅曼、摩醯邏矩羅和上述嚈噠王父子無涉，不可混爲一談。

■ 注释

[1] J. F. Fleet,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3, Inscriptions of the Early Gupta Kings and their Successors, No. 13. Calcutta, 1888.

[2] 注 1 所引書，No. 14, pp. 56-65。

[3]《續高僧傳·玄奘傳》(卷四)："自斯地（迦畢試）北，民雜胡戎，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爲邊國蜜利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大正新脩大藏經》T 50, No. 2060, p. 448。

[4] 朱納伽德銘文中提到的蜜利車人，是否比太里銘文中的 Hūṇas，學者間有過許多爭論。這個問題同樣關係到嚈噠人入侵笈多印度的年代。U. Thakur, *The Hūṇas in India*. Varanasi, 1967, pp. 67-69, 認爲"蜜利車是對外族的泛稱，而在朱納伽德銘文中應指 Hūṇas。今案：其説甚是。

[5] 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0～3（1958 年），pp. 1-52。

[6] 這種意見可以注 4 所引 U. Thakur 書，pp. 86-185，爲代表。

[7] K. G. Sankar, "The Hun Invasion of Industān." *New Indian Antiquary* 4 (1941-42): pp. 36-43. 否定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是匈奴的論文還有 K. B. Pathak, "New Light on the Gupta Era and Mihirakula." *Indian Antiquary* 47 (1918), pp. 16-22, 等。

[8] 頭羅曼的庫臘銘文見 G. Bühler, "The New Inscription of Toramana Shaha." *Epigraphia India* I (1892): pp. 238-241。

[9]《北史·突厥傳》："大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

中華書局，1958年，p. 135，以爲"蓋葉護（西漢翻翕侯）之稱，歷見於匈奴、烏孫、蠕蠕、突厥、回紇之歷史，幾經千年而勿廢。"

[10] 這篇曼達索爾銘文見注1所引J. F. Fleet書，No. 33, pp.142-148。

[11] G. R. Sharma, *The Excavations at Kauśāmbī (1957-1959)*. Allahabad, 1960, pp.15-16.

[12] 注1所引J. F. Fleet書，pp. 161-164 (No. 37)。

[13] 参看見注4所引U. Thakur書，pp. 103-105。

[14] 注1所引J. F. Fleet書，pp. 88-90 (No. 19)。

[15] 注1所引J. F. Fleet書，pp. 158-161 (No. 36)。

[16] 注1所引J. F. Fleet書，pp. 91-93 (No. 20)。

[17] 注4所引U. Thakur書，pp. 86-131，認爲頭羅曼進犯笈多印度始自501—502年，不久便於埃蘭即位。510年跋奴笈多進行的這場失敗的戰爭旨在收復失地。

[18] 注4所引U. Thakur書，p. 122，以及K. P. Jayaswal, *An Imperial History of India in a Sanscrit Text (c. 700 BC – c. 770 AD)*. Lahore: Motilal Banarsi Dass, 1934, p. 57。

[19] 注4所引U. Thakur書，p. 123-124，以及*Mañju-śrī-mūlakalpa*, 見注18所引K. P. Jayaswal書，p. 51。

[20] 見注4所引U. Thakur書，pp. 127-128。

[21] 宋雲所謂"已經二世"，衹能理解爲"已經是第二代王了"，不能理解爲"已經經過了二代王了"。如果承認520年宋雲所見爲摩醯邏矩羅，則應該認爲頭羅曼係特勤本人。

[22] 注4所引U. Thakur書認爲，年代爲笈多紀元209年的科赫（Khoh）銅牌

重新提到笈多主權，說明摩醯邏矩羅再次引兵東向、佔領瓜廖爾的時間應在 530 年左右，並由此推出頭羅曼之亡年爲 515 年。可參看。

[23] 注 1 所引書，pp. 150-158 (No. 35)。

[24] 見注 7 所引 K. G. Sankar 文。

[25] J. W. McCrindle, tr, Cosmas, *Christiana Topographia*. Publications of the Hakluyt Society, 1897, pp. 366-372.

[26] R. C. Majumdar, *The Classical Ag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 People*, vol. 3. Bombay, 1954, p. 36.

[27] R. R. Sharma, ed. *Harivaṁśa Purāṇa* (Txet and Trans.). Moradabad, 1928.

[28] Guṇabhadra, *Uttra Purāṇa*. Palm-leaf Extracts in Bhandarkar Comm, Poona, 1917.

[29] K. B. Pathak, "New Light on the Gupta Era and Mihirakula." *Indian Antiquary* 46 (1917), pp. 287-296; 47 (1918), pp. 16-22. 認爲迦勒佉羅闍應即摩醯邏矩羅，似亦未安。

[30] 注 26 所引 R. C. Majumdar 書，p. 32。

[31] V. A. Smith, "History and Coinage of the Gupta Perio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63 (1894), pp. 193-195; J. F. Fleet, "The Coins and History of Toramana." *The Indian Antiquary* 18 (1889): pp. 225-230, esp. 226.

[32] 參看注 4 所引 U. Thakur 書，pp. 116-120。案：U. Thakur 認爲應是一種獨特的白匈人紀元，始自 448 年。

[33] 注 1 所引 J. F. Fleet 書，pp. 200-208 (No. 42)。

[34] 在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是否"匈奴人"這個問題上，注 7 所引 K. G. Sankar 文的結論無疑是錯誤的。但我也不完全贊同注 4 所引 U. Thakur 書

的意見。由於他沒有注意到前者的觀點，論證並不充分，還包含若干不正確的觀點，當然更沒有採納前者論文中的合理成份，而指出文獻所載與碑銘、錢銘所見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並非同一個人正是前者的功績。

[35] A. Stein, ed. *Rājataṅginī of Kalhaṇa*. Westminster, 1900, I, pp. 288-313, III, pp. 97-330.

[36] U. Thakur 雖然承認諸王流派中有關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的記述幾乎完全無法同已知的其他事實相符，但仍堅持認爲不可能存在兩個頭羅曼和兩個摩醯邏矩羅。

[37]《大正新脩大藏經》T12, No. 0386，p. 1075。

[38] 山田龍城"蓮華面經について——グプタ末期のインド佛教事情"，《山口博士還曆記念印度學佛教學論集》，京都：法藏館，1955 年，pp. 110-123，曾力主《蓮華面經》所傳"寐吱曷羅俱邏"即嚈噠王 Mihirakula。但是，除了兩者同名外，他並沒有舉出任何更積極的證據，可見，在山田氏，此說也是以先入爲主的嚈噠滅佛說爲出發點的。

[39]《大正新脩大藏經》T50, No. 2058，p. 321。

[40] 注 38 所引山田氏文認爲《付法藏因緣傳》所傳"彌羅掘"也應該是嚈噠王 Mihirakula。其理由是該經並非吉迦夜、曇曜譯自一個連貫的原本，乃由北魏佛教學者所編著，其中有關"彌掘羅"的部份則是吉、曇以後的學者補入的，質言之，不能因爲《歷代三寶記》卷九（《大正新脩大藏經》T49, No. 2034, p. 84）稱該經譯成於延興二年（472 年）而否定"彌掘羅"與嚈噠王 Mihirakula 係同一人。我認爲，此說亦未安。一則，即使該經確係編譯之作，也不能因此懷疑其成書年代。退一步說，即使能證明今本有吉、曇以後編入的部份，也不能因此斷有關"彌掘羅"的部份決非

成於吉、曇之手。再退一步,即使能證明有關“彌掘羅”的部份編譯於吉、曇以後,也不能因此斷“彌掘羅”與嚈噠王 Mihirakula 爲同時代人,因爲吉、曇以後的編譯者完全可能依據吉、曇同時或以前的資料。同理,也不能根據《蓮華面經》的迻譯年代作出類似判斷。二則,論者既承認玄奘所載“摩醯邏矩羅”即“彌掘羅”和“寐吱曷羅俱邏”,就應該承認後二者的年代亦在玄奘之後“數百年”。這不僅同《付法藏因緣傳》,而且同《蓮華面經》的編譯年代並無矛盾之處。三則,《歷代三寶記》卷九(p. 85)有云:“昭玄統沙門釋曇曜慨前凌廢,欣今載興。故於北臺石窟寺內集諸僧衆,譯斯傳經,流通後賢,庶使法藏住持無絕。”正如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中華書局,1983 年,p. 360,所指出:“太武帝毀法之時,誣言佛法本是虛誕,胡無此教,乃漢人之無賴者所僞造。曇曜於大法再興之後,乃譯《付法藏傳》以明釋教之傳歷然可考。而且不數年中,吉迦夜又爲曜重譯之。蓋皆意在昭示傳燈之來由,而‘庶使法藏住持無絕’也。”因此,不無理由認爲,“彌掘羅”的故事正是吉曇編譯入經,意在藉此“慨前凌廢,欣今載興”。至少這種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41] U. Thakur 在分析、批判各種不同意見後指出,摩醯邏矩羅是首先被幼日王卽那羅僧訶笈多打敗,接著被耶輸陀曼打敗的。

[42] 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 22,東京:平凡社,1975 年,p. 137。

[43] 嚈噠與佛教關係見本書第一〇篇。

六　覆亡

嚈噠國家亡於突厥、波斯聯盟。有關問題，諸家多有考證。茲就其時間、過程及後果略陳己見。

（一）嚈噠之亡，一般認爲在562—567年間。[1] 蓋據彌南[2] 記載，562年，“突厥主Silzibul獲悉阿瓦爾人逃亡以及其人侵害突厥人利益（這在蠻族司空見慣）之事，傲然宣稱：他們不是鳥，不能飛過天空，逃脫突厥人的劍；他們不是魚，不能深入海底；他們衹能在地上遊動而已。一結束對嚈噠人的戰爭，我就去討伐阿瓦爾人，他們一定難逃我强有力的攻擊。這樣自吹自擂一番之後，Silziboulos就踏上了討伐嚈噠的征途”。（4.2: Exc. de Sent. 3）而568年突厥首次遣使拜占庭時，嚈噠已經被征服。（10.1: Exc. de Leg. Gent. 7）

或據歐格里烏斯（Evagrius）《教會史》[3]（V），指出嚈噠國家之破滅，應在558年之前。[4] 此前，西突厥斯坦已處於突厥控制之下。更有人舉《周書·異域傳》關於嚈噠於“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558年），竝遣使來獻。

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的記載，以見東西文獻之合契。[5]

今案：後說近是。據忒俄費拉克圖斯·西摩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6]記載，“是年（598年）夏，東方的突厥可汗遣使莫里斯（Maurice）皇帝，呈一函炫耀其戰績。函首致辭稱‘可汗、七姓大君長，世界七域之共主致書羅馬皇帝’云。正是這位可汗曾戰勝Abdeli族（應卽嚈噠）之主，君臨其國。受此勝利之鼓舞，遂與Stembis可汗結盟，征服了Avar族。……嗣後，此可汗又征服了所有Ogur部落”。Ogur人有部份逃亡歐洲，行抵高加索時，高加索諸族誤以爲可怕的阿瓦爾人，爲免受侵擾，曾厚賂之。這些逃亡者不欲解除這種於己有利的誤會，便以阿瓦爾自居。忒俄費拉克圖斯·西摩卡塔稱這些西逃的Ogur人爲僞阿瓦爾人。（VII, 7, 7-14）或以爲598年致書拜占庭的突厥可汗當爲達頭可汗（576—603年），而Stembis可汗應卽室點密可汗；“殆因國書譯文有誤，抑因其他理由，致以前可汗之武功，一併歸諸達頭”。[7]

不過，查《新唐書·突厥傳》，達頭係室點密之子；因此他很可能隨父西征，參加或直接指揮對嚈噠、阿瓦爾的戰役，也就是說歸功於達頭和歸功於室點密並不矛盾，國書並不費解，譯文亦未必有誤。從中可知，突厥首先征服的是嚈噠，其次是阿瓦爾人和包括僞阿瓦爾人在內的Ogor人。

又據彌南，僞阿瓦爾人於558年行抵阿蘭族（Alans）境，並致使拜占庭請求避難之地。（5.1: Exc. de Leg. Gent.）可知Ogor人被征服必在558年或稍前，而阿瓦爾人被征服亦在是年或稍前。

既然如此，則突厥之破嚈噠當在558年以前無疑。[8]而當明帝二年，嚈噠使臣抵達周都時，其本國已經破滅。彌南所載突厥於562—567年間發動的對嚈噠戰爭，僅僅是對嚈噠餘衆的掃蕩而已。一說558年並非嚈噠之亡年，而是嚈噠與突厥對抗的最後階段之起點；[9]似有未安。

（二）突厥興起後，其首領土門於552年發兵擊柔然，大破之；柔然可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死，弟俟斤立，號木杆可汗。木杆於555年滅亡柔然汗國，突厥西境遂同嚈噠鄰接。而薩珊波斯庫薩和一世即位後，精勵圖治，積極謀求同拜占庭簽署和約、解除來自西方的威脅；[10]同時，與突厥聯姻，共謀嚈噠。兩國聯盟擊破嚈噠的具體經過，波斯、阿拉伯史家雖多有記載，但均語焉不詳，且自相矛盾，今天已不易一一辨正，衹能通過以下二則比較有代表性的記載，約略窺其大概。

一則是歐提喀俄斯（Eutychios）所摘《列王記》(2, 189)。據載，庫薩和一世（Anōšarvān）欲攻嚈噠，“以復其祖卑路斯之讎，乃先同（突厥）可汗聯姻。庫薩和——居和多之子——將他進軍的消息函告可汗，請求他（可汗）在他到達之前就向嚈噠進軍。於是，他（可汗）來到（嚈噠）那裏，殺死其王，並將Balch，包括其中和來自其後Chorāsān的一切，都移交給Anōšarvān。後者則駐軍於Feryāna，與大可汗之女完婚”。[11]

另一則是迪奈韋里（Dīnawarī）《通史》(69）的記載：庫薩和一世“派遣軍隊進入嚈噠國土，佔領了吐火羅斯坦（Ṭuhārestān），

謝颶（Zābulistān），迦布羅（Kābulistān）和石汗那（Čaγāniyān）”。而突厥 Singibū 可汗則“朝呼羅珊方向進軍，佔領了柘支（Šāš）、拔汗那、薩末鞬（Samarkand）、佉沙（Kišš），他一路劫掠，直抵捕喝（Buchārā）”。[12]

將兩者結合起來，似乎可以認爲：在突厥、波斯聯盟發動的對嚈噠戰爭中，突厥起了主要作用。其軍隊除攻略阿姆河以北的嚈噠領土外，還曾渡河南下，直搗嚈噠國都 Balch，摧毀了嚈噠主力。波斯進軍的重點則是阿姆河以南地區。此後，或因有約在先，突厥將巴爾赫及其附近地區移交給波斯，兩國便大致以阿姆河爲界中分嚈噠疆域。[13] 而當庫薩和一世與突厥大可汗之女在拔汗那城成婚時，嚈噠已破。

兩國聯軍夾擊嚈噠時，波斯方面的統帥爲庫薩和一世，史籍記載頗爲一致，似可無疑。突厥方面的統帥，據《周書·突厥傳》：

> 科羅死，弟俟斤立，號木杆可汗。……性剛暴，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滅之。……俟斤又西破囐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

和《隋書·突厥傳》：

> 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

可知應爲木杆可汗。而據《舊唐書·突厥傳下》：

> 室點密，從單于統領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爲可汗，號十姓部落，世統其衆。

則可進一步知道事實上西征嚈噠的是室點密，並非木杆本人。僅僅因爲木杆當時係突厥最高可汗，《周書》、《隋書》纔以破嚈噠之功歸屬之。“從單于”云云，[14] 並不是說西征之際，木杆親臨前線，以室點密隨行；而應該理解爲室點密平時擁衆十萬，聽從大可汗指揮，後率所部往平西域諸國，始自爲可汗。

732 年（唐開元二十年）苾伽可汗所立《闕特勤碑》有云：

> 當上方蒼天下方黑地開闢之時，人類的子孫亦出生於其間矣。人類子孫之上，我祖宗 Bumïn 可汗及 Istämi 可汗實爲之長，卽與突厥人民製定统治國家的制度。天下四隅，悉爲敵人，我祖悉征討之，使之遵守和平，垂首屈膝。東至興安嶺，西至鐵門，悉爲我居之地。[15]

其中 Istämi 卽室點密。顯然是因爲他西征嚈噠，拓地直至鐵門，功勳卓著，纔被尊奉爲突厥開國之祖的。[16]

至於迪奈韋里所載 Sinğibū 與彌南所載 Silzibul，一般認爲應卽室點密。這可能是正確的。因爲 Sinğibū 的事蹟和室點密的事蹟相一致；而 Silzibul 與 Sinğibū 可以視作同名異譯，又同忒俄費拉

克圖斯所載 Stembis（Isämi, 室點密）的事蹟符合。

另外，關於突厥、波斯破嚈噠事，《泰伯里史》在一處（895）記載："Sinğibū 可汗是全突厥最大胆、最堅强、擁軍最多的人。他殺死了嚈噠王 Warz。他毫不懼怕嚈噠人兵衆勢盛，與其王廝殺，殲其全軍、鹵其財富，征服了庫薩和所佔以外全部嚈噠國土。"而在另一處（899）記載："他（庫薩和）爲報其祖卑路斯之仇，乃出兵攻打嚈噠。事先，他已同［突厥］可汗聯姻，他將自己的意圖函告他（可汗），並命令他向嚈噠進軍。於是，他（可汗）來到（嚈噠人）那裏，他殺死其王及全體王室人員。他越過巴爾赫及其以外地區（阿姆河北岸），營於拔汗那"。[17] 或據後一則記載認爲殺死嚈噠王的實際上是庫薩和一世。[18]

今案：泰伯里兩則記載所述無疑是同一事件，不過，前者是從突厥、後者是從波斯的角度記述而已。前一則記載言之鑿鑿，殺死嚈噠王的是 Sinğibū 可汗，並不是庫薩和一世，故後一則記載的有關部份似乎應理解爲"殺死其王及全體王室人員"（行爲一）的是 Sinğibū 可汗，而"越過巴爾赫及其以外地區，營於拔汗那"（行爲二）的纔是庫薩和一世。但是按之泰伯里原文，行爲一和行爲二是同一個主詞，而這個主詞不僅不可能是庫薩和一世，也不可能是 Sinğibū 可汗，因爲後者是行爲一的主詞，且顯然不可能是行爲二的主詞。因此，不能不認爲泰伯里原文此處有奪誤，其本來面貌或與歐提喀俄斯所摘《列王記》相似。庫薩和一世北營於拔汗那之類記載似乎表明兩國聯軍夾擊嚈噠時，波斯軍曾一度渡阿姆河北上，佔領拔汗那。但是我認爲這種可能性極

小。庫薩和一世北營拔汗那很可能僅僅是爲了同突厥大可汗之女舉行婚禮，其事當在突厥將巴爾赫移交給波斯之後。種種傳說，或皆緣此而起。

至於 Sinǧibū（Silzibul）一名，一般認爲其後半部 -gibu (-zibul) 乃“葉護”(jabγu) 之音譯，而由於對其前半部 Sin- (Sil-) 的詮釋則各不相同，該名被指爲“Sir（族）葉護”、“室點密葉護”、“Sir（河）葉護”和“肆葉護”。[19] 今案：指 -ǧibū(-zibul) 爲“葉護”不爲無據，[20] 室點密曾爲葉護在漢文史料中雖找不到佐證，[21] 但不能否定他在“自爲可汗”以前曾任葉護的可能性。迪奈韋里等稱 Sinǧibū 爲“可汗”則可能是誤以爲 Sinǧibū 是人名；何況漢文史料也有將“葉護”與“可汗”聯稱的例子（如“統葉護可汗”）。諸家所釋 Sin-(Sil-) 似以“肆葉護”說教較勝。

要之，室點密卽西史所見 Stembis、Sizabul、Sinǧibū。其本人曾奉木杆可汗之命，與其子達頭等率所部西征嚈噠，於 558 年前與庫薩和一世聯兵破滅其國，以阿姆河爲界中分其土；接著，又擊破阿瓦爾人及 Ogor 人；並於 562—567 年間率軍掃蕩阿姆河北嚈噠殘部，追剿西逃的 Ogor 卽僞阿瓦爾人。

（三）嚈噠破滅之初，突厥控制了中亞北部，隔阿姆河與波斯爲鄰。由於貿易等方面的原因，兩國很快就發生了衝突。

據彌南記載，原屬嚈噠、時已歸從突厥的索格底亞那人，爲進入波斯境內銷售絲綢，請可汗遣使波斯。Sizabul 遂派出以 Maniach 爲首的使團。使節們來到波斯王御前，提出在波斯自由商販絲綢的請求。然而波斯王不樂意突厥人自由入境，便託故推宕。

索格底亞那人糾纏不休，庫薩和不得已廷議此事。時有亡命波斯之嚈噠人 Katulph 力勸波斯王不要同意，並收購絲綢，焚毀於使團之前，以示不用突厥絲綢。使節歸報，Sizabul 爲結好波斯，又派出第二個使團。波斯王、大臣及 Katulph 下令毒死一些使節，倖免者僅三四人。波斯人散佈流言，說突厥使節是因氣候乾燥窒息而死的。但 Sizabul 目光敏銳，堅信使節們是被謀殺的。這就是波斯和突厥交惡的原因。（10.1: Exc. de Leg. Gent. 7）

兩國聯盟既告破裂，據彌南記載，突厥遂於 568 年首次遣使拜占庭，共謀波斯，並企圖開闢直接同西方貿易的路線，上述情況就是拜占庭使臣 Zemarchus 於同年報聘時獲悉的。Zemarchus 報告，他曾親睹 Sizabul 整軍往討波斯。（10.3: Exc. de Leg. Rom. 8）突厥、波斯對抗的序幕當於此時揭開。

一般認爲，Silzibul（Sizabul）卽室點密。彌南曾載 576 年拜占庭使臣 Valentinus 抵突厥時，正值 Silzibul 去世，由其子 Turxanthus 主持喪禮。（19.1: Exc. de Leg. Rom. 14）後者係 Tardu（卽室點密子達頭）之兄弟。[22]

要之，隨著嚈噠覆亡出現的是突厥和薩珊波斯對抗的新局面。前者的勢力不久就沿阿姆河南下，遲至七世紀二十年代，拓地直至罽賓，佔有了全部嚈噠舊壤。[23] 後者由於突厥和拜占庭的夾擊，國力逐漸耗盡，終於爲阿拉伯鐵騎的長驅直入敞開了大門。

■ 注释

[1] 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58 年，pp. 200-202。據《周書》有關嚈噠於明帝二年（陳武帝永定三年）來朝之記載，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pp. 879-880，本沙畹說，以爲嚈噠之滅必在陳文帝世（560—566 年在位）。今案：呂說未安。明帝二年嚈噠使者抵達周都之際，其本國業已破亡是完全可能的。

[2] 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 1985.

[3] E. Walford, tr. *Evagrius Scholastic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AD 431-594)*. London, 1846, p. 246.

[4] H. W. Haussig, "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Byzantion* 23 (1953): pp. 275-462, esp. 370-371; H. W. Haussig, "Die Quellen über die Zentralasiatische Herkunft der Europäischen Aware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II (1956), pp. 21-43; F. Altheim, *Geschichte der Hunnen* II, Berlin, 1969, p. 260.

[5] 内田吟風"西突厥初世史の研究"，《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88 年，pp. 429-493, esp. 434-438。

[6] Michael and Mary Whitby,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of Simocatta: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7] 見注 1 所引沙畹書，p. 223。

[8] 參見余太山"柔然－阿瓦爾同族論質疑——兼說阿瓦爾即悅般"，《嚈噠史

研究》，齊魯書社，1986 年，pp. 163-192。

[9] 内藤みどり“エフタル民族とその發展”,《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 年，pp. 134-147。

[10] E.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 (1): The Seleucid, 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 CUP, 1983, p. 156.

[11] 引自 F. Altheim, *Geschichite der Hunnen*, V. Berlin, 1962, p. 139。

[12] 見注 4 所引 F. Altheim 書，p. 53。迪奈韋里接著說，庫薩和一世令其子嗢沒斯（四世，579—590 年）率軍往討突厥，迫使可汗放棄所佔之地。注 1 所引沙畹書，pp. 202-203，認爲：“此說似非事實。”今案：嗢沒斯四世係庫薩和一世與大可汗女所生，嚈噠破滅時，尚未出世。因此，卽使確有庫薩和一世命嗢沒斯抗擊突厥之類事情，也應該發生在波斯和突厥交惡之後。

[13] 注 1 所引沙畹書，pp. 202-203，指出：其時兩國之界址爲鐵門。蓋 628 年玄奘西行之時，突厥國境雖已抵信度河，然尚視鐵門爲突厥固有之國界。故《慈恩傳》卷二云，鐵門“卽突厥之關塞也”。今案：鐵門係索格底亞那與吐火羅斯坦之天然界限，沙畹說是。又，《闕特勤碑》亦視鐵門爲突厥固有之國界，見下文所引。

[14]《舊唐書·突厥傳上》:“可汗者猶古之單于。”知此處“單于”乃指木杆可汗。注 5 所引内田氏文以爲室點密早就在中亞獨樹一幟，未必奉木杆之命西征。主要根據在於阿拉伯史料載，庫薩和一世曾遣與室點密女所生之子嗢沒斯阻止室點密南下，可見突厥與波斯聯姻遠在 558 年之前。今案：其說非是。因爲《列王記》明載庫薩和一世與突厥可汗完婚時,嚈噠已破。而且庫薩和一世所娶未必爲室點密之女，更可能是木杆之女。何況卽使

兩國聯姻甚早，嚈噠破滅時嚧沒斯已經成年，亦不足以證明室點密西征並非木杆所遣。

[15] 引自馬長壽《突厥人和突厥汗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p. 21。

[16]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 年，pp. 256-257，認爲：唐初以前的中國人對室點密（Istämi）一無所知，可知其人不過是傳說中的君主。兩《唐書》所見其事蹟和系譜，不過是阿史那彌射和阿史那賀魯爲使唐朝承認其正統，以求得支援而杜撰的，不足憑信。今案：此說未安。一則，唐初以前的記載沒有提到室點密，主要是其人活動的地點去中原極遠，不能因此肯定其人並不存在，後來與其子孫交往始知其名，亦在情理之中。二則，即使能證明彌射等並非室點密子孫，亦不足以否定室點密存在。彌射等果如說者所言，妄稱室點密爲先祖，以示正統，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室點密確有其人。又，注 5 所引內田氏文以爲，碑文所見 Istämi 是突厥神話傳說中的始祖，與史籍所見現實中的西突厥的始祖室點密並非一人。因爲屬於東突厥系統的所謂“復興突厥”的碑文不可能頌揚舊敵國西突厥的始祖。今案：其說亦有未安。一則，碑文雖帶有傳說色彩，但所述不妨認爲是突厥開國時的現實情況。二則，室點密時代並無東西突厥之分，其人更與後世兩突厥汗國互爲寇讎無涉。“復興突厥”尊之爲開國世祖，不僅爲了紀念他開拓西疆之功，也是爲了藉此表明其先祖功業之宏大。

[17] 引自 T. Nöldecke, *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zur Zeit der Sasaniden, aus arabischen Chronik des Tabari*. Leyden, 1879, pp. 158-159, 167。

[18] G. Rawlinson, *The Seven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 London, 1876, p. 422.

[19] J. Marquart,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1901, pp. 216, 247; 注 4 所引 H. W. Haussig 文；注 1 所引沙畹書，pp. 201-202；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 年，pp. 116-119，四者均以爲 jabghu 乃“葉護”之音譯。然於 Sin- (Sil-) 的解釋則各不相同，依次爲 Sir（族）、室（點密）、Syr（河）和“肆”。

[20] 參看注 1 所引沙畹書，pp. 227-228；G. Moravcsik, *Byzantinoturcica, die Byzantinischen Quellen der Geschichte der Türkvölker*, II. Berlin, 1958, pp. 130-131。

[21] 注 5 所引內田氏文舉《舊唐書·突厥傳下》：“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密從單于統領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爲可汗，號十姓部落，世統其衆。在本蕃爲莫賀咄葉護”。以證室點密確有葉護之號。今案：其說非是。“在本蕃”上應據通典補“彌射”二字。參見中華書局標點本校勘記。

[22] 彌南原文用 ὅμαιμος 一詞（注 2 所引 R. C. Blockley 書，p. 178）表示 Turxanthus 與 Tardu（達頭）的關係。此詞用作形容詞時意指 of the same blood, related by blood；但多用作名詞，且引申爲 brother or sister。K. Dieterich, *Byzantinische Quellen zur Länder- und Völker Kunde*, II. Leipzig, 1912, p. 24, 譯作 blutsverwandt, 是取其本義。E.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Paris, 1903, p. 241, 釋爲 frére consanguin（同父異母兄弟），則是取其引申義：可能是因爲他知道達頭是室點密之子，又考慮到希臘人的血統按父系計，而突厥人往往一夫多妻的緣故。內藤みどり“東ローマと突厥の交涉に關する史料”，《遊牧社會史探究》22（1963 年），pp. 1-26，以爲希臘語用 ἀδελφός 一詞指“兄弟”故譯 ὅμαιμος 爲“親戚”，並據以否定 Silzibul 與 Tardu 是父子。今案：內藤

氏說未安。因爲與這兩個概念是真包涵關係，前者真包涵後者。也就是說，稱 Turxanthus 與 Tardu 爲 ὅμαιμος，並不排斥兩者事實上是 ἀδελφός 的可能性。內藤氏既不否認 Silzibul 卽室點密，如果再結合中國史籍關於達頭（Tardu）係室點密之子的記載，則此處 ὅμαιμος 一詞徑譯作“兄弟”也不能算錯。何況，突厥人一夫多妻，Turxanthus 與達頭（Tardu）也未必是 ἀδελφός（同父同母兄弟）。蓋查馬科斯遠道來聘，一時未能搞清 Turxanthus 與 Tardou 的確切關係，便用了 ὅμαιμον 一詞。另外，Turxanthus 一名，內藤みどり“西突厥の一君主 Turxanthus について”，《東方學》24（1962 年），pp. 30-40，譯爲“咄陸設”，甚是；注 5 所引內田氏文斷爲達頭之子都六，則欠妥。蓋咄陸卽都六、都陸、咄六，突厥人以此爲名者不少，未必卽達頭之子。

[23]《新唐書·突厥傳下》：“統葉護可汗（618—628 年）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參見注 1 所引沙畹書，pp. 217-234。

七　社會經濟

嚈噠在中亞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由於直接的記載極其貧乏、零碎，其社會經濟形態不可能清晰地勾勒出來。以下僅臚列要點，供研究者採擷。

《魏書·西域傳》載嚈噠“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内”。這是關於嚈噠人葬俗的記載。結合同傳“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的記載，可知嚈噠社會貧富差距還是比較明顯的。

嚈噠人的首領稱“可汗”，[1] 其妻稱“可敦”，均爲阿爾泰系部族，諸如鮮卑、柔然、突厥等，習用的尊號。嚈噠起源塞北，故亦有這類尊號。

嚈噠可汗握有全部族的最高權力，其妻可敦似乎也參與軍政大事。《梁書·西北諸戎傳》載滑國：

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

又據《舊唐書·蕭瑀傳》:“北蠻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而迪奈韋里（Dīnawarī）《通史》（57）載，五世紀二十年代中，該族入侵薩珊波斯，被巴赫蘭五世擊退，可汗戰死，可敦遭擒。[2] 嚈噠可敦臨陣遭擒，也是“知兵馬事”的緣故。

值得注意的是嚈噠人的王位繼承制。《魏書·西域傳》載嚈噠“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洛陽伽藍記》卷五載宋雲一行途經嚈噠國時，曾見到一位嚈噠王和一位嚈噠王妃，據云：

> 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廻以氍毹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凰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惟有此法，不見音樂。嚈噠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與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

嚈噠統治者的生活起居精細如繪，宛在目前。

饒有趣味的上引宋雲關於王妃“頭帶一角”，以及下文大臣妻“頭亦似有角”的記載。或以爲這是嚈噠盛行“多夫制”的標誌。蓋據《周書·異域傳下》載嚈噠：

> 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

但是，多夫並不是嚈噠真正的婚俗。[3] 嚈噠王妃“頭帶一角”，顯然並不是由於嚈噠王“無兄弟”的緣故。《魏書·西域傳》載嚈噠王“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魏書·蠕蠕傳》則載：“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皆可證嚈噠王是多妻的。嚈噠大臣妻之角帽亦與多夫無關。上引《周書·異域傳》，以及《梁書·西北諸戎傳》的類似記載，不過是當時中國人把嚈噠治下吐火羅斯坦等地土著之風誤以爲嚈噠人固有的習俗罷了；嚈噠婦人之有角帽，很可能是其人在服飾方面入境隨俗的表現。

《梁書·西北諸戎傳》載嚈噠“無職官”，這可能衹是早期的情況。宋雲則載其有“大臣”，並説“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大臣的名號已知者有“特勤”和 jovula（葉護）等。[4] 這也和鮮卑、突厥等阿爾泰系部族相同。特勤或 jovula 可能是世襲的，往往受封大塊土地。

據普洛科庇烏斯記載，嚈噠貴族還有這樣的習俗，卽“爲自己招羅一些夥友，其數約二十人或更多。這些人遂成爲該貴人的永久性食客，且可分享其財富，但當這位貴人去世時，所有這些人均應按慣例殉葬”。(I, 3) [5] 今案：這種“夥友”很像後來蒙古部落首領的“伴當”卽“那可兒”(nökör, nökür)。[6] 其殉死之風又頗類匈奴。《史記·匈奴列傳》載，單于死，“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殉人的身份顯然不是奴隸。

《魏書·西域傳》稱嚈噠人“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因此，至少在初期，嚈噠人的經濟生活來

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畜牧。故《魏書·西域傳》載"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梁書·西北諸戎傳》亦載：其獸有師子、兩腳駱駝、野驢"。又，《太平御覽》卷四三五載：

> 吐火羅波訕山陽石壁上有一孔，恒有馬尿流出，至七月平旦，石崖間有石閣道，便不見。至此日，厭達人取草馬置池邊與集，生駒皆汗血，日行千里。

參以《隋書·西域傳》所載：

> ［吐火羅］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

可知嚈噠人在佔領吐火羅斯坦後，亦曾因地制宜從事馬種的改良。

嚈噠自塞北經阿爾泰山南遷，首先到達的是索格底亞那，接著佔領了吐火羅斯坦。這兩個地區都有發達的農業和商業，許多城市如撒馬爾罕、巴爾赫等早已成爲貿易中心，積聚了大量財富。以此爲基地，嚈噠人發動了對波斯、印度和天山南北地區的戰爭。"絲綢之路"的中亞部份一度幾乎完全置於它的控制之下，沿途諸國都受它役使。在這種情況下，嚈噠人特別是它的上層統治集團的經濟生活來源，必然更多地依靠來自被征服者的賠款和賦稅。宋雲等"行紀"載其"受諸國貢獻，甚饒珍寶"，可以爲證。

嚈噠人從事貿易活動，除利用侵略和征服戰爭中獲得的大量金錢外，也自己製造貨幣，可能爲了便於流通，已發現的嚈噠錢

幣多摹仿薩珊和笈多的款式。[7]嚈噠人的貿易活動還常常假手素以善商賈著稱的索格底亞那人進行，他們往往因此充任嚈噠的使者。據所謂《梁職貢圖》的滑國使臣圖題記，普通元年（520年），嚈噠"王妻□□亦遣使康符真，同貢物"。康符真可能就是一個索格底亞那人。

另外，當時在嚈噠勢力範圍內的中亞各小國也都有一定的通商自由。資料表明，在嚈噠統治中亞期間，東西交通是暢通無阻的。[8]

嚈噠進入中亞以後，遊牧經濟就開始逐步向農耕和定居過度，終於從"居無城郭"發展到定都拔底延。[9]雖然直至519年宋雲一行西使時，尚見其王"遊軍而治"，但一般說來上層份子總是比較頑固地保持舊習俗，而在阿姆河兩岸高度發達的農耕文化影響之下，其下層開始定居當早於這個年代。《梁書·西北諸戎傳》載滑國：

> 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麨及羊肉爲糧。

"以麨及羊肉爲糧"，也許反映了普通嚈噠人的定居生活。普洛科庇烏斯據以區分嚈噠與匈人者，主要在於前者"並不遊牧，久居良田沃土"。（I, 3）而據彌南，568年突厥使臣答查士丁尼皇帝問時，也說嚈噠人"居有城郭"（10.1: Exc. de Leg. Gent. 7）。[10]

定居、農耕和通商有利於嚈噠人擺脫舊習俗、舊制度的羈絆，接受先進的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可惜的是，不僅有關嚈噠本身社會經濟狀況的資料寥寥無幾，而且對於當時中亞、西亞和南亞的

社會經濟狀況我們也知之甚少，以致無法對嚈噠社會經濟的性質及其發展、變化作出切實、具體的説明。嚈噠發動的征服戰爭，雖然會使上述一些地區的生産力遭到破壞，經濟發展進程因此中斷或減速，但嚈噠征服者不僅不可能在佔領區推行落後的社會制度，而且將不得不和這些地區被佔領後尚保有的較高的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而且，嚈噠的征服造成的空前的统一局面，客觀上會對上述地區、特别是中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起一定的積極作用。

歷史上遊牧部族的社會經濟發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所接觸的農耕部族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往往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雖然由於它們登上歷史舞臺的時代不同，從而接觸到的農耕部族所處的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和階段不同，以及接觸的方式、程度和範圍不同，所受影響的大小性質也不相同。但是，當它們佔領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之後，都會通過走向農耕和定居，學會被征服者的語言、文字，接受被征服者的習俗、宗教，遂步適應和採用新的經濟生活方式和社會政治制度。嚈噠也不應例外。

■ 注释

[1] 關於嚈噠有“可汗”號見本書第三、第四篇。另可參看 F. Altheim, *Geschchite der Hunnen*, II. Berlin, 1969, p. 273。

[2] 引自注 1 所引 F. Altheim 書，p. 48。

[3] 參看本書第一一篇。

[4] Jovula, 見 G. Bühler, "The New Inscription of Toramana Shaha." *Epigraphia India* I (1892), pp. 238-241。

[5] H. B. Dewing, tr.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New York, 1914.

[6] 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 劉榮焌漢譯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0 年, pp. 140-154。

[7] R. Ghirshman, *Les Chionites Hephtalites*. Le Caire, 1948, pp. 9-60; U. Thakur, *The Hūn.as in India*. Varanasi, 1967, pp. 277-296.

[8] 見本書第八篇。

[9] 見本書第九篇。

[10] 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 1985.

八　東西交通

嚈噠時代的東西交通，因資料奇缺，以往論述均語焉不詳。但這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亦在此試述其梗概。

嚈噠是在擴張和征服中迅速興起的，遊牧經濟本身的性質決定了這一點。因爲遊牧是一種單一的自然經濟，它相對於足够發達的農業來説，是十分脆弱的；隨着人畜的蕃衍，遊牧部族對於各種生産和生活資料尤其是對農産品的需求越來越大，它同農耕部族進行交换的積極性也越來越高；而由於部落内部的階级分化以及國家的形成，這種對於交换的積極性終於發展成爲爭奪商道霸權、劫掠和侵吞農耕區的野心。

嚈噠人一進入中亞，便佔領了索格底亞那和吐火羅斯坦，這兩地不僅是當時中亞的戰略要衝，而且是當時東西陸上交通的樞紐。興旺的貿易增强了嚈噠的經濟實力，對於嚈噠的勃興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嚈噠人以索格底亞那和吐火羅斯坦爲基地同巴赫蘭五世以降波斯列帝進行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戰爭。戰爭的重要目的便是爭

奪商道霸權。因爲當時波斯人掌握着從中亞通往西亞和拜占庭的主要貿易道，也就是“絲綢之路”的西部，有許多市場和港口使嚈噠人垂涎。拜占庭的忒俄法涅斯曾談到：

> 突厥人佔有了許多賽里斯人（Seres）時常出入的市場和港口。這些市場和港口在嚈噠王 Ephthalanus（該族實得名於此王）戰勝卑路斯時，曾被嚈噠人所奪取；稍後，突厥人又戰勝嚈噠人，乃歸突厥。[1]

不僅如此，嚈噠人曾多次介入波斯帝位廢立之爭，[2] 顯然意在扶植波斯的親嚈噠政權（雖然實際上並不那麼成功）。嚈噠人對薩珊波斯採取這種政策，比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嚈噠人自知實力還不足以完全取代波斯人，便企圖以武力爲後盾，迫使薩珊臣服，從而獲得對自己有利的貿易條件。據 Menander [3] 記載。嚈噠亡後，突厥和波斯爲鄰，因薩珊波斯不允許隊商過境貿易，突厥可汗派遣使臣遠赴拜占庭，力圖開闢和拜占庭直接交通的路線。（10.1: Exc. de Leg. Gent. 7）這也可以說明嚈噠發動對波斯戰爭的實質。

此外，勒索戰爭賠款，也是嚈噠發動對波斯戰爭的原因。例如，普洛科庇烏斯曾記載，卑路斯死後，“波斯就成了嚈噠的屬國。一直到居和多鞏固了自己的政權，認爲沒有必要再向嚈噠繳納年貢時爲止。蠻族支配波斯人的這段時間共達二年”。（I, 3）[4] 這是因爲薩珊銀幣當時已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國際貨幣，和拜占庭金幣一樣，在中東、近東和東歐廣泛流通。考古工作者在中國境

內也發現了爲數十分可觀的薩珊銀幣，它們的出土地點分佈很廣，東達河北定縣，南抵廣州英德和曲江。其中尤以卑路斯及其前帝的銀幣爲最多。這些銀幣之所以能大量流傳中國，除了當時波斯和中國已經建立了直接的貿易關係外，可能是因爲嚈噠人以所獲得的波斯賠款轉向東方購貨。在定縣塔基所發現的銀幣中，有一枚伊嗣俟二世的銀幣邊緣壓印一行嚈噠文字的銘文，這反映了波斯、嚈噠和中國三者的關係。[5]

嚈噠同南北朝的交通，始於五世紀中葉，而以六世紀上半葉最爲頻繁。其時嚈噠一面同薩珊波斯對峙，一面北上同高車爭奪準噶爾盆地及其以西，並積極向塔里木盆地擴張。在西域南道，其勢力達到于闐，在北道則達到焉耆以東，於是同南北朝的交往日益便利。

508年，高車王彌俄突朝魏，據《魏書·高車傳》，世宗下詔說：

> 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嚈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往來路絕，姦勢亦沮，於卿彼藩，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侯,] 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6]

這段話簡要地說明了公元六世紀初西域北道的形勢，由於高昌內附，柔然、吐谷渾都無法利用這個交通樞紐，所謂“姦勢亦沮”。而這種形勢對於新興的高車是十分有利的，詔書所謂“於卿彼藩，

便有所益”云云，顯然是誘之以利，藉高車之力維持商道暢通，同時抑制柔然、吐谷渾的勢力。至於嚈噠，自456年首次朝獻以來，同北魏無疑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所以宣帝在上述詔書中沒有把它和柔然、吐谷渾相提並論。而嚈噠亦深知高昌一地對於通商的重要性，面臨高車勢力的擴張，除與之對抗外，也採取同北魏相倣的政策，卽加以利用。嚈噠兩次操縱高車王位的廢立，積極扶植親嚈噠的人當高車王，都是爲了控制高車，借高車之力同柔然對抗，使商道不致梗塞。[7]

經由高昌，嚈噠積極開展同北魏的交往。《魏書》“本紀”中明確記載的有以下幾次：

太安二年（456年）十一月，“嚈噠、普嵐國並遣使朝獻”。（高宗紀）

正始四年（507年）冬十月辛未，“嚈噠、波斯、渴槃陀……諸國並遣使朝獻”。（世宗紀）

永平二年（509年）正月壬辰，“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一”。（世宗紀）

永平四年（511年）九月甲寅，“嚈噠、朱居槃……等諸國並遣使朝獻”。（世宗紀）

延昌元年（512年）十月，“嚈噠、于闐、高昌及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世宗紀）

延昌二年（513年）八月庚戌，“嚈噠、于闐、槃陀及契丹、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獻”。（世宗紀）

熙平二年（517年）四月甲午，“高麗、波斯、疏勒、嚈噠諸國並遣使朝獻”。（肅宗紀）

神龜元年（518年）二月戊申，“嚈噠、高麗、勿吉、吐谷渾、宕昌……諸國並遣使朝獻”。（肅宗紀）

神龜二年（519年）四月乙丑，“嚈噠國遣使朝貢”。（肅宗紀）

正光五年（524年）閏二月癸巳，“嚈噠國遣使朝貢”。（肅宗紀）

正光五年（524年）十二月壬辰，“嚈噠、契丹、地豆于、庫莫奚諸國並遣使朝貢”。（肅宗紀）

永安三年（530年）六月戊午，“嚈噠國獻師子一”。（孝莊紀）[8]

太昌元年（532年）六月丙寅，“蠕蠕、嚈噠、高麗、契丹、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廢出三帝紀）

太昌元年（532年）六月癸酉，“蠕蠕、嚈噠國遣使朝貢”。（廢出三帝紀）

北魏出使嚈噠，《魏書·高湖傳》載有二次：

[高] 徽，字榮顯……延昌中（512—515年），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嚈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並因之以獻名馬。還，拜冗從僕射。神龜中（518—520年）……又假平西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使嚈噠。[9]

此外，還有前文屢次提到的宋雲一行也於神龜二年（519 年）十月抵達嚈噠國，據稱其王曾“再拜跪受詔書”。

北魏亡後，嚈噠繼續同西魏、北周交往，《周書》中明確記載的有三次：

大統十二年（546 年）“遣使獻其方物”。（異域傳下）

魏廢帝二年（552 年）“遣使來獻”。（異域傳下）

明帝二年（558 年）六月癸亥，“嚈噠遣使獻方物”。（明帝紀）

在同北魏交往的同時，嚈噠和南朝也建立了較密切的聯繫。[10]《梁書》明確記載的有以下五次：

天監十五年（516 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西北諸戎傳）[11]

普通元年（520 年）三月丙戌，“滑國遣使獻方物”。（武帝紀下）[12]

普通七年（526 年）正月丁卯，“滑國遣使獻方物”。（武帝紀下）

大同元年（535 年）三月辛未，“滑國王安樂薩丹王遣使獻方物”。（武帝紀下）

大同七年（541 年）三月乙亥，“高麗、百濟、滑國各遣使獻方物”。（武帝紀下）

嚈噠派往南朝的使者是沿西域南道，到達鄯善，再穿越柴達木盆地，繞過青海，從岷山道南下，到達益州，然後順江而下直抵建康的。

嚈噠人不僅自己積極同南北朝交往，而且允許落入它勢力範圍的中亞各小國遣使朝貢。南北朝史籍所載諸國來朝的年代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茲將《魏書》"本紀"所見其中若干地望較清楚者最後一次朝魏年代臚列於下：

者舌：太延三年（437 年）
破洛那：和平六年（465 年）[13]
粟特：太和三年（479 年）
悉萬斤：永平二年（509 年）
忸密：永平二年（509 年）
迷密：正平元年（451 年）
[以上阿姆河以北]
吐火羅：和平五年（464 年）
薄知：永平二年（509 年）
[以上阿姆河以南]
烏萇：正光二年（521 年）
車多羅：太和元年（477 年）[14]
疊伏羅：孝昌二年（526 年）
[以上興都庫什山以南]
賒彌：永平四年（511 年）[15]
鉢和：永平二年（509 年）[16]

渴槃陀：延昌二年（513 年）[17]

朱居：神龜二年（519 年）[18]

于闐：延昌三年（514 年）

[以上西域南道]

居密：正光二年（521 年）[19]

疏勒：神龜元年（518 年）

龜兹：正光三年（522 年）

焉耆：太延五年（439 年）[20]

[以上西域北道]

蓋嚈噠佔領阿姆河以北和以南地區分別在四世紀六七十年代和五世紀三十年代末；其勢力越過興都庫什山在五世紀五十年代中；沿西域北道擴展至焉耆在五世紀末、六世紀初；[21] 沿南道伸向于闐的年代雖無從確知，[22] 但不妨認爲是在向北道擴展的同時或稍前。

當然，來朝者是使臣或商賈本不易分清；但按之宋雲沿途所見，當時已處於嚈噠勢力範圍内的于闐、朱居、渴槃陀、烏萇等國，[23] 無論在信仰、習俗、外交等方面確實都具有自主權。

不難想見，這些嚈噠控制下的小國，在頻頻遣使南北朝的同時，也一定朝貢嚈噠。各地的方物，連同諸國遣使南北朝所得也就源源不斷地流入嚈噠統治的中心地區了。宋雲所謂："四十餘國，皆來朝賀。……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洛陽伽藍記》卷五）就是指的這種情況。

最後，資料表明，在嚈噠統治中亞時期，西亞乃至歐洲與中國交往的渠道也是暢通的。例如：據《魏書》"本紀"，波斯使節來朝共十次，《梁書》"本紀"記載了二次，《周書·異域傳》也記載了一次；又據《魏書》"本紀"，普嵐（Frum）即拜占庭也曾三次來聘。

總之，嚈噠結束了貴霜帝國土崩以來四分五裂的局面，在中亞建立了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儘管這種大範圍的征服造成的統一局面是短暫的、不穩固的，在客觀上還是有利於中亞各地和東西方之間開展經濟、文化交流活動的。

■ 注释

[1] C. Müller,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æcorum, Disposuit, Notis et Prolegomenis Illustravit*. Paris, 1851, p. 270.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1. London, 1942, pp. 204-205.

[2] 見本書第九篇。

[3] 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 1985.

[4] H. B. Dewing, tr.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New York, 1914.

[5] 夏鼐“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銀幣”,《考古學報》1974年第1期，pp. 91-110。

[6] 見《魏書·高車傳》。括弧内的字據《通典·邊防一三·北狄四》補正，說見“高車王·彌俄突に下した北魏·宣武帝の詔——その脫字補充に至る牛步の考と師の示教——”,《季刊東西交涉》3～4（1984年），冬の號，pp. 47-49。

[7] 参見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年，pp. 213-219。

[8]《魏書·西域傳》載嚈噠於“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洛陽伽藍記》卷五稱師子乃波斯所獻。

[9]《魏書·高湖傳》載高吞曾“與叔徽俱使西域”。

[10]《梁書·裴子野傳》:“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另參見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考 1-2”,《史學雜誌》48～11（1937年），pp. 49-85；48～12（1937年），pp. 37-71。

[11] 此條不見本紀。《梁職貢圖》滑國使臣圖題記作：“天監十五年，國王姓厭帶名夷栗陁始使蒲多達□皾［獻］㚢［延?］賔□㲊名纈杯”。

[12] 所貢之物，《梁書·西北諸戎傳》作：“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

[13]《魏書·肅宗紀》載正光三年（522年）有“不漢”國來朝；“不漢”疑爲“破洛那”之異譯。

[14]《魏書·世宗紀》載永平四年（511年）有“不流沙國”遣使朝獻。“不流沙”很可能便是車多羅即寄多羅月氏當時的都城之名“富樓沙”的異譯。果然，則寄多羅朝魏見諸記載的最後年份爲511年。

[15]《魏書》“本紀”作“舍彌”。

[16]《魏書》"本紀"作"胡密"。《梁書·西北諸戎傳》作"胡蜜丹",載:"普通元年(520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

[17]《魏書》"本紀"又作"槃陀"。《梁書·武帝紀下》載中大同元年(546年)朝梁。

[18]《魏書》"本紀"作"悉居半"、"朱居槃"《魏書·肅宗紀》載神龜元年(518年)有"末久半"國來朝,疑"末"係"悉"或"朱"之訛,"末久半"即"悉居半";說見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九校勘記。又,《梁書·西北諸戎傳》作"周古柯",載:"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

[19]《魏書》"本紀"又作"久末陁"。

[20]《魏書·世宗紀》載景明三年(502年)有"烏稽"國來朝;"烏稽"疑即焉耆。

[21]嚈噠破焉耆事,參見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193-216。

[22]《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等"行紀"載嚈噠疆域之四至有云:"東被于闐。"

[23]朱居、渴槃陀、烏萇三國,《洛陽伽藍記》卷五作朱駒波、漢盤陀、烏場。

九　控制和統治方式

嚈噠控制和統治中亞的方式其實在前文中已多次點明，之所以還要在這裏提出來，是因爲這個問題本身非常重要，值得較全面地加以探討。

在治嚈噠史的過程中，有若干問題一直困擾著研究者。這些問題看起來互不相干，但衹要把它們放到一起，就會發現其間有著某種內在聯繫，從而也就找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

第一個問題，嚈噠和粟特的關係問題。如前所考，粟特在四世紀六十年代已被嚈噠征服，而《魏書》"本紀"卻記載著"粟特"自435—479年間一共九次朝貢，這顯然是一個矛盾。也許正是爲了解決這個矛盾，有學者纔一方面否定《魏書·嚈噠傳》關於嚈噠起源於塞北、經阿爾泰山西徙這一記載的可靠性，一方面把嚈噠佔領粟特的時間推遲到479年以後。[1]其實，不僅粟特，其他被嚈噠征服或落入嚈噠勢力範圍內的小國也有類似的情況。

第二個問題，嚈噠首次入侵笈多帝國的時間問題。根據對笈多時期碑銘的研究，嚈噠對笈多帝國的首次入侵應該發生在塞建

陀笈多卽位之初。但是，據《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宋雲等“行紀”和《魏書》“本紀”可以推知：到477年左右，興都庫什山以南地區尚屬於寄多羅貴霜王朝，這顯然又是一個矛盾。也就是說，既然直到五世紀七十年代末，包括乾陀羅在內的興都庫什山以南地區還沒有被嚈噠并吞，嚈噠人又怎麼可能在五世紀五十年代中就入侵笈多印度？這個問題，被稱爲嚈噠發展史上一大謎。說者竭力否定嚈噠在塞建陀笈多卽位之初入侵印度的可能性，正是因爲覺得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謎。[2]

第三個問題，便是所謂“吐呼羅國”問題。“吐呼羅”亦作“吐火羅”，就是《史記·大宛列傳》所見“大夏”。吐火羅卽大夏人在月氏西徙以前已居住在巴克特里亞卽後來的吐火羅斯坦；吐火羅卽大夏被大月氏征服以後，在歷史上幾乎完全銷聲匿蹟，直到北魏時纔重新作爲一個“國”出現，《魏書·西域傳》且專門爲之立傳。這個吐呼羅國出現的時間至少也要到董琬西使歸國之後。一則，並沒有證據表明有關吐呼羅國的事情傳自董、高。二則，主要是根據董琬報告寫成的《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表明，當時盤踞吐火羅斯坦的是寄多羅月氏人。目前治嚈噠史者都一致認爲嚈噠進入中亞後，以吐火羅斯坦爲中心進行统治；嚈噠首次朝魏就是從該處遣使的。而嚈噠人逐走盤踞吐火羅斯坦的寄多羅月氏人，佔領該地，正是在董琬西使歸國後不久。這就是說，“吐呼羅國”的出現，是在嚈噠佔領吐火羅斯坦之後，豈不令人費解？另外，直到和平五年（464年），《魏書》的朝貢記錄上還出現“吐呼羅”這一名稱，[3]其時嚈噠顯然已在吐火羅斯坦站穩了腳跟。

又該作何解釋?

今案：以上這些矛盾，祇要搞清楚嚈噠控制和統治中亞地區的方式，就一一迎刃而解了。

關於嚈噠控制和統治中亞的方式，曾經身臨其境的宋雲留下的記錄無疑最有權威性。《洛陽伽藍記》卷五載：

> [神龜二年] 十月之初，至嚈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遊軍而治。以氈爲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勑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諸國奉獻，甚饒珍異。

這種方式，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謂“役屬”。質言之，嚈噠自塞北西遷，征服了中亞諸國，但並沒有把這些國家一一消滅，僅僅是强迫他們納貢稱臣。在嚈噠治下或勢力範圍內的小國，依然有自己的國君，有自己的領土，有外交的權利，有信仰的自由，祇是必須向嚈噠統治者進貢，把它們本土的特産和通商所得源源不斷地送到嚈噠統治的中心地區。《洛陽伽藍記》載宋雲一行沿途所經見當時已處於嚈噠勢力範圍之內的于闐、朱居、渴槃陀、烏萇等國的情況，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4]

四世紀六十年代，嚈噠人遷入粟特地區，雖然一開始“殺其王而有其國”，但顯然並沒有完全取代粟特人的政權。也就是說，嚈噠殺死原來的粟特王以後，另立親嚈噠的粟特人爲王。這個粟特王在政治上是嚈噠人的傀儡，卻擁有一定的自治權。435—479 年朝

貢北魏的“粟特”，其實就是這樣一個處於嚈噠監領下的國家。[5]

嚈噠與笈多帝國關係之謎也能因此得到解決。如前所述，寄多羅貴霜即《魏書·西域傳》提到的“小月氏”治下的乾陀羅等地受嚈噠役使，並不等於政權被嚈噠推翻，它依舊能夠以原來的名義朝魏，直至被嚈噠滅亡、立特勤爲王時爲止。在此期間，嚈噠完全有可能假道在它控制下的乾陀羅等地入侵塞建陀笈多治下的印度。至於嚈噠最後消滅乾陀羅的寄多羅貴霜政權，則很可能是由於那裏的寄多羅貴霜人反抗嚈噠人的控制。《隋書·西域傳》載石國“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可以參證。

其他中亞小國的情況也大致與粟特、乾陀羅相仿佛。嚈噠征服它們之後，並沒有消滅土著政權，祇是强迫它們納貢稱臣。也許直至嚈噠滅亡，它們中的大多數始終保持著某種程度的自治。所謂《梁職貢圖》的滑國使臣圖題記稱嚈噠於“所降小國，使其王爲㚢隸”。“爲奴隸”很可能就是臣服的意思；否則，嚈噠人必另立傀儡進行統治。所謂《梁職貢圖》另外三則題記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類傀儡政權同嚈噠的關係，現摘引如下：

周古柯，滑旁小國，普通元年（520年），隨滑使朝貢。

呵跋檀，滑旁小國，普通元年，隨滑使□貢。

胡蜜丹，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朝。其表曰：……今滑使到聖國，同附函啓。

另外，《魏書·世宗紀》載：永平二年（509 年）正月壬辰，“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一”。在“薄知”上冠以“嚈噠”二字，也反映了這種隸屬關係。

上述解決矛盾的方法，對於“吐呼羅國”問題也是完全適用的。《魏書·西域傳》的“吐呼羅國”也是嚈噠人扶植的一個傀儡政權。

扶立傀儡，應該是嚈噠迫使中亞小國受其役使的一個重要手段。雖然迄今爲止還沒有發現直接的資料，上面的論述總的來說也沒有越出推理的範圍，但我們可以從嚈噠控制高車的方式中找到佐證。

據《魏書·高車傳》，高車原來役屬於柔然，也許因爲不堪柔然誅求，其中副伏羅部於 487 年在渠帥阿伏至羅率領下西走，在“前部西北”即今準噶爾盆地一帶獨立建國。阿伏至羅稱“大天子”，以其弟窮奇爲“儲主”，兩人和睦，分部而立，前者在北，後者在南。至遲在六世紀初，嚈噠勢力自西向東發展也到達準噶爾盆地，同新建的高車國發生衝突：[6]

> 窮奇後爲嚈噠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爲主。歲餘，嚈噠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

這是嚈噠首次操縱高車王位的廢立，時在世宗永平元年（508 年）

或稍前。

據《魏書·蠕蠕傳》，柔然可汗醜奴於“熙平元年（516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王彌俄突，殺之”。又據同書“高車傳”：

> 經數年，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

這是嚈噠第二次操縱高車王位的廢立。不難想見，伊匐是嚈噠在納彌俄突時留下作人質的。足見嚈噠操縱高車有一套頗爲周密的計劃，可謂長於此道。

不僅高車，嚈噠甚至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控制波斯。例如：據泰伯里記載，薩珊波斯皇帝伊嗣俟二世身後，二子爭位，次子嗢沒斯獲勝，長子卑路斯避難於嚈噠，得嚈噠王之助，始奪得帝位。嗣後，卑路斯之子居和多一世因故遭波斯貴族廢黜。他越獄投奔嚈噠，嚈噠人與之聯姻，助其復辟。可見嚈噠曾操縱波斯帝位的廢立。[7]

而據《文殊師利根本儀軌》記載，嚈噠王頭羅曼攻佔華氏城後，曾“憑藉鉢羅伽帝阿迭多（Prakatāditya）的正統性”鞏固政權。據考證，這個鉢羅伽帝阿迭多係笈多皇族。[8] 果然，他也可以認爲是嚈噠人扶立的傀儡。

雖然嚈噠同高車、波斯、印度的關係和它同中亞諸國的關係並不完全一樣，但是我認爲衹要對嚈噠本身和當時中亞地區的情況有一個大致的瞭解，就會明白嚈噠採取這種方式的必然性。

嚈噠的興起，主要是乘貴霜帝國崩潰以後中亞四分五裂之機。

但據《魏書·西域傳》，嚈噠有衆不過十萬，以一個人口這麼少的部族，要控制和統治如此遼闊的地區，無論這個地區如何分崩離析，也依然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再者，嚈噠文化十分落後。《洛陽伽藍記》卷五引宋雲等"行紀"載其"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梁書·西北諸戎傳》也載滑國"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與此相對，當時中亞地區文化已相當發達。再加上這個地區民族成份、宗教信仰十分複雜。嚈噠以如此貧乏的文化，如此落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如果完全依靠本部族，要控制和統治中亞地區也是不可思議的。第三，嚈噠統治者雖然握有强大的騎兵，隨時可以鎮壓中亞各地可能出現的反抗和叛亂；《魏書·嚈噠傳》所謂"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恐怕不光是爲了同諸妻相會，主要目的也許在於以兵威彈壓各地。這是適應其遊牧特點創造出來的一種統治方式，宋雲稱之爲"遊軍而治"。但是，必須看到，中亞地形複雜，許多地區並不適宜騎兵馳驅；何況北有柔然、高車，西有薩珊波斯，南有笈多印度，可以說四面受敵。嚈噠本族的騎兵畢竟是有限的，勢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地土著。更重要的是，嚈噠是一個遊牧部族，在當時條件下，它發動征服戰爭的目的，衹能是掠奪農耕區和爭奪商道霸權。因此，嚈噠人通過操縱王位廢立，扶植傀儡之類方式或手段控制和統治中亞，應該說不僅是當時中亞的客觀環境，也是嚈噠本身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同上述客觀環境和經濟基礎所制約的嚈噠統治者的主觀意願也是相符合的，因而是必然的。

當然，我並不認爲嚈噠人的國家如果能夠足夠長期地存在下去，將會永遠採用這種間接的方式來控制和統治中亞。嚈噠從"居無城郭"發展到定都拔底延，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統治方式開始轉變的蹟像。但是由於這樣的轉變畢竟沒有在歷史上出現，似乎也就沒有必要去進一步探討上述方式將在什麼條件下發生變化以及怎樣變化等問題。

在此，我覺得應該指出的是：搞清楚遊牧部族嚈噠控制和統治中亞的方式，不僅是治嚈噠史所必需，而且在研究匈奴、柔然、突厥等遊牧部族對中亞的控制和統治方式時不無參考價值，而廣泛地研究遊牧部族對被征服民族和地區的控制和統治方式，對於探索歷史上遊牧部族社會經濟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則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與上述控制和統治方式的討論有聯繫的是嚈噠的都城問題。最早記載嚈噠都城的應爲《周書·異域傳下》：

> 嚈噠國……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

和《隋書·西域傳》：

>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

然而，如所週知，嚈噠是一個遊牧部族，初起時並無都城可言。《魏書·西域傳》明載其“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梁書·西北諸戎傳》也載滑國“無城郭，氈屋爲居”。這種情況在嚈噠人遷入中亞後很長一段時期内仍無變化。據上引宋雲“行紀”，可知至少到六世紀二十年代末，嚈噠人依舊“遊軍而治”，還談不上有自己的都城。

可是，據彌南（Menander）[9]記載，568年突厥首次遣使拜占庭，查士丁尼皇帝詢及嚈噠所居爲城爲鄉時，突厥使臣答：“其民居有城郭”。（10.1: Exc. de Leg. Gent. 7）其民既有城郭，其王終究也會有都城，遊牧部族進入農耕區後，難免逐步走向定居，嚈噠也不例外。不過，嚈噠有都城，最早也要到六世紀二十年代以後了。

以上所述，史學界大概没有什麽異議。問題在於這個嚈噠都城拔底延究竟在什麽地方。最有影響的有兩説：Balkh[10]與Warwālīz[11]。兹將兩説要點概括如下：

前説以爲：《魏書》云，嚈噠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西域記》卷一云，縛喝國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均稱王舍城，又均在河南，則縛喝與拔底延必爲一城。此城今尚稱縛喝（Balkh），波斯人所名；昔時希臘人稱爲縛脱拉（Bactra），中國所謂大夏是也。拔底延蓋縛脱拉之訛，蓋由拉（ra）訛爲那，又由那爲延，更爲野；此例不少。然則此傳稱縛底耶，《唐書》作縛底野，皆縛脱拉之訛也。

後説則以爲：拔底延卽《魏書·西域傳》所載吐呼羅國的“薄

提城"，與 Balkh 並非一地。據載：

>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應爲南）至范陽國，西（應爲北）至悉萬斤國（Samarkend），中間相去二千里；南（應爲東）至連山（帕米爾），不知名；北（應爲西）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國中有薄提城（Balkh），周帀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應爲濮）樓河（阿姆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原文所載方位有誤，均經前人糾正；[12] 這些考證絕大部份是正確的，唯一的錯誤是指"薄提"爲 Balkh：

1. 當時 Balkh 還是大月氏王寄多羅的都城，即《魏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而在寄多羅放棄 Balkh 之後，巴克特里亞全土又落入嚈噠人的勢力範圍，故不可能是吐呼羅國的都城。

2. 薄提城在阿姆河（Oxus）之北，而 Balkh 在阿姆河之南；兩者顯非一地。

3.《魏書·西域傳》載"盧監氏城"（Balkh）去代 14500 里，又載"薄提城"去代 12000 里，方位不同。

4. 在《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西戎七》中，"薄提"和"(藍)[監] 氏"是作爲兩個不同的城列舉的。

5.《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西戎七》載"薄提"也作"薄底延"，與 Balkh 對音不合。

由此可見，薄提是位於阿姆河的大支流昆都斯（Kunduz）河北的大城市 Warwālīz，亦即《新唐書·地理志》的阿緩城。由於貴霜帝國衰落，被貴霜征服的大夏即吐呼羅人獲得了解放，終於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在《魏書》中出現，薄提也就成了吐呼羅國的都城。但不久以後，這個獨立的吐呼羅國又被嚈噠征服，於是吐呼羅這一名稱又在中國史籍中消失，薄提遂變爲嚈噠的都城，即《周書》的拔底延。指薄提爲拔底延是因爲：

1. 薄提亦作薄提延，與拔底延名稱相同，都是波斯語 padiyan 的音譯，意爲“王城”。

2. 城的周長相同。

3. 去中國距離相同。《周書》載拔底延去長安 10100 里，加上長安去代 1900 里，正好等於《魏書》所載薄提去代 12000 里。

嚈噠以薄提即拔底延爲都城，標誌着遊牧生活從此結束，從六世紀初開始以“嚈噠”或“滑”（即 Warwālīz 的縮譯）的名義朝貢中國，在《魏書》和《梁書》中頻頻出現。至於《隋書》所謂“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則可以理解爲嚈噠曾以 Balkh 爲第二都城，而且這種情況從六世紀初一直繼續到嚈噠被征服，成爲突厥監領下小國之時。

下面是我的看法：

第一，拔底延應即 Balkh：

1. 指 Balkh 的古稱有兩個系列：[13]

A. Av. Bāχδī-; O.Pers. Baχtri-(Baχtriš, Bāχtriyā); Elam. ba-ak-

ši-iš, ba-ik-tur-ri-iš; Akk. ba-aḫ-tar; Gr. Βακτρα; MP. Bāχdiyā.

B. Skt. Bāhlīka, Bāhūlaka, Bāhlī; Mid. Pers. Baχl, Balχ; Arm. Balχ, Bahl, Baχl, Baht; Syriac. Bhl, Bahl; Arab-Pers. Baχl; Christian Sogd. Bhl; Kushano-Sasanian and Hephth. Baχlo; Gr. Παχλ; Tib. Bag-la.

《魏書·西域傳》的“薄提”、《新唐書·地理志七下》的“縛叱［吒］”等，都是Bāχδī的音譯。《周書·異域傳下》的“拔底延”、《往五天竺國傳》“吐火羅國條”的“縛底耶”[14]、《新唐書·西域傳下》“謝颶條”所載“縛底野”，都是Baχtri（Bāχtriyā）的音譯；屬於以上第一系列。《正法念處經》（卷六九）的“婆佉羅”[15]、《續高僧傳》（卷二）的“薄佉羅”[16]、《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的“縛渴羅”[17]，都是Bāhūla[ka]的音譯；《大唐西域記》（卷一）、《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的“縛喝”[18]，都是Bāhū[laka]的音譯；屬於以上第二系列。由此可見，不能認爲拔底延與Balkh對音不合。

2.《大唐西域記》（卷一）載縛喝（Balkh）有“小王舍城”之稱，與《周書·異域傳》所載拔底延“蓋王舍城也”相合。[19]

3.《周書·異域傳下》雖未載拔底延方位，但《隋書·西域傳》所載可以作爲補充，也就是説，兩傳所載實爲同一都城。一則兩傳皆載其城“方十餘里”。二則《周書·異域傳下》稱其城爲“王舍城”，《隋書·西域傳》載其城“多寺塔，皆飾以金”，名副其實。由此可見，位於“烏滸水南二百餘里”的正是拔底延卽Balkh。

第二，薄提即拔底延：

1. 去中國距離相等。

2. 城周長大致相同。

3. 薄提是 Bāχδī 的音譯，拔底延是 Bāχtriyā 的音譯，同屬第一系列。

第三，薄提即 Balkh：

1. 薄提即屬第一系列，Balkh 屬第二系列，故不能指爲對音不合。

2. 上引《魏書·西域傳》所列吐呼羅國諸地名方位皆誤，完全有理由認爲"城南有西流大水"句中"城南"亦係"城北"之誤，故不能指爲位置不合。

3.《魏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去代 14500 里，是根據《漢書·西域傳》所載監氏城去長安的 12600 里，加上長安去代 1900 里推算出來的，並非當時實測所得。據考證，《魏書·西域傳》中類似的里程推算方法還見於車師、且彌、烏孫、悦般、破洛那、者舌、粟特、疏勒等。[20] 漢與北魏兩代測算萬里之外地點的距離不可能没有誤差，故不能指爲去中國距離不合。

4.《魏書·西域傳》所謂"吐呼羅國"，如前所述，在 437 年以前即寄多羅月氏盤踞 Balkh 時尚未出現；因此並非如論者所說，在貴霜衰落後已經獨立。[21] 又，和平五年（464 年）"吐呼羅國"還在北魏的朝貢記録上出現，其時巴克特里亞全土早已處在嚈噠治下，因此亦非如說者所言，在嚈噠人侵巴克特里亞時爲嚈噠所滅。《魏書·西域傳》的"吐呼羅國"，應該是嚈噠人在逐走寄多羅月氏人後，在 Balkh 扶立的一個由吐火羅人組成的傀儡政權。因

此，不能指爲與史實不合。

另外，這個“吐呼羅國”雖然在《魏書》的朝貢記録中僅出現一次，又不見於《周書》，但未必在464年以後不復存在。也就是説，《隋書·西域傳》中出現的“吐火羅國”，和《魏書·西域傳》的“吐呼羅國”性質相同，都是傀儡政權，不過前者的宗主國已不再是嚈噠，而變成突厥了。《隋書·西域傳》載：

>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

“與挹怛雜居”，可謂得其真相。這種情況由來已久，並非嚈噠亡後纔如此。因而，這個方僅二里的所謂吐火羅國“都城”，很可能也在巴克特里亞，是突厥人爲“勝兵者十萬”的吐火羅人特闢的一個自治中心。

5.《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西戎七》視“薄提”與“監氏”爲兩城，不足爲據。樂史係宋人，年代相去已遠。

第四，薄提（薄提延）卽拔底延並非阿緩城（Warwālīz）：

1. 對音不合。

2. 阿緩城素無“王舍城”之稱。

3.“王舍城”與一般的“王城”不同。“王舍城”是梵語Rajagrîha或Râjagaha的義譯，而不能認爲是波斯語padiyan的義譯；而如果音譯的話，應如《增一阿含經》（卷三）譯作“羅閲”[22]或如《翻譯名義集》（卷三）譯作“羅閲祇伽羅”[23]，不可能是“薄

提延”或“拔底延”。何況 Warwālīz 在嚈噠滅亡之前從未有過成爲“王城”的記録。

第五，阿緩城不是吐火羅人的都城：

1. 如前所説，吐火羅卽大夏，而據《史記·大宛列傳》：

>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Oxus）南……其都曰藍市城。

一般認爲“藍市”卽《漢書·西域傳》的“監氏”，均指 Balkh，故吐火羅人的活動中心自古以來就在阿姆河南的 Balkh，没有證據足以證明他們後來把活動中心遷到了 Warwālīz。

2. 正如説者指出，唐初以阿緩城爲都城的所謂“吐火羅國”，實際上是建立在吐火羅人和月氏貴霜人之上的一個突厥系王朝。换言之，並不是吐火羅人自己建立的王國，甚至連傀儡政權都不是。因此，根本談不上吐火羅人以阿緩城爲都城。[24]

3. Aboulféda《地理誌》所云：“Warwālīz 者，吐火羅（Tokhāristān）都城也，舊爲嚈噠國（Hayâtilah）。”（II, 2）[25] 所謂“吐火羅”，乃指上述突厥人建立的吐火羅國，與《魏書·西域傳》的“吐呼羅國”、《隋書·西域傳》的“吐火羅國”不可混爲一談。所謂“舊爲嚈噠國”，也許不過是説 Warwālīz 一地，過去曾是嚈噠的領土，並没有説嚈噠曾建都於該處。

第六，阿緩城並不是嚈噠的都城。基於以上考證，對此衹要指出一點就足够了，亦卽不能認爲嚈噠的另一名稱“滑”是

Warwālīz的縮譯。[26]因爲“滑國”在516年首次朝梁時還没有都城，《梁書·西北諸戎傳》也明載滑國“無城郭”。遊牧部族的族名或國號有許多來源，但幾乎没有一個是得自都城名稱的。

要之，嚈噠如果定都，當在520年以後，其地衹能是Balkh。

■ 注释

[1] 榎一雄“エフタル民族の人種論について”,《東方學》29(1965年),pp. 1-29。

[2] 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0～3（1958年），pp. 1-52。

[3] 参見本書第八篇。

[4] 参見本書第七篇。

[5] 参見本書第二篇。

[6]《魏書·世宗紀》載，正始四年（507年）十二月甲子，“蠕蠕高車民他莫孤率部來降”。“蠕蠕”二字之後可能奪脱其部帥之名。果然，結合同書“高車傳”關於窮奇被殺後“其衆分散，或來奔附”的記載，或可斷嚈噠殺窮奇的年代爲正始四年或稍前。

[7] T. Nöldecke, *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zur Zeit der Sasaniden, aus arabischen Chronik des Tabari*. Leyden, 1879, p. 115.

[8] U. Thakur, *The Hūṇas in India*. Varanasi, 1967, pp. 123-124. *Mañju-śrī-mūlakalpa*, 見 Kashi-Prasad Jayaswal, *An Imperial History of India in a Sanscrit Text (c. 700 BC – c. 770 AD)*. Lahore: Motilal Banarsi Dass, 1934, p. 51。

[9] 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 1985.

[10]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釋》，北京，1910 年，pp. 55-56。馮承鈞説略同，見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58 年，p. 198, n. 5。

[11] 內田吟風"吐火羅（Tukhāra）國史考"，《東方學會創立 25 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72 年，pp. 91-110。以下所引該氏説均出此篇。又，岑仲勉説略同，見"嚈噠國都考"，《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 年，pp. 202-207。

[12] J. Markwart,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pp. 33-39.

[13] 參見 H. W. Bailey, "Kanaiṣ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p. 14-28, 以及注 2 所引榎一雄文。

[14] 注 10 所引藤田氏書，p. 56。

[15]《大正新脩大藏經》T17, No. 721, p. 411。

[16]《大正新脩大藏經》T50, No. 2060, p. 435。

[17]《大正新脩大藏經》T51, No. 2066, p. 2。

[18]《大正新脩大藏經》T50, No. 2053, p. 228。

[19] 注 10 所引藤田氏書，p. 55。

[20]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 年，pp. 178-204。

[21] 吐火羅亦作"兜佉羅"或"兜佉勒"，二者在四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史

籍中已經出現。這可能是貴霜衰落後吐火羅人曾一度獨立的緣故；不過這個吐火羅人的政權後來被寄多羅月氏所征服，因此董琬西使但聞月氏，不知有吐火羅。然而更可能是“兜佉羅”等僅用作族名，並非國名。

[22]《大正新脩大藏經》T2, No. 125, p. 558。

[23]《大正新脩大藏經》T54, No. 2131, p. 1097。

[24] 注 11 所引内田氏文。

[25] J. T. Reinaud, tr. *Géographie d'Aboulfeda*. Paris, 1848, II, 2, p. 207; E.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Paris, 1903, p. 155, n. 4.

[26] 参見本書第一篇。

一〇　宗教

在海路開闢以前，中亞地區一直是東西交通的必由之途，因而也成了各種宗教傳播的渠道。嚈噠人進入中亞後，勢必受到當地流行宗教的影響。它的侵略和征服對當時各種宗教的發展也一定起過作用，可惜的是有關資料十分缺乏，無法進行全面的研究，衹能有重點地作一些探討。

1. 祆教和基督教

嚈噠人最初的信仰，今天已無蹟可尋，衹知道他們來到阿姆河流域後，開始接受祆教，文獻記載以《洛陽伽藍記》卷五所引宋雲等“行紀”爲最早：

> 十月之初，至嚈噠國。……四夷之中，最爲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

所事外神爲何，宋雲雖未明言，《梁書·西北諸戎傳》卻提供了線索：

滑國……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

很可能，嚈噠人所事天神則祆教的宇宙創造神 Ahuā Mazdā；[1] 而所謂事火神，則顯然是祆教特有的拜火儀式，但必須指出，嚈噠人的喪葬習俗與正統祆教徒不同，後者務將屍體剖陳山頭，以委鷹鷲，而《梁書·西北諸戎傳》卻載滑國人：

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則吉。

應該是保持了原來的風俗，這也說明嚈噠人最初並不是祆教徒。

有證據表明，不僅留居中亞的嚈噠人接受了祆教，而且侵入西北次大陸的嚈噠人也繼續保持著這種信仰。

屬於頭羅曼的一些銀幣的正面圖案是一個騎馬人，反面是拜火祭台，以及用希臘字母拼寫的“沙希、葉護”字樣。一般認爲這些銀幣頒發於入侵笈多印度之前。[2] 頭羅曼所頒發的銅幣的特殊標誌是日輪，在旁遮普以及薩特累季與耶母那兩河之間發現的小銅幣的款式均是太陽。[3] 他在木爾坦修建過一座太陽神廟，[4] 還給自己的兒子取名爲 Mihirakula（意爲“太陽花”）。[5] 由此可見，在五世紀末，隨著嚈噠人的擴張，西北次大陸尤其是乾陀羅，旁遮普等地有過一次規模較大的祆教勢力的滲人。

除祆教外，嚈噠進入中亞後，似乎還受到基督教，主要是聶斯脫里派（景教）的影響，在時間上當晚於祆教。

據敍利亞文寫的《阿巴大師傳記》（History of Mār Ab̲bā），

大約在 549 年，Mār Aḇbā 曾任命一位牧師爲嚈噠統治區內該教主教。[6] 又據拜占庭史家忒俄費拉克圖斯·西摩卡塔斯[7] 記載，“叛逆者” Bahrām Čōbīn 軍隊中的嚈噠人前額戴有十字。(V, 10,15) 這也是早期基督教特别是景教向東方發展的重要線索。[8]

2. 婆羅門教和耆那教

上述頭羅曼的情況表明進入北次大陸的嚈噠人仍然信仰祆教。但是，必須看到他們已經開始受到婆羅門教諸教派的影響。

頭羅曼的埃蘭銘文提到了毗濕奴神的 Varāha（豬）的化身，稱頌它用强有力的嘴拱得地動山搖。[9] 他頒發的“騎馬者”型銀幣的正面，和吉祥天女型銅幣上均有毗濕奴神的輪寶和法螺。[10] 他頒發的半德拉克姆扇尾孔雀型銅幣顯示出崇拜戰神伽提凱耶（Kārttikeya）——濕婆之子的標記，因爲在印度神話中，孔雀是這位戰神的坐騎。[11]

這種影響到了摩醯邏矩羅時期似乎有所加深。摩醯邏矩羅頒發的薩珊人半身像型銀幣和銅幣的錢銘是“祝摩醯邏矩羅戰無不勝”(Jayatu Mihirakula) 和“祝牛旗戰無不勝”（Jayatu Vṛṣadhvaja）；正面印有公牛旗標。公牛正是濕婆崇拜的象徵。[12] 在旁遮普和拉賈斯坦發現的摩醯邏矩羅頒發的小銅幣上，正面是國王頭像及其名字，反面是一頭瘤牛，題銘爲“祝牛常勝”（Jayatu Vṛṣa）。有的銅幣在公牛背上有一彎新月，這也是濕婆崇拜的標記。[13] 此外，他的瓜廖爾銘文稱他“從未中斷祀奉波輸鉢底（Paśupati，獸主卽濕婆）。[14] 耶輪陀曼的未標明年代的曼達索爾銘文也稱摩醯邏矩羅“除了濕婆外從未向任何神祇低頭”。[15] 這些證

據似乎說明摩醯邏矩羅已成爲一個熱誠的濕婆信徒。

不過，在摩醯邏矩羅頒發的“騎馬者”型和君王立像型銅幣的背面還可以看到手持蓮花環的吉祥天女；[16] 在他頒發的薩珊人型半身像型銀幣的反面仍印有拜火祭台；[17] 在拉瓦爾品第和克什米爾發現的銅幣上，除了公牛標識外，還印有一個八道光芒的太陽；[18] 他的瓜廖爾銘文也提到他資助太陽神廟的修建。[19] 這一切和他的濕婆崇拜相比，可以說衹佔次要的地位。

將上述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的情況結合起來，可以看到進入次大陸的嚈噠人宗教信仰的變化。正如嚈噠人信仰祆教是同中亞各族同化的反映，侵入次大陸的嚈噠人信仰毗濕奴或濕婆也是同次大陸各族同化的反映。

宋雲等“行紀”載渴槃陀國、烏萇國種種婆羅門教蹟與傳說，且載宋雲因“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則可見嚈噠時代婆羅門教對中亞內地影響之一斑。

似乎沒有發現足以說明頭羅曼和耆那教關係的直接、可靠的資料。耆那教學者烏迪呾那·室利（Udyotana Sūri）在完成於777/8年的《藍蓮華鬘》（Kuvalayamālā）一書中提到，頭羅曼有一位名叫訶里笈多（Harigupta）的宗教教師；[20] 但顯然難以據此推斷頭羅曼對耆那教的態度。

一些學者認爲摩醯邏矩羅是耆那教的迫害者，但同樣缺少確鑿的證據。學者們往往徵引笈那跋陀羅《嗢呾羅往世書》中有關迦勒佉羅闍（Kalkīrāja）的一則記載。據說，迦勒佉羅闍下令，

“每天中午第一個給尼健多人（Nirgranthas）的耆那教團體佈施食物的善男信女必須繳納一筆稅。而信耆那教的尼健多人按教規每天祇在中午吃一頓飯；如果在中午發生什麽麻煩，就必須到次日中午纔能進食。因此這位暴君的命令有使他們餓死的危險。這種情況是無法忍受的。於是，有一魔鬼現形，用霹靂殺死了這個暴君，接著他就墮入羅帝那鉢羅跋（Ratnaprabhā）地獄，受盡痛苦之煎熬，永世不復”。（ch. 76）[21] 但是，很難認爲迦勒佉羅闍便是Hūṇa 卽嚈噠王摩醯邏矩羅；因此，我們不能得出摩醯邏矩羅迫害耆那教，和耆那教在嚈噠入侵北次大陸期間發展受挫之類結論。[22]

3. 佛教

根據上引宋雲等的記載，可以確知嚈噠人“不信佛法”。但是，歷來認爲嚈噠興起乃中亞佛教之一劫之說卻是不能成立的。在嚈噠統治中亞期間，佛教顯然繼續存在，甚或還有所發展。

宋雲途經諸地雖然當時多已役屬嚈噠，然記于闐則曰：

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

記朱駒波則曰：

食則麵麥，不立屠煞。食肉者以自死肉。

儘管沒有提到與佛教有關的內容，但從這些習俗、風尚中仍可以看到佛教信仰存在的痕蹟。

烏塲的情況更清楚：

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即面東合掌，遙心頂禮。

城外則浮圖高大，教蹟遍佈，比丘們戒行精苦，風範堪敬。

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乾陀羅，宋雲記當時統治該地的嚈噠王：

立性兇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

可是該地佛教似乎還未到十分衰敗的地步。儘管嚈噠“治國以來，已經二世”,不僅國中人民猶“崇奉佛教,好讀經典”,而且所到之處，“亦有塔寺”，屢見僧徒。尤其是屬城佛沙伏（Varṣapura）：

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

僧徒既衆，伽藍、窣堵波亦多，如記伽膩色迦所建雀離浮圖：

塔内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

遠來取經人，見此風貌，當堪自慰。

《魏書·西域傳》也談到當時已役屬嚈噠的朱居、渴槃陀、烏萇等國依然“事佛”。《隋書·西域傳》則記吐火羅人“與悒怛雜居。……其俗奉佛”。可見“雜居”與“奉佛”並不牴牾。同傳還載嚈噠的都城“多寺塔，皆飾以金”。

此外，尚有疏勒等地的情況可間接推知：

據《魏書·西域傳》，高宗末（465年），疏勒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據《續高僧傳·達摩笈多傳》（卷二），約585年，南天竺僧達磨笈多（Dharmagupta）來華時，途經疏勒，停在王寺，“經住兩載，仍爲彼僧講說破論，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又爲講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23]據《大唐西域記》卷一二，644年玄奘途經疏勒時，記該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玄奘時代僧徒多達萬餘，很難設想曾出現過一個較長的中衰期。

囿於資料，不能把嚈噠勢力所及地區佛教的盛衰情況一一搞清楚，但似乎已經可以斷定，在嚈噠統治期間，中亞的佛教並沒有出現顯著衰落。質言之，嚈噠人並不打擊、迫害佛教。

不僅如此，頭羅曼的庫臘銘文記載他曾對一所佛寺進行捐贈，以求降福於國王及王室，[24]則甚至說明嚈噠統治者還資助過佛教。

論者每引玄奘和迦羅那關於摩醯邏矩羅的記載證明嚈噠滅佛。然而，正如前文所考，他們所載摩醯邏矩羅和嚈噠王摩醯邏矩羅並非一人，不能作爲嚈噠滅佛的依據。[25]

可是，據《大唐西域記》卷二，630年玄奘途經乾陀羅時，佛教的敗落景像十分觸目：

多敬異道，少信正法。……僧伽藍十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波，頗多隤圮，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他記雀離佛塔之西，伽膩色迦王伽藍說：

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雖則圮毀，尚曰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

又記布色羯羅伐底（Puṣkalāvatī）城北故伽藍說：

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

同佛教衰微相對，所謂外道頗有發展：

跋虜沙（Paluṣa）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Mahesvara）像，毗摩天女（Bhimā）也。聞諸土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Pāśupata）外道式修祠祀。

又記布色羯羅伐底“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看來最顯赫的還是濕婆。

一般認爲，這是嚈噠人統治的結果。然而應該看到，即使在佛教最爲流行的時期，在整個北次大陸，包括乾陀羅、克什米爾，人們仍然沒有忘記崇拜昔日婆羅門教諸神祇。自公元二世紀起，隨著梵語的轉播和推廣，該教在社會上已經有了顯著的地位。公元三世紀，古吉拉特和蘇拉斯特拉的州長們都大力推崇這一宗教；而到了四五世紀時，由於笈多皇室的支援，該教進一步發揚光大。雖然笈多王朝並不歧視其他宗教，但佛教還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起而代之的是對婆羅門教諸神祇，如濕婆、毗濕奴的崇拜。[26] 翻開《大唐西域記》，不難發現玄奘有關“五印度”的記錄中“天祠”、“異道”不絕於書，決不限於乾陀羅一地，亦可見佛教之衰落自有更深刻的原因，而與嚈噠人無涉。

至於中亞各地的佛教，玄奘時代同法顯時代相比，亦出現不同程度的衰落，當也有複雜的背景，其中許多原因尚爲我們所不知，這正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

最後，略述嚈噠征服西北次大陸與乾陀羅藝術的關係。

從亞歷山大和塞琉古時代起，乾陀羅就一直是希臘人的移居之地，受希臘文化影響很深。佛教傳入後，希臘藝術的形式自然被應用到佛教的主題上去，於是產生了一種特殊的佛教藝術，一般稱爲希臘佛教藝術或乾陀羅藝術。這種藝術最繁榮的時期是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二世紀，亦即貴霜王朝統治的極盛時期，一度對北次大陸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嗣後，它的影響逐步縮小。

笈多王朝政治上的穩定、經濟上的繁榮，導致了文化藝術的發達，建築、繪畫、雕刻都採取了新的形式。這種形式是古印度傳統藝術形式的繼承和發展，至公元四至五世紀時漸趨成熟，完成了從希臘式向印度式的過渡，最典型的例子是馬土臘和薩拉那特即鹿野苑的佛像雕塑。這種形式且反過來影響了乾陀羅地區；故乾陀羅藝術可分爲前後兩期，前期以石雕爲主，希臘影響非常明顯，後期以泥塑爲主，印度風格比較濃厚。嚈噠人在五世紀中入侵乾陀羅時，希臘佛教藝術風行的年代早已過去。有的學者認爲希臘佛教藝術乃毁於嚈噠人之手，或把嚈噠人的入侵看作乾陀羅地區佛教藝術形式更替的關鍵，似乎都不符合實際。[27]

■ 注释

[1] 此“天神”究係何神，不易確定。蓋北方遊牧部族多事“天神”。如《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人於“歲正月，諸小長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又，《北史·突厥傳》載突厥人於“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北史·蠕蠕傳》亦載女巫地萬爲醜奴可汗“齋潔七日，祈請天神”。他如烏桓、鮮卑等大致相同，不具引。案：此處“天神”與“火神”並列，故疑指祆教之神。

[2]U. Thakur, *The Hūṇas in India*. Varanasi, 1967, p. 282.

[3]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p. 284-285。

[4]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 262。

[5]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 262。

[6] A. Mingan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A New Document." *Bulletin of the John-Rylands-Library Manchester* 9~1 (1925), 297-371, esp. 304-305.

[7] Michael and Mary Whitby,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of Simocatta: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8] F. Altheim, *Geschchte der Hunnen*. Berlin, III, 1975, pp. 104-105.

[9] J. F. Fleet,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3, Inscriptions of the Early Gupta Kings and their Successors, No. 36, Calcutta, 1888.

[10]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 261。

[11]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 264。

[12]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p. 264-265。

[13]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 265。

[14] 注 9 所引 J. F. Fleet 書，No. 37。

[15] 注 9 所引 J. F. Fleet 書，No. 33。

[16]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p. 264-265。

[17]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p. 264-265。

[18]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p. 264-265。

[19] 注 9 所引 J. F. Fleet 書，No. 37。

[20] A. N. Upadhye, ed. *Udyotana Sūri*, *Kuvalayamālā*. Bombay, 1959. 引自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p. 108-111。

[21] Guṇabhadra, *Uttra Purāṇa*. Palm-leaf Extracts in Bhandarkar Comm, Poona, 1917, pp. 219-221; 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p. 268-269。

[22] 參看注 2 所引 U. Thakur 書，pp. 267-269。

[23]《大正新脩大藏經》T50, No. 2060, p. 435。

[24] G. Bühler, "The New Inscription of Toramana Shaha." *Epigraphia India* I (1892): pp. 238-241.

[25] 參見本書第六篇。

[26] V. A. 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1924 pp. 318-320.

[27] 參看格魯塞《印度的文明》（R. Grousset, *The Civilization of Indi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Catherine Alison Phillips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Alfred A. Knopf, 1939.），常任俠譯，商務印書館，1965 年，pp. 49-60。

一一 《魏書·西域傳》“嚈噠國條”原文考釋

如所週知，魏收原著《魏書·西域傳》已於唐宋間亡佚。今本《魏書·西域傳》乃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劉恕等人整理殘缺的《魏書》時，據《北史·西域傳》補入者。《北史》成自唐李延壽之手，主要取材於魏、齊、周、隋各代正史，其中“西域傳”也不例外。爲了恢復《魏書·西域傳》的本來面貌，學者們作了不少研究，成績頗爲可觀。[1] 他們採取的方法大致相同，即將《北史·西域傳》和《周書·異域傳下》、《隋書·西域傳》各有關部份進行對比，剔除《北史》中抄自《周書》、《隋書》兩者的部份。但推理過程並不一致，結論也有差別。在此，我也採取他們使用過的方法，將三傳中有關嚈噠的部份進行對比，以期在考定《魏書·西域傳》這部份原文的基礎上，對所傳嚈噠史實作出較切合實際的詮釋。爲節省篇幅，凡採納上述諸家意見，恕不一一注明；相異之處，亦大抵申述己見而已，不多加辨析。

茲先照錄三傳有關嚈噠部份字句於下：[2]

《北史·西域傳》“嚈噠國條”：“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

曰高車之别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内。其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絶。至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周書·異域傳下》“嚈噠國條”：“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畧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其人兇悍，能戰鬬。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

屬之。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竝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

《隋書·西域傳》"挹怛國條"："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是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强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考釋】

1. "大月氏之種類也"一句，係《北史》抄自《周書》，原本《魏書》所無，因爲下文又說"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而《史記》、《漢書》等書並無大月氏與塞北、金山關係之記載。蓋北周以降，對於嚈噠人的真正起源已日趨模糊，衹知嚈噠的統治中心原來是貴霜帝國的發祥地，而這個貴霜帝國，中國一直"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後漢書·西域傳》)，因此誤以爲嚈噠是"大月氏種類"。

2. "亦曰高車之別種"至"自金山而南"三句，係《魏書》原文，唯"亦曰"兩字爲《北史》編者所加。按之《魏書》"本紀"，嚈噠遣使北魏至少一十三次，北魏正式遣使也有二次，往來頻繁，彼此一定有較深的瞭解；且《魏書》修成於北齊文宣帝天保二至五年間（551—554年)，其時嚈噠國尚未爲突厥所破；因此，魏收所傳必有依據，關於嚈噠之起源當從《魏書》。

又，"金山而南"句下當據《通典·邊防九·西戎五》補"至

高宗（文成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十字。據《魏書》“本紀”，嚈噠首次遣使北魏在高宗太安二年（456年）。因此，嚈噠人南遷年代應由456年上溯“八九十年”，約爲366—376年。又，嚈噠人自塞北南遷，首先到達地點應爲“粟特”（索格底亞那）。《魏書·西域傳》載粟特“一名溫那沙，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高宗（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至王忽倪已三世矣”（括號內文字據《通典·邊防九·西戎五》補），此“匈奴”應卽嚈噠。蓋嚈噠人另有一個族號卽“匈奴”，“溫那沙”卽（Hunna-šāh），意謂“匈奴王”。所謂“已三世矣”，一世以三十年計，則嚈噠遷至粟特的年代，可自高宗初（452年）上溯80—90年，約爲362—372年。與《魏書·西域傳》“嚈噠條”所載大體相符。

3.“在于闐之西”一句，係《北史》抄自《周書》，原本《魏書》所無。因爲在《周書》中，“嚈噠傳”緊接在“于闐傳”之後，起承上啓下作用，而置於《魏書》中則顯得突兀。

4.“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一句，係《北史》抄自《隋書》，原本《魏書》所無。因爲這同下文“無城邑”相抵觸。

5.“去長安一萬一百里”至“多寺塔，皆飾以金”數句，均原本《魏書》所無。“多寺塔”以上係《北史》抄自《周書》，以下乃抄自《隋書》。一則，北魏都於代，故里程計算應以代爲基準；而北周都於長安，故里程計算以長安爲基準。二則，嚈噠本一逐水草遷徙的遊牧部族，宋雲一行於神龜二年（519年）抵達該國時，尚見其“居無城郭，遊軍而治”。可以說嚈噠開始定居、建都之日，已接近覆亡之時，故《周書》、《隋書》始見有關其都城之記載。

6.“風俗與突厥略同”一句，係《北史》抄自《周書》，原本《魏書》所無。因爲北魏時突厥尚未興起，不應取來比況。《北史》編者删去《周書》“刑法”兩字，是由於他注意到《魏書》原文對嚈噠的刑法另有說明的緣故。

7.“其俗”以下至“更加帽角焉”數句，係《北史》抄自《周書》原本《魏書》所無。

一則，同下文“分其諸妻”云云相悖。若多夫者僅嚈噠王一人，則《魏書》應另予說明。

二則，據《隋書·西域傳》“吐火羅條”所載，其人“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爲志。生子屬其長兄”；以及《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所載：“其吐火羅國，乃至罽賓國、犯引國、謝颶國等，兄弟十人、五人、三人、兩人共娶一妻、不許各娶一婦，恐破家計”；[3] 可知此風流行甚廣，而其成因主要是經濟的，即所謂“恐破家計”。嚈噠人果有此風，必然會如《隋書》所言，規定“生子屬其長兄”。但這和下文“王位不必傳子”云云，又是矛盾的。質言之，《魏書·嚈噠傳》中不應出現如此矛盾的記載。

由此亦可見，所謂嚈噠人的多夫之俗，其實很可能不過是周、隋時人誤以嚈噠治下土著之風爲嚈噠人固有習俗而已。卽使《周書》、《隋書》有關嚈噠流行多夫之風的記載不誤，也祇能認爲是嚈噠人在進入中亞後所受土著的影響。江山易改，習性難移，嚈噠有衆不過十萬，與都庫什山南北何致於因其統治而變風易俗？

至於宋雲關於嚈噠王妃“頭帶一角”之類記載，至多表明嚈噠人在服飾方面入境隨俗，所載角帽未必和多夫有涉。宋雲對此

隻字未提，當非偶然。何況這位王妃娶自當地土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又，《通典·邊防九·西戎五》關於嚈噠的條目中亦有相同字句，或持以證明上述數句乃《魏書》原文，似有未安。一則，杜佑並沒有爲“嚈噠”立專條，其意或在於將《魏書》、《周書》有關情況合而爲一，故上述數句有可能摘自《周書·異域傳》。二則，杜佑是否能見到完整的《魏書》已不可知，至少不能排除當時《魏書·西域傳》特別是“嚈噠國條”以下已經殘缺的可能性，故《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嚈噠條”有可能摘自《北史·西域傳》。《通典》之文有“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一百里”二句，當出自《周書·異域傳》，可以爲證。

另外，《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載“少女子，兄弟共妻”云云，卽或係梁代的記錄，亦不可援引考訂《魏書》原文。蓋嚈噠朝梁時立國已久，不能排除梁人混淆其人與土著風俗之可能。

案：今本《魏書》“妻戴一角帽”，“妻”上有“其”字；“更加帽角焉”“角”上無“帽”字。

8.“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數句，當爲《魏書》原文。“類”字下應據《通典·邊防九》（卷一九三）補“胡”字。“頭皆翦髮”乃當時伊朗之風。嚈噠自金山南下之遊牧部族，於此亦有所沾染。所謂《梁職貢圖》中滑國使臣圖像正作蓬頭、剪髮。由此可知，“衣服類胡”之“胡”乃指伊朗族；下文其語與“諸胡不同”亦應理解爲嚈噠人的語言與伊朗族不同。

9."衆可有十萬"句當爲《魏書》原文。《隋書》所載"勝兵者五六千人"乃指嚈噠被突厥征服之後、即大業中朝隋時的情況。案：今本《魏書》"可"下無"有"字。

10."無城邑"以下至"皆置塚內"數句，均係《魏書》原文。《周書》、《隋書》不見這類描述，也許是嚈噠人後來漸趨文明，粗獷之態有所改變的緣故。

案："子弟堪者，死便受之"，今本《魏書》"者"作"任"，"受"作"授"。又，"富家"作"富者"。

11."其人凶悍"以下至"皆役屬之"數句，當係《北史》抄自《周書》，原本《魏書》所無。今本《周書·異域傳下》無"康居、沙勒（疏勒）"四字，疑有奪訛。

又，《周書·異域傳下》無康居、疏勒專條，或持以證明上述數句乃《魏書》原文；然而《周書》無專條未必不可能在"嚈噠傳"中提及，例如"安息國條"即稱安息"北與康居"相接，可以爲證。而《魏書》原文若有關於嚈噠疆域之記載，很可能依據宋雲等"行紀"，其字句當近似於："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勑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4]

又，《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嚈噠條"亦有類似字句，當摘自《北史·西域傳》或《周書·異域傳》，說見上文。

12."號爲大國"一句，今本《周書》所無，故有可能是《魏書》原文。

13."與蠕蠕婚姻"一句，係《魏書》原文。《魏書·蠕蠕傳》載，柔然主"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

14.“自太安以後”以下至“朝獻遂絕”數句，均係《魏書》原文。《魏書·孝莊紀》載，永安三年（530年）六月戊午，“嚈噠國獻師子一”。此師子當即正光末（525年）所貢，因醜奴反，路阻，永安三年始抵京師。又據《魏書》“本紀”，嚈噠最後一次朝魏在太昌元年（532年）六月，是年十二月改年號永熙，與傳文合。案：“遣貢師子一”，今本《魏書》“遣”下有“使”字。

15.“至大統十二年”以下至“職貢遂絕”數句，係《北史》抄自《周書》，原本《魏書》所無，亦不見今本《魏書》。朝貢事《周書》“本紀”唯載明帝初元二年（558年）六月一次。突厥破嚈噠見《周書·突厥傳》。

16.“至隋大業中”以下，均係《北史》抄自《隋書》，原本《魏書》所無，前兩句亦不見今本《魏書》。大業（605—618年）中朝貢事，《隋書》“本紀”不載，具體年份不得而知。

又，《周書·宣帝紀》載，武帝宣政元年（578年）十一月，“突厥寇邊，圍酒泉，殺掠吏民”。而《隋書·突厥傳》載開皇三年（583年）詔有云：“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則宣政元年圍攻酒泉者應爲達頭，而《隋書·挹怛傳》所謂“先是國亂”云云，或即此時嚈噠殘部乘機騷動。

案：今本《魏書》“去漕國”句“去”上有“南”字。

綜上所述，《魏書·嚈噠傳》原文可大致釐定如下：

嚈噠國，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至高宗時已八九十年矣]。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

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

■ 注释

[1] 諸家與本題有關的論著爲：内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下）"，《東洋史研究》31～3（1972年）pp. 58-72；K. Enoki,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Ephthalit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18 (1959): pp. 1-58；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學出版部，1970年，pp. 433-442；船木勝馬"エフタルに關する中國史料について"，《史淵》61（1954年），pp. 57-77；請參看。

[2] 均據中華書局標點本。

[3] 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釋》，北京，1910年，p. 70。

[4] 參看余太山"董琬、高明西使考"一文，《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217-244。又，"牒羅"應即 Zabul，嚈噠控制該地當與控制乾陀羅約略同時。

附卷

一　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

（一）嚈噠的族名、族源和族屬

嚈噠的族源一直是東西中亞史學界頗感興趣的問題，異說不下十餘種。中國古史就有高車說、車師說、大月氏說和康居說，西史則有匈人說。自十八世紀中葉起，學者們對此作了大量研究，或附和、推衍康居說以外諸舊說，或另創新說。新說中較有影響的有柔然說、蒙古說、突厥說、伊朗說、悅般說等。近代學者且大多力圖在查明族源的基礎上判定其族屬。但是，正如我在前文中已經指出的，諸說均難以成立。[1]

在批判諸舊說的基礎上，我提出了關於嚈噠族源的新說，卽乙弗鮮卑說。[2] 時至今日，我仍然認爲，相對於其餘諸說，此說的依據最爲充分。但也必須承認，囿於當時的認識水平，有關論述不無疏漏，尤其是未能指出乙弗鮮卑可進一步溯源於高句驪。鑒於嚈噠族源問題不容忽視的重要性，玆重新考證如下。

（一）乙弗爲拓跋鮮卑之一部：

《魏書·官氏志》載："乙弗氏，後改爲乙氏。"乙氏爲拓跋氏"內入諸姓"之一。乙氏當是依附拓跋鮮卑的乙弗。

《魏書·太祖紀》載：登國元年（386年）"五月，護佛侯部帥侯辰、乙弗部帥代題叛走"。由此可知乙弗部附拓跋氏至遲在登國以前。

（二）南涼之西亦有乙弗：

《晉書·禿髮烏孤載記》云："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資治通鑒·晉紀三〇》繫此事於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年）七月。胡注："乙弗、折掘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廉川在湟中。"

又，《晉書·禿髮傉檀載記》云："傉檀議欲西征乙弗……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資治通鑒·晉紀三八》繫此事於晉安帝義熙十年（414年）。

由此可知南涼之西亦有乙弗部。

（三）乙弗與吐谷渾北之乙弗敵國同源：

《魏書·吐谷渾傳》載："吐谷渾北有乙弗（勿）[3]敵國，俗風與吐谷渾同，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又，《通典·邊防六·西戎二》："乙弗敵，後魏聞焉，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其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蘇子。"案：屈海卽青海，吐谷渾之北正當南涼之西。

又，《北史·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傳》載："其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案：《太平御覽》卷一〇四引《後魏書》及《北史·西魏文帝紀》皆稱乙弗后爲乙氏。

由此可知，此乙弗敵國即禿髮氏所討之乙弗。“乙弗”乃“乙弗敵”之省稱。應該指出的是，拓跋氏內部的乙氏未必均來自青海之乙弗敵。[4]

（四）乙弗與乞伏可能是同部别出：

《魏書·官氏志》：“乞扶氏，後改爲扶氏。”《魏書·尒朱榮傳》：“秀容内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這表明拓跋鮮卑有乞扶氏。

“乞扶”亦作“乞伏”。《北齊書·廣寧王孝珩傳》：“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矟刺孝珩墜馬。”“乞扶令和”，《北齊書·張保洛傳》作乞伏令和。《隋書·乞伏慧傳》亦載：“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

《通志·氏族五》引《西秦錄》文字：“乞伏國仁之先如弗與出連、斯引、叱靈三部自漠北出陰山。”《魏書·乞伏國仁傳》亦載：“鮮卑乞伏國仁出於隴西，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兩史均稱乞伏國仁之先爲如弗，可見乞伏氏實即如弗氏。蓋日疑鄰紐、疑見旁紐，“如弗”[njia-piuət]與“乞伏”[kiət-biuək]得視爲同名異譯（[nj→ng→k]）。

乞伏亦作乞佛。《魏書·高宗紀》太安二年條有幷州刺史“乞佛成龍”，《魏書·陸真傳》作“乞伏成龍”，[5]亦可佐證“乞伏”即“如弗”。

“乞扶”、“乞伏”、“乞佛”[kiət-biuət]或“如弗”無疑均得視爲“乙弗”[iet-piuət]之異譯。《魏書·官氏志》既有乙弗氏，又有乞扶氏，應是同部别出之故。

（五）乙弗在高車者史稱泣伏利：

《魏書·高車傳》稱："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二曰吐盧氏……""泣伏利"[kiəp-biuək-liet] 應卽"乙弗敵"[iet-piuət-dək] 之異譯，泣伏利乃依附高車之乙弗部。

《魏書·乞伏保傳》稱："乞伏保，高車部人也"；可知"乞伏"卽"泣伏利"之略譯。[6]

"乞伏"卽"泣伏利"之略譯，"乙弗敵"得視作"泣伏利"之對譯，亦見"乙弗"與"乞伏"乃同名異譯。

（六）乙弗的遷徙過程：

1.《北史·乙弗朗傳》載："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知乙弗可追溯之故地在遼東。

2.《晉書·乞伏國仁載記》載："乞伏國仁（？—388年），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伏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人非神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卽國仁五世祖也。"案：《元和姓纂·七之》（卷二）引《西秦錄》云："乞伏氏與期引氏自漠北出陰山。"《古今姓氏書辯證·五支》（卷三）所引《西秦錄》略同；唯"期引"作"斯引"。既然《晉書·乞伏國仁載記》載乞扶部後來任顯職者有斯引烏埿、出連高胡、叱盧那胡，結合前引《通志·氏族五》所引《西秦錄》

文字，知《晉書·乞伏國仁載記》奪一“引”字，[7]原文應作：“在昔有如弗［與］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8]而“叱盧”與“叱靈”爲同名異譯。

由此可見，《晉書·乞伏國仁載記》所載推託鐸莫何爲統主之“四部”爲如弗、出連、斯引和叱盧。既然後來乞伏部並無姓如弗者，知乞伏與如弗，就名稱而言，其實一而二，二而一。當然，“乞伏”作爲包括如弗等四部在内的部落聯合體之名稱，其内涵又不同於“如弗”。《晉書·乞伏國仁載記》所謂“時又有乞伏部”，客觀上成了上述聯合過程的追述。[9]

又據《晉書·乞伏國仁載記》，祐鄰於“泰始初（265年左右）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10]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埿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埿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旡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案：國仁五世祖祐鄰既爲晉泰始初人，則如弗等自漠北南

出陰山可能在三世紀中葉。司繁降堅，《資治通鑒·晉紀二五》繫於簡文帝咸安元年（371 年）。

3. 乞伏這一部落聯盟在逐步遷徙的過程中，征服了許多別的部落，其勢漸盛，而其種愈雜。這樣一個龐雜的部落集團本來就極不穩固，一旦大敵當前，不戰而潰，也就勢在必然了。正如司繁所謂“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故降於苻堅者衹可能是其中之一部份，其餘必定分道揚鑣，各奔前程，或附拓跋，或投高車。

質言之，依附拓跋氏、遷往吐谷渾之北的乙弗或乙弗敵、以及成爲高車十二姓之一的泣伏利，按之它們在中國史籍出現的年代，很可能主要是與斯引等結成部落聯合體、自漠北南出陰山的如弗卽乙弗人的分支或後裔。

至於據《晉書·乞伏國仁載記》，後來西秦乞伏氏與青海北乙弗敵國兵戎相見，不能視爲兩者異種或異源的證據。

當然，據《魏書·官氏志》，所謂“內入諸姓”，乃“神元皇帝（力微，220—277 年）時，餘部諸姓內入者”。因此，乙弗或乞扶作爲“內入諸姓”依附拓跋的時代有可能在司繁降秦，乃至在如弗與斯引等結爲聯合體之前。[11] 同理，乙弗出現在吐谷渾之北和成爲高車十二姓之一的時間，也存在同樣的可能性。

（七）乙弗可溯源於高句驪：

如前所述，一般認爲乙弗或乞伏是鮮卑種。乙弗氏或乞伏氏均爲拓跋鮮卑內入諸姓，似乎便足以說明這一點。然而有證據表明其人在遼東時可能是高句驪。

1.《元和姓纂·五質》（卷一〇）“乙弗條”稱：“前燕（269—

333 年）有高麗王乙弗利。《後魏書》云，代統部落，太武時乙弗疋隨魏南遷，遂爲河南人，孝文改爲乙氏。……疋之子瓌，定州刺史、西平王。”將高句驪王乙弗利與依附拓跋氏之乙弗作了連貫的敍述。所謂“前燕有高麗王乙弗利”應即《梁書·東夷傳》所載“[高] 句驪王乙弗利”。[12] 果然，則乙弗可溯源於高句驪。[13]

一則，《梁書·東夷傳》等所載高句驪王名“乙弗利”[iet-piuət-liet] 與“乙弗敵”得視爲同名異譯。

二則，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五》（卷一七），“美川王（一云好壤王，300—331 年在位），諱乙弗（或云憂弗）”。[14]“乙弗”或“憂弗”[iu-piuət] 顯然是同名異譯。

三則，據前引《魏書·太祖紀》，登國元年（386 年）五月，有乙弗部帥名代題者叛走。“代題”可能就是《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六》（卷一八）所見廣開土王談德（392—413 年）。

（1）“談德”[dam-tək] 與“代題”[dək-dye] 可以視爲同名異譯。

（2）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六》（卷一八），故國壤王於“三年（386 年）春正月，立王子談德爲太子”。這一年正是《魏書·太祖紀》所載代題“叛走”之年。因立爲太子而急於歸國似乎可以認爲是代題即談德“叛走”的原因。

（3）談德乃美川王乙弗之直系子孫，故所率高句驪部落稱爲乙弗。

由此可見，在高句驪美川王乙弗即位之後，高句驪諸部有一次或數次較大規模的內徙。

2.“乙弗”或“乙弗利”可能是高句驪王族習見的名號。在美

川王乙弗之前，已經有相同名號之王，這就是見諸《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五》（卷一七）的中川王“然弗”。

（1）《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五》（卷一七）：“中川王，諱然弗。”“然弗”[njian-piuət] 與“如弗”[njia-piuət] 堪稱確切對譯。

（2）中川王然弗於公元 248—270 年在位，不僅與拓跋力微在位時間大致相當，而且《西秦錄》或《晉書·乞伏國仁載記》所傳如弗與斯引、出連、叱盧三部從漠北南出陰山的年代恰好落在這位高句驪王的在位時期。這似乎很難說是偶然的。換言之，中國史籍所見乙弗最早可能是在中川王在位時內徙的。

3.《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一》（卷一三），“始祖東明聖王，姓高氏，諱朱蒙（一云鄒牟，一云衆解）。先是，扶餘王解夫婁老無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流淚。王怪之，使人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蛙一作蝸）形。王喜曰：此乃天賚我令胤乎！乃收而養之，名曰金蛙。及其長，立爲太子。”這一以來歷不明“小兒”爲嗣傳說的影子似乎還保存在上引《晉書·乞伏國仁載記》所錄乞伏氏的始祖傳說中。[15] 這也可說明乞伏或乙弗與高句驪的淵源。

要之，至少在中川王然弗和美川王乙弗利在位其間，高句驪人各有一次較大規模的內徙。[16] 以這些內徙高句驪人爲核心形成的鮮卑化部落聯合體在中國史籍中稱爲乞伏或乙弗。

（八）乙弗係雜胡：

乞伏卽乙弗乃由如弗、斯引、出連、叱盧（卽叱靈）四部而成。

出連，一說“本屠各族”。[17] 蓋據《魏書·官氏志》，“出連氏，

後改爲畢氏”，而據《資治通鑒·晉紀二七》，後燕有“屠各畢聰”。案：此說似未安。即使畢聰原姓出連，被稱爲“屠各畢聰”，也可能是其人依附屠各的緣故，未必原來便是屠各。何況屠各本有畢氏亦未可知。又，鮮卑拓跋氏有出連氏，當是後來歸附，不能因此指出連爲鮮卑。

叱盧，或以爲應爲高車種。[18] 案：其說亦有未安。據《魏書·高車傳》，高車十二姓，其二爲吐盧氏。《通典·邊防一三·北狄四》等引此均作“叱盧”，當據以改正。但是，不能因此指叱盧爲高車，高車有叱盧氏不等於叱盧氏便是高車，蓋不能排除高車之叱盧氏乃來自乞伏聯合體之可能性。

今案：據《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稱高句麗“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既然如弗即乙弗可以溯源於高句驪，則“出連”[thjiuət-lian]與“叱盧”[thjiət-la]非常可能是“絕奴”[dziuat-na]與“順奴”[djiuen-na]之對譯。質言之，兩者與如弗同爲高句驪種。

至於斯引，其來源有兩種可能：

a. 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六》（卷一八），美川王乙弗之子故國原王“諱斯由”。“引”[jien]與“由”[jiəu]音近。兩者或者有某種淵源。這就是說斯引可能也是高句驪種。

b. 斯引不見於《魏書·官氏志》，亦不見於乞伏氏之外的部落，又鑒於《元和姓纂·七之》（卷二）所引《西秦錄》“斯引”作“期引”，似乎不能排除“斯引”或“期引”其實皆是“胡引”之誤。上引《魏書·太祖紀》載乙弗與護伏侯部帥侯辰同叛。“侯辰”乃

“胡引”之異譯，“胡引氏”乃以部酋名爲氏。[19] 從依附拓跋氏之乙弗與胡引氏的關係，似亦可證“斯引”實則“胡引”。胡引，據近人考定，“乃羯族也”。[20] 羯多爲西域胡。

如果中國史籍所見乙弗均源自三世紀中葉自遼東西遷漠北的如弗或稍後與胡引等部結成聯合體的乞伏，則當它登上歷史舞臺時已經是一個雜胡。

至於史稱乙弗爲“乙弗鮮卑”（《晉書·乞伏熾磐載記》）、乞伏爲“隴西鮮卑”，則表明這個部落聯合體已經鮮卑化。這個鮮卑化的過程當開始於諸部居遼東時，託鐸莫何稱乞伏可汗則是這種影響逐步加深的標誌。蓋“可汗”一號在中國史籍中首見於鮮卑族。

當然，應該指出的是，《新唐書·東夷傳》載高麗人“祀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乞伏部之可汗號究竟來源如何，尚待進一步研究。

（九）乙弗的源流和遷徙情況果如上述，則不難發現它與嚈噠的淵源。也就是説嚈噠可以溯源於高句驪。

1. 族名

“嚈噠”[iap-dat] 這一族名見諸《魏書·西域傳》等，《梁書·西北諸戎傳》等作“滑”[huət]，《周書·異域傳下》作“嚈噠”[ngian-dat]，《隋書·西域傳》、《新唐書·西域傳下》作“挹怛”[iəp-tat]，《洛陽伽藍記》卷五載宋雲“行紀”作“嚈噠”[xat-dat]，《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引韋節《西蕃記》等作“挹闐”[iəp-dyen]，《酉陽雜俎續集》卷八作“厭達”[iap-dat]，《冊府元龜》又作“厭噠”[iap-dat]（卷九五六）、“悒怛”[iəp-tat]（卷九五八）或“挹達”

[iəp-dat]（卷九九九）等，《續高僧傳·闍那崛多傳》（卷二）作“厭怛”[iap-tat]。[21]

這一名稱，在西方，拜占庭史家如普洛科庇烏斯（Procopius, I, iii-viii）[22]等寫作Ephthalitai（Hephthalitai），阿伽提阿斯（Agathias, 338-340=IV, 27-28）[23]寫作Nephthalitai，忒俄費拉克圖斯·西摩卡塔斯（Theophylactus Simocattas, VII, 7-8）[24]寫作Abdelai；此外，在亞美尼亞史籍中寫作Hep't'al,[25]在波斯史籍中，寫作Heftal。[26]在阿拉伯史籍中寫作Hayṭal或Hayāṭilah(複數)。[27]

其中，嚈噠、囐噠、厭達、厭怛、悒怛、挹怛、挹達、挹闐、猒怛、Ephthalitai（Hephthalitai）、Nephthalitai、Hep't'al、Heftal、Hayṭal（Hayāṭilah）、Abdelai和Abdel等，無疑是同名異譯，而顯然也可譯作“乙弗敵”、“乙弗利”，或省作“乞伏”、“乞佛”、“憂弗”和“乙弗”。

嚈噠前身乙弗的漢文異譯在中國史籍中有“如弗”、在朝鮮史籍中有“然弗”，《周書·異域傳下》的“囐噠”[ngian-dat]可視爲“如弗”或“然弗”最確切的對譯。無獨有偶，西史亦曾將Ephthal譯作Nephthal。

據拜占庭的忒俄法浧斯（Theophanes Byzantios）記載，戰勝薩珊波斯國王卑路斯（Pērōz，459—484年）的嚈噠王名Ephthalanus，並說：“該族實得名於此王”。[28]《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嚈噠條”引劉璠《梁典》也說：“滑國［王］姓嚈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由此可見，此名得自王名或王姓。

另一方面，“乙弗”或“乙弗敵”等在中國史籍中作爲部名出現，但此名在高句驪其實也是王名。部酋名轉爲部名歷史上屢見不鮮。

其餘諸稱，似乎除了《梁書·西北諸戎傳》的“滑”之外，均與“匈奴”或“匈人”有關。如普洛科庇烏斯（I, iii）等又稱之爲“匈人”（Huns），普洛科庇烏斯（I, iii-viii）、科斯馬斯[29]（Cosmas, XI）等又稱之爲“白匈人”（White Huns）。

印度古文獻如迦梨陀娑的《羅怙世系》[30]（IV，60-71）以及笈多時期碑銘[31]稱之爲“匈奴”（Hūṇa）；六世紀的天文學家彘日在所著《廣集》[32]（XI, 61）一書中稱之爲 Śveta Hūṇa（白匈奴）。[33]

由此可見，嚈噠有兩個族名，一個得自王之姓名，另一個便是“匈奴”或“匈人”。今案：嚈噠被稱爲匈奴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性是：西遷中亞的乙弗卽嚈噠最初自號“匈奴”，周鄰各族亦目之爲匈奴，佔領吐火羅斯坦後，其勢日盛，原名始顯，拜占庭人遂誤以爲此名得自五世紀下半葉戰勝卑路斯之嚈噠王。

應該指出，嚈噠有“匈奴”或“匈人”之稱，並不能說明他們和中國史上的匈奴乃至歐洲史上的匈人同出一源。四至八世紀活躍於歐亞草原上的遊牧部族多以“匈奴”或“匈人”爲號。舉其大者如 Sabir、Onogur、Utigur、Kutrigur 和阿瓦爾等。[34] 又如《魏書·高車傳》稱高車爲“匈奴之甥”；《宋書·芮芮傳》稱柔然爲“匈奴別種”；《南齊書·魏虜傳》稱拓跋鮮卑爲“匈奴種也”。這些部族的風俗與匈奴或匈人大致相同，故往往自稱、亦被稱爲“匈奴”或“匈人”。嚈噠或其一例。

而如果從嚈噠之前身乙弗可溯源於高句驪這一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則似乎更應該認爲“匈奴”其實是高句驪五部之一“灌奴”[kuan-na] 之異譯。這也就是說，組成乞伏四部之一的如弗原屬高句驪的灌奴部。這就是說嚈噠被稱爲“匈人”(Huns)，與“匈奴”和“灌奴”音近有關。

至於嚈噠被稱爲“白匈奴”則可能是因爲如弗卽乙弗與胡引氏混血以致膚色較白的緣故。

一說乙弗與吐谷渾同屬白部鮮卑。[35] 果然，則“白匈奴”一名之來歷可能與之有關。今案：指乙弗爲白部鮮卑似無確據。《北史·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傳》雖稱乙弗氏居青海之先世爲吐谷渾渠帥，但不能因此指乙弗、吐谷渾同族。

以上述假說爲基礎，不妨認爲《梁書·西北諸戎傳》對嚈噠的稱呼“滑 [huət]”，客觀上可能也是“胡”[ha] 卽“匈奴”或“灌奴”的異譯。蓋據《通典·邊防九·西戎五》，滑國“至後魏時謂之滑�”，知“滑”乃“滑�”之省稱。“滑匜 [hoat-duən]”可以視爲“匈奴 [xiong-na]”或“灌奴”之音轉。[36] 蓋梁人認爲“嚈噠”是王姓，全譯爲“厭帶夷粟陁”，並非真正的族名，乃稱之爲“滑”或“滑匜”。之所以未譯爲“胡（匈奴）”或“灌奴”，則可能是梁人祇聞其音，不知其實，猶如北魏人把嚈噠佔領下的粟特稱爲“溫那沙”[uən-na-shea] 一樣。[37]

2. 故地

《魏書·西域傳》載嚈噠起源於塞北，這是現存有關嚈噠故地的唯一可靠的記載。乙弗雖可溯源於遼東，但祇有當它遷至塞北，

成爲雜胡之後，纔成爲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乙弗，這就是說，事實上乙弗也是起源於塞北。

3. 遷徙

嚈噠度阿爾泰山西遷索格底亞那應在366—376年之間（詳下文），這同以上推測的乙弗可能自乞伏分出，走上西遷道路的時間（371年）基本一致。當時，這些西遷的乙弗人大概分爲兩支，一支（或其羸弱）到達青海湖畔，是爲乙弗敵，一支度阿爾泰山奔赴嬀水北岸，是爲嚈噠。

據《資治通鑒·晉紀二五》，“是歲，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衆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案：《太平御覽》卷一二七引《十六國春秋·西秦錄》記乞伏國仁“五世祖拓隣[38]，晉太始初，率戶五萬遷居高平川”。而據《晉書·乞伏國仁載記》，該部落聯合體遷至苑川時，又增加了五萬餘落，一共約十萬餘落。一落若以五口計，則有五十餘萬人。[39]投降苻堅的司繁部衆不過五萬餘衆，這五萬人即使另有妻子，也不過二十五萬。其餘二十五萬人，除投靠拓跋鮮卑、高車者外、或者就此踏上了西遷之途。

另一方面，嚈噠登上歷史舞臺時，有衆不過十萬。如果考慮到這一點，加上時間符合，不妨認爲嚈噠便是被苻堅擊潰後西遷的一支乞伏即乙弗人。

或以爲其時司繁所部均已投降王統，即使有部份西遷，也衹

能是其中的少數。蓋僅二年之後，亦卽373年，司繁便受命於苻堅，率部衆討鮮卑勃寒於隴右，勃寒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足見其勢未衰。不僅如此，司繁所部便是日後西秦之母體。若稱司繁所部中，有部份留在塞北、歸附拓跋，部份從屬高車、形成泣伏利部，另有若干移居青海、稱乙弗敵國，尚可以理解。說更有一部遠遷阿姆河北岸則頗難接受。[40] 今案：其說未安。

4. 族源和族屬

根據以上考證，嚈噠的族源可能是一部份乙弗卽某種程度鮮卑化的高句驪人。

《魏書·西域傳》稱嚈噠爲"高車之別種"，這可能是因爲其前身乙弗的重要組份叱盧，或以上諸族融合形成的部落聯合體乞伏有部份成了高車的顯赫姓氏，故在北魏人看來，儘管其語與高車不同，還應該稱之爲高車之別種。

至於嚈噠被稱爲"白匈人"，如前述，應是如弗與羯胡混血的結果。應該指出，無論乙弗卽嚈噠因混血而膚色白到何種程度，其體貌至少在一段時期內仍未脫出蒙古利亞種的窠臼，《梁職貢圖》所寫滑國使臣肖像便是明證。

5. 語言

《魏書·西域傳》載嚈噠人的語言不同與高車、柔然和諸胡，可見嚈噠人說的是一種很特殊的語言，現在看來可能是高句驪語和鮮卑語等因經常接觸而形成的混合語（mixed language）。《梁書·西北諸戎傳》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河南卽吐谷渾，其人之所以能譯嚈噠語，顯然不是因爲嚈噠語與吐谷渾語相

同，也不僅是由於吐谷渾北鄰乙弗敵國，而且是由於吐谷渾原是東部鮮卑，與高句驪早有接觸的緣故。這從語言學的角度增强了嚈噠與高句驪同源的可能性。

6. 制度、習俗與宗教

嚈噠有可汗、可敦、葉護、特勤等稱號，有剺面、截耳、殉死等習俗，[41] 皆阿爾泰系諸族所共有，可以作爲嚈噠與乙弗同源的佐證。蓋乙弗雖可溯源於高句驪，但是在文化方面早已受東北亞和北亞諸族（特别是鮮卑）之影響。

嚈噠所事天神，似乎也可索解於乙弗；乙弗前身乞伏的組份之一羯胡亦有此俗，[42] 很可能乙弗在塞北時已經受其影響。至於嚈噠人在習俗方面表現出來的若干伊朗之風，則應是遷入中亞後，沾染自伊朗系諸族，不能視作嚈噠與乙弗同源説之反證。

合上六證，嚈噠前身爲乙弗，乙弗可溯源於高句驪之説或可成立。

最後，順便説説一個與嚈噠族屬間接相關的問題。

1973 年出土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雷祖廟北魏墓的描金彩繪漆棺，其後部雖已損毀，木胎亦朽失不存，但殘存漆皮經拼接復原後，大部份畫面得以恢復。[43] 一般認爲，此漆棺畫之年代約爲太和（477—499 年）中。[44]

值得注意的是漆棺前檔所繪墓主像，墓主著鮮卑裝坐於榻上，右手舉杯，左手持小扇。或以爲此像表現出一派嚈噠作風。尤其是墓主像與烏兹别克斯坦南部鐵爾梅兹市西北的巴拉雷克（Balalyk-Tepe）建築遺址所出壁畫上的人物非常肖似。在後者所

表現的宴飲場面中，嚈噠貴族多一手持酒杯，一手執小扇，且其手勢很特殊，皆以拇指與食指、中指、無名指相對捏住杯足，小指單獨翹起，與固原漆棺畫中墓主像的姿態相同。這是北魏貴族受嚈噠風尚使然。[45] 而另說此像主要是受波斯風尚影響，與嚈噠無關。[46]

今案：就整體來看，漆棺畫風格可能是受波斯的影響，但也必須看到漆棺畫似乎和巴拉雷克的壁畫有某種聯繫。具體而言，便是上述見諸漆棺畫和壁畫肖像的特殊手勢之間的一致性。這種手勢尚未在可以類比的波斯宴飲圖上發現。

這種一致性與其說是當時北魏鮮卑貴族受嚈噠風尚的影響，毋寧說漆棺畫與巴拉雷克壁畫所表現的風尚有共同的來源。後者果然出自嚈噠人之手，則不妨認爲前者出諸乞伏鮮卑後裔之手。蓋今固原一帶正是《晉書·乞伏國仁載記》所述“高平川”，國仁五世祖祐鄰擊破鮮卑鹿結後曾一度留居該處，這是乞伏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質言之，不能排除墓主與巴拉雷克壁畫所表現的宴飲貴族有共同祖先的可能性。這或許也可以視作嚈噠前身爲乙弗亦即乞伏的旁證。

應該說明的是，與上述漆棺畫和壁畫肖像所見特殊手勢有某種程度類似的手勢也能夠在七至八世紀邊吉坎特（Pendzhikent）壁畫的粟特（Sogdiana）貴族宴飲圖上見到，[47] 可以認爲是粟特人受嚈噠人影響的結果。

（二）嚈噠與索格底亞那

我曾指出最早記載嚈噠與索格底亞那關係的是《魏書·西域傳》：

>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高宗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矣。自後每使朝獻。

同時詳細論證了所謂"粟特"乃指中亞的 Soghd（索格底亞那），而"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正是指嚈噠對索格底亞那的征服。[48]

問題在於嚈噠人征服索格底亞那的時間和過程。論者或懷疑嚈噠人自 371 年踏上西遷之途、中途未曾停留、直接到達索格底亞那的可能性。[49] 對此，我是這樣考慮的。

1.《魏書》修成於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至五年（551—554 年）。其時，嚈噠尚未破滅，且據《魏書》"本紀"，嚈噠遣使北魏至少有一十三次，北魏使臣抵嚈噠也有二次，往來不可謂不頻繁，故所述必有依據，最應受到重視。

《魏書·西域傳》載："嚈噠國，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至高宗時已八九十年矣。"嚈噠首次朝魏既在高宗太安二年（456 年），嚈噠自塞北度金山即阿爾泰山南遷的時間當自

456年上溯80—90年，約爲366—376年。這就是說，嚈噠征服索格底亞那應該在366—376年或之後。

2.如所週知，《魏書·西域傳》原文早佚，今本《魏書·西域傳》乃採自《北史·西域傳》。一般認爲，其中有關粟特國的一則記載基本上是魏收原文。儘管如此，顯然不能認爲粟特國條並無奪訛。

查《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奄蔡“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溫那沙”。注曰：“《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可見《魏書·西域傳》原文“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句“至”字下應奪“高宗（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八字，可據補。這就是說，高宗初朝魏的“匈奴”王已經是第三代了。這次朝魏，無疑是爲了請贖見虜商人。

由此可見，“匈奴”統治“粟特”“已三世矣”，應自忽倪朝魏的年代上溯。換言之，“匈奴”卽嚈噠征服索格底亞那的時間可自高宗卽位之初（452年）亦卽忽倪首次朝魏之年上溯“三世”(80—90年)，得362—372年。

3.《魏書·西域傳》將粟特與奄蔡混爲一談，主要是由於魏使在傳聞“匈奴”卽嚈噠征服索格底亞那的同時，又傳聞匈人對Alans的征服，兩者在時間上接近，“匈奴”與匈人在名稱上又相同的緣故。而匈人征服對Alans正是370年左右。[50]

要之，嚈噠度阿爾泰山與其征服索格底亞那的年代大致相符，似乎表明後者可能發生在其人越過阿爾泰山之後不久。

以下擬略論與嚈噠征服索格底亞那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卽所謂滑國“屬芮芮”問題。蓋據《梁書·西北諸戎傳》“滑國條”，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而如前述，嚈噠自阿爾泰山南遷、並征服索格底亞那的年代約在362—376年之間，而柔然興起於五世紀初，故嚈噠度阿爾泰山、遷往索格底亞那之前不可能役屬柔然。又，437年左右，嚈噠人自索格底亞那入侵吐火羅斯坦，逐走寄多羅貴霜人，此後逐漸强大，當然也不可能再役屬柔然。因此，從嚈噠和柔然的發展史來看，如果嚈噠受柔然役使的話，衹可能在嚈噠南度阿爾泰山之後，入侵吐火羅斯坦之前。

所謂“元魏之居桑乾”，應卽拓跋氏都平城之時（398—494年），這同上述柔然、嚈噠的情況結合起來，嚈噠役屬柔然的時間似可定在402—437年之間。這一段時間，正是柔然積極向西方發展的時期，其勢力越過葱嶺，侵掠位於吐火羅斯坦的寄多羅貴霜，《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的有關記載可以爲證。既然吐火羅斯坦尚且受到柔然侵掠，索格底亞那的嚈噠受柔然支配也就不難想見了。“大月氏國條”稱其國“北與蠕蠕接”，正說明蠕蠕勢力一度伸向阿姆河北岸。[51]

《梁書·西北諸戎傳》稱嚈噠“屬芮芮”時“猶爲小國”，這與它控制索格底亞那的形勢亦無不符。稱之爲“小國”是因爲當時嚈噠人衆較少。《魏書·西域傳》載嚈噠有衆“十萬”，金山初度時很可能還不足此數。當然，嚈噠較少的人口，不等於它沒有能夠征服索格底亞那的兵力。

一個非常類似的例子是《史記·大宛列傳》描述的康居。據載，康居因“國小”，一度役屬匈奴。然而正是這個“國小”的康居卻“兵强”，且領有索格底亞那。史傳所謂國之大小，其實多不

以地域廣狹而以人戶多寡爲標準。[52]

最後，由康居的情況似乎還可以進一步推測，嚈噠度金山而南，在征服索格底亞那的過程中，很可能以錫爾河北岸爲其本據，也和漢代的康居一樣。換言之，嚈噠西遷第一個落腳點是錫爾河北岸。僅僅是因爲它佔領錫爾河北岸後立即南下征服了索格底亞那，以致南度金山和領有粟特在北魏人的傳聞中沒有了明顯的時間差。客觀上，《魏書》關於嚈噠南度金山和粟特被"匈奴"征服時間的模糊記載反映了這一點。

（三）嚈噠與寄多羅貴霜、薩珊波斯

嚈噠佔領吐火羅斯坦的過程應該就是征服寄多羅貴霜的過程。寄多羅貴霜史唯一有條理的文字記載見諸《魏書·西域傳》的"大月氏國條"：

>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

和"小月氏國條"：

>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Puruṣapura）。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

其中，所謂大月氏國王“寄多羅”便是印度錢銘所見 Kidāra。[53]Kidāra 治下的貴霜，史稱“寄多羅貴霜”（Kidāra Kushāns）。《魏書·西域傳》稱之爲“大月氏國”，是因爲自東漢以來，中原王朝一直本貴霜之故號，稱之爲“大月氏”的緣故。

傳文所謂“匈奴”就是嚈噠，“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乃指寄多羅貴霜人被嚈噠逐出吐火羅斯坦。此後盤踞富樓沙城的寄多羅貴霜殘餘勢力《魏書·西域傳》則稱之爲“小月氏”。[54]

據研究，《魏書·西域傳》“大月氏國條”的資料可能來源於董琬、高明西使歸國後所作報告。這就是說，直到 437 年，寄多羅貴霜的領土尚跨有興都庫什山兩側。其國雖屢遭柔然侵擾，其勢未衰，其王寄多羅仍有力量越過興都庫什山，征服了乾陀羅以北五國。[55]

但是，437 年又是嚈噠佔領吐火羅斯坦的時間上限。蓋據亞美尼亞史家埃里塞（Elišē）記載，薩珊朝波斯伊嗣俟二世（Yazdgird II，438—457 年）即位伊始，便投入了同“貴霜人”和“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的戰爭。[56]前者應該就是被嚈噠人逐出吐火羅斯坦的寄多羅貴霜人，後者應即嚈噠人。由此可見，大概在董、高歸國後不久，寄多羅王便由於遭受“匈奴”亦即嚈噠的侵略而放棄了吐火羅斯坦，也就是《魏書·西域傳》所描述的“大月氏國”

的北部。

或以爲上述埃里塞所述“貴霜人”和“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乃至拜占庭史家普里斯庫斯（Priscus）所載薩珊波斯卑路斯與之作戰的所謂“寄多羅匈人”（Kidarite Huns），都是被嚈噠逐出吐火羅斯坦西遷的寄多羅貴霜人。[57] 今案：此說未安。

一、據埃里塞有關記載不難判斷，作者所傳“貴霜人”和“也被稱作貴霜人的匈人”乃指同一種人，而被“匈奴”所逐西遷的貴霜人決不可能被稱爲“匈人”。[58] 同理，寄多羅既爲“匈奴”所逐西徙，也決無以“匈人”爲族號之理。被稱爲“匈人”或自稱爲“匈人”的衹能是逐走寄多羅貴霜人的嚈噠人。

二、普里斯庫斯一再提到波斯人與“寄多羅匈人”之間的戰爭（33，41，47，51）。[59] 其中最詳細且可供討論的是第 41 章第 3 節的有關記載：465 年，當拜占庭皇帝 Leo 一世（457—474 年在位）的使者 Constantius 抵達波斯時，當時的國王卑路斯駐蹕在與“寄多羅匈人鄰接的邊境上”接見了 Constantius。

戰爭隨之爆發，戰爭的原因是匈人收不到波斯人和帕提亞統治者此前一直繳納的貢金。這位君主的父親拒絕納貢，選擇了戰爭，其子連同王國一起繼承了戰爭。結果波斯人被這場戰爭拖垮，企圖用欺詐的手段結束與匈人的鬬爭。於是卑路斯（Perozes，當時波斯君主的名字）派人去見匈人的首領 Kunchas，表示樂意言和，並希望締結盟約，將其姊妹許配給他，因爲他恰好非常年輕，還沒有生兒育女。可是，可汗

接受了這些建議時，卻沒有娶到卑路斯的姊妹，娶到的是波斯國王派去的一個僞裝成公主的女人。卑路斯對她說：衹要她不揭穿這一詭計，就能享有王室的身份和優裕的生活，如果說出這一欺詐行爲，就會被處死，因爲寄多羅人的統治者不會容忍娶一個婢女而不是一位貴族婦女爲妻。

和約按照這些條件簽訂，卑路斯不久就從他對匈人統治者的背叛中得到了報應。由於該婦人害怕匈人統治者有一天會通過他人獲悉她的真實身份，處她以極刑，從而揭穿了欺詐行爲。Kunchas 稱讚了她的誠實，繼續讓她作他的妻子。但爲了懲罰卑路斯使詐，他藉口與鄰邦交戰需要指揮戰事的將軍，而不是士兵（因爲他的士兵爲數衆多）。卑路斯派出了三百名一流的軍官。寄多羅人的統治者殺死了其中若干人，而使其餘人致殘後返回卑路斯處，告訴卑路斯這就是他的背叛應得的懲罰。於是兩國間戰火重燃，戰況激烈。因此，卑路斯在 Gorga 亦即波斯人駐軍的地點接見了 Constantinus。……

在這一節中，與薩珊波斯國王卑路斯敵對的一方被稱爲“寄多羅匈人”，有時也稱爲“寄多羅人的統治者”或“匈人的統治者”。提及的一位寄多羅匈人統治者名 Kunchas，希臘原文爲 Κούγχας，早已有人指出其實不是人名，而是 Qun-Xan 之訛傳。[60] 其實，這 Qun-Xan 就是 Hun-Xan，可譯爲“匈可汗”。貴霜或寄多羅貴霜人均不採用“可汗”這一尊號，使用“可汗”稱號的衹能是嚈噠人。[61]

更重要的是，寄多羅貴霜人的西遷決無可能從三十年代中一直延續到六十年代中。

三、《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有關“貴霜匈奴”（Ḳūšānāyē d-hinnōn Hunnāyē）或“匈奴”（Hunnāyē）的記載（IX-XI, XIX, XXIII-XXIV）可進一步證實上引埃里塞或普里斯庫斯所載“貴霜匈奴”和“寄多羅匈人”都是嚈噠人。[62]

在這本507年用敍利亞語書寫的著作中，提到“波斯國王卑路斯（Pērēz）爲了他和貴霜匈奴的戰爭，經常接受希臘人的錢財”。（IX）而“由於得希臘人金錢的援助，卑路斯一度制服了匈奴，從匈奴手中奪取了許多地方，以增益自己的國土。然而他終於成了匈奴的俘虜。希臘皇帝 Zēnōn 獲悉此事後，便用自己的錢將他贖回，並使之與匈奴和解。於是卑路斯與匈奴簽訂和約，保證不再越境發動對匈奴的戰爭。但他像 Zedekiah 一樣背信棄義、破壞盟約，重啓戰端，也像他一樣落入敵手，全軍潰滅，本人被生擒”。爲了活命，他答應以滿載三十頭騾子的銀幣爲贖金，並留下其子居和多（Ḳawād）爲人質。（X）歸國後，他向全國徵收人頭稅，以償付贖金和引渡其子。但是，他很快又徵集了一支軍隊，重燃戰火。結果是波斯人全軍覆沒，卑路斯陣亡。（XI）

普洛科庇烏斯的平行記述如下：“後來，波斯國王卑路斯（Perozes）捲入了一場與嚈噠匈人——他們被稱爲白匈人——爭奪邊境的戰爭。他集結了一支威風凜凜的軍隊，進擊嚈噠。嚈噠人是名副其實的匈人血統，可是與已知的任何匈人不同。他們的領土既不與其他匈人的鄰接，也不靠近，而是緊貼波斯的北境。而

在波斯國界的對面，座落著一座嚈噠人的城市 Gorgo，該城因而成爲雙方頻繁的邊境衝突的中心……”由於嚈噠匈人佯敗，誘敵深入，波斯軍陷入重圍。卑路斯不得已與嚈噠匈人議和。（I, iii）但“此後不久，他因急於向匈人報仇雪恥，不顧自己曾立下的誓約，迅速在波斯全境及其盟國徵兵，率之進攻嚈噠”。結果因再度中計而全軍覆沒，卑路斯陣亡。“從此，波斯就成了嚈噠的屬國，向嚈噠進貢，直到居和多（Cabades）鞏固了他的政權，認爲無需再向嚈噠人繳納年貢時爲止”。（I, iv）

又，《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有載：“居和多敗行枉法，波斯顯貴陰謀弒君。居和多獲悉，棄國逃往匈奴國，投奔匈奴王。他曾爲質子，成長於該國王庭。其弟 Zāmāshp 遂取代他統治波斯。居和多本人則在匈奴中娶其姊妹之女爲妻。其姊妹在其父喪生的那場戰爭中被俘去，因係公主，成了匈奴王之妻，匈奴王和她生有一女。居和多來奔，她就將此女許配居和多。因當了駙馬，居和多受到鼓勵，日日哭泣於匈奴王前，懇求軍援以誅叛復辟。匈奴王允其所請，給予大軍。當他踏上波斯國土時，其兄弟已聞風而逃，於是他如願以償，誅殺叛臣。”（XXIII-XXIV）

普洛科庇烏斯的平行記述如下：“居和多偕同 Seoses 一起逃跑，居然未被看破行藏，最後投奔了嚈噠匈人（Ephthalitae Huns）。嚈噠國王將其女許配居和多。既爲駙馬，居和多遂率大軍討伐波斯，波斯人不願迎擊，迅速潰散。”居和多終於復辟。（I, vi）

儘管細節頗有出入，但《柱行者喬舒亞年代記》所述貴霜匈奴便是普洛科庇烏斯所述嚈噠匈人殆無疑義。而既然直到卑路斯

去世之際嚈噠人仍然被稱爲“貴霜匈人”，也就不能否定埃里塞所載“貴霜匈人”乃至普里斯庫斯的“寄多羅匈人”不是西遷的寄多羅貴霜人、而是嚈噠人的可能性。這與客觀上伊嗣俟二世最初有可能遭遇被“匈奴”逐出吐火羅斯坦的寄多羅貴霜人，以及被征服的寄多羅貴霜人也可能充當嚈噠人進攻薩珊波斯前鋒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四、據太伯里[63]和費爾道西[64]記載，可知卑路斯卽位之前一度避難嚈噠，後藉助嚈噠兵威登基，可見波斯和嚈噠早已接壤。而前引普洛科庇烏斯所見Gorgo，無疑便是普里斯庫斯所載Gorga。這也可以視爲普里斯庫斯的“寄多羅匈人”就是嚈噠人的旁證。

五、祇要考慮到嚈噠人自號“匈奴”，又來自一度處於貴霜或寄多羅貴霜統治之下的吐火羅斯坦，“貴霜匈人”或“寄多羅匈人”這些稱呼就都是不難理解的了。而突厥佔領吐火羅斯坦之後的情況正可參證。[65]蓋據《冊府元龜》卷九六六：

> 吐火羅國，唐永徽三年（652年）列其地爲月氏府。以其葉護阿史那烏濕波爲都督。開元七年（719年），其葉護曰支汗那。十七年，冊其首領骨咄祿頓達度爲葉護。

顯然，以阿史那烏濕波爲首的統治吐火羅斯坦的突厥人，也完全可以稱之爲“吐火羅人”或“吐火羅突厥人”。

至於盤踞興都庫什山以南的寄多羅貴霜殘部亦卽“小月氏”，

雖然很可能早在455年之前就役屬嚈噠，但和許多役屬嚈噠的小國一樣，依然有某種自主權，其國名直至太和元年（477年）在北魏的朝貢錄上尚能見到。[66]

（四）嚈噠與笈多印度

在討論嚈噠與笈多印度關係之前，首先應該就寄多羅貴霜與乾陀羅的關係略作說明。

或以爲《魏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小月氏其實與貴霜人無關，實際上是廣義匈奴人之一支，先嚈噠人入侵西北印度，後來被嚈噠人取代。其說略云：[67]

Tepe Marinjan 窖藏包括十一枚寄多羅的錢幣和一枚沙普爾二世（Shapur II, 309—379年）的錢幣，可知這些錢幣最晚在沙普爾二世末年入土。這應該就是寄多羅王征服乾陀羅的大致年代。[68]這種錢幣正面是婆羅謎銘文：Kidāra Kuṣāṇa Sāh。反面是表示年份的數位，若非239便是339。[69]按塞迦紀元推算，爲公元317或417年。[70]如果後一種讀法是正確的，可以進一步證實寄多羅王進入乾陀羅及其附近地區在Shapur二世治期的後半葉，該地區由其子孫繼續統治。另外，阿拉哈巴德（Allahabad）石柱銘文[71]（L. 23）提及西北邊區 Daivaputra Śāhānuśāhis 的自願歸順，Daivaputra Śāhānuśāhis 無疑是迦膩色迦系統貴霜統治者的稱號，[72]可見在沙摩陀羅笈多（Samudragupta，約公元340—380年）時代領有

西北次大陸的是迦膩色迦繼承者的殘餘勢力。《魏書·西域傳》稱寄多羅是大月氏人，其依據可能是寄多羅及其繼承者的錢銘。其實，很可能是因爲寄多羅征服貴霜領地，纔採用了貴霜人的稱號(Sāh)。而據同時代的希臘史家普里斯庫斯的有關記載，可知所謂寄多羅人其實是匈人的一支。

今案：此說有所未安：

一則，《魏書·西域傳》明載寄多羅亦即 Kidāra 被匈奴所逐西遷，說明寄多羅不是匈奴。[73]

二則，寄多羅貴霜的錢幣與沙普爾二世的一起出土既不能說明這些錢幣入土的時間、更不能說明寄多羅王征服乾陀羅及其附近地區在沙普爾二世的晚年。[74] 而《魏書·西域傳》明載，寄多羅人侵乾陀羅應在蠕蠕即柔然興起（五世紀初）之後。

三則，在寄多羅入侵之前乾陀羅及其附近地區由迦膩色迦後裔統治無妨這一帶後來被另一系統的貴霜人征服。同爲貴霜人，自然可能採用相同稱號。既屬不同系統，加上 Kidāra 以示區別，也不足爲奇。

四則，普里斯庫斯所載寄多羅匈人應即嚈噠人，且與《魏書·西域傳》所見寄多羅王統率的大月氏或小月氏人無關，已由前文證明。事實上不存在寄多羅貴霜爲另一支匈人的可能性。

盤踞乾陀羅的寄多羅貴霜後來被嚈噠人征服。嚈噠入侵乾陀羅見諸《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宋雲“行紀”：

至正光元年（520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

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嚈噠所滅，遂立勑懃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兇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持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鬭，已歷三年。王有鬭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楂，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

“治國以來，已經二世”，說明宋雲所見之王已經是第三代了。若一世以三十年計，嚈噠即嚈噠入侵西北次大陸的年代應爲 450—460 年。

嚈噠人的這次入侵在笈多時期的印度碑銘中也有所反映。塞建陀笈多（Skanda Gupta）的比泰里（Bhitarī）石柱銘文[75]稱頌塞建陀笈多爲重振衰落的家業，“投身於對匈奴的激戰時，雙臂使大地顫抖，敵人中産生了恐懼的旋渦”。（L. 15）雖然比泰里石柱銘文沒有明確的紀年，但年代爲笈多紀元 136/137/138 年（前 455/ 前 456/ 前 457 年）的朱納格爾（Junagadh）石刻銘文[76]（L. 3-4）提到塞建陀笈多征服了“蜜利車”（Mlêchchhas）。一般認爲“蜜利車”一詞泛指“外族”，此處卽指匈奴，具體時間應在塞建陀笈多卽位之初，亦卽公元 454 年。[77]這一年也就是嚈噠可能入侵笈多印度的最早年份。既然這一年代與上述根據宋雲的記載推出的時間正相符合，則不妨認爲嚈噠對乾陀羅的入侵與比泰里銘文所載“匈奴”對笈多印度的入侵是彼此銜接的。換言之，嚈噠首先進入乾陀羅，征服了盤踞該處的寄多羅貴霜人，然後侵入笈多王朝的

轄區，終被塞建陀笈多擊退。

應該指出的是，被塞建陀笈多打敗的嚈噠人，並沒有退出乾陀羅地區，否則宋雲有關嚈噠控制乾陀羅“已經二世”的記載就無法理解了。

還應該指出的是，被嚈噠征服的寄多羅貴霜很可能作爲嚈噠治下的一個傀儡政權依舊存在於乾陀羅。《魏書》“本紀”如下記載：

> 太安五年（459年）四月，“居常國遣使朝貢”。
>
> 和平元年（460年）十月，“居常王獻馴象”。
>
> 太和元年（477年）九月，“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各遣使朝貢”。

說明這個政權至少存在至太和元年。而出土的寄多羅貴霜錢銘所見諸王[78]應該就是這個政權的統治者。

多數學者認爲見諸笈多時期碑銘和錢幣的頭羅曼（Toramāṇa）和摩醯邏矩羅（Mihirakula）都是入侵笈多印度的“匈奴”即嚈噠人的首領。[79]果然如此，有理由進一步認爲塞建陀笈多之後嚈噠人對笈多印度的入侵正是以乾陀羅爲基地進行的。頭羅曼很可能就是最初稱王乾陀羅的嚈噠特勤之子，而宋雲遇見的正在“與罽賓爭境”的乾陀羅嚈噠王便是頭羅曼之子摩醯邏矩羅。換言之，已知嚈噠人先後對西北次大陸的入侵是一脈相承的。

在埃蘭（Ēraṇ）發現的石野豬銘文[80]銘刻於頭羅曼在位的元年，銘文稱頭羅曼爲當地酋長曇尼耶毗濕奴（Dhanyavishṇu）的君

主，文中提及曇尼耶毗濕奴之兄摩帝利毗濕奴（Mātṛivishṇu）去世之事（L. 4-6）。而在另一篇屬於佛陀笈多（Budhagupta）治期、年代爲笈多紀元 165 年（公元 484 年）的埃蘭石柱銘文[81]中摩帝利毗濕奴和曇尼耶毗濕奴兩兄弟尚健在（L. 4-9）。這表明頭羅曼於埃蘭即位之年在 484 年之後。

佛陀笈多的年代爲笈多紀元 174 年的銀幣[82]表明他治期可能結束於公元 493 年。這雖然表明頭羅曼於埃蘭即位之年有可能遲至公元 493 之後，但並不能因此完全排除頭羅曼在 484 年之後不久便佔領埃蘭的可能性，蓋埃蘭丟失未必意味著佛陀笈多去位。[83]

既然公元 454 年可能是嚈噠入侵笈多印度的最早年代，則似乎視 484 年左右爲頭羅曼繼承其父的年代較爲合理。

屬於跋奴笈多（Bhānugupta）治期、年代爲笈多紀元 191 年（公元 510 年）的埃蘭石柱銘文[84]說明頭羅曼在埃蘭（可能還有埃蘭以東地區）的統治並不長久。蓋銘文述及當地的酋長瞿波羅闍（Gōparāja）追隨跋奴笈多在埃蘭進行的一場戰爭（L. 3-7）。雖然銘文沒有提到戰爭的對手和勝負，但對手無疑是頭羅曼，而此碑能夠在埃蘭樹立，似乎表明戰爭以頭羅曼的失敗告終。至於銘文沒有提到頭羅曼之死，則可能是因爲他已從埃蘭西撤至旁遮普。在旁遮普鹽山發現的庫臘（Kura）銘文[85]由於碑文毀損，以致其年代無法確定，但可以視爲頭羅曼曾經統治旁遮普的證據。

既然摩醯邏矩羅在位第十五年的瓜廖爾（Gwalior）銘文[86]表明摩醯邏矩羅是頭羅曼之子和繼承人（L. 2-4），宋雲的記載又

表明520年時佔領西北印度的第三代嚈噠統治者在位至少已經三年。也就是說518年是摩醯邏矩羅已經繼承頭羅曼最遲的年份。

如果以上所述可以接受，則不妨認爲頭羅曼的馬爾瓦式錢幣[87]標明的年代52始自嚈噠特勤征服乾陀羅之時。

（五）嚈噠的都城

前文曾探討過嚈噠的都城這個聚訟紛紜的問題，[88]結論是嚈噠如果定都，應該在520年之後，其地衹能是Balkh。由於對問題的複雜性估計不足，考證有欠周詳，茲再論述如下。

一、如所週知，嚈噠是一個遊牧部族，初起時並無都城可言。事實上，中國史籍中最早記載嚈噠歷史的《魏書·西域傳》明載其“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

這種情況在嚈噠人遷入中亞後很長一段時期內仍無變化。據《洛陽伽藍記》卷五所收宋雲“行紀”記載，宋雲於北魏明帝神龜二年（519年）“十月之初，至嚈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遊軍而治。以氈爲屋，隨逐水草，夏則遷涼，冬則就溫”。可知直至宋雲與其王會晤之時，亦卽六世紀二十年代末，嚈噠卽嚈噠人依舊“遊軍而治”，尚未建都。[89]

不僅如此，《梁書·西北諸戎傳》也載滑國“無城邑，氈屋爲居”，似可說明遲至嚈噠末次朝梁之時卽大同七年（541年），該國並無都城可言。

二、據拜占庭史家彌南（Menander）[90]記載，568年突厥首次遣使拜占庭，查士丁尼皇帝詢及嚈噠所居爲城爲鄉時，突厥使臣答："其民居有城郭"。（10.1: Exc. de Leg. Gent. 7）其民既有城郭，其王終究也會有國都，遊牧部族進入農耕區後，難免逐步走向定居，嚈噠也不例外。

最早記載嚈噠都城的應爲《周書·異域傳下》："囐噠國……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既然囐噠卽嚈噠朝周凡三次，首次爲大統十二年（546年），這一年不妨視爲嚈噠定都時間的上限。這就是說，嚈噠有都城，恐怕已經接近其滅亡之時了。

三、《隋書·西域傳》："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是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强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挹怛卽嚈噠，所載位於"烏滸水南二百餘里"的挹怛國都應卽《周書·異域傳》所載拔底延城。

一則，兩傳皆載其城"方十餘里"。

二則，《周書·異域傳下》稱其城爲"王舍城"，《隋書·西域傳》載其城"多寺塔，皆飾以金"，名副其實。

由此可見，這個拔底延城應該位於烏滸水之南。在《隋書·西域傳》描述的年代，役屬突厥的挹怛（卽嚈噠）國依舊據有該地。

四、《魏書·西域傳》："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應

爲南）至范陽國，西（應爲北）至悉萬斤國（Samarkend），中間相去二千里；南（應爲東）至連山（帕米爾），不知名；北（應爲西）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國中有薄提城（Balkh），周帀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應爲濮）樓河（阿姆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就研究嚈噠都城位置而言，應該說明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上引傳文涉及的地名、方位等，多有錯訛，前人有關考證，基本上是正確的。[91] 由此可知，傳文所謂“吐火羅國”的範圍，大致相當於《大唐西域記》卷一所載覩貨邏故地：

> 出鐵門至覩貨邏國故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帕米爾），西接波剌斯（波斯），南大雪山（興都庫什山），北據鐵門（今 Shahr-i Sabz 南九十公里處），縛芻大河（阿姆河）中境西流。

既然在阿姆河以北、覩貨邏故地範圍之內不存在薄提這樣一座大城。完全有理由認爲“城南有西流大水”句中，“南”字也應該是“北”之誤。

其次，《魏書·西域傳》所載西域諸國去代里數，均以王治爲基準。《魏書·西域傳》吐呼羅國條不載王治名稱，僅見有關薄提城的記載，說明所謂“一萬二千里”是指自薄提城赴代的行程。薄提顯然是所謂“吐呼羅國”最重要的城市。

第三，《魏書·西域傳》所謂“吐呼羅國”是嚈噠在逐走寄多

羅月氏人後，在 Balkh 扶立的一個由吐火羅人組成的傀儡政權。[92] 傳文未載該國有王治，可能與此“國”的傀儡性質有關。

第四，《通典·邊防九·西戎五》：“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一說“隋時通焉”句說明《通典》所載吐火羅國直到隋代始爲中國所知，與早在北魏時已與中國交通的吐呼羅國不在一地。[93] 今案：所謂“隋時通焉”衹能說明隋代的吐火羅國與北魏的吐呼羅國不是同一政權的延續，與兩者地理位置無涉。雖然“都葱嶺西五百里”的這個吐火羅國未必在《魏書·西域傳·西戎五》所載薄提城。但應該承認“後魏時吐呼羅國也”句暗示《通典·邊防九·西戎五》編者所見《魏書·西域傳》的主要城市薄提城應在烏滸水亦即濮樓河之南。

五、《周書·異域傳下》所見拔底延應即《魏書·西域傳》所載吐呼羅國中的薄提城。

一則，“薄提”[bak-dye] 可以視爲“拔底延”[buat-tyei-jian] 之略譯。

二則，兩者地理位置相同。《周書·異域傳下》載拔底延去長安 10100 里，《魏書·西域傳》載薄提去代 12000 里，而長安去代約 1900 里。[94]

三則，《魏書·西域傳》稱薄提城“周帀六十里”，約“方十五里”，與《周書·異域傳下》所載拔底延城“方十餘里”，不妨認爲是一致的。[95]

四則，根據經校正後的《魏書·西域傳》記載，薄提城應在阿

姆河之南，而結合《隋書·西域傳》的有關記載可知，拔底延城亦應在阿姆河之南。兩者並無不合。

六、《大唐西域記》卷一："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教法。"所傳"縛喝"[biuak-xat] 無疑就是 Balkh 古稱之音譯，而縛喝國所在應即拔底延：

一則，指 Balkh 的古稱有兩個系列：[96]

A. Av. Bāχδī-; O.Pers. Baχtri-(Baχtriš, Bāχtriyā); Elam. ba-ak-ši-iš, ba-ik-tur-ri-iš; Akk. ba-aḫ-tar; Gr. Βακτρα; MP. Bāχđiyā.

B. Skt. Bāhlīka, Bāhūlaka, Bāhlī; Mid. Pers. Baχl, Balχ; Arm. Balχ, Bahl, Baχl, Baht; Syriac. Bhl, Bahl; Arab-Pers. Baχl; Christian Sogd. Bhl; Kushano-Sasanian and Hephth. Baχlo; Gr. Παχλ; Tib. Bag-la.

"縛喝"屬於第二系列，而"薄提"和"拔底延"屬於第一系列。[97] 不可謂對音不符。

二則，縛喝又稱"小王舍城"，與《周書·異域傳下》關於拔底延亦稱"王舍城"的記載相符。"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教法"，與《隋書·西域傳》"多寺塔，皆飾以金"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三則，薄喝與拔底延均在烏滸水（縛芻河）之南。

四則，“方十餘里”與“周圍二十餘里”（“方五里”）似乎不合，但不能排除下述可能性：到《大唐西域記》描述的時代，該城已非昔日作爲嚈噠都城時的規模。轉折點可能是突厥和波斯聯軍在滅亡嚈噠時對這一城市的洗劫和毁壞。[98]

七、《隋書·裴矩傳》載當時西域南道："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Warwālīz）、挹怛（Balkh）、忛延（Bāmiyān）、漕國（Kapisa），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載玄奘路線："出鐵門至覩貨羅國。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至活國（Warwālīz）"，經活國至於縛喝後，復"自縛喝（Balkh）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隨入揭職國。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Bāmiyān）。"知兩者均自 Balkh 入 Bāmiyān。

既然《新唐書·西域傳下》稱："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Bāmiyān），東臨烏滸河。""縛底野"即"拔底延"位於 Balkh 似乎又可添一旁證。

以下是若干補充說明：

一、《魏書·西域傳》載："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盧監氏城去代 14500 里，與《魏書·西域傳》載"吐呼羅國"薄提城去代 12000 里方位不同。既然盧監氏城即 Balkh，[99] 似不應再指薄提爲 Balkh。

其實，盧監氏城去代里數，是根據《漢書·西域傳》所載監氏

城去長安 12600 里，加上長安去代 1900 里推算出來的，並非當時實測所得。據考證，《魏書·西域傳》中類似的里程推算方法還見於車師、且彌、烏孫、悅般、破洛那、者舌、粟特、疏勒等。[100]《魏書·西域傳》所載薄提去代 12000 里，則有可能是根據當時實測距離計算出來的。漢與北魏兩代測算萬里之外地點的距離不可能沒有誤差，路途經由亦可能不同，故盧監氏與薄提去代里數不同無妨兩者同爲 Balkh。

又，《太平寰宇記·四夷一五·西戎七》引《史記·大宛列傳》："大夏在媯水南，其都曰藍氏城。"又稱："薄提城今名薄底延城，在國北。"似乎據《太平寰宇記》，可證薄提城與監氏城並非一地。而既然監氏城爲 Balkh，則薄提城不應是 Balkh。

其實，《太平寰宇記》所謂薄提城在"國北"乃指在大夏卽吐呼羅國之北，這顯然是承襲《魏書·西域傳》薄提城在濮樓河卽媯水之北的記載所致。如前所述，《魏書·西域傳》有關吐呼羅國方位的記載多不足據，《太平寰宇記》這則記載自然也不足據。

二、《梁書·西北諸戎傳》："白題國……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菓，食物略與滑同。"[101]所謂白題國所在可能就是《魏書·西域傳》所載吐呼羅國之薄提城。"六日行"應爲自白題國王治西赴滑卽"遊軍而治"的嚈噠王駐蹕處的行程。

三、《隋書·西域傳》有關悒怛國的記載表明，嚈噠國破之後，役屬突厥的嚈噠政權一度還在拔底延亦卽 Balkh。這種情況後來發生了變化。蓋據《舊唐書·地理志三》載，"龍朔元年（661 年），

西域諸國遣使來内屬，乃分置十六都督府”，皆隸安西都護府。其中“月氏都督府，於吐火羅國所治遏換城置，以其王葉護領之。於其部内分置二十四州，都督統之。太汗都督府，於嚈噠部落所治活路城置，以其王太汗領之。仍分其部置十五州，太汗領之。”這就是說，遲至龍朔元年，嚈噠傀儡政權已經遷至活路城。[102]

四、《隋書·西域傳》在記載悒怛國情況的同時，還記載吐火羅國的形勢如下：

>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既然同時存在的挹怛國都於 Balkh，再結合下引《新唐書·地理志七下》有關縛叱城的記載，似乎可以認爲這個“方二里”的吐火羅國都城很可能就是同志所見阿緩城（亦卽遏換城）。

五、《新唐書·地理志七下》載：“龍朔元年，以隴州南由令王名遠爲吐火羅道置州縣使，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以其王都爲都督府，以其屬部爲州縣。”其中，“月支都督府，以吐火羅葉護阿緩城置”，所領“大夏州，以縛叱城置”；又載“大汗都督府，以嚈噠部落活路城置”。“縛叱”[biuak-thiet] 應卽“薄提”之異譯，縛叱城與活路城並提，知“活路”與 Balkh

並非一處。

一般認爲《梁書·西北諸戎傳》所見嚈噠的另一名稱“滑”與“活路”[huat-lak]有關。其說或是。但必須指出，沒有證據表明嚈噠人是據有活路城後纔被稱爲“滑”的。《梁書·西北諸戎傳》的記載表明，嚈噠朝梁時尚未建都。因此，如果“活路”一名與嚈噠有關，衹能說明該地是因嚈噠據有而得名的。

六、《大唐西域記》卷一二載：“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玄奘所謂活國之都城應即阿緩城，業已由前人考定。[103]玄奘稱其城“周二十餘里”，相當於“方五里”，與《隋書》所載“方二里”似乎不合，但不僅“二”與“五”字形近易訛，而且阿緩城自“方二里”發展成“方五里”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七、《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稱：“又從此犯引國北行廿日，至吐火羅國。王住城名爲縛底耶。見今大寔兵馬在彼鎮押，其王被逼，走向東一月程，在蒲特山（Badakhsān）住，見屬大寔所管。……又從吐火羅國西行一月，至波斯國。”此處“縛底耶”就是“拔底延”或“薄提”。慧超西使始於開元十一年，十五年（727年）回抵安西。因此，這則記載似乎表明，最遲在727年所謂吐火羅國之都城已遷至縛底耶卽拔底延，而不在阿緩城。[104]

一說自犯引（Bāmiyān）至縛底耶，據《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需“廿日”，自 Bāmiyān 至 Balkh，據伊斯塔赫利（Iṣṭakhri），仅需十天；而自 Ghaznī 至 Bāmiyān，據前者爲七日，據後者爲八天。既然兩書於後一里程所載頗爲一致，可知縛底耶不是 Balkh。[105] 今案：此說未安。

一則，說者以爲慧超所載縛底耶其實是 Baghlan。果然，從 Bāmiyān 往赴所需時日卽使不較赴 Balkh 者少，也決不可能是往赴後者所需之兩倍。

二則，慧超所載“廿日”僅僅是他個人從 Bāmiyān 抵達 Balkh 實際經過的天數，未必具有標誌兩地距離的價值。

八、《新唐書·西域傳》：“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卽吐火羅也。”“治藍氏城（卽監氏城）”的主詞是挹怛國。這說明，至少在《新唐書·西域傳》的編者看來，嚈噠國都與西遷大月氏的都城同在一處，均爲 Balkh。

九、薄提（薄提延）卽拔底延並非阿緩城（Warwālīz）。不僅對音不合，而且阿緩城素無“王舍城”之稱。

（六）嚈噠的朝貢

前篇多次涉及嚈噠的朝貢，但沒有作爲專題討論，在此擬略作補充。

關於嚈噠來朝,《魏書》、《周書》和《梁書》明確記載的凡二十二次。其中,最早的一次是《魏書·高宗紀》所載太安二年(456年)十一月,其時嚈噠勢力正值上昇時期。最後一次是《周書·明帝紀》所載明帝二年(558年)嚈噠國家已接近滅亡。

一般說來,來朝的嚈噠使者均由嚈噠可汗派遣。值得指出的是,據《梁書·武帝紀下》,普通元年(520年)三月丙戌,"滑國遣使獻方物"。而所謂《梁職貢圖》題記載這一次朝貢,"王妻□□亦遣使康符真同貢物"。嚈噠王妻稱可賀敦,與許多遊牧部族一樣,也參與政事和軍事,這次遣使是可賀敦插手外事的證據。

嚈噠國除自己來朝外,還允許其役使諸小國自行來朝,對此我已有較充分的說明,在此不贅。[106]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役屬嚈噠的小國有時還隨同嚈噠使者一同來朝。例如,據《梁書·西北諸戎傳》記載:

>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
>
> 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
>
> 胡蜜丹國,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

"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說明了這些小國與嚈噠之間的附庸關係。而據所謂《梁職貢圖》記載:

周古柯，滑旁小國。普通元年，隨滑使朝貢。圕表曰：一切所恭敬，一切吉具足，如天靜無雲，滿月明曜，天子身清靜，具足亦如此。爲四海弘願，以爲舟舫，揚州閻浮提，第一廣大國，人民佈滿，歡樂荘［莊］嚴，如天上不異。周古柯王頂禮弁拜、問訊天子□□。今上金□一、琉璃椀一、馬一疋。

呵跋檀，滑旁小國。普通元年，隨滑使囚貢。其［表］曰：最所寔恭敬吉天子，東方大地。呵跋檀王問訊囫一過，乃百千囫億，天子安（隱）［穩］。我今遣使手送此書，書不空故，上馬一疋、銀器一故。

胡蜜丹，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朝。其表曰：（楊）［揚］州天子出處，大國聖主，胡蜜［蜜］王名□圜，遙長跪合掌，作禮千万，今滑使到聖國，用附函啓，并水精鍾一口、馬一疋。聖主有若所敕，不敢有異。

則可確知這些小國使者雖然隨嚈噠使者來朝，卻有自己的國書，亦另備貢品。這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些小國與嚈噠附庸關係的實況。

又據《魏書·世宗紀》，永平二年（509年）正月壬辰，“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一”。歷來將這則記載視爲嚈噠和薄知國兩國一同朝魏的紀錄，但如果將這則記載與《魏書·高宗紀》同類記載加以比較：

太安二年（456年）十一月，“嚈噠、普嵐國並遣使朝獻”。

再考慮到周古柯等均自備貢品，似乎衹能認爲這是嚈噠國屬下小國薄知朝魏的記錄。“薄知”上冠以“嚈噠”二字，其隸屬關係真是再清楚不過了。

此外，應該提出來商討的問題是：嚈噠在456年首次朝魏之後，據《魏書·世宗紀》，直至正始四年（507年）冬十月辛未始有第二次朝貢。[107] 這兩次朝貢相隔長達五十年。而在這段嚈噠朝貢的空白時期，《魏書》記載了悉萬斤（Samarkend）頻繁的朝魏，說者以爲這是由於嚈噠忙於對波斯作戰，悉萬斤從其桎梏下解放出來獲得遣使自由的緣故。[108] 今案，此說有所未安。

這是因爲沒有嚈噠在上述與薩珊波斯鬬爭期間放鬆對索格底亞那控制的證據，卻有證據表明嚈噠屬下小國均有遣使朝貢的自由。因此，在嚈噠朝魏的空白時期，悉萬斤朝魏特別頻繁有可能是受嚈噠人指使的結果。

另外，嚈噠佔領索格底亞那以後，史稱“殺其王而有其國”，很可能不僅僅是扶植粟特人爲傀儡，而是置將監領之，猶如它在乾陀羅設立特勤政權一樣。該處朝魏最初以“粟特”的名義，在上述嚈噠朝魏的空白時期，纔有以“悉萬斤”名義朝魏的使團。因而所謂“悉萬斤國”實際上可能是嚈噠人在索格底亞那的一個地方政權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嚈噠另一個地方政權乾陀羅的朝貢記錄見諸《洛陽伽藍記》卷三：“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509

年）乾陀羅國胡王所獻"，也可參證。

以下是幾點補充：

一、《魏書·世宗紀》載：正始四年（507年），四月壬寅，"悉萬斤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月辛未，"嚈噠、波斯、渴槃陁……等諸國並遣使朝獻"。"悉萬斤"和"嚈噠"分別代表嚈噠地方和中央政權。前者從索格底亞那、而後者自吐火羅斯坦遣使。

二、《魏書·世宗紀》載：永平二年（509年）正月丁亥，"忸密……悉萬斤……諸國並遣使朝獻"。正月壬辰，"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一"。"忸密"是役屬嚈噠的索格底亞那小國。"悉萬斤"是嚈噠在索格底亞那的地方政權，"嚈噠薄知"則是役屬嚈噠的吐火羅斯坦小國。

三、永平二年（509年）之後，不復有以"悉萬斤"名義朝貢的使團，則也許表明此後嚈噠不再安排其地方政權朝魏，儘管對其役使諸國朝貢還是允許的。

■ 注释

[1]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8-33。

[2] 注1所引余太山書，pp. 33-39。

[3] 傳文似衍"勿"字。

[4] 以上三節參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學出版社，1958年，pp. 160-165。

[5] 參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pp. 178-180。

[6] 說見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78 年，pp. 382-450。今案：唐氏疑乞伏源出高車，毋寧說高車泣伏利氏來自乞伏。

[7] 參見注 6 所引唐長孺文。

[8] 參看注 4 所引姚薇元書，pp.107-108；注 6 所引唐長孺文；以及周偉州“魏晉十六國時期鮮卑族向西北地區的遷徙及其分佈”，《民族研究》1983 年第 5 期，pp. 31-38。

[9] 參見注 6 所引唐長孺文。注 5 所引陳連慶書，pp. 178-180，以爲如弗並非乞伏異譯，否則，“時又有乞伏部”一句便成贅語。今案：此說未安。

[10] 中華書局標點本作“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今按周偉洲說改，見所著《南涼與西秦》，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pp. 117-118。

[11] 注 4 所引姚薇元書 pp. 137-139，以爲所列內入諸姓未必皆於神元皇帝時內入。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屈突氏。魏有屈突氏始於登國十年（395 年）。今案：其說未必是。《魏書·屈遵傳》謂遵於魏太祖伐慕容垂時來歸。但這未必是魏有屈突氏之始。另有屈突氏先於屈遵在力微時已歸拓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12] 乙弗利亦見《魏書·高句麗傳》。

[13] 注 5 所引陳連慶書，p. 86，以爲“乙弗利”似是名非姓，因疑乙弗利與其他乙弗部落有關。今案：乙弗利即使是人名，其後成爲部落名是完全可能的。

[14] 日本京城府：古典刊行會，1931 年。

[15] 注 5 所引陳連慶書，p. 178，以爲乞伏氏之始祖傳說與拓跋氏獻帝鄰令其子聖武帝詰汾南移時遇神獸之口碑非常類似。今案：乞伏氏始祖傳說與

拓跋鮮卑有相彷佛處，乃其種類揉雜的反映。

[16] 這些高句驪人內徙的原因不詳。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六》（卷一八），故國原王十二年（342 年），慕容皝入侵，“虜男女五萬餘口”。又載廣開土王談德元年（392 年）九月北伐契丹，“招諭本國陷沒民口一萬而歸”。這些都說明其人在遼東者不在少數。

[17] 說見注 4 所引姚薇元書，p. 114。

[18] 說見注 6 所引唐長孺文。

[19] 說見注 4 所引姚薇元書，p. 82。

[20] 說見注 4 所引姚薇元書，pp. 84-85。

[21] 《大正新脩大藏經》，T50, No. 2060, p. 433。

[22] H. B. Dewing, tr.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New York, 1914.

[23] L. Dindorf, *Historici Graeci Minores*, II. Lipsiae 1871, pp. 132-392.

[24] B. C. Niebuhr, ed. Theophylacti Simocattae, *History (Greek and Latin text).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pars. XI. Bonn, 1828.

[25] *Zénob de Glag. Histoire de Daron*. See V. Langlois, *Collection des historiens ancients et modernes de l'Armenie*, vol 1. Paris 1867, p. 343; *Histoire de Lazare de Pharbe. Ibid.*, pp. 350-351.

[26] A. G. and E. Warner, tr. *Firdausī*, *Sháhnama*, vol. 7. London, 1915, pp. 164-165.

[27] C. E. Bosworth, tr.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Ta'rīkh al-rusul wa'l-mulūk*), vol. 5, The Sāsānids, the Byzantines, the Lakhmids, and Yem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107.

[28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1. London, 1942, pp. 204-205.

[29] J. W. McCrindle, tr. *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01, pp. 163-166.

[30] D. H. Velankar, ed. *Raghuvaṃśa of Kālidās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Mallināthа*. Bombay, 1948.

[31] D. C. Sircar, *Select Inscriptions, bearing on Indian History and Civilisation*. Calcutta, 1942, p. 312.

[32] Sudhākara Dvivedī, ed. *Bṛhatsaṁhitā* of *Vārāhamīhir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Bhaṭṭotpala*. Banaras: Saṁvat 1895-97.

[33] 《廣集》（XIV, 27）還提到印度北部有 Hālā Hūṇa，似與嚈噠無關。除《廣集》外，Hālā Hūṇa 還見於 V. S. Sukthankar, ed. *Mahābhārata* (Sabhāparva, Digvijayaparva, Adhyāya 29, ś l, 11). Poona, 1933.

[34] G. Moravcsik, *Byzantinoturcica, die Byzantinischen Quellen der Geschichte der Türkvölker*, II. Berlin, 1958, pp. 231-237.

[35]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中華書局，1985 年，p. 63。

[36] 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 40（注 11）。

[37] 說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44-65。

[38] 應即《晉書·乞伏國仁載記》所見祐鄰。“祐”、“拓” 形近易訛，未知孰是。

[39]《晉書·乞伏國仁載記》稱祐鄰於 “率戶五千”，乃遷夏時部衆之數，此處作 “率戶五萬”，乃 “部衆稍盛” 後的情況。參看注 10 所引周偉洲書，pp. 117-118。

[40] 見内藤みどり關於注 1 所引余太山書的評論，載《東洋學報》70 ~ 3·4（1989 年），pp. 167-176。

[41] 嚈噠有可汗、可敦見注27所引《泰伯里史》, pp. 94-99。嚈噠有葉護(Jovula), 見印度匈奴亦即嚈噠之銘文：G. Bühler, "The New Inscription of Toramana Shaha." *Epigraphia India* I (1892): pp. 238-241。嚈噠有特勤見《洛陽伽藍記》卷五所引宋雲等"行紀"。印度之匈奴即嚈噠人有剺面之風，見注30所引 Kālidāsa 書 IV, 68。《梁書·西北諸戎傳》載滑國即嚈噠人有截耳之風。嚈噠人有殉死之風見注22所引普洛科庇烏斯書（I, iii)。

[42] 《晉書·石季龍載記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 又，《太平御覽》卷一二〇引《後趙錄》同。

[43] 寧夏固原博物館《固原北魏墓漆棺畫》, 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8年, pp. 1-13。

[44] 注43所引書以爲在太和十年(486年)左右。孫機"固原北魏漆棺畫",《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pp. 122-138，pp. 122-138，以爲在太和八年（484年）至十年。

[45] 注44所引孫機文。

[46] 詳見羅豐"固原漆棺畫に見えるペルシャの風格",《古代文化》44 ~ 8(1992年)，pp. 40-52。

[47] M. M. 梯亞闊諾夫"邊吉坎特的壁畫和中亞的繪畫", 佟景韓、張同霞譯,《美術研究》1958年第2期，pp. 77-102。有關肖像見該文所附圖十（遺址六1號室西牆、北牆壁畫)。

[48] 注1所引余太山書，pp. 44-62。

[49] 同注40。

[50] O. J.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Studies 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London,

1973, pp. 18-20.

[51] 参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66-74。

[52] 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 99。

[53] 關於 Kidāra 的錢幣見 M. F. C. Martin, "Coins of Kidāra and the Little Kuṣāṇ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 3, 1937, No. 2 = *Numismatic Supplement*, No. 47, pp. 23-50。

[54] 詳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66-74。

[55] 大月氏國無疑包括在董、高西使歸國後所作報告之中。不僅在敍述當時通西域的"四道"時涉及大月氏，而且計算大月氏國王治去代距離的方法也和董、高報告中提到的其他西域國家一樣。參看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0 年，pp. 173-186；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0 ~ 3(1958 年)，pp. 1-52。

[56] R. W. Thomson, tr. *Ełishē, History of Vardan and the Armenian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63-64, 66.

[57] 注 55 所引榎一雄文。

[58] 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78-80。

[59] R. C. Blockley,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ARCA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exts, Papers and Monographs 10. Francis Cairns, 1981-1983.

[60] H. W. Haussig, "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Byzantion* 23 (1953): pp. 275-462, esp. 353.

[61] 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70-74。

[62] W. Wright, *The 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 with a English Translation into and Notes*. Cambridge, 1882.

[63] 注 27 所引《泰伯里史》，pp. 107-109。

[64] 注 26 所引 Firdausī 書，pp. 157-158。

[65] 參看內田吟風“吐火羅（Tukhāra）國史考”，《東方學會創立 25 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72 年，pp. 91-110。

[66] 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85-87。

[67] A. Biswas,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ūṇas in India*. Delhi, 1973, pp. 45-53.

[68] A. D. H. Bivar, “The Kushano-Sassanian Coin Serie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18 (1956): pp. 13-42.

[69] 注 53 所引 M. F. C. Martin 文。

[70] A. Cunningham, “Later Indo-Scythians.”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3, 13 (1893), pp. 184-202.

[71] J. F. Fleet,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3, Inscriptions of the Early Gupta Kings and their Successors, Calcutta, 1888, No. 1.

[72] 參看注 67 所引 A. Biswas 書，p. 46，注 6。

[73]《魏書·西域傳》“寄多羅爲匈奴所逐”，《通典·邊防八·西戎四》（卷一九二）“匈奴”作“蠕蠕”，不可從。參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70-74。

[74] 參看注 55 所引榎一雄文。

[75] 注 71 所引 J. F. Fleet 書，No. 13。

[76] 注 71 所引 J. F. Fleet 書，No. 14。

[77] 注 67 所引 A. Biswas 書，p. 49。今案：比泰里石柱銘文“在戰場上擊敗強大富有的敵人之後，他將左足踏上王座的足凳”（L. 10）云云，似乎暗示擊退“匈奴”的時間爲塞建陀笈多卽位之初。參看 U. Thakur, *The Hūṇas in India*. Varansi, 1967, pp. 67-69。

[78] 注 67 所引 A. Biswas 書，p. 48（注 1-6）。

[79] 注 77 所引 U. Thakur 書，pp.86-185; 注 67 所引 A. Biswas 書 , pp. 56-67。否定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是匈奴的代表作有 K. B. Pathak, “New Light on the Gupta Era and Mihirakula.” *Indian Antiquary* 47 (1918): pp. 16-22; K. G. Sankar, “The Hun Invasion of Industān.” *New Indian Antiquary* 4 (1941-42): pp. 36-43。

[80] 注 71 所引 J. F. Fleet 書，No. 36。

[81] 注 71 所引 J. F. Fleet 書，No. 19。

[82] A. Cunningham, “Later Indo-Scythians.”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3, 14 (1894): pp. 243-293, esp. 252.

[83] 參看注 67 所引 A. Biswas 書，p. 63。

[84] 注 71 所引 J. F. Fleet 書，No. 20。

[85] 注 41 所引 G. Bühler 文。

[86] 注 71 所引 J. F. Fleet 書，No. 37。

[87] J. F. Fleet, “The Coins and History of Toramana.” *The Indian Antiquary* 18 (1889): pp. 225-230, esp. 226.

[88] 見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135-141。對這個問題最重要的研究是桑山正進“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エフタル・テュルクとその城邑”，《三笠宮殿下古稀記念オルエント學論集》，小學館（1985 年），pp. 140-154; Shoshin

Kuwayama, "The Hephthalites in Tokharistan and Northwest India." *Zinbun: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Number 24 (1989): pp. 89-134。

[89] 宋雲進入嚈噠國時，已屆十月，故與嚈噠王會面之處，很可能便是嚈噠王冬季宿營地。應該指出的是，這一宿營地，以及當時可能存在的夏季宿營地與後來的嚈噠都城之間並無必然聯繫。而且很可能不在一處。定都是嚈噠人由遊牧走向定居的重要標誌，所選擇都城的位置，一般說來應該適應定居生活的需要，不言而喻其形勢與遊牧時冬夏宿營地不同。質言之，宋雲的有關記載對於探討嚈噠都城的位置價值不大。

[90] 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 1985.

[91] J. Markwart,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pp. 33-39.

[92] 吐呼羅亦作"兜佉羅"或"兜佉勒"，後二者在四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史籍中已經出現。這可能是貴霜帝國衰落後吐火羅人曾一度獨立的緣故，不過這個吐火羅人的政權後來被寄多羅月氏所征服，因此董琬西使但聞月氏，不知有吐呼羅。然而更可能是"兜佉羅"僅用作族名，並非國名。

[93] 注 88 所引桑山氏文。

[94]《元和郡縣圖志·河東道三》(卷一四) 載雲州 (雲中郎代)"西南至上都 (長安) 一千九百六十里"。

[95] 桑山氏注 87 所引文以爲：《大唐西域記》有關國都大小的表述有十餘里、十四五里、十五里、十六七里和二十餘里五種，知"十餘里"與"十四五里"迥然有別，不能混爲一談。今案：此說似有未安。一則，《魏書》所

謂“周市六十里”亦不過約數，未必換算成“方十五里”正。二則，一般情況下用“十餘里”表述，是因爲不知確切里數，客觀上包括十五以下、十里以上里數。

[96] 參見 H. W. Bailey, “Kanaiṣ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p. 14-28; 以及注 54 所引榎氏文。

[97] 注 88 所引桑山氏文似以爲在四、五世紀時 Balkh 被稱爲 Baχl，故不可能譯作“薄提”或“拔底延”等。今案：其説未安。上述 Balkh 古稱出現兩個系列，據研究，不過是音轉的結果，名稱本身並未變化。沒有證據表明四、五世紀時 Balkh 的稱呼僅僅流行 Baχl 一種（或僅僅是第二系列）。更何況地名使用古稱和恢復使用古稱是常有的現象。

[98] 注 27 所引《泰伯里史》，pp. 152-160。

[99] 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70-71。

[100] 注 55 所引松田壽男書，pp. 178-204。

[101]《梁職貢圖》白題國使臣圖題記稱：白題國“在滑國東，六十日行，西極波斯，二十囗囗”。今案：作“六十日”似誤。

[102] 榎一雄“エフタル民族の起源”,《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 東京: 講談社，1951 年，pp. 133-150；以及注 54 所引文。

[103] J. Marquart,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1901, p. 231; 以及注 91 所引書，p. 44。

[104]《冊府元龜》卷九六四：“[開元] 十七年（729 年）正月冊吐火羅骨咄祿頡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悒怛王”。這位吐火羅葉護悒怛王的都城應在 Balkh。

[105] 桑山正進“バーミヤーン私注”,《建築史學》2（1984 年），pp. 127-150。

[106] 注 1 所引余太山書，pp. 129-135。

[107]《魏書·世宗紀》景明三年（502 年）："是歲，疏勒、罽賓、婆羅捺、烏萇、阿喻陁……不崙、陁拔羅……斯羅、噠舍……羅槃、烏稽、悉萬斤、朱居槃、訶槃陁、撥斤、厭味……南天竺……諸國並遣使朝貢。""厭味"疑爲"嚈噠"之奪訛。果然，則嚈噠第二次朝魏在 502 年。

[108] 注 88 所引 S. Kuwayama 文。

二　Aλχονο 錢幣和嚈噠的族屬

關於 αλχονο 錢幣

1. 紐約羅森收藏品（Rosen Collection）中，有一枚柘榴石橢圓形印章，刻一男子半身像，臉朝右，高鼻深目，蜷髮，留有上髭，像下方是樹葉圖案。臉右方是一行巴克特利亞文銘文：αλχονο。[1]

另有一類德拉克麥（drachma）銀幣（Göbl1967, Em. 36）[2]：正面是薩珊波斯沙普爾二世（Shapur II，309—379 年）半身像，臉朝右，雉堞冠，留上髭，虯髯，戴耳環、項鍊。像周是一圈鉢羅婆文（Pehl.）銘文：mzdysn bg '(šhpwhr ') MLK' n MLK' 'yr' n MNW cytr' MN yzd' n（馬茲達的崇拜者、神聖的［沙普爾］、伊朗眾王之王、眾神後裔），在原應是沙普爾名字的位置上，卻是巴克特利亞文（baktr.）：ΑΛΧΟΝΟ。像右側是一個戳记，據說是最典型的嚈噠戳记[3]。反面是拜火祭壇，左右各有祭司一，中央火焰之上爲 Zarathustra 半身像。

一說這種印章、錢幣屬於 Ammianus Marcellinus[4] 所載

Chionitae,[5] 而“嚈噠”與“Chionitae”衹是同一部族的不同名稱,[6] 嚈噠也可能衹是 Chionitae 部落之一。[7]

今案：根據比較可信的說法：αλχονο 即 hala-hūṇa。[8] 既然 αλχονο 出現在錢銘中，揆情度理，可見鑄幣人以此爲國族名，αλχονο 應理解爲 Qara-Hūṇa。Qara 意爲“高貴”，亦見於後世 Qara 契丹等。

既然 χονο 即 Hūṇa，而 Ammianus Marcellinus 所載 Chionitae 一名是中古伊朗語詞根 xiyōn(意为“匈奴”)，加上希臘文後缀 -ιται (意为“部落”) 构成,[9] 則不妨將 χονο 與 Chionitae 勘同，進而認爲 Chionitae 也可能自稱 αλχονο (Qara-Hūṇa)。

但是，Ammianus Marcellinus 所載 Chionitae 有可能自稱 Qara-Hūṇa 並不等於刻有 αλχονο 的印章或錢幣均屬於這 Chionitae。這是因爲公元四世紀中葉以降，“匈奴”已成泛稱，在歐亞草原上有許多遊牧部落自稱或被稱爲“匈奴”。[10] 凡自稱“匈奴”者均有可能在“匈奴”前冠以“Qara”。不能僅憑 χον 或 αλχονο 這一稱呼就作同一認定。

2.《魏書·西域傳》“粟特國條”的“匈奴”就是嚈噠，但不能因此認定嚈噠就是 Ammianus Marcellinus 所載 Chionitae (XVI, 9, 4; XVII, 5, 1)。

一則，如前所述，降至公元四世紀中葉，已有若干不同的部落或部族自稱或被稱爲“匈奴”，不能僅憑名稱勘同。

二則，據 Ammianus Marcellinus，Chionitae 有王名 Grumbates，隨沙普爾二世遠征拜占庭，其子戰死於阿米達 (Amida，今土耳其

Diyarbakir）城下，“於是，宣告休戰，按其本族的葬禮哀悼這位出身高貴、深受愛戴的青年。如同往常一樣，他全副武裝，被擡出來，放置在一個高大的平臺上，周圍分佈著十個臥榻，榻上各有一具模型，製作精細，酷肖逝者。七日之內，公眾和（王子生前的）伴當一起宴飲，舞蹈和吟唱某種哀傷的挽歌（以悼念王子）”。（XIX, 1.10）王子的“遺體被火化後，骨灰被收集起來裝入一個銀甕之中。蓋其父決定將骨灰帶回故土，委之大地”。（XIX, 2.1）這些描述表明，這位王子被火化是按照 Chionitae 本族的葬禮進行的，不是因軍旅在外而採取的權宜之舉。所謂“帶回故土，委之大地”，也可能是將骨灰撒在故鄉，未必是埋入土中。而《魏書·西域傳》卻載嚈噠人葬俗：“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

由此可知，Ammianus Marcellinus 所載 Chionitae 和嚈噠兩者喪葬習俗迥然不同。僅憑這一點，就很難將兩者作同一認定。這也反過來證明了名稱相同實質並不相同。

三則，嚈噠度阿爾泰山西遷粟特（Sogdiana）的時間。漢文史料沒有明確記載，祇能從以下兩個途徑推斷：

a.《魏書·西域傳》載：“嚈噠國，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至高宗時已八九十年矣。”嚈噠首次朝魏既在高宗太安二年（456 年），其人自塞北度金山卽阿爾泰山南遷的時間可自 456 年上溯“三世”（80—90 年），約爲 366—376 年。這就是說，嚈噠征服索格底亞那應該在 366—376 年間或稍後。

b.《魏書·西域傳》載：“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高宗（文

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世矣。”按之《魏書·高宗紀》，高宗即位後粟特國首次來朝爲太安三年（457 年）。既然其時“匈奴”統治“粟特”“已三世矣”，這一次遣使者可能是已經是征服了粟特的“匈奴”。果然，則嚈噠征服索格底亞那的時間可自 457 年上溯“三世”（80—90 年），得 367—377 年。

按以上兩種途徑推算，得出嚈噠人西遷 Sogdiana 的時間大致相仿：公元四世紀六七十年代。而據 Ammianus Marcellinus，Chionitae 出現的時間是 356—359 年。由此可見，Chionitae 和沙普爾二世發生關係之際，嚈噠人尚未遷至 Sogdiana，焉能威脅波斯東境，或隨波斯王遠征拜占庭。

至於《魏書·西域傳》“粟特國條”所傳“匈奴”之王名“忽倪”[xuət-ngye]，也許根本不是王名，衹是“匈奴”之音訛。

3. 既然《魏書·西域傳》所載“匈奴”就是嚈噠，嚈噠人也就有可能自稱 αλχονο。但是，按照前面所說的理由，不能將刻有 αλχονο 的印章或錢幣全部歸屬於嚈噠。毫無疑問，自稱或被稱爲“匈奴”的部族均有可能採用 αλχονο 一號，不獨嚈噠爲然。

《魏書·西域傳》稱被嚈噠佔領的粟特國爲“溫那沙”。“溫那沙”[uən-na-shea] 應該就是若干錢幣上常见 αλχονο þαυο 或 þαυο αλχονο 之漢譯。但是，這些刻有 αλχονο þαυο 或 þαυο αλχονο 之錢幣卻未必可以全部歸屬嚈噠。因爲 αλχονο 未必指嚈噠，þαυο 這一官號也不是嚈噠獨有。

因此，目前可以肯定的似乎僅僅是，嚈噠進入中亞後使用過錢幣。但是，傳世的這一時期的錢幣中，究竟哪些是嚈噠人自己

鑄造的，尚不能肯定。錢幣和文獻作爲研究資料有著質的區別，將兩者掛鉤，不能不慎之又慎。

4. 最早的 αλχovo 錢幣爲仿製沙普爾二世的錢幣，表明仿製者最初接觸薩珊波斯，是在沙普爾二世時代（309—379年）。最晚的 αλχovo 錢幣鑄於卑路斯時期，即 465—484 年間或稍後，這是 αλχovo 錢幣年代的下限。[11]

果然，最早的 αλχovo 錢幣很有可能是 Ammianus Marcellinus 所載 Chionitae 人的作品。但似乎不太可能是嚈噠人的作品。後者剛自金山南下，在 Sogdiana 立足未穩，缺乏一個適應新環境的過程。

另外，也不能認爲此後的 αλχovo 錢幣均出諸嚈噠人之手。因爲 αλχovo 錢幣至少可以大別爲 5 類：第一類：僅有錢銘 αλχovo 的錢幣；第二類：αλχovo Khingila 錢幣；第三類：Oλχovo Rājā Lakhāna 錢幣；第四類：仿卑路斯錢幣；第五類：αλχovo þovo Zooβλ 錢幣。[12]

不僅錢銘有異，風格也不同。由於存在仿製的可能性，這五組錢幣歸屬難定，其主人至少有 Ammianus Marcellinus 所載 Chionitae、嚈噠、Lakhana 王、Khingila 和 Zoobl 五者，仿製者姑置勿論。這就是說，至少有五個部落或部族被稱或自稱爲“匈奴”。Ammianus Marcellinus 所載 Chionitae 並非嚈噠已如前述，Lakhana 王、Khingila 和 Zoobl 三者究竟代表何種部落或部族也有待進一步研究。我們目前祇能說 αλχovo 錢幣主要是 300—500 年間，中亞一些自稱或被稱爲“匈奴”的部族或部落的作品，可能還包括不明部落的仿製品以及仿製品的仿製品。

要之，沒有證據表明，αλχονο錢幣是同一部族在不同時代的作品，更不能逕指爲嚈噠人的作品，即使蓋上所謂典型的嚈噠戳記者也不例外。這是因爲所謂嚈噠戳記並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它屬於嚈噠。退一步說，即使能夠證明它確實是嚈噠人的標記，也不過說明嚈噠人在一些錢幣上、更可能是一些本來不屬於嚈噠人的錢幣上，蓋上了自己的標記，如此而已。也就是說，打上嚈噠戳記的錢幣未必均可歸屬嚈噠，甚至可以將這些戳記看做這些錢幣屬於嚈噠的反證。更何況，戳記同樣可以倣製，而且要簡單得多，也就是說打有嚈噠戳記者也未必是與嚈噠直接有關的錢幣。嚈噠一度十分强大，其他人倣製其戳記的動機是存在的。

關於嚈噠的族屬

嚈噠的族屬是一個經久不息的話題。諸說中，伊朗說似乎信從者較多，論證常圍繞其人的體貌特徵和語言展開。[13] 茲就這兩方面再作審視。

一、關於體貌特徵，說者舉出以下證據：

1. 印章

說者認爲：在嚈噠統治過的地區（如阿富汗、西北次大陸）發現了若干年代爲四至六世紀的肖像印章。其中刻有所謂嚈噠戳記者，可歸屬嚈噠人。其上所刻人物肖像的體貌爲典型的歐羅巴種。在刻有嚈噠戳記的印章中，更有若干刻有巴克特里亞文銘文，

有些銘文的內容可確認與嚈噠有關，進而證實這些印章屬於嚈噠人、其肖像正是嚈噠人的形像。

例一：一枚頭像右側有巴克特利亞文銘文 OCBOPOBIOO = Asβārβiδ（騎兵司令）。嚈噠無疑擁有强大的騎兵，指揮騎兵肯定須有 asbarobido（騎兵司令）。[14] 騎兵司令一職應由嚈噠人、而不大可能由其治下居民如吐火羅人出任。

例二：臉的右側有一條巴克特利亞文銘文：αλ-χονο。如前所述，嚈噠人亦有“匈奴”一號。

今案：此說未安。

一則，如前所述，有銘文 αλ-χονο 的印章未必與嚈噠有關。

二則，嚈噠固然有騎兵，也可能有類似“騎兵司令”一類的職務。但並不是衹有嚈噠人纔設“騎兵司令”。因爲嚈噠治下諸國（包括吐火羅）均有自治權，擁有自己的騎兵從而也任命司令亦屬情理之中。

2. 錢幣

說者認爲：屬於嚈噠的錢幣多半模仿貴霜、笈多和薩珊錢幣之樣式。其上刻劃的國王肖像酷似貴霜、笈多和薩珊國王之肖像。雖不能通過這些肖像判定嚈噠國王的體貌特徵，但這些肖像上沒有任何因素可以使人聯想到嚈噠人是蒙古利亞種，或者說找不到可以否定嚈噠人是歐羅巴種的因素。可注意的是，這些錢幣肖像的模仿不是一成不變，一些仿製品在比例和形像方面出現了變異，而當這種變異和嚈噠戳記或巴克特利亞文銘文 αλ-χονο 同時出現時，就有理由推測，這是在有意刻劃嚈噠國王的相貌。再考慮到

鑄幣主要是嚈噠人的權利，這種可能性就更大了。

今案：此說未安。

一則，如前所述，有錢銘 αλ-χovo 的錢幣未必與嚈噠有關。

二則，即使 αλ-χovo 是嚈噠人刻上的，也不能說明錢幣上的肖像便是嚈噠王的形像。既然這些錢幣是仿製品，錢幣上的王者肖像便是主要的仿製對像。如果連肖像都不能成功仿製，也就談不上仿製了。

三則，肖像的比例等出現變異，可能是鑄錢的水平有問題，也可能是原件的肖像有了偏差，而沒有任何理由將這些仿製品肖像的變異看做刻畫嚈噠王肖像的嘗試。

四則，不能認爲衹有嚈噠人纔有鑄錢的權利，嚈噠治下諸國很可能也有類似的權利。事實上，嚈噠人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阻止其屬國錢幣甚或私錢的流通。

3. 壁畫

說者認爲：撒馬爾罕北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遺址 1 號室西牆和南牆均有表現赤鄂衍那（Chaganiyan）使臣的壁畫，使臣形像均有歐羅巴種特徵無疑。一說赤鄂衍那乃嚈噠亡國後其餘種所建小國之一。南牆的壁畫可能是送嫁圖，繪有騎在駱駝上的兩位赤鄂衍那使臣，一位臉色紅潤，另一位膚色白皙。[15] 中古波斯、拜占庭和印度史料中曾提及“紅”匈奴和“白”匈奴，這可能反映了嚈噠內部不同族群的差別。上述兩位赤鄂衍那使臣，正是這種區別在壁畫藝術中的反映。[16]

今案：其說未安。何以見得上述壁畫表現的是赤鄂衍那使

臣？即使赤鄂衍那是嚈噠餘種所建小國，何以見得兩使臣之臉色或膚色不是藝術加工、而是種族特徵？何以見得“紅匈奴”和“白匈奴”乃指嚈噠內部不同族群？嚈噠既被稱爲“白匈奴”，“紅匈奴”怎麽可能也指嚈噠？凡此種種既未定讞，嚈噠族屬的結論又從何推出？

4. 中國文獻

說者以爲：《周書·異域傳下》“于闐國條”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按之《周書·異域傳》的內容，所謂“高昌以西”無疑包括同傳所載嚈噠即嚈噠國。

今案：如果《周書·異域傳》所依據的資料確實經過了調查，而不僅僅是籠統而言，那末《周書·異域傳》這則記載客觀上將嚈噠人包括在“深目高鼻”之列，說明降至此傳描述的年代，在中亞的嚈噠人至少在體貌特徵方面已經走完了他們和土著同化的過程。

據《魏書·西域傳》，嚈噠有衆不過十萬，早在四世紀中葉就越金山西遷索格底亞那，從此進入了歐羅巴種的汪洋大海。後來立國於吐火羅斯坦，“吐火羅”即“大夏”。早在《史記·大宛列傳》描述的時代，“大夏”即吐火羅人已多達百萬。《魏書·蠕蠕傳》載，嚈噠王有三妻，皆柔然主婆羅門姐妹，知嚈噠實行族外婚，故其人在入主吐火羅斯坦後，難免與土著通婚。區區十萬嚈噠人，不可能不迅速土著化。

5. 西方文獻

拜占庭史家 Procopius [17] 有一則記載，常常在討論嚈噠族屬時被提及：

> 嚈噠人並不遊牧，久居良田沃土，和其他匈人不同。因此，他們從不進犯羅馬領土，除非和米底（Media）軍隊在一起。嚈噠人是匈人中唯一膚色較白，面目亦不甚醜陋的一支。他們生活方式確實並不野蠻，與其血親殊異。嚈噠人由一位國王統治，而由於有法可依，個人之間及與鄰國交往時總是服從公道和正義，與羅馬人、波斯人相比毫不遜色。(I, iii)

說者以爲：Procopius 所載其實並非嚈噠人，而是嚈噠治下之吐火羅人。蓋其人與吐火羅國雜居，導致了誤判。[18]

今案：嚈噠人與吐火羅人雜居，見載於《隋書·西域傳》。而在《隋書·西域傳》描述的時代，嚈噠政權已亡，故其人與土著雜居。而在 Procopius 描述的時代，嚈噠人作爲宗主，統治階層固不待言，一般嚈噠人的地位也一定高於土著，不難區分也。

再說，《隋書·西域傳》"吐火羅國條"載其人"與悒怛雜居"，說明即使在嚈噠國亡後，兩者的區別還是明顯的，否則也就不會提及"雜居"了。

稱嚈噠人"膚色白皙"，若非其人原本如此[19]，當是與土著通婚的結果，如前所述，嚈噠人實行族外婚。

至於 Procopius 稱嚈噠人定居、法制不亞於羅馬、波斯，是他

所獲的情資不夠全面的緣故。據《洛陽伽藍記》卷五載宋雲等行紀，直至518年，嚈噠王遊牧之習未改。宋雲稱其王施政的方式爲“遊軍而治”。須知嚈噠征服中亞諸國後，並沒有把這些國家一一消滅，衹是强迫它們納貢稱臣。一般說來，在嚈噠勢力範圍内的小國，都有自己的政權，有自己的國君，有自己的領土，有外交的權利，有信仰的自由。[20]而所謂“遊軍而治”，顧名思義，就是嚈噠王率領軍隊巡視各地，監督這些屬國的施政，彈壓可能出現的反叛。

《魏書·西域傳》的“吐呼羅國”也是嚈噠人扶植的這樣一個傀儡政權。一般說來，這“吐呼羅國”與其它在嚈噠勢力範圍内的小國並無兩樣，其特殊之處僅僅在於這吐火羅國所在正是嚈噠的統治中心。也就是說，這一自治政權很可能是處在嚈噠王以及吐火羅國主的雙重管轄之下。Procopius所記述的應該就是這樣一個嚈噠人爲宗主、吐火羅人自治的國家。

當然，Procopius描述的定居在良地沃土上的，不遊牧的居民，不僅包括吐火羅人，也可能包括部份嚈噠人。蓋嚈噠人，特別是其下層，從遊牧逐漸轉向定居、農耕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順便說一下，Procopius稱嚈噠人“面貌亦不甚醜陋”，無非表明在他心目中嚈噠人的形像勝過其預期。或指《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所載呬摩呾羅人爲嚈噠餘種，[21]其實並無依據，故玄奘稱其人“形貌鄙陋”，與Procopius關於嚈噠人“不甚醜陋”的記載並不存在矛盾，沒有解釋之必要。

要之，卽使後退一步，承認說者所指印章、錢幣、壁畫上的

肖像全部是嚈噠君主的肖像，依然無從據以說明嚈噠人的族屬。蓋無法排除其人在西遷後因與歐羅巴種通婚以致體貌特徵產生變化的可能性。如所週知，這類體貌特徵的變化最少一代人就可以形成。

其實，傳世文物中，對於判斷嚈噠族屬最有意義的是所謂《梁職貢圖》[22] 滑國使臣之肖像。其像：蓬頭、翦髮、無髭鬚，鼻亦不甚高大。但是，說者又對來使是否嚈噠人表示懷疑，並指出其人可能是柔然或高車人。蓋據《魏書·蠕蠕傳》，柔然主“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姐妹也”。可見柔然與嚈噠關係密切，嚈噠統治階層中可能有柔然人的外戚集團。因此，由柔然人充任使者不是不可能的。而據《魏書·高車傳》，“肅宗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脚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嚈噠”。可知在嚈噠內部高車人的數量一定不少。高車人作爲使者被派遣至蕭梁也是可能的。

今案：外戚集團之類不過想像的產物。而據《魏書·高車傳》，彌俄突死後，“經數年，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不難想見，投奔嚈噠的彌俄突部眾會隨伊匐還國。儘管如此，在嚈噠人內部有一定數量的柔然人和高車人是非常可能的，但這不等於嚈噠王一定讓柔然或高車人充任使者。更何況，即使有柔然或高車人充當嚈噠國使臣，《梁職貢圖》的滑國使臣圖肖像也不可能取材於這些柔然或高車人。

一則，“萬國衣冠拜冕旒”，一直是歷代中原王朝經營四夷的重要動因，堪稱國之大事。蕭梁繪製《職貢圖》正是爲了表現萬

方來朝，以粉飾太平，因而對來使必然仔細甄別，以“驗明正身”。試看所謂《梁職貢圖》其餘諸國使臣圖像之形容並無錯訛，足以爲證。

二則，嚈噠與梁並非罕通之國。滑卽嚈噠使臣正式朝梁，見載於《梁書》者已達五次，雙方民間往來更加頻繁可以想見。由此可見，蕭梁對嚈噠人有足夠的了解，決不至於不能辨識，而所謂《梁職貢圖》得以傳世是首先得到時人認可的。

三則，梁人與柔然交往密切，據《梁書·武帝紀中》，天監十四年（515 年）“二月庚寅，芮芮國遣使獻方物”。天監十五年（516 年）秋八月，芮芮“遣使獻方物”；據《梁書·西北諸戎傳》，十四年朝貢，“獻烏貂裘”。又據《梁書·武帝紀下》大通二年（528 年）“正月乙酉，芮芮國遣使獻方物”。中大通元年（529 年）二月“辛丑，芮芮國遣使獻方物”。大同四年（538 年）三月“癸未，芮芮國遣使獻方物”。大同七年“秋九月戊寅，芮芮國遣使獻方物”；據《梁書·西北諸戎傳》，這次朝貢，“獻馬一匹，金一斤”。《梁書·西北諸戎傳》還稱：芮芮於“普通元年（520 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值得注意的是柔然朝梁要早於嚈噠。

高車，梁人稱“丁零”，蕭梁雖與其人並無直接來往，但亦非一無所知。《梁書·西北諸戎傳》記載：“芮芮國……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移其居。天監中，始破丁零，復其舊土。”可證蕭梁對於北魏的與國高車的活動一直是密切注意的。

這就是說，從蕭梁對柔然、高車頗爲瞭解這一角度來考慮，也不能認爲《職貢圖》的滑國使臣實際上是以柔然或高車人爲模

特的。

四則，據《魏書·西域傳》，嚈噠人“頭皆翦髮”。出現在《梁職貢圖》上嚈噠使臣的髮式正是翦髮！而與此相對，柔然人的髮式是辮髮。《魏書·高車傳》載：高車主彌俄突“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這可證柔然人辮髮。

至於高車，《隋書·鐵勒傳》載鐵勒“其俗大抵與突厥同”，《隋書·突厥傳》則稱突厥之俗“被髮左衽”，而高車正是鐵勒之前身，可見其人亦非翦髮者。

這就是說，在裝束上，嚈噠和柔然、高車有清楚的區別，不可能混淆。

五則，柔然人、高車人不僅與嚈噠人在習俗上有很大不同，而且《魏書·西域傳》明載，嚈噠人的語言也與柔然、高車不同。

嚈噠是當時西域大國，不僅遣使蕭梁，還屢次遣使北魏等，其人之體貌特徵必然廣爲人知。當梁人欲圖畫嚈噠人形容時，無疑會根據對其人的瞭解，選擇來使中最爲典型者。張冠李戴的幾率是非常之小的。

退一步說，即使歷次朝梁之嚈噠使臣均來自受嚈噠役使之蒙古利亞種諸國，梁人竟未能辨別，也衹能認爲是嚈噠人作爲蒙古利亞種的體貌特徵已經深入人心的緣故。再說，嚈噠朝梁使團中並不是沒有伊朗人。據所謂《梁職貢圖》的滑國使臣圖題記，普通元年（520 年），嚈噠“王妻□□亦遣使康符真，同貢物”。康符真可能就一個索格底亞那人。但出現在《梁職貢圖》上的並不是深目高鼻的索格底亞那人形像，再好不過地說明了梁人對於嚈噠

人容貌的認知。這一認知的基礎正是嚈噠人和中原各政權的頻繁交往，因此是可信的。

二、關於語言，說者指出：嚈噠統治吐火羅爲時不短，其語言不應在新出巴克特利亞文文書[23]、特別是在年代爲 639 年之前文書中了無痕蹟。事實上，在上述文書中沒有發現突厥語或蒙古語的借詞。這表明嚈噠語屬印歐語系，很可能是一種中古伊朗語。

今案：此說未安。

1. 某種證據沒有找到，決不等於這種證據並不存在。在巴克特里亞活動過操各種語言的族群，其語彙或其殘骸是否留在上述巴克特里亞文文書中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因爲在這些文書中找不到某種語言的語彙或其殘骸，便推斷操這種語言的族群從未在巴克特里亞活動過。

同理，沒有理由認爲這些可能存在的突厥語或蒙古語借詞必然會出現在巴克特里亞文文書中！在 639 年之前的巴克特利亞文文書沒有發現突厥語或蒙古語的殘骸，並不足以證明在文書描述的時代巴克特里亞沒有活動過操突厥語或蒙古語的族群。

2. 在年代爲 639 年以前的巴克特里亞文文書中找不到突厥語或蒙古語的借詞不僅不能說明在這此年代之前在巴克特里亞沒有活動過操這些語言的族群，而且不能說明在這此年代之前的巴克特里亞文文書中不存在突厥語或蒙古語借詞，至多說明含有這種借詞的巴克特里亞文書尚待發現而已。

3. 即使嚈噠人爲伊朗語族，也應該看到嚈噠和其他遊牧部族一樣，不是一個單一血統的部族，在嚈噠內部可能包括阿爾泰語

系諸族。正如說者所指出，既可能有柔然人，又可能有高車人。柔然操蒙古語、高車操突厥語，按照說者的邏輯，這些阿爾泰語系的語彙或其殘骸豈不均應在639年以前的巴克特里亞文文書中被發現？這樣的殘骸終於沒有留下，豈不正好說明阿爾泰語系諸族的活動未必會在這些文書中留下痕跡麽？

4. 說者將巴克特里亞文文書中所見突厥語彙完全歸諸繼嚈噠之後統治巴克特里亞的突厥人。但是，突厥佔領巴克特里亞時，不可能將當地的嚈噠人趕盡殺絕。也就是說，如果嚈噠人操突厥語，按照說者的邏輯，又何以見得這些殘存在巴克特里亞文文書中的突厥語彙並非來自嚈噠餘種呢？

5.《梁書·西北諸戎傳》明確記載，滑卽嚈噠人"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很難設想，"旁國胡"會用自己的文字記錄下嚈噠人的語言。"使旁國胡爲胡書"這一嚈噠人與外族交往的特殊方式減少了其原始語言使用的頻率和範圍，從而也減少了其語彙流傳後世的幾率。這也許正是嚈噠語在巴克特里亞文文書沒有留下痕跡的重要原因。

6.《梁書·西北諸戎傳》"滑國條"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河南卽吐谷渾，係鮮卑之一支。"河南人譯然後通"，是說凡吐谷渾人皆能傳譯嚈噠語。如果嚈噠人說的是一種伊朗語，顯然無法解釋這一條關於嚈噠語的重要史料，因爲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吐谷渾語屬伊朗語族。

7.《魏書·西域傳》"嚈噠國條"稱"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又稱嚈噠人"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翦髮"。既然

“纓絡”、“翦髮”皆伊朗之風，“諸胡”就是指伊朗諸族。嚈噠語與“諸胡不同”，事實上已經排除了嚈噠人操伊朗語的可能性。

8. 一說漢文“厭帶夷栗陁”和希臘文Έφδαλίται均出自粟特文複數Heβtalit（單數Heβtalak）。[24] 薩曼王朝曼蘇爾一世（Amir Sadeed Abu Saleh Mansur ebne Nuh, 961—976年）的大臣伯勒阿米（Bel^cami）節譯了泰伯里史。他在敍述伊嗣俟二世（Yezdedjerd II, 438-457）與嚈噠之戰時，提及“嚈噠”這一族名之語源：在Bukhārā語中，haitāl意爲“强大的”。[25] 而此詞因而被認爲與和闐塞語的hītala-（英勇的）相關。[26] 今案：此說果然，亦不能據以指嚈噠爲伊朗語族。

《梁書·西北諸戎傳》載滑國王名“厭帶夷栗陁”，按之年代，無疑是誤族稱爲王名。“厭帶夷栗陁”一名很可能得諸隨嚈噠使臣朝梁之索格底亞那人。因此，不妨認爲“厭帶夷栗陁”一名出自粟特文複數Heβtalit。但是，必須指出，Heβtalit不過是嚈噠族名的粟特語譯而已。[27] 其粟特語的字面意義是粟特人在音譯“嚈噠”這一族稱時所賦予的。由於粟特役屬嚈噠，因而是褒義的。既然粟特語（包括Bukhārā語）與和闐塞語均屬東伊朗語，Heβtalit與hītala-有關也就不足爲怪了。

當以一種語言音譯另一種語言的專名時，既可能是完全的音譯，也可能在音譯的同時賦予字面意義。Ephthalite一名就屬於後一種情況。這種情況在漢文史籍中屢見不鮮。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漢書·西域傳上》所見“去胡來王”。（顏注：“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而一般認爲“去胡來”應是Tochari的漢譯。

要之，在未能證實嚈噠語是伊朗語之前，不應用粟特語詮釋其族稱，更不可採用這一詮釋的結果來證明嚈噠人說伊朗語。

9. 說者以爲：嚈噠人採用“沙（þαυο）”、“翕侯（ιαβγο）”等伊朗語的官稱號，可證其人操伊朗語。

今案，這完全不足以證明嚈噠人的原始語言是伊朗語，其理不言自明。嚈噠也有“可汗”、“特勤”等阿爾泰語系的官稱號，[28] 同樣不足以證明其人操阿爾泰語系諸語言。

10.《通典·邊防典·西戎五》：“悒怛同，至隋時又謂悒怛國焉。”一說“同”[dong] 可能是一個嚈噠語詞彙，意爲“國”，故該詞可指爲若干伊朗語之後綴 -don。[29]

今案：“悒怛同”云云，乃承上“嚈噠國條”而言：“悒怛（同）[國]：[嚈噠國,] 至隋時又謂悒怛國焉。”“悒怛”兩字之後若爲“同”字，則《通典》原文應作：“悒怛同：嚈噠國至隋時又謂悒怛同焉”。這就是說，“悒怛同”什麼也說明不了。

我認爲，探討嚈噠的族屬不能僅從體貌特徵和語言這兩個方面進行，而必須和追溯嚈噠的族源結合起來。族源不明，勢必片面地理解有關體貌特徵和語言的資料，從而誤入歧途。

至於族源和族屬的關係，首先可以指出的是：《魏書·西域傳》明確記載嚈噠人是在公元四世紀中葉從塞北度阿爾泰山西遷中亞的。除非能夠否定這條記載，否則難以想像，降至四世紀中葉，塞北還有一個純歐羅巴種遊牧部族，深目高鼻，形貌如上述中亞錢幣、印章所見。這種可能性即使不能徹底排除，也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同樣，如果不搞清楚嚈噠人的最早的居地，也就無法推斷其原始語言。當然也就不可能說明吐谷渾人能譯嚈噠語的原因。而祇要考慮到吐谷渾和嚈噠均可溯源於遼東，而吐谷渾之北鄰乙弗敵與嚈噠又是同源異流的關係，《梁書·西北諸戎傳》這則的記載就可以得到說明了。[30]

總之，嚈噠族屬伊朗說的證據均難以成立。

■ 注释

[1] Judith Lerner, "Some Central Asian Seals in the Rosen Collection." In M. Alram, ed.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 Wien, 1999, pp. 265-276, esp. 268, 275, 276: fig. 9.

[2] R. Göbl, *Doc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hc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4 vols. Wiesbaden, 1967, Em. 36 (v. I, p. 56; v. III, Tafel 14, no. 36; v. IV, Tafel 24, no. 36).

[3] 注 2 所引 R. Göbl 書 IV, Tafel 14, no. 1。

[4] John C. Rolfe, tr. *Ammianus Marcellin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39.

[5] E. Herzfeld, "Kushano-Sasanian Coins."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38 (1930), p. 19, & Table I, 24, 25; R. Ghirshman, *Les Chionites-Hephthalites*. Le Caire: 1948, pp. 9-10 (Fig. 5, 6, 7); Pl. II, 1, 2.

[6] 注 5 所引 R. Ghirshman 書，p. 10 (Fig. 5, 6, 7); Pl. II, 1, 2；A. Biswas,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ūṇas in India. Delhi, 1973, pp. 18-22.

[7] R. Frye, *The Heritage of Persia*. Cleveland and New York, 1963, p. 217.

[8] H. Humbach, *Baktrische Sprachdenkmäler*, I. Wiesbaden, 1966, pp. 28-31, 56-57.

[9] D. Bivar, "Sasanians and Turks in Central Asia." In G. Hambly, ed.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69, p. 54; D. Bivar. "The History of Eastern Iran." In E.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 (1): The Seleucid, 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 CUP, 1983, p. 211.

[10] G. Moravcsik, *Byzantinoturcica, die Byzantinischen Quellen der Geschichte der Türkvölker*, II. Berlin, 1958, pp. 231-237.

[11] 馬小鶴"溫那沙（αλχονο þαυο）考"，《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pp. 408-424。

[12] 注11所引馬小鶴文。

[13] 馬小鶴"嚈噠族屬伊朗說"，《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pp. 429-479。以下引伊朗說不另注者均見此文。

[14] B. A. Litvinskiy,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3,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 D. 250 to A. D. 750. Unesco Publishing, 1996, p. 139.

[15] G. Azarpay, *Sogidan Painting*. Berkeley, 1981, p. 200.

[16] 注14所引Litvinskiy注書，pp. 136-137, pl. 1; p. 177。

[17] H. B. Dewing, tr.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New York, 1914.

[18] 注13所引馬小鶴文。

[19] 鮮卑本有所謂“白虜”之稱（《太平御覽》卷三五九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可能是膚色較淺的緣故。而據我考證，嚈噠與鮮卑淵源頗深。說見余太山“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 1 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pp. 180-210。

[20] 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 年， pp. 129-142。

[21] K. Enoki,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Ephthalit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18 (1959): pp. 1-58.

[22] 傳世所謂《梁職貢圖》的摹本，其原底應爲裴子野繪製的《方國使圖》。爲方便起見，在此仍稱之爲《梁職貢圖》。見余太山“《梁書·西北諸戎傳》與《梁職貢圖》”，《燕京學報》新 5 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pp. 93-123。

[23] N. Sims-Williams, *New Light on Ancient Afghanistan*. Lond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997, pp. 1-25; N. Sims-Williams, *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 *Legal and Economic Documents*. Oxford, 2000; N. Sims-Williams, *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I: Letters and Buddhist Texts*. Oxford: Nour Founda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Azimuth Editions, 2007.

[24] W. B. Henning, “Neue Materialen zur Geschichte des Manichäismus.”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1936, pp. 1-18, esp. 17, no. 2.

[25] Bel^cami, *Chronique de Abou Djafar Mohammed ben Djarir ben Yezid Tabari*. Traduite sur la version persane d’Abou-ᶜAli Mohammed Belᶜami par H. Zetenberg, vol. 2. Paris, 1869, p. 128.

[26] В. А. Лившиц, "Коткрытию бактрийских надписей на Кара-тепе." In: Б. Я. Ставиский, ed., *Буддийские пещеры Кара-тепе в старом Термезе*. Москва 1969, pp. 47-81; H. W. Bailey, "North Iranian Problem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42 (1979): pp. 207-210.

[27] 嚈噠早有族名，漢語作"乙弗敵"（說見注 19 所引余太山文），Heβtalak 應該是其粟特語譯。

[28] 嚈噠有"可汗"、"可敦"號見 C. E. Bosworth, tr.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Ta'rīkh al-rusul wa'l-mulūk)*, vol. 5, The Sāsānids, the Byzantines, the Lakhmids, and Yem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94-99。嚈噠有"葉護（Jovula）"號，見印度匈奴亦即嚈噠之銘文：G. Bühler, "The New Inscription of Toramana Shaha." *Epigraphia India* I (1892): pp. 238-241. 嚈噠有"特勤"號見《洛陽伽藍記》卷五所引宋雲"行記"。

[29] 見注 21 所引 K. Enoki 文。

[30] 按照我關於嚈噠族屬的乙弗鮮卑說，嚈噠語可能既有鮮卑語的因素，又有朝鮮語的因素，而朝鮮語的繫屬迄無定論。

徵引文獻

漢語文獻（1）

《北齊書》，（唐）李百藥撰，中華書局，1972年。

《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1983年。

《冊府元龜》，（宋）王欽若等編，中華書局影印，1982年。

《古今姓氏書辯證》，（宋）鄧名世撰，（宋）鄧椿年編，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922冊）。

《漢書》，（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中華書局，1975年。

《漢西域圖考》，（清）李光廷撰，《皇朝藩屬輿地叢書》第四集，金匱浦氏靜寄東軒石印本，1903年。

《後漢書》，（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1973年。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1982年。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中華書局，1975年。

《鉅宋廣韻》，（宋）陳彭年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

《梁書》，（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1973年。

《南齊書》，（梁）蕭子顯撰，中華書局，1972年。

《三國史記》，日本京城府：古典刊行會，1931 年。

《三國志》，（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中華書局，1975 年。

《史記》，（漢）司馬遷撰，中華書局，1975 年。

《宋書》，（梁）沈約撰，中華書局，1983 年。

《隋書》，（唐）魏徵、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1982 年。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469—470 冊）。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中華書局影印，1985 年。

《唐會要》，（宋）王溥撰，中華書局，1955 年。

《通典》，（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1988 年。

《通志》，（宋）鄭樵撰，中華書局影印，1987 年。

《魏書》，（北齊）魏收撰，中華書局，1984 年。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中華書局，1986 年。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撰，中華書局，1975 年。

《酉陽雜俎》，（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中華書局，1981 年。

《元和郡縣圖志》，（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中華書局，1983 年。

《元和姓纂》，（唐）林寶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90 冊）。

《周書》，（唐）令狐德棻等撰，中華書局，1983 年。

《資治通鑒》，（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中華書局，1976 年。

漢語文獻（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彥悰著，《大正新脩大藏經》T50, No.

2053。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辯機著，章巽校點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法顯傳校注》,（東晉）法顯撰，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翻譯名義集》,（宋）法雲編，《大正新脩大藏經》T54, No. 2131。
《付法藏因緣經》,（北魏）吉迦夜、曇曜譯，《大正新脩大藏經》T50, No. 2058。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箋釋》,［日］藤田豐八箋釋，北京，1910 年。
《歷代三寶記》,（隋）費長房撰，《大正新脩大藏經》T49, No. 2034。
《蓮華面經》,（隋）那連提黎耶舍譯，《大正新脩大藏經》T12, No. 0386。
《洛陽伽藍記校釋》,（魏）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中華書局，1963 年。
《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唐）慧超著，張毅箋釋，中華書局，1994 年。
《西域求法高僧傳》,（唐）義淨撰，《大正新脩大藏經》T51, No. 2066。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大正新脩大藏經》T50, No. 2060。
《增一阿含經》,（前秦）曇摩難提譯、（東晉）僧伽提婆修正，《大正新脩大藏經》T2, No. 125。
《正法念處經》,（北魏）般若流支譯，《大正新脩大藏經》T17, No. 721。

漢語文獻（3）

岑仲勉“嚈噠國都考”,《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 年，pp. 202-207。
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

陳寅恪"五胡問題及其他",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编年事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p. 194-195。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馬長壽《突厥人和突厥汗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中華書局,1985年。
馬小鶴"溫那沙(αλχονο þαυο)考",《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pp. 408-424。
馬小鶴"嚈噠族屬伊朗說",《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pp. 429-479。
寧夏固原博物館《固原北魏墓漆棺畫》,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孫機"固原北魏漆棺畫",《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pp. 122-138。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中華書局,1983年。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78年,pp. 382-450。
王堯、陳踐譯注《敦煌吐蕃文獻選》,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夏鼐"综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銀幣",《考古學報》1974年第1期,pp. 91-110。
徐中舒、鄭德坤、馮家昇"月氏爲虞後及氏和氐的問題",《燕京學報》第13期(1933年),pp. 209-238。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學出版社,1958年。
余太山"柔然—阿瓦爾同族論質疑——兼說阿瓦爾即悅般",《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163-192。
余太山"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193-216。

余太山“董琬、高明西使考”，《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 217-244。

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

余太山“《梁書·西北諸戎傳》與《梁職貢圖》”，《燕京學報》新第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pp. 93-123。

周偉州“魏晉十六國時期鮮卑族向西北地區的遷徙及其分佈”，《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pp. 31-38。

周偉洲《南涼與西秦》，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漢語文獻（4）

A

《蒙古社會制度史》，[蘇] 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焌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西突厥史料》，[法] 沙畹著，馮承鈞譯，中華局，1958年。

《印度的文明》，[法] 格魯塞著，常任俠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

B

[蘇] M. M. 梯亞闊諾夫“邊吉坎特的壁畫和中亞的繪畫”，佟景韓、張同霞譯，《美術研究》1958年第2期，pp. 77-102.

日語文獻

江上波夫“ユーラシア北方民族の葬禮における剺面，截耳、剪髮について”，《ユーラシア北方文化の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51年，pp. 9-15。

江上波夫“匈奴・フン同族論”，《ユ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1954年，pp. 319-402。

榎一雄“エフタル民族の起源”，《和田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講談社，1951年，pp. 133-150。

榎一雄“エフタル民族に於けるイラン的要素”，《史學雜誌》，61～1（1952年），pp. 1-26。

榎一雄“ソグディアナと匈奴”1-3，《史學雜誌》64～6（1955年），pp. 1-28；64～7（1955年），pp. 31-49；64～8（1955年），pp. 31-54。

榎一雄“魏書粟特國傳と匈奴・フン同族問題”，《東洋學報》37～4（1955年），pp. 1-48。

榎一雄“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0～3（1958年），pp. 1-52。

榎一雄“滑國に關する梁職貢圖の記事について”，《東方學》27（1964年），pp. 12-32。

榎一雄“エフタル民族の人種論について”，《東方學》29（1965年），pp. 1-29。

榎一雄“初期アルメニア史書に見えるエフタルとクジャン”，《東洋學報》47～4（1965年），pp. 1-56。

藤田豐八“大宛の貴山城と月氏の王庭”，《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年，pp. 1-43。

藤田豐八“月氏の故地とその西移の年代”，《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年，pp. 45-96。

船木勝馬“エフタルに關する中國史料について”，《史淵》61（1954年），pp. 57-77。

桑山正進“バーミヤーン私注”，《建築史學》2（1984年），pp. 127-150。

桑山正進“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エフタル·テュルクとその城邑”，《三笠宮殿下古稀記念オルエント學論集》，小學館（1985年），pp. 140-154。

羅豐“固原漆棺畫に見えるペルシャの風格”，《古代文化》44～8（1992年），pp. 40-52。

松田壽男《漢魏六朝の西域》，《世界文化史大系》6，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36年。

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考1-2”，《史學雜誌》48～11（1937年），pp. 49-85；48～12（1937年），pp. 37-71。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52年。

松田壽男等《アジア歷史事典》第1卷，東京：平凡社，1959年。

松田壽男“アルタイ山とエフタル族”，《史觀》57·58（1960年），pp. 8-21。

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增補版)，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70年。

宮崎五十騎“嚈噠種族の發展”，《青丘學叢》4, 6, 21（1931-1935年），pp. 69-92, 73-91, 163-184。

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東京：平凡社，1975年。

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4（1977年），pp. 1-48。

内藤みどり“西突厥の一君主 Turxanthus について”,《東方學》24（1962年），pp. 30-40。

内藤みどり“東ローマと突厥の交涉に關する史料”，《遊牧社會史探究》22（1963年），pp. 1-26。

内藤みどり“エフタル民族とその發展”，《東西文化交流史》，東京：雄山閣，1975年，pp. 134-147。

内藤みどり“評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東洋學報》70～3·4（1989年），pp. 167-176。

重松俊章“嚈噠種族考”，《史學雜誌》28～1，2（1917年），pp. 20-50，114-154。

白須淨真“高車王·彌俄突に下した北魏·宣武帝の詔——その脱字補充に至る牛步の考と師の示教——”,《季刊東西交涉》3～4（1984年）,冬の號，pp. 47-49。

白鳥庫吉“蒙古及び突厥の起源”,《白鳥庫吉全集·塞外民族史研究（上）》（第4卷），東京：岩波，1970年，pp. 541-547。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上）》（第6卷），東京：岩波，1970年，pp. 1-55。

白鳥庫吉“粟特國考”，《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第7卷），東京：岩波，1971年，pp. 43-123。

内田吟風“柔然族史序說”，羽田博士還曆記念會編《羽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0年，pp. 131-171。

内田吟風“蠕蠕の寄多羅月氏領バルク地方侵入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8～2（1959年），pp. 23-34。

內田吟風"吐火羅(Tukhāra)國史考",《東方學會創立25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72年，pp. 91-110。

內田吟風"魏書西域傳原文考釋（下）"，《東洋史研究》31～3（1972年），pp. 58-72。

內田吟風"匈奴西移考"，《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pp. 115-141。

內田吟風《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

內田吟風"西突厥初世史の研究"，《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88年，pp. 429-493。

山田龍城"蓮華面經について——グプタ末期のインド佛教事情"，《山口博士還暦記念印度學佛教學論集》，京都：法藏館，1955年，pp. 110-123。

西方文獻

Altheim, F. *Geschchte der Hunnen,* II, III, V. Berlin, 1969, 1975, 1962.

Azarpay, G. *Sogidan Painting*. Berkeley, 1981.

Bailey, H. W. "Kanaiṣk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p. 14-28.

Bailey, H. W. "North Iranian Problem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42 (1979): pp. 207-210.

Belᶜami, *Chronique de Abou Djafar Mohammed ben Djarir ben Yezid Tabari. Traduite sur la version persane d'Abou-ᶜAli Mohammed Belᶜami par H. Zetenberg*, vol. 2. Paris, 1869.

Bhandarkar, R. G. *R. G. Bhandarkar Commemorations Volume*. Poona, 1917.

Biswas, A.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ūṇas in India*. Delhi, 1973.

Bivar, A. D. H. "The Kushano-Sassanian Coin Serie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18 (1956): pp. 13-42.

Bivar, D. "Sasanians and Turks in Central Asia." In G. Hambly, ed.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69, pp. 49-62.

Bivar, D. "The History of Eastern Iran." In E.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1). Cambridge, 1983, pp. 181-231.

Blockley, R. C.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Oly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ARCA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exts, Papers and Monographs 10. Francis Cairns, 1981-1983.

Blockley, R. C.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Introductory Essay, Text, 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 Published by Francis Cairns Ltd.,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Redwood Burn Lid. Trowbridge, Wiltshire, 1985.

Bosworth, C. E, tr.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Ta'rīkh al-rusul wa'l-mulūk)*, vol. 5, The Sāsānids, the Byzantines, the Lakhmids, and Yem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Bühler, G. "The New Inscription of Toramana Shaha." *Epigraphia India* I (1892): pp. 238-241.

Chavannes, E.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Paris, 1903.

Cunningham, A. "The Ephthalite or White Huns."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2 (1871): pp. 75-82.

Cunningham, A. "Later Indo-Scythians."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3, 13 (1893):

pp. 184-202.

Cunningham, A. "Later Indo-Scythians." *Numismatic Chronicle* Series 3, 14 (1894): pp. 243-293.

Deguignes, J.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etc*, I-II. Paris, 1756.

Dewing, H. B., tr.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ol. 1. New York, 1914.

Dieterich, K. *Byzantinische Quellen zur Länder- und Völker Kunde*, II. Leipzig, 1912.

Dindorf, L. *Historici Graeci Minores*, II. Lipsiae 1871.

Drouin, E. "Mémoire sur les Huns Ephthalites." *Le Muséon* 14 (1895): pp. 232-247, 277-288.

Dvivedī, Sudhākara. ed. *Bṛhatsaṁhitā* of *Vārāhamīhir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Bhaṭṭotpala. Banaras: Saṁvat 1895-97.

Enoki, K. "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Ephthalit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18 (1959): pp. 1-58.

Fleet, J. F.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3, Inscriptions of the Early Gupta Kings and their Successors. Calcutta: 1888.

Fleet, J. F. "The Coins and History of Toramana." *The Indian Antiquary* 18 (1889): pp. 225-230.

Franke, O.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III. Berlin-Leipzig, 1937.

Frye, R. *The Heritage of Persia*. Cleveland and New York, 1963.

Ganguly, K. M., tr. *Mahābhārata*. Calcutta, 1883-96.

Ghirshman, R. *Les Chionites-Hephthalites*. Le Caire, 1948.

Gibbon, E. *The Decline and Falls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3. London, 1912.

Göbl, R. *Doc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hc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4 vols. Wiesbaden, 1967.

Grousset, R.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New Jerssy, 1970.

Guṇabhadra. *Uttra Purāṇa*. Palm-leaf Extracts in Bhandarkar Comm, Poona, 1917.

Hansen, O. "Die Berliner Hephthaliten Fragment." *La Nouvello Clio* 1951, pp. 41-69.

Hansen, O. "Ein Neues Hephthaliten-Fragment." *La parela del passato* 20, Napoli, 1951, pp. 361-366.

Haussig, H. W. "Theoph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 *Byzantion* 23 (1953): pp. 275-462.

Haussig, H. W. "Die Quellen über die zentralasiatische Hekunft der europäischen Aware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II (1956): pp. 21-43.

Henning, W. B. "Neue Materialen zur Geschichte des Manichäismus."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1936, pp. 1-18.

Herzfeld, E. "Kushano-Sasanian Coins."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38 (1930).

Hirth, F. "Ü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M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1899, II, pp. 245-278.

Humbach, H. *Baktrische Sprachdenkmäler*, I. Wiesbaden, 1966.

Jayaswal, K. P. *An Imperial History of India in a Sanscrit Text (c. 700 BC – c. 770 AD)*. Lahore: Motilal Banarsi Dass, 1934.

Jones, H. L., tr.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8 vols. London, 1916-1936.

Kingsmill, Thos. W. "Migr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White Hu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8, pp. 285-304.

Klaproth, J. *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Paris, 1824.

Konow, S. "The White Huns and Tokharian." *Festskrift til Professor Olaf Broch*. Oslo, 1947, pp. 77-82

Langlois, V. *Collection des historiens ancients et modernes de l'Armenie*, vol 1-2. Paris, 1867-1869.

Lerner, J. "Some Central Asian Seals in the Rosen Collection." In M. Alram, ed.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 Wien, 1999, pp. 265-276.

Litvinskiy, B. 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3,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 D. 250 to A. D. 750. Unesco Publishing, 1996.

Maenchen-Helfen, O. J. *The World of the Huns, Studies 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London, 1973.

Majumdar, R. C. *The Classical Ag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 People*, vol. 3. Bombay, 1954.

Markwart, J.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Marquart, J.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1901.

Marquart, J.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Eran*, I-II, Göttingen, 1896-1905.

Marquart, J. "Die Nichtslavischen (altbulgarischen) Ausdrücke in der Bulgarischen

Fhrstenliste." *T'oung Pao* 11 (1910): pp. 649-680.

Martin, M. F. C. "Coins of Kidāra and the Little Kuṣāṇ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 3, 1937, No. 2 = *Numismatic Supplement*, No. 47, pp. 23-50.

Martin, V. de St. *Les Huns Blancs ou Ephthalites des Historiens Byzantins*. Paris, 1849.

Martin, V. de St. *Mémoire analytique sur la carte de l'Asie centrale et de l'Inde, Mémoire sur les contrees occidentales*, II. Paris, 1858.

McCrindle, J. W., tr. Cosmas, *Christiana Topographia*. Publications of the Hakluyt Society, 1897.

McCrindle, J. W., tr. *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01.

McGovern, W. M.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9.

Mingana, 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A New Document." *Bulletin of the John-Rylands-Library Manchester* 9~1 (1925), 297-371.

Moravcsik, G. *Byzantinoturcica, die Byzantinischen Quellen der Geschichte der Türkvölker*, II. Berlin: 1958.

Müller, C.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æcorum* IV, *Disposuit, Notis et Prolegomenis Illustravit*. Paris, 1851.

Niebuhr, B. C., ed. Theophylacti Simocattae, *History (Greek and Latin text)*,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pars. XI, Bonn, 1828.

Nöldecke, T. *Geschichte der Perser und Araber zur Zeit der Sasaniden, aus arabischen Chronik des Tabari*. Leyden, 1879.

Parker, E. H. "The Ephthaltes Turks." *Asiatic Quaterly Review* (1902): pp. 131-159.

Pathak, K. B. "New Light on the Gupta Era and Mihirakula." *Indian Antiquary* 46 (1917): pp. 287-296; 47 (1918): pp. 16-22.

Rawlinson, G. *The Seven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 London, 1876.

Reinaud, J. T., tr. *Géographie d'Aboulfeda*. Paris, 1848.

Richthofen, F. F. vo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 1. Berlin, 1877.

Rolfe, J. C., tr. *Ammianus Marcellin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39.

Sankar, K. G. "The Hun Invasion of Industān." *New Indian Antiquary* 4 (1941-42): pp. 36-43.

Sharma, G. R. *The Excavations at Kauśāmbī (1957-1959)*. Allahabad, 1960.

Sharma, R. R., ed. *Harivaṁśa Purāṇa* (Txet and Trans.). Moradabad, 1928.

Shoshin Kuwayama. "The Hephthalites in Tokharistan and Northwest India." *Zinbun: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Number 24 (1989): pp. 89-134.

Sims-Williams, N. *New Light on Ancient Afghanistan*. Lond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997, pp. 1-25.

Sims-Williams, N. *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 Legal and Economic Documents, Oxford, 2000.

Sims-Williams, N. *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I: Letters and Buddhist Texts*. Oxford: Nour Founda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Azimuth

Editions, 2007.

Sircar, D. C. *Select Inscriptions, bearing on Indian History and Civilisation.* Calcutta, 1942.

Smith, V. A. "History and Coinage of the Gupta Perio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63 (1894): pp. 193-195.

Smith, V. A. *Early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1924.

Specht, Ed. "Études sur l'Asie central d'après les historiens chinois." *Journal Asiatiqua* 8~2 (1883): pp. 317-350.

Stein, A., ed. *Rājataṅginī of Kalhaṇa.* Westminster, 1900.

Stein, A. "White Huns and Kindred Trib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 Northwest Frontier." *India Antiquary* 34 (1905): pp. 73-87.

Sukthankar, V. S., ed. *Mahābhārata.* Poona, 1933.

Thakur, U. *The Hūṇas in India.* Varanasi, 1967.

Thomson, R. W., tr. *Eḷishē. History of Vardan and the Armenian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Upadhye, A. N., ed. *Udyotana Sūri, Kuvalayamālā.* Bombay, 1959.

Velankar, D. H., ed. *Raghuvaṃśa of Kālidās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Mallinātha.* Bombay, 1948.

Walford, E., tr. *Evagrius Scholastic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AD 431-594).* London, 1846.

Warner, A. G. and E., tr. *Firdausī, Sháhnama*, vol. 7. London, 1915.

Whitby, Michael and Mary.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of Simocatta: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Wilson, H. H., tr. *Viṣṇu Purāṇa*, 6 vols. London, 1864-1870.

Wright, W. *The Chronicle of Joshua the Stylite, with a English Translation into and Notes*. Cambridge, 1882.

Yarshater, 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 (1): The Seleucid, 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 CUP, 1983.

Yule, H.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London, 1942.

俄語文獻

Лившиц, В. А. “К открытию бактрийских надписей на Кара-тепе.” In: Б. Я. Ставиский, ed. *Буддийские пещеры Кара-тепе в старом Термезе*. Москва 1969, pp. 47-81.

索引

【說明】本索引收入正文中主要人名、地名、族名等，分漢文、西文兩部份，按音序排列。條目後數字爲本書頁碼。

後記

孫毓棠師指導我自嚈噠入手研究中亞史，已經將近七年了。老師年踰古稀，體弱多病，又肩負重任，但從未放鬆對我的教育、培養，從治學的原則到具體的方法，事無巨細，不厭其煩、不厭其詳，耗費了不知多少心血。在本書脫稿之際，感激之情，確實難以言語形容。

在研究嚈噠史的過程中，我還不斷受到季羨林師、翁獨健師、張廣達師、馬雍師的指點、啓發、鼓勵和鞭策。

復旦大學歷史系章巽教授，以及新疆社會科學院中亞研究所郭平粱先生、新疆大學歷史系魏良弢先生、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所周偉洲先生均曾不吝賜教，爲我排難釋疑。

南京大學已故韓儒林教授也曾在百忙中爲我訂正謬誤。

王鏞、王譞、任榮康、宋峴、宋曉梅、林梅村、芮傳明、吳焯、吳玉貴、邱克、馬小鶴、徐文堪、黃靖、羅益羣諸位學長則在我需要的時候，一再伸出支援的手，以各自出色的專長，彌補了我各種知識的缺陷。

日本學者梅村坦氏、北村高氏、白須淨真氏、堀直氏，以及一些訪問和留學日本和歐美的師友，尤其是夏應元先生和錢滿素先生，先後爲我蒐集和郵寄了不少國內圖書館見不到的外文資料，使我能較好地瞭解國際學術界有關的研究成果。

我所和我室的負責人千方百計爲科研人員解決工作和生活中碰到的問題。對此，我也是深有體會的。

齊魯書社的領導和編輯同志爲本書的出版克服了許多困難，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謹在此向一切指導、關心、幫助我的人表示我最深切的謝意。

余太山

於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中外關係史研究室

1985年7月10日

再版後記

《嚈噠史研究》一書完稿於 1985 年。今天看來，自然有許多不盡人意處。我曾想重寫一遍，而終於没有動手，是因爲這本書對我來說意義特殊。這是我唯一一本在多位老師指導下完成的書，字裏行間留下了太多值得回憶的東西。

這次重印，觀點、材料和結構保持不變，衹是修改了行文方式，删去了幾處明顯的錯誤，一些徵引由間接换成了直接。若干新認識則另文附於書後。

作者

2011 年 1 月 9 日

余太山主要出版物目錄

一、專著

1 《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9月。

2 《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2月。

3 《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6月。

4 《古族新考》，中華書局，2000年6月。

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11月。

6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2005年3月。

7 《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

二、論文

1 《魏書·嚈噠傳》考釋，《文史》第20輯（1983年），pp. 258-263。

2 《魏書·粟特國傳》辨考，《文史》第21輯（1983年），pp. 57-70。

3 嚈噠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中亞學刊》第 1 輯（1983 年），中華書局，pp. 91-115。

4 《魏書·小月氏、大月氏傳史實辨考》，《學習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生院學報）》1984 年第 3 期，pp. 64-69。

5 關於頭羅曼和摩醯邏矩羅，《南亞研究》1984 年第 3 期，pp. 9-15。

6 嚈噠史二題，《中華文史論叢》1985 年第 2 期，pp. 189-204。

7 關於嚈噠的覆亡，《西北史地》1985 年第 4 期，pp. 38-43。

8 柔然與西域關係述考，《新疆社會科學》1985 年第 4 期，pp. 67-77，80-81。

9 柔然、阿瓦爾同族論質疑——兼說阿瓦爾即悅般，《文史》第 24 輯（1985 年），pp. 97-113。

10 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中國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pp. 57-74。

11 關於董琬、高明西使的若干問題，《文史》第 27 輯（1986 年），pp. 31-46。

12 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編後，《新疆社會科學》1986 年第 4 期，pp. 124-126。

13 嚈噠的族名、族源和族屬，《文史》第 28 輯（1987 年），pp. 109-125。

14 《太伯里史》所載嚈噠史料箋證（宋峴漢譯），《中亞學刊》第 2 輯（1987 年），中華書局，pp. 51-64。

15 烏孫考，《西北史地》1988 年第 1 期，pp. 30-37。

16 奄蔡、阿蘭考，《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pp. 102-110，114。

17 《漢書·西域傳》所見塞種，《新疆社會科學》1989 年第 1 期，pp. 67-78。

18 匈奴、鮮卑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pp. 153-171。

19 大夏和大月氏綜考,《中亞學刊》第 3 輯(1990 年),中華書局,pp. 17-46。

20 匈奴、Huns 同族論質疑,《文史》第 33 輯(1990 年),pp. 57-73。

21 Who were Toramana and Mihirakula? *Asia-Pacific Studies* 1990, pp. 95-108.

22 塞種考,《西域研究》1991 年第 1 期,pp. 19-33。

23 大宛和康居綜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第 1 期,pp. 17-45。

24 關於鄯善都城的位置,《西北史地》1991 年第 2 期,pp. 9-16。

25 安息與烏弋山離考,《敦煌學輯刊》1991 年第 2 期,pp. 82-90。

26 罽賓考,《西域研究》1992 年第 1 期,pp. 46-61。

27 關於 Huns 族源的臆測,《文史》第 34 期(1992 年),pp. 286-288。

28 張騫西使新考,《西域研究》1993 年第 1 期,pp. 40-46。

29 東漢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3 年第 2 期,pp. 19-39。

30 西漢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pp. 9-24;第 2 期,pp. 125-150。

31 兩漢西域戊己校尉考,《史林》1994 年第 1 期,pp. 8-11,7。

32 貴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屬,《文史》第 38 輯(1994 年),pp. 18-28。

33 漢魏通西域路線及其變遷,《西域研究》,1994 年第 1 期,pp. 14-20。

34 前秦、後涼與西域關係述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4 期,pp. 68-73。

35 西涼、北涼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史地》1994 年第 3 期,pp. 1-5。

36 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 4 輯(1995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pp. 73-96。

37 新疆出土文書劄記:I.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緣禾"、"建平"年號,II. 關於"李柏文書",《西域研究》1995 年第 1 期,pp. 77-81。

38 前涼與西域關係述考,《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pp. 139-144。

39 兩漢西域都護考，《學術集林》卷五，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 年，pp. 214-242。

40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的綠洲大國稱霸現象，《西北史地》1995 年第 4 期，pp. 1-7。

41《榎一雄著作集》第 1—3 卷《中亞史》(書評)，《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卷(1995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pp. 381-389。

42 南北朝與西域關係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6 年第 1 期，pp. 1-32。

43《後漢書·西域傳》與《魏略·西戎傳》的關係，《西域研究》1996 年第 3 期，pp. 47-51。

44 說大夏的遷徙——兼考允姓之戎，《夏文化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96 年，pp. 176-196。

45《魏書·西域傳》原文考，《學術集林》卷八，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pp. 210-236。

46 允姓之戎考——兼說大夏的西徙，《中國國際漢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pp. 673-711。

47 關於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體例，《西北師大學報》1997 年第 1 期，pp. 17-22，92。

48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南北道綠洲諸國的"兩屬"現象——兼說貴霜史的一個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 年第 2 期，pp. 1-5。

49《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張騫李廣利傳、西域傳》的關係，《學術集林》卷一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 年，pp. 162-179。

50 曹魏、西晉與西域關係述考，《文史》第 43 輯（1997 年），pp. 61-71。

51 有虞氏的遷徙——兼說陶唐氏的若干問題，《炎黃文化研究（炎黃春秋增

刊)》第4期（1997年),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社,pp. 52-59,67;第5期（1998年)，pp. 62-66，75。

52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族名、國名、王治名，《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pp. 238-251。

53《梁書·西北諸戎傳》與《梁職貢圖》,《燕京學報》新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pp. 93-123。

54 昆吾考，《中華文史論叢》第58輯（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pp. 245-257。

55 評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漢譯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主辦《中國出版》1999年第4期，中心插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西域考古圖記》5卷，原著：[英] 奧雷爾·斯坦因，翻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56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里數，《文史》第47輯（1999年第2期)，pp. 31-48；第48輯（1999年第3期)，pp. 129-141。

57 讀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書品》1999年第4期，pp. 29-34。

58 關於甘英西使，《國際漢學》第3輯，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pp. 257-263。

59 犬方、鬼方、舌方與獫狁、匈奴同源說，《歐亞學刊》第1輯，中華書局，1999年，pp. 7-28。

60 中國史籍關於希瓦和布哈拉的早期記載，《九州》第2輯，商務印書館，1999年，pp. 157-160。

61 荀悅《漢紀》所見西域資料輯錄與考釋,《中亞學刊》第5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pp. 216-238。

62 馬雍遺作目錄，《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第3期，pp. 26-29。

63 樓蘭、鄯善、精絕等的名義——兼說玄奘自于闐東歸路線，《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pp. 32-37。

64 義渠考，《文史》第50輯（2000年第1期），pp. 153-158。

65 漢晉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地望，《歐亞學刊》第2輯，中華書局，2000年，pp. 37-72。

66 嚈噠史若干問題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pp. 180-210。

67 讀華濤《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書品》2001年第4期，pp. 35-39。

68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山水，《史林》2001年第3期，pp. 50-56。

69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宗教、神話傳說和東西文化交流，《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pp. 115-127。

70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吐魯番學研究》2001年第1期，pp. 116-123；第2期，pp. 104-111。

71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制度和習慣法，《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pp. 5-14。

72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人口，《中華文史論叢》第67輯（2001年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pp. 62-76。

73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人種和語言、文字，《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pp. 51-57。

74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社會生活，《西域研究》，

2002年第1期，pp. 56-65。

7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物產，《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周年華辰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pp. 437-453。

76 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地望，《歐亞學刊》第3輯，中華書局，2002年4月，pp. 163-183。

77 魚國淵源臆說，《史林》2002年第3期，pp. 16-20。又載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主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科學出版社，2006年，pp. 140-147。

78 有關嚈噠史的笈多印度銘文——譯注與考釋(劉欣如譯注)，《西北民族論叢》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2月，pp. 44-66。

79 新發現的臘跋闍柯銘文和《後漢書·西域傳》有關閻膏珍的記載，《新疆文物》2003年第3—4輯，pp. 43-47。

80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認知和闡述系統，《西北民族論叢》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2月，pp. 43-47。

81 《史記·大宛列傳》要注，《暨南史學》第2輯，2003年，pp. 56-79。

82 《水經注》卷二（河水）所見西域水道考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2集，2004年4月，pp. 193-219。

83 《梁書·西北諸戎傳》要注，《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pp. 93-104。

84 《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有關大秦國桑蠶絲記載淺析，《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pp. 14-16。

85 《周書·異域傳下》要注，《吐魯番學研究》2003年第2期，pp. 54-72。

86 《後漢書·西域傳》要注，《歐亞學刊》第4輯，中華書局，2004年6月，

pp. 261-312。

87 《隋書·西域傳》的若干問題，《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pp. 50-54。

88 渠搜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古史文存•先秦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11月，pp. 331-344。

89 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第69輯（2004年第4期），pp. 49-57。

90 《漢書·西域傳上》要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3集，2004年10月，pp. 125-178。

91 《隋書·西域傳》要注，《暨南史學》第3輯，2004年，pp. 92-123。

92 漢文史籍有關羅馬帝國的記載，《文史》第71輯（2005年第2期），pp. 31-96。

93 匈奴的崛起，《歐亞學刊》第5輯，中華書局，2005年6月，pp. 1-7。

94 裴矩《西域圖記》所見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pp. 16-24。

95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有關早期SOGDIANA的記載，《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法國漢學》第10輯），中華書局，2005年12月，pp. 276-302。

96 《通典·邊防七·西戎三》要注，《文史》第74輯（2006年第1期），pp. 139-160。（與李錦繡合作）

97 《魏略·西戎傳》要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pp. 43-61。

98《魏書·西域傳》(原文)要注,《西北民族論叢》第4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pp. 24-75。

99 宋雲行紀要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pp. 565-591。

100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於東西陸上交通路線的記載，《中國古代史論叢——黎虎教授古稀紀念》，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pp. 242-251。

101 關於法顯的入竺求法路線——兼說智猛和曇無竭的入竺行，《歐亞學刊》第6輯(古代內陸歐亞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卷上)，中華書局，2007年6月，pp. 138-154。

102 劉文鎖著《沙海古卷釋稿》序，中華書局，2007年7月，pp. 1-3。

103 《漢書·西域傳下》要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4集，2007年8月，pp. 187-233。

104 伊西多爾《帕提亞驛程志》譯介與研究，《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pp. 5-16。

105 《穆天子傳》所見東西交通路線，《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pp. 192-206。

106 希羅多德《歷史》關於草原之路的記載，《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4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p. 11-23。

107 宋雲、惠生西使的若干問題——兼說那連提黎耶舍、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的來華路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5集，2008年4月，pp. 25-45。

108 馬小鶴著《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pp. 1-2。

109 托勒密《地理志》所見絲綢之路的記載，《歐亞學刊》第8輯，中華書局2008年12月，pp. 85-98。

110 《那先比丘經》所見“大秦”及其他，《歐亞學刊》第9輯，中華書局2009年12月，pp. 109-114。

111 “History of the Yeda Tribe (Hephthalites): Further Issues.” *Eurasian Studies* I,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pp. 66-119.

112 Αλοχον 錢幣和嚈噠的族屬，《中國史研究》2011 年第 1 輯，pp. 5-16。

113 《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發刊詞，《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創刊號，商務印書館，2011 年，pp. i-iii。

114 關於驪靬問題的劄記，《絲瓷之路——古代中外關係史研究》創刊號，商務印書館，2011 年，pp. 235-244。



http://www.cp.com.cn

